

战争狂人



东条英机

解力夫 著



作者前言

东条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也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在他任日本陆军大臣和内阁总理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先后践踏和蹂躏了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

一提到东条英机，中国人民就会深恶痛绝，他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早在 1935 年，他作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来到我国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所谓“满洲国”大搞什么“强化治安”和“整肃纲纪”，疯狂镇压我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七七”事变前后，他又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分，带领“东条兵团”，侵入我国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践踏了我国的大好河山，建立了察南傀儡政权，屠杀了我国成千上万的同胞。

东条以其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进一步赢得了当年日本反动政府和垄断资本家的赏识，随即被提升为陆军大臣和内阁首相。为了称霸亚洲和进一步奴役世界，1941 年 12 月 8 日（东京时间），他又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而使亚洲的战火愈烧愈旺，人民的灾难也愈来愈重。因此，东条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是当时压迫和残害日本人民的真正元凶！

东条被国际军事法庭正法已 30 多年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大战犯，在日本却被某些人描绘成为“护国英雄”。其中尤以伊东峻一郎撰写的《至诚的铁人东条英机传》一书最为露骨。作者竭力宣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吹捧东条是献身“世界和平”、“救国济世”的领袖；并以大量篇幅宣扬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所谓“德政”！还有人人为他举行追悼会、展览会，放映为他树碑立传的电影。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饱受日本侵略战祸的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愤慨。

为了还东条的本来面目，为了便于人民牢记东条发动侵略战争的沉痛教训，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我根据国内外一些史料和报刊材料撰写了这个战争狂人的传记。对于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矛盾，我查阅了近千万字的中外文资料，力求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表述，但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有限，书中难免有谬误不当之处，敬希赐教。

解力夫

1984 年 2 月于北京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法西斯给世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这次大战的元凶就是希特勒、东条英机和墨索里尼。

本书是用章回体形式分三册撰写这三个罪魁祸首的历史。

第一册为：《盗世奸雄——希特勒》；

第二册为：《战争狂人——东条英机》；

第三册为：《专制魔王——墨索里尼》。

东条英机

第一章 武士世家

毒汁藤上结苦瓜 军阀之家黷武娃
帝国熏陶横侵略 野心勃勃欲征杀

日本侵华战犯东条英机，1884年诞生在日本一个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老刽子手，早年毕业于陆军教导团，是一个由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中将的大军阀，号称为陆军军部内屈指可数的战术家。

东条英教从日本陆军教导团毕业不久，就在1877年参加“西南战争”，为明治天皇平定西乡隆盛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又参与指挥了1894年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当时他作为大本营的高级参谋，辅佐日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大将，为打败中国、吞并朝鲜积极出谋献策。

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封建军阀就多次发出要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叫嚣。明治天皇即位伊始，便制定了分期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所谓“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日本政府在明治天皇即位的那一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就表露了这种野心。《御笔信》中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

日本政府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要求国会通过准备对中国作战的军费预算。当时，他公然声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就在山县发表讲话的这一年，1890年，日本军费的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1892年更高达41%强。随着军费的增加，日本的陆海军在加剧膨胀。据1893年的统计，日本陆军的兵力平时为6.3万余人，战时可达到23万人，日本的海军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894年7月丰岛海战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2艘，共60771吨。还有鱼雷艇24艘，排水量1475吨。此外，为了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还按着东条英教的建议将“西京丸”、“山城丸”、“相横丸”、“近江丸”等商船加以武装，改为军舰，因此，到丰岛海战前，日本海军共拥有舰艇7.2万多吨。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就绪，便开始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起义军提出了“逐灭洋倭”、“尽灭权贵”等口号，反映了这次起义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日本政府早就蓄谋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随即派兵进行镇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派赴朝鲜的侵略军已达1万人左右。

日本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虽已昭然若揭，但满清政府却不积极采取

1877年2月，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封建武士在鹿儿岛举行叛乱，反对明治维新，西南其他地方的封建武士也起兵响应。这场战争前后打了七八个月，政府以优势的兵力击败了西乡的军队。在战争快结束时，西乡身亡，这场叛乱完全被平定下去。叛军战死和被俘后处决的达1万人。西南战争是明治政权建立后发生的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封建武士的叛乱。经过这场战争，明治政府彻底清除了来自封建武士阶级叛乱威胁。

有效的抵抗措施，仍然梦想依靠第三国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当时，日本政府是得到西方帝国主义支持的，而且在军事上又处于优势的地位，于是决意挑起这场侵略战争了。

1894年7月23日，侵入汉城的日军悍然发动军事政变，攻进朝鲜王宫，拘禁了朝鲜国王李熙；两天之后，即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不宣而战，对援助朝鲜的中国北洋舰队发动了海盗式的袭击。丰岛海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大造舆论，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把自己对中国军舰发动海盗式的突然袭击的丑恶行径赖得一干二净，反咬一口，说北洋舰队进攻了日本军舰。

中国军队增援朝鲜本属军事机密，日本又是怎样获知的呢？原来，窃取运兵计划的日本特务石川五一，受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派遣，早就悄悄地隐蔽在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衙门里。石川五一又名义仓告，来中国多年，化装成中国人，一向住在外国租界，以洋行职员的身分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买通了张士珩的书吏刘芬，搞到了中国的运兵计划，便报告了驻天津的日本海军武官井上敏夫。7月22日，日本大本营接获情报后，当即命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于第二天率“松岛”、“千代田”、“桥立”等15艘军舰从佐世保港向朝鲜海岸进发；在双方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海军根据他们政府的命令，对中国舰队进行了卑鄙的海盗式的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丰岛海战后，东条英机的父亲协助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大将，一面休整侵朝的陆军部队，一面改编海军舰队，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从8月9日以来，日本联合舰队多次袭扰威海卫，借以阻挠中国军队增援平壤，并力图消灭中国年轻的海军。黄海海战之前，中日双方海军在黄海上皆未掌握制海权。开始，日本联合舰队对北洋舰队采取回避方针，不与正面交锋，北洋舰队则与之相反，屡次在海上追逐敌舰，欲求一战。对日军采取攻势，这不仅是主将丁汝昌的主张，也是北洋舰队广大爱国将领的普遍要求。但是，丁汝昌采取攻势的主张，又受到李鸿章的掣肘和压制。腐败的满清政府反以“观望迁延，毫无振作”的莫须有罪名，将丁汝昌革职。“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愆”。然而丁汝昌早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度外，仍然决心伺机与敌拼战。可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他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8月18日，丁汝昌身负重伤，北洋舰队由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行指挥。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北洋海军损失很大。虽然如此，在作战中，有不少官兵很英勇，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舰只重伤、弹药用尽的危急时刻，开足马力向日本快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250多人壮烈牺牲。“经远号”舰长林永升指挥官兵奋勇作战，在竭尽所能打击了敌人以后全船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战斗到底，终于使敌舰不得不退却。这一场鏖战竟使李鸿章吓破了胆。他命令北洋舰队从此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口内，实行他既定的所谓“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保存自己的实力，等待战争结束的方针。他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方针，导致了他的舰队悲惨地覆没。

黄海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东条英教所在的大本营，一面派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腹地，一面派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进而侵占金州。李鸿章在事后奏报说：“查旅顺一岛，孤悬海中，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若论防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

此次倭兵于金州东北之皮子窝登岸，本非旅顺海口守台兵将所能远防。贼已袭据金州，则大连湾和旅顺俱成绝地。”其实，在金州和旅大，当时清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但是几乎所有的将领都相率放弃阵地，望风逃遁。因此，日本侵略军在攻占金州后，只用了两天，就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7日不放一枪就占据了大连湾，又于22日占领了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旅顺口。日军侵占辽东半岛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据当时的中外报刊报道，仅在旅大地区屠杀的中国军民，就在数十万以上。

旅顺失陷后，清政府内部进一步发生动摇，日军遂于1895年1月，以陆海两路齐头并进，直取清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海军基地威海卫。日本侵略军进攻威海卫的目的，是消灭北洋舰队，以迫使清政府在最屈辱的条件下求和，早在日军登陆龙须岛之前，伊东祐亨即策划对丁汝昌实行诱降，但遭到拒绝。丁接到劝降信后愤慨他说：“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决与舰队共存亡！”他带领全军英勇奋战，但因敌众我寡，腐败的满清政府又不给援助，这支拥有大小舰只40多艘的北洋舰队，终于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北洋舰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从1879年10月开始筹建，1881年初步建成，到1888年正式成军，历时整整9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第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第三，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第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第五，允许日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第六，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第七，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后，东条英教名声大震，以“智将”闻名海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又为日本打败沙皇并取代其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立过“显赫战功”。后来，因日本军阀内部派系斗争，与当时的陆军大臣、长州军阀的巨头寺内大将不合，以中将身分退出现役。晚年著有兵书《战术麓之尘》，被称力日本“陆军之宝典”。

东条英机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并在他的军阀父亲的熏陶下长大的。当时东条英教一家住在东京四谷区须贺町。英机从小就是一个顽皮而倔强的孩童，在学校念书，功课一向不好，是个不爱用功的淘气包，玩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

父亲东条英教觉得有必要改变他的这种顽童恶习，从他七八岁起就严加管教。其中有一条是：吩咐他做的事必须完成，否则不予放过。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早上，父亲吩咐东条英机拔掉院子里的草，可是他只顾玩，竟忘掉了，快要点灯时，才饿着肚子回家来吃晚饭。父亲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立即叫他把用一个钟头才能干完的活全部干完，否则不给饭吃。

东条一家从四谷须贺町搬到西大久保，英机也随之转到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念书。那时学习院的学生是很豪华的，上学都用人力车接送，并在食堂吃饭。可是父亲却对他说：“我们小时候上私塾，都是穿草鞋走着去的。决不允许你坐车！”因此，东条英机也不得不拎着木头饭盒，徒步从西大久保走到学习院去。他的同学看到这种情景，都把眼睛瞪得溜圆，表示十分惊讶。

东条英教为了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特请了日比野雷风氏。教他学习

“神刀流剑舞”，为的是更有助于培养他“杀身仁成”的精神。东条英机对这种剑舞也很喜欢，因而进步很快。在学校举行文娱会演或其他集会时，他的表演充满了“凛凛的魄力”，因而常常博得观众的喝彩。直到他当上将军以后，也常常在酒席上乘兴表演他拿手的“神刀流剑舞”，借以宣扬他的所谓“虎威”精神。

东条英机的母亲是九州小仓人，具有朴实而严谨的性格，在丈夫出征的动荡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带着孩子为生活历尽艰辛，这对东条英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有很大的影响。

东条英机的父母为教育这个顽皮的儿子伤了不少脑筋，可是他从学习院毕业升到城北中学以后，仍然是一个爱胡闹的孩子。他总是把功课丢在脑后，常在外边打架，因此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被叫到学校。

有一回他和大孩子打架，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大孩子把他按倒在地，勒紧他的脖子，问他“服不服”，可是不管勒得怎么紧，他绝不说一个“服”字，最后含着眼泪还是不认输。因为他太犟了，反倒使对手心软了。

谈到童年的往事，东条英机在就任陆军大臣前夕，在宴请昔日校长深井鉴一郎时，深有感触他说：“我小时候是个很顽皮的孩子，我记得受到深井先生严厉训斥就有三次之多，先生说：‘像你这样的学生干脆退学算了！’”深井也很坦率他说：“英机在爱打架和不眼输这一点上，确实是全校的冠军。”

光阴荏苒，“大和魂”在这个顽皮少年身上扎了根。在军阀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之下，东条英机决心像他老子那样，要作一个驰骋四方、横行侵略，为日本天皇东征西杀的武士道军官。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于明治 32 年 9 月 1 日，也就是在他 16 岁的那年，进入了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从此迈出了他毕生军人生活的第一步。

身穿梦寐以求的草绿军装，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三期 50 名学生的入学典礼开始了。站在讲坛上进行“训示”的是日本法西斯军官关谷铭次郎中佐，他号召学生“要刻苦奋斗，严于律己，成为一名忠于天皇的合格军官。在战争中要勇冲猛杀，视死如归，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东条英机听着校官的训导，诚惶诚恐，站在市谷台上仰望那雄伟壮丽的皇宫沉默静思，决心将来报效帝国。可是，他升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以后，成绩还不算太好。他身材虽然矮小，但举动敏捷，打起架来很厉害。“打架王东条”这个名字在这里也使同学们感到害怕。

在学科当中，他最讨厌的是图画，当然画得也不好。有一天上图画课时，他画了一排 30 多个圆圈，并把这张奇形怪状的画大模大样地交上去了。教官看到这张莫名其妙的图画，立即把东条英机叫过来责问。可是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张画，画的是挂在墙上的军帽。”当时就被暴怒的教官申斥了一顿。

后来，他对自己的子女常常谈到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以为军人练习画画没有什么用处，因而也不去重视它，才干出那种荒唐的事来。当军官以后，十分懊悔，有时出去演习，需要画些地图或草图，我很吃力。这时我才懂得：无论哪门功课都不应偏废，各科都是需要的。”

可是，东条英机在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完全变了样，像换了一个人似地用起功来。关于他转变的动机，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他跟七八个同学打架，由于寡不敌众被打得狼狈不堪。于是他想：“气力再大，只能对付一个敌人，要战胜众敌，还得靠学问。”东条英机擦干了悔恨的眼泪，给自己得

出了这样一条结论。

他幡然悔悟之后，猛然用起功来。关于这件事，他的同学桥次郎中将曾这样说过：“我们不了解他出于什么动机，可是他确实变了样。于是，‘闹事党’这帮人对突然认真起来的东条进行了迫害。他们寻衅闹事，殴打东条，但是他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都决不求助于人，自始至终靠自己的力量去拼搏。正因为他具有这种顽强的性格，所以全靠自己的力量终于击退了‘闹事党’的迫害。”

在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三年岁月里，给予他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教官，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关谷铭次郎中佐外，还有后来的校长桑畑景尧中佐和学监仓石一中尉。仓石一中尉，以他所写的《白雪皑皑》这首军歌而著名，是青森第五营八甲田山遇难事件的幸存者，后来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还有后来的学监饭田毅中尉，他在日俄战争中失掉了一只胳膊。再一位是高年级的学监林大尉，他虽属于预备役，但自从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创建时就担任学监的总负责人。此人善于骑射，杀气腾腾，他就是1937年“八一三”在上海惨杀中国人民的臭名昭著的林大八少将的父亲。这些为日本天皇东征西杀、横行侵略、以身捐躯或“荣立战功”的武士道军官，成了东条学习的楷模。

升入地方幼年学校的第二年，即明治33年（1900年），中国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一直为掠夺中国而垂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准备大规模入侵，日本陆军幼年学校采取了战时的教育方针，从早到晚不停地进行正式军事训练、实弹射击、马术训练或上作战兵学课等。从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和熊本六个镇招来的300名学生，都在这里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

令东条难忘的长途野外演习，是在春天里4月初进行的。从东京乘火车到小田原，然后从小田原开始徒步行军，经过箱根到沼津，从沼津又到御殿场。在富士山山脚的原野上进行演习之后，从御殿场乘火车返回。就这样，进行了连续数日的强行军。

经过三年的严格训练之后，于明治35年（1902年）9月1日，东条在19岁时升入了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了两年，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日俄战争。日本举国动员，加紧扩军备战，东条英机又趁机进入向往已久的士官学校。士官学校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将军的摇篮，中国的反动头子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孙传芳、唐继尧、阎锡山等人，都先后在这里学习过。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兴起的。

1868年明治政府一成立，即实行“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国策，首先，立即着手全面的兵制改革。2月，改海陆军科为军防事务局；7月，政府认为开设军校培养军官为当务之急。8月3日，京都军校开学，该校是“陆士”的前身，起初仅收官僚子弟入学。这是完全沿袭了凡事必讲等级身分的幕政陈规，因而遭到反对，1870年取消了身分限制，并通令各藩派送学生不论士庶均可。

1871年12月10日，兵学寮迁到东京，翌年4月，法国陆军中校马立克等15人组成的教官团被聘执教。在德川幕府的末期，日本军事训练深受法国影响，“陆士”最初10多年内采用法式体制，并聘法国教官。但日本是帝制国家，故对帝制德国更为欣赏，后来决计在军事上以德为师。1885年，“陆士”聘来德国麦克尔少校为军事顾问，遂改取德式体制。

“陆士”和其他各类军校的出现，是天皇政府以“强兵”为最高国策的

必然结果。执政者认为，强将手下无弱兵，而强将须从军校中造就，尔后在战场上练成。《军人训诫》强调封建忠君思想为军人精神之根本。“皇军”成了“天皇陛下”这个人格神任意驱使的兽群。士官学校实行奴化教育，除了有关军事课程之外，学校当局竭力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毒素，培养武士道精神。为了磨练学生的“意志”和适应任何恶劣环境的能力，学校甚至经常逼学生重装操练于烈日当空之时，薄衣僵立于寒风刺骨之夜。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血案、日俄战争中乃木希典发明的“肉弹”战术等，都是在野蛮的武士道精神的培育下出现的。

与此同时，天皇政府还对国民强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企图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兵营，把国民都变成“肉弹”，甚至奢望每个将士在战场上都能高喊“天皇万岁”而后死去。日俄战争中因沉船堵塞旅顺口而丧主的广濑武夫被捧为“军神”，大军阀乃木被捧为“圣将”，类似的人物都成了天皇政府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军部的建立、宪警的推行、各种军国主义组织的出现，更使日本国家迅速成长为一个战争巨魔。

随着上述情况的恶性发展，以上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的日本“皇军”实力也很快膨胀起来。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半个世纪中，“皇军”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反动政府的得力工具，侵略中朝诸国，与列强争霸远东，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罪恶历史。

东条就是在这样的军官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一株毒草，他思想深处充满了军国主义的毒素。他对明治天皇所封的“圣将”——乃木希典尤为崇拜，决心将来要成为乃木式的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东征西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建立“功勋”，并以此“光宗耀祖”，让日本皇军“永世传颂”。

东条英机所崇拜的乃木希典，原是日本陆军第三军司令官，在日俄战争中负责攻打旅顺口。旅顺口是被沙俄誉为“固若金汤”的海军要塞，为了尽快攻下这一要地，乃木一味蛮干，完全置广大士兵的生命于不顾。他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以鲜血和白骨去填平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胜利道路”。当时沙俄用钢筋水泥修筑的要塞工程，连日本炮兵的炮弹都被弹了回来。还有机枪大炮的猛烈封锁。但是，乃木却一味地下达“肉弹攻击”的命令。

1904年8月19日，乃木发动第一次总攻击，日军投入兵力5万以上，死伤超过1.58万人，尸骨累累，血流成河。接着又组织敢死队，发起第二次、第三次总攻击，使用兵力总计13万，费时155天，最后终于以死伤5.9万人的代价攻下这一要塞。

有一个名叫樱井忠温的陆军中尉，在参加攻打旅顺口的战斗中负了重伤，后来专门写了一本战争回忆录，书名叫《肉弹》。该书在1906年出版，对乃木的“肉弹”战术的“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备加吹嘘。乃木看后题了“壮烈”二字，交给了樱井。因为樱井的书所宣扬的“肉弹攻击法”体现了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中鼓吹的武士道军人不以生命为重的思想，因此受到天皇的重视。后来这本书竟连续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流毒极广，影响极坏，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教材。

“一将成名万骨枯”，乃木踏着成千上万士兵的尸体，从中将爬到大将的高位，于是更对天皇感恩戴德。正是因为这样，1912年7月当明治天皇死去时，乃木和他的妻子一道在家里剖腹殉死。在20世纪居然出现这种封建武士的腐朽遗风，被当时世界各国传为奇闻，流作话柄，而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却备加推崇，大力宣扬乃木的“忠节”！

这就是士官学校的东条所崇拜的“圣将”的形象，这就是他孜孜追求的皇军楷模！

就这样，东条英机经过“刻苦”的学习和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于1905年4月21日，在士官学校毕业了，并被天皇授予陆军步兵少尉的军衔。此刻，他的父亲望子成龙，心情异常激动，东条英机也决心像他老子那样，在今后的侵略征途上，不断为日本天皇建立殊功。从此，他结束了艰苦的学生生活，开始了法西斯军官的新的生涯。

在离开陆军士官学校之前，东条英机的全班同学参观了皇宫的振天府。东条带领全校300名同学在振天府前面握拳宣誓：“要为天皇而死，要作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据当时在场的东条的一位同学说：那时东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参加战斗，立即奔赴战场，为天皇征战建立功勋。正是：日俄交战烽火急，急功近利鬼着迷。

为了激发武士道精神，临近毕业的几个星期天，东条经常邀集和他臭味相投的一些同学在市谷台的山坡上开会，他们一边喝苦茶、吃点心，一边听一个姓须的琵琶师弹奏萨摩琵琶，倾听《川中岛》、《城山》等英勇悲壮的乐曲。这时他们就像只身飞到战场一样。

“大家齐努力啊，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每弹一曲，便心潮澎湃，一浪高似一浪。情不自禁时，年轻的士官们就狂吼起来。达到最高峰时，东条英机便不由得舞起剑来。

东条英机的同期同学江桥中将，在回忆当年的生活时，曾这样谈到：“在那紧张的时局里，不管教员还是学生都是在拼命当中度过日子的。结束一天的紧张训练进入梦乡，梦见的是满洲的战场，听到的是隆隆的炮声。已被任命为少尉的第十七期300名青年士官，抚摸着自已的长剑，精神抖擞，为实现理想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时已晚矣。奉天战役已告结束，日俄战争也已到了后期。大部分士官学生都受命分配到国内各地的部队去了。只有几个“幸运儿”上了前方，东条少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受衔之后，最初被分配到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不久，就跟随新编的第十五师团开到他父亲正在荣立“显赫战功”的满洲战场。东条虽然是抱着殊死立功的决心踏上征途的，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参加战斗的机会，只是作为守备队员发着髀肉复生之叹。不久，“皇军”大获全胜，日俄战争终于结束了，东条也就随军“凯旋”了。

回国之后，东条在联队做了几年下级军官，又经他父亲朋友的举荐，被送入陆军大学学习。

1915年毕业后，他曾担任过陆军省副官。以后又担任过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在这期间，他以德国为中心研究了欧洲的形势。回国后他担任过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从此，东条步步提升，被誉为“智勇双全”的陆军军官。正是：武士得志心发狂，侵略欲望更膨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章 “ 剃刀将军 ”

鼓吹侵华急先锋 残酷镇压伎无穷
大好河山蒋氏送 黑水白山遍哭声

在日本帝国主义鲸吞我国东北期间，号称“剃刀将军”的东条，积极鼓吹侵华，残酷镇压日本反战军民，扮演了极为可耻的角色。

日俄战争结束后，野心勃勃的东条英机，一直磨刀霍霍，耀武扬威，寻找为日本天皇荣立战功的机会。他和一些右派青年军官沆瀣一气，积极鼓吹向中国东北进军，认为满蒙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所谓日本的“生命线”，而且是征服中国大陆和向东亚侵略扩张的重要基地。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思想，是和当时日本的整个形势密切相关的。

甲午战争后，日本军阀被迫交还辽东半岛，但并未放弃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他们又进行了10年的扩军备战，准备同沙皇俄国进行再次争夺。

1904年1月，在英国支持下，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是日俄两国力争夺我国东北领土而进行的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给日俄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因为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我辽东人民又惨遭一次战火的洗劫。据当时报载，凡属日、俄侵略军所过之地，“菽黍高粮，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广大东北人民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日俄炮火之下达数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然而，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竟然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而宣布“中立”，真是咄咄怪事！

这次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根据1905年日俄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日本从俄国手里夺去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从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同时还攫取了对朝鲜的直接统治权。

1905年底，日本政府派小村寿太郎为代表，到北京和清政府进行谈判，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通过这个条约，日本不仅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承认俄国把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让与”日本，而且强迫中国政府开放凤凰城、辽阳、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等16个城市，作为日本殖民主义者通商和居住的地方；日本还攫取了从丹东到沈阳的“安奉铁路”的直接经营权，以及鸭绿江右岸木材采伐权，等等。从这以后，日本侵入我国东北的南部，沙俄势力退到北部。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俄国，一跃成为我国东北的南霸天，使其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得到部分的实现。日本侵略者又急急忙忙地把我国的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设立一个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作为它侵吞东北、进而灭亡全中国的一大据点。

1906年末，日本以经营被它侵占的南满铁路为名，在大连设立了一个公司，名叫“南满铁道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并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日本侵略军两个师团赖在中国东北不走，于1919年正式命名为“关东军”。“关东都督府”是阴谋策划蚕食中国的老巢，而“满铁”和关东军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吞并东北、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两个反动工具。

“满铁”就是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当时筹建“满铁”的委员有80多名日本军阀。官僚和财阀。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在我国台

湾省曾进行殖民统治的后藤新平；另一个是日本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他们曾就如何侵略中国东北的形式问题进行了挖空心思的谋划，一致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管理”是采取“东印度公司”这一商业公司的形式，即借商业贸易之名，行征服印度大陆、掠夺其无尽宝藏之实。日本帝国主义也要利用“满铁”对我国东北进行残酷的侵略和掠夺。据统计，从开业到1931年日本强占东三省为止，24年间，纯收益增长19倍。其中，共付给日本政府红利1.45亿元，付给股东红利2亿日元，付给美国及日本公司债务利息3亿余日元，另有公积金1.88亿日元。四项合计共8.3亿多日元。

关东军用刺刀维护“满铁”的掠夺，并和“满铁”勾结在一起，它是阴谋吞并中国东北的一支最野蛮的殖民侵略军。这支部队名义上是保护日本侨民和铁路，实际上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充当“满铁”从事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军事后盾。关东军控制中国辽南地区的要冲，同驻在朝鲜的日本侵略军相互配合，力全面侵占中国东北、蚕食华北和进犯苏联建立军事基地。因此，关东军是推行日本“大陆政策”的急先锋。

“满铁”与关东军一文一武，相互勾结，豢养清室余孽肃亲王善耆和蒙古反动贵族巴布扎布，于1911年至1916年间，在中国东北策划“满蒙独立”，妄图把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傀儡政权，变成日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曾先后派遣侵华“浪人”头子川岛浪速以及日本军官土井市之进、小矶国昭等人潜入东北，准备策划“满蒙独立”。日本的大仓财阀以150万日元的巨额贷款，供给肃亲王作为叛国活动的经费。可是，由于害怕中国人民反抗、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内讧：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等，想以满洲军阀张作霖为傀儡，谋求“满蒙独立”；而关东都督府参谋长却策划由土井等人炸死张作霖。由于意见分歧、行动不一，致使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却达到了对张作霖进行牵制和恫吓的目的。此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拉拢利用张作霖，为实现其侵略中国东北的目的加快步伐。

日本帝国主义按其“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一方面在我国东北与军阀张作霖进行政治交易，力图把他作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妄图通过卖国的袁世凯政府，实现其侵吞我国东北、灭亡全中国的狂妄野心。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德等欧洲列强，积极参战，不得不把它们的军队撤出亚洲；沙皇俄国也被迫倾注全力去应付欧洲战场；美帝也因急于参战而放松了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侵略部署。这样就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东北亚的力量对比。东条英机紧步日本帝国主义“元老”井上馨的后尘，叫嚷：“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实在是天赐良机。”日本军国主义准备趁西方列强全力应付大战的时机，阴谋扩张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妄图独霸中国。

1914年8月23日，日本借对德宣战，派兵侵占我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其目的就是夺取德国侵占的中国山东半岛，进而占领全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侵略行径，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狂妄野心，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立即爆发了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性的爱国反日运动。卖国求荣的袁世凯，仅仅当了

三个月的皇帝，就在反袁的声浪中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而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正如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精辟分析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

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很快袭击了日本。

1928年6月3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军阀张作霖，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我国东北的步伐。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东北，早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日斗争日益高涨。在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的民族觉悟有所提高，并对日军杀害他父亲张作霖一事深怀不满。1928年7月4日，他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时，与国民党政权合作，悬挂“青天白日旗”，并着手修建与“满铁”平行的铁路，开工修建葫芦岛港。这就使“满铁”感到它的垄断地位面临威胁，并且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安。

本来，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宝藏已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家掠夺的对象：鞍山供给铁，抚顺供给煤，从吉林、黑龙江的大森林取得木材。这样，它每年要从满蒙掠夺大量的重要物资。此外，日本又大搞对外投资，在中国东北的外国资本中，七成以上是日本资本。到1931年末，日本向中国东北投资总额达17.5亿日元，使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

所以，中国东北经济的荣衰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有着生命攸关的关系，而当时东北经济深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负有盛名的大豆、豆饼等农产品的出口额也显著减少。

1929年大豆出口额为300万吨，到1930年则锐减至223万吨；大豆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也大力降低，从而引起了深刻的农业危机，中国东北居民因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而降低了购买力，使日本和中国东北的贸易大大缩减；同时也使“满铁”的收入严重下降，甚至第一次出现赤字。如1927年“满铁”的收入为12210万日元，到1931年则锐减到8547万日元。

“满铁”经营的不振、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及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更加使日本反动派感到恐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渊之中，他们为了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并企图把东北变为镇压中国革命的据点和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前哨阵地，便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一个“救命符”悍然走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当时，日本进步势力反对侵略战争，但日本反动政府采用法西斯手段予以镇压，如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的，1929年有4000多人，1930年增至6000多人，1931年则达1万人以上。这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用法西斯手段加速扩充军备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进程。

日本政府在疯狂镇压左派的同时，积极支持法西斯右翼势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发动“九一八”事变作舆论准备。当时，不仅主张对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黑龙会”等老牌右翼团体异常活跃，而且又新出现了“血盟团”、“国粹大众党”、“大日本生产党”、“爱乡塾”等法西斯组织。参加这类组织的多半是反动政客、财阀和法西斯军人，他们和东条如出一辙，疯狂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被日本反动派所赏识

的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在日本参谋本部的唆使下，于1929年间周游日本各地，极力鼓吹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所谓“八 一字”。“皇道主义”的侵略经，就是这个黑帮头子大川周明所鼓吹的。所谓“八 一字”，就是要用军事侵略方法征服世界，把全世界置于日本天皇统治之下，并胡说什么“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使命”。

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日本政府不仅大造舆论，而且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准备侵略战争。早在1929年，日本就曾在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国家总动员演习，训练如何在空袭下进行军需生产、保证军需品的调拨和运输。日本政府又于1929年12月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1930年6月成立了临时产业管理局，1931年4月发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通过这些措施，在许多工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把国民经济纳入战争经济的轨道。

在军事方面，以东条的密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中心，组织4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暗中制定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身为参谋本部战备动员课长的东条，从中积极协助。据他们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25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2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10900人，因此石原密谋“以寡制众”。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也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方案。

1931年6月中旬，日本军部秘密指派东条的同伙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制定了名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的侵略计划，并于7月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侵略东北的行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便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突然袭击。当天夜里10点30分，日寇按事先布置，以一小股工兵在沈阳城北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沟，用炸药炸坏了不足：米长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日寇随即以此为借口，诬陷中国，并立即用事先从旅顺运来的大口径榴弹炮猛轰北大营。翌日凌晨占据北大营，同一天占领整个沈阳城。

在占领沈阳的同时，日寇还分兵几路攻打长春、四平街、公主岭等地的中国兵营。9月21日占领吉林省会吉林和吉长、吉敦两铁路。22日，又侵占辽源四洮铁路。前后不到一周时间，除辽西以外，辽宁、吉林的大好河山已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同年11月，日寇侵占了黑龙江省；1932年1月2日占领了锦州，中国军队奉蒋介石之命全部撤至关内。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就在蒋介石不抵抗的错误政策下，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噬了。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它的投降外交政策的发展。蒋介石继承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衣钵，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进行罪恶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对于侵略国土的帝国主义者，则不借节节退让，以至屈膝求和。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在后来流行于民间的小调中曾悲愤地申诉道：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
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东条等军国主义分子，更加趾高气扬。为了给日本的殖民统治蒙上一块遮羞布，他们在东北导演了一个“自治”、“独立”的丑剧。1932年2月16日，成立“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声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伪满洲国”，把日军从天津劫持去的早已被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当“执政”。9月15日，日本胁迫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用法律形式固定了日本强占的各项殖民特权。这样，日本就在整个东北地区建立了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寇所以如此轻易地攻占中国东北，主要是蒋介石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04万人，加上从朝鲜赶来的一股日军，也不过1.5万人。当时，日本全国的总兵力也只有23万人。而我国东北军仅正规军就有10几万，东北全境的兵力不下30万人。当时东北军的士气和装备并不比日军差。但是蒋介石热衷于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对日寇采取了投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发动进攻前夕，9月11日，蒋介石通令东北军说：“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入营房即听其侵入”。在日寇侵占锦州后，蒋介石又下令东北军一弹不发地撤至关内。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从此日寇得陇望蜀，更加肆无忌惮地策动侵略全中国的罪恶活动。

在日本侵略扩张活动中，日本法西斯势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纷纷出笼。法西斯分子在煽起侵略扩张的沙文主义恶浪的同时，竭力在日本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他们不惜制造一系列暗杀、政变的流血事件，来推动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得逞之后，法西斯军人身价倍增，军部法西斯的权势日益显赫，法西斯势力空前增强，他们的罪恶活动也愈发肆无忌惮。1932年初，法西斯组织“血盟团”和少壮派军官勾结，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负责人团琢磨。同年5月15日，一批法西斯军官发动政变，刺杀了当时的首相大养毅，袭击了政府和政党的重要机关以及重要的金融机构。1933年7月，法西斯分子又搞了一次未遂的政变阴谋。他们搞政变是为在日本建立法西斯专政、推行战争政策扫清道路。

为了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以东条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鼓吹法西斯的“总体战”思想，大肆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广为散布一个觊觎世界霸权的“八 一字”侵略扩张口号。他们极力美化侵略战争，把它说成是“神圣事业”、“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并肉麻地吹捧法西斯军人为“国家之花”。日本军事当局大肆宣传“武士道军人典范”及大军阀乃木希典在日俄战争中使用过的“肉弹攻击法”，即凭借武士道、“大和魂”以士兵肉体为“武器”，不计伤亡、死打硬拼的战法。他们还在少年

中灌输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

1932年12月，日本文部省编审的小学教科书中就有歌颂侵略战争的课文：“前进，前进，军队在前进！”

在这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代里，东条英机充当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他不仅积极支持侵略东北，而且狂热主张吞并全中国。他在参谋本部负责战备动员期间，积极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效劳。正因为如此，在昭和8年，即1933年，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并于当年11月22日，被任命为军事调查部部长。其任务是专门调查和镇压所谓“思想不轨”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立即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这一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向全党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的国际主义号召。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的工人、农民相继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反战活动。各阶层人民陆续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反战的呼吁。

日本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片山潜，早在19世纪末叶就开始宣传中日友好，他一直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国际主义情谊。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侵略战争大会，于1932年8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他在会上历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抵抗的罪行，热烈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与广大群众以游击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屈膝卖国的斗争。片山潜这一次次充满国际主义情谊的有力声援，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

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日本士兵目睹法西斯的残暴，反战运动也不断发生，不少日本士兵拒绝把枪口对准中国人民而遭到法西斯的枪杀和逮捕，但他们仍想尽办法，投到抗日部队中来或冒死向游击队秘密提供军人。著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伊田助男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那是1933年春天，日军调集了3000多名士兵，由鳌刚村一指挥，对吉东马家大屯的抗日游击队进行追剿。游击队从拂晓到黄昏足足打了一天，眼看弹药消耗殆尽，打败了敌人最后一次攻击时，游击队领导立刻组织战士们去收拾子弹。午夜过后，在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极隐蔽的松林里，发现一辆装有10万发子弹的日本军用汽车停在那里，车上发动机被破坏了，并在嘎牙河边发现一具日本士兵尸体，旁边用石头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伊田助男事件发生后，东条英机指令军事调查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在鳌刚旅团进行大搜捕。不久，这个部队被调往延吉，全部解散，官兵被送到各

地“矫正思想”。愚蠢的敌人哪里会知道，觉醒了的日本人民和士兵的反战情绪像江海的怒涛一样不可遏止，类似的事件以后仍不断发生。如驻在宁安的日军有七八人秘密逃向唐头沟，想通过中国农民转投抗日联军。结果因无向导，走迷了路，没有办法，又转回宁安，被日本宪兵枪杀。驻在牡丹江以北的日本守备队，有 10 几名士兵拿着游击队散发的日文宣传品逃进森林，寻找抗日队伍，决心不给日本法西斯卖命，不幸在密林中没有找到抗联，被守备队当局发现，派兵追捕。他们无法出去，宁肯在林子里吊死、饿死，也决不拿枪打中国人。

面对侵华士兵和日本人民的强烈反战活动，东条英机进行了惨酷的镇压。仅据 1934 年不完整的统计，日本军事调查部和特务机关以“叛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先后逮捕和枪杀的日本士兵和进步人士就达数万人。东条英机从而获得了“剃刀将军”的绰号。

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们对东条的毒辣手段极为欣赏，当时的军务局长永田中将夸奖他说：“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日本财团也对这个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分子寄予极大关注。从此，东条沿着把日本拖入灾难的侵略扩张道路飞黄腾达，步步提升。正是：“剃刀将军”杀人如麻，烈士鲜血灌溉中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章 不屈的人民

出使东北掀妖风 “清剿剔抉”留恶名

中华儿女多勇士 艰苦奋斗育英雄

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强化东北，把它建成侵华的前哨基地。于是，1935年9月，东京大本营特任命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宪兵司令。上台伊始，这位司令官就面临着极力棘手的问题和异常严峻的国内外局势。

在国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大侵略的阴谋步步得逞和扩军备战的变本加厉，法西斯军阀的气焰更加嚣张。加之，自1935年以来，新的危机使整个反动统治阶级惶恐不安，法西斯军阀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梦寐以求的确立军部法西斯全面独裁和在亚洲发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便很快提到行动日程上来。

但在30年代，日本法西斯军阀内部又分为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有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冈村宁次。侨本欣五郎、相泽三郎等人。统制派有字垣一成，杉山元、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两派的目标都是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但其所用手段则有所不同：皇道派主张用政变、暴动以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统制派则主张用合法手段，由军部大臣把军部意见提交内阁，从事合法改革。统制派极力主张建立总体战体制。两派的对立还来自人事上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统制派主要是陆军中央机构内的军官，皇道派的人多为野战部队的少壮派军官。

1936年2月26日清晨，日本陆军中的一批“皇道派”的少壮派军官，率领部下官兵一千四五百人，在首都东京发难，企图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等重要政府机关，杀死了内阁大臣。前首相斋藤实及前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并使天皇的侍从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幸免身死。经过上层两派势力激烈斗争后，暴乱终于在2月底全部被平定下去。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统制派借机通过“肃军”排斥和打击皇道派，掌握了军部内的主导权。法西斯军阀趁机要求实现国家的全面法西斯化，并且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同年5月，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恢复了1923年一度制定的陆海军大臣、次官由中将以现役军人担任的制度。法西斯军阀还提出所谓改革政治制度的“计划”，以缩小议会权限，消除政党政治，使议会完全变成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附属品。他们还提出建立由军人主持的统一政策机构的方案，要把国家一切大政方针和国家预算的决定权完全控制起来。

日本法西斯独裁确立后，对内加紧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对外则加紧侵吞中国华北。继1936年1月发表的“广田三原则”之后，同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政权实现“特殊化”，以达到“华北自治”的侵略目标。

“二二六”事件后，由于军部法西斯独裁的确立，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完全纳入战争和法西斯轨道。所谓军部法西斯独裁，就是完全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在日本，由于长期存在军国主义反动传统，军部又在天皇制统治机构中占有特殊地位，日本式的法西斯不同于德、意法西斯，不需要组织法西斯政党来夺权，而是紧紧依靠和利用现存的天皇制统治机构，以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式来推行国家的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独裁

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东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使东北的。这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军官，满以为到东北后会旗开得胜，治安迅速平定，但他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极为棘手的问题。日本侵略军四处挨打，已处于中国人民武装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发表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并于9月21日发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起来救国，组织民众抗日政府，自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提出用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且派遣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到东北地区工作，杨靖宇、罗登贤，魏拯民、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人，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在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自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辽、吉之后，原东北军洮辽镇守张海鹏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作侵略者的走狗，接受日本的军人援助（仅新三八枪就有2万多枝），自恃装备精良，悍然北上帮助日寇袭取黑龙江省。

10月16日拂晓，张海鹏的前锋部队抵达嫩江桥南端时，黑龙江省守军愤于张海鹏的丧心病狂、认贼作父，广大士兵不听上级命令，自动将江桥炸毁，并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袭击，阻止其北上。张的3个团也趁机纷纷反正。

日本侵略者眼看侵占黑龙江省的计划破产，便继续以4列车军械，10万元日币援助张海鹏，并亲自出马。

11月1日，日本驻吉林第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率领步兵2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工程兵1个中队，借口“匪患”而逼进嫩江桥。

11月3日晚，日本飞机突然向中国驻地大兴站投弹；4日，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扑来。中国军队虽兵员单薄，军械缺乏，但士气高昂。激战10余小时，打退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接着，5日打了一场恶战，中国军队几乎全歼了滨本步兵联队。日本又调集兵力，命令关东军第二师团主力前来支援。从16日早开始，一直激战到18日傍晚。其间，日军曾增派飞机12架、坦克12辆，大施空陆立体战之威力，对中国军队进行上下前后夹击；战至最后，战壕全部被毁平，抗日战士只好持枪与敌人展开肉搏，直到夜幕降临，才撤出阵地。

嫩江桥的血战，揭开了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它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大煞了敌人的威风。继嫩江桥战斗之后，辽西义勇军又创造了全歼一个日军联队的光辉战例。

12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其第八师团骑兵联队长占贺中佐，又于1932年1月6日午后率200余骑兵进驻锦西。这支骑兵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称为“攻无不克”的骑兵队。1月8日晚，占贺准备就绪，要出发征剿辽西义勇军，并嘱咐赶制“凯旋”大旗，准备欢迎皇军“得胜”回来。1月10日早8时，占贺亲率骑兵百余名向辽西出发，得意洋洋。不料在一狭路口，中了辽西义勇军的埋伏，日军骑兵不得施展，被打得人仰马翻；首先占贺被击毙，其余敌骑死伤狼藉，无一幸免。义勇军还获悉，占贺行前，曾派松尾小队骑兵27人前去锦州取弹药、给养。下午返回时，该小队也遭到义

勇军伏击，枪响后各村报信，四面八方约百余人来会，不少没枪的人拿锹，镐，锄头参战，重重包围，一举消灭，至此全歼了古贺骑兵联队。

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 4000 多人，编成 3 个步兵团、1 个大刀队、1 个侦察队。12 月，邓亲率大刀队 500 人主攻安奉线重镇凤凰城，缴步枪 300 余支，还有轻机枪与迫击炮等，以后又进驻庄河。大孤山，随着抗日情绪的高涨，邓的队伍不断扩大，至 1932 年初，已拥有 3 万人左右。这支队伍不仅打破了日军的“讨伐”，还成功地突袭了岫岩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 1933 年初，敌人再次“讨伐”时，邓铁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所属李海山部 600 余人，被围于沙金沟老平顶，同敌死拼，坚持六昼夜，全部壮烈牺牲。他们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和颂扬。邓铁梅本人也一再拒绝敌人的招抚和诱降，后被劫持谋害，死前曾题词：“七尺躯何足惜哉，四省土几时收复？”

战斗在吉东的王德林、吴义成的抗日救国军，自 1932 年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之咽喉地带，使敌死伤近 400 余人。接着又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人捷克式机枪 21 挺、三八式机枪 7 挺、大小枪支 1600 余支。3 月，敌田野少将率号称万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四面夹击的办法，在南湖头墙缝大摆口袋阵，歼灭敌人 3000 多，缴三八式步枪上千支。随后又在杜乙沟展开了围歼逃敌的战斗，利用春天的干旱气候以及该地草高、路窄，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的声威。接着，1932 年 3 月方正一战，又打伤了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中，战斗力最强、最有组织的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几支抗日武装部队，后来又在斗争中发展成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大游击地区。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起可靠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在日伪不断进行残酷的“扫荡”、“讨伐”后仍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

1933 年底和 1934 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各抗日游击队，总计达 23 万人。仅据敌伪材料，只辽宁一省，1934 年 6 月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就作战 709 次，7 月份增为 759 次，8 月份、12 月份再增为 1700 多次。抗日游击队，成百次地袭击伪奉天（沈阳）铁路局、长春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洮南铁路局等所辖各线路。在抗日游击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不少伪军和部分日军发生动摇以至哗变。日寇虽增兵 30 万，还利用并村屯、连坐法。保甲制和派遣大批奸细特务打入游击队内部等手段，企图瓦解破坏游击队，但均未得逞。

1936 年至 1937 年，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抗日联军进行了整编，组成以杨靖宇为指挥的第一路军，“七七”事变后，又组成周保中指挥的第二路军和李兆麟指挥的第三路军，这三路游击部队在广大地区积极活动，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牵制了大量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他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当时在辽、吉、黑三省民间，广泛流行着这样一支歌曲：

抗日联军十万人，
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
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
白山黑水庆升平。

在抗联活动的游击区内，“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许多地方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在吉东、南满、北满一些县成立了人民政府，与日伪政权相对峙。特别是在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下江地区的伪三江省，广大农村布满了抗联的“铁骑”，纵横不断地进攻和袭击敌军。尤其是在依兰、桦川、勃利一带，成了抗联第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军的集合地区，各军上下左右驰骋，灵活机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当地的农村城镇完全掌握在抗联与抗日救国会的手中，敌人所能控制的只是比较大的城市和分散孤立的据点而已。

坐落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是伪三江省的中心，更是抗联第六军的故乡，他们是汤原的人民子弟兵，差不多家家都有人参军。抗联部队要打击日军，群众都自动报名前来参战，组织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他们有的扛着土枪洋炮，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的人手里拿着汽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打仗时把炮放在桶里，响起来比重机枪还厉害，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是什么新式武器。妇女会，儿童团、救国会也都出动了，或在路旁摆上茶水劳军，或准备担架抢救伤员，或赶着大车去拉战利品。难怪日伪军无可奈何地叫喊：“汤原地皮红透了三尺！”

此外，在第三军出没的滨绥路两侧的哈东游击区里，还有在党的领导下由农民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农民委员会。广大农民亲切地称县农民委员长是“我们的县长”。由于建立了农民委员会，打击了汉奸地主，实行了减租减息，当地农民既受不到日伪特务警察的欺压和逼索，土豪劣绅、土匪地痞的剥削掠夺也大为收敛。在吉东、东满一带，有些地方的妇女会、儿童团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救国会负责为抗联筹划给养、供给粮食与衣物，几乎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救国会。

1937年，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击敌人，扩大抗联的声势，杨靖宇在东满、南满游击区联成一片之后，开始组织第一军西征，准备与挺进到热河一带的八路军打通联系，建立热、辽、吉、黑游击区，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结束关内外相互隔绝的局面。两次西征虽未成功，但却显示了抗日武装力量的声威，钳制了敌人的兵力，使其不能入关南下，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配合关内部队抗战的作用。在东北战场上，抗联第五军曾派独立旅远征南满，从依兰的大小罗勒密出发，到敦化、额穆、蚊河、桦甸、濛江、辑安各地，建立了南北满联合战线。1937年，他们又派兵沿牡丹江流域北上，一直扩张到穆稜、勃利、密山一带，与抗联第四军汇合。又向北过了依兰、桦川，与第三军汇合。以后向东发展，到宝清等地又与第七军联络到一起。这样，从南满到北满以至东满山地的抗日联军，全都联络汇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铁拳。

素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东北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多种斗争形式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抗联的武装斗争。以焚毁日军大量军用物资为目标的大连放火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工人们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人药，在码头、军用仓库等重要设施放火。为躲过敌人的搜查，他们将这小块火药卷进大煎饼里，一边走，一边拿着吃，巧妙地混过日军的耳目，带进了日本陆军仓库。

1938年6月，在大连码头用这种办法烧了4个主要仓库，大火烧了三天

三夜，日方损失极为严重。在这之前，甘井子石油工厂也被放了火，烧了6个小时，毁掉6万多桶石油。像这样的大火，当时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日日新闻》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币达2000多万元。

铁路，作为交通大动脉，在铁路工人与抗日武装配合下，经常被破坏，处于“梗塞”状态，使日军急需调运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吉海铁路500名养路工人，在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扒铁路，毁桥梁，一个时期使日军的铁路运输瘫痪。他们还为抗联购买和运送武器以及其他军需品，甚至配合抗联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如1933年夏天，蛤蟆河子、老爷岭地区几十名铁路工人协助游击队，在老爷岭隧道阻击一列火车。经过激烈战斗，俘虏日军几十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武装了游击队。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了日寇的“心腹之患”。因此，关东军为了巩固东北这块侵略基地，采取了增兵讨伐的办法，妄图全部消灭之。从1935年开始加强关东军的兵力，至1936年初，日军竟增至12个师团、4个混成旅和1个专驻间岛的“朝鲜派遣军”的师团，外加铁道守备队以及伪满军的兵力。敌酋东条对抗日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他们集中兵力，纵横扫荡，来回拉网，采取所谓“蓖梳式”、“踩踏式”的办法，对付抗联及广大抗日群众。进攻的重点由南满、东满、吉东后发展到松花江下游、三江平原一带。敌人实行所谓军事上、政治（招降）上、经济（断绝给养来源）上全面的大扫荡。

“七七”事变后，1938年，东条更以70万日军和30万伪军的兵力，在东北集中搞了一年多的“大讨伐”。与此同时，还拼命搜剿深山密林，摧毁抗联密营和地下粮食埋藏地，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更在全东北实行所谓“大检举”，破坏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和抗日群众被逮捕，遭杀害。还组织大批武装特务深入山林，许多抗日营地遭到破坏。斗争进入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衣少粮，又无落脚休整的地方。露营生活正像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所描绘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这首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抗联战士们的艰苦生活。

但是，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献身的抗联战士们，他们对战胜日本侵略者充满必胜的信心和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兆麟的《露营之歌》就是抗联战士艰苦生活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真实写照。请听：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升！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
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雾弥漫，
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舞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熄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熊熊，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光。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风侵入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来，夺回我河山。

抗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喋血苦斗，展开了一幅幅英勇牺牲的悲壮画卷，不仅写下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的一页，而且揭开了近代世界史上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最精彩的一幕。

有名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参加二路军西征的女教导员冷云，带着7个女战士，在阴历九月初的一天，越过几道封锁线，来到牡丹江畔，露宿在乌斯浑河尽头作木岗山下，准备过河去克上克密营第五军军部。敌人发现后，从三面包围上来，她们几次突围冲不出去。敌人看她们人少力单，又多是短枪，疯狂地叫喊：“投降！抓活的！”八女英雄姐妹，在给了敌人一定的杀伤之后，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持革命气节，从容地架起负伤的战友，决然跳进乌斯浑河。

秋天河水泛涨，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她们昂头挺胸，用坚强不屈的身躯，推着汹涌的河水，壮烈牺牲了。

宝清十二烈士的苦战，与“八女投江”一样动人心魄。1938年初，抗联第五军七团一连连长李海山，带着13名战士到宝清尖山子警戒敌人，这里地势险要，为进入第五军营地的必经之路。一天夜里，这支小部队被敌人团团包围了。早上7时，战斗打响了。连长说：“我们被包围了，大家要节省子弹，剩下一人一弹也不叫敌人捉后的！”第一批有百余名敌人，分东西、南北两路骑马往上冲，不到20分钟，被打得人仰马翻。敌人放弃活捉的打算，开始用炮轰，组织几次大冲锋，都被抗联战士猛烈的火力打下去了。待敌人发动第五次冲锋时，天已经黑了，山上只剩下连长和5名战士，都是身负重伤，连长腿被打断了，战士们抬着他继续坚持战斗。子弹打光了，李连长手持空枪筒对敌人大喊：“你来，我就给你这一下子！”敌人慌忙扔了几颗手榴弹，连长和3名战士壮烈牺牲了。其余两名战士抱枪从山上就雪滑到山下，隐蔽起来。敌人半天不见山上有动静，才胆颤心惊地摸上山，只见遗体，不见武器。

在这次战斗中，抗联这支14人的小部队，同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敌人激战了一整天；击毙日军25名，重伤10余名；击毙伪军70余人，伤15人；

冻伤日伪军近 50 名，军马被打死 90 余匹。为永志不忘，抗联第五军党委决定，把小孤山改名为烈士山。

在抗联苦战恶斗、可歌可泣的壮举中，不仅有上述这样的集体英雄群像，而且有成千上万的英雄个人典型。他们有的深入虎穴为民除害、有的冲过千难万险为抗联送信、送粮，积极支援前线。愚蠢的敌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遥相呼应的热察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同盟军勇敢崛起，与日军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察哈尔是西北军旧部的活动地盘。西北军自蒋、阎、冯大战后，所剩残部，多退入晋南各县，暂归张学良节制。其中以宋哲元部保存实力较多。不久，国民党政府编宋部为第二十九军。1932 年秋，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所部一部分留驻晋东，一部分开入察省，冯玉祥亦于此时移驻张家口。

当 1933 年春日日军进犯察东时，宋哲元率部集中于长城一线，察省兵力空虚，只有一小部分晋军和自东北及热河退入察境之义勇军数部，情况十分危险。这时原西北军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出而奔走联络，促成在晋南的方振武与冯玉祥的合作，当年 2 月间，方振武在晋南介休、孝义一带，联络西北军旧部及地方武装揭起抗日救国大旗，于 5 月下旬率部进抵察境，与冯玉祥、吉鸿昌共同发起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 月 26 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收复失地。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张家口的工人救国运动发展起来了，平绥铁路工人也组织了交通团，积极支援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并发动北平、天津、太原各地的学生，成批地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军队。北方各地零散的武装部队，也都集合到抗日的旗帜下，这些部队有察省的地方武装，有从辽西、黑龙江和热河各地区退到察省的义勇军，有原防守长城各口的部分爱国军队以及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率领的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因此，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发展到了 10 余万人。

6 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同盟军的纲领以及抗日的具体方案。6 月 20 日，同盟军兵分三路，迎击日伪军，连续克复康保、主昌、沽源等城市，伪军纷纷反正，同盟军声威大振。7 月 4 日，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领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多伦。10 日将多伦包围，日军拼死坚守，经过五昼夜的艰苦奋战，终将多伦收复，并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这个胜利的消息振奋了全国人心，上海、北平、广州以及各省的工、商、教育界的救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捐献财物，热烈支援前线。在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7 月下旬，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

正当察热人民抗日斗争炽烈开展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却采用各种毒辣手段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利用汉奸到处散布中伤抗日同盟军的谣言，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能打仗呢？”说多伦的收复“非自日本之手，乃取自伪军之手”，并要求同盟军“交还政权”。何应钦在北平也散布同样的谣言。国民党又派遣蓝衣社特务和托派潜入察哈尔，进行挑拨离间，企图瓦解抗日同盟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委派庞炳勋为总指挥，向正在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同盟军进攻。7月8日，国民党政府又调遣大军向怀来、张家口进逼。7月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电告冯玉祥“勿擅立军政名义”。同时，何应钦和日本关东军柴山进行勾结，商订了协同进攻同盟军的计划。这时国民党调集进攻张家口的军队有16师之众，配以飞机、装甲车等新式武器，包围了张家口，切断了对外交通，日本关东军也回师进攻多伦。在日蒋夹击下，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至8月14日，冯玉祥离开了张家口。

冯玉祥去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9月8日，何应钦派殷同和日军再度进行勾结，联合围攻抗日讨贼军。方、吉两将军率同盟军从怀来转战退入滦东，至9月底，终以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则被迫潜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工作，同年11月间，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将坚决抗日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员吉鸿昌逮捕，并引渡到北平，交由何应钦亲自审问。吉鸿昌在法庭上正义凛然地痛斥了蒋介石、何应钦辈的卖国勾当，表现了共产党员忠贞的革命气节。在临难的一刻，吉鸿昌从容地向刽子手说：

“来！给我拿椅子来，让我坐下，为抗日而死，死的光明正大！”

“来！你到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吉鸿昌将军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没有死在日寇的屠刀下，而是以“坚决抗日的罪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的死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愤慨，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仇恨。

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蒙古人民，当日寇的铁蹄踏进蒙古草原之后，那里的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英勇的抗日斗争。1932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出现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接着，在归绥、包头、赤峰、围场、多伦等地，出现了蒙汉抗日同盟会的组织，随后又有牧民抗日会和农民抗日会的建立。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人民，直接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有着强烈的武装抗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时领导了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除直接组织和领导了有蒙族人民参加的东北抗日联军外，1933年党又在赤峰、乌丹一带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1933年2月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组织蒙汉同盟军，开赴前线，武装抗日。蒙汉人民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纷纷组织蒙汉同盟军，并在热河前线的朝阳、阜新、开鲁等地，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蒙古人民军，还配合吉鸿昌的部队收复了多伦、沽源、商都、张北等地，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这一时期，东部内蒙人民的自发性斗争也不断发生。较著名的如1934年7月间，日本侵略者兼并农民的土地，群众奋起反抗，自动组织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军，攻下了日伪的警察署，占领了八仙洞，砸开监狱救出政治犯，并张贴布告号召武装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发动和领导蒙汉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和锻炼了人民武装队伍，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同时，也使内蒙古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坚，才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救星。共产党在内蒙古群众中的活动及其影响的扩大，为迎接更大规模的、更艰巨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面对东北人民和察蒙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敌酋东条英机气急败坏，妄

图摧毁抗日联军和人民游击队的营地。正是：革命火种扑不灭，英雄人民杀不绝。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四章 腥风血雨

东方魔酋杀人王 “三光政策”毒狠狂

千方百计灭火种 抗日武装战愈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建成侵华和反苏的战略基地，身为东北宪兵司令、伪满警各部长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妄图使用军、警、宪、特力量，一举扑灭东北的抗日联军和人民游击队。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极为棘手的任务。

1937年3月1日，东条英机继板垣征四郎之后，由宪兵司令官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他在就任致词中说：

“现在，我受天皇之命担任参谋长之要职，作为在国内外有崇高威望的前参谋长之后任进行工作，我甚感惶恐。尤其当此国内外多事之秋，考虑关东军的任务以及围绕满洲国周围之情势，越发痛感责任之重大。今后要很好地体察司令官阁下之意图，依靠各方面的协力，一道完成任务。”

东条英机所谓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剿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恢复“治安”，建立“满蒙新秩序”，竭力掠夺东北物资和榨取奴役中国人民，以便把东北建成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扩张的牢固战略基地。为此，他在天皇面前曾夸下海口，要“竭尽最善的努力，以期收到成效，鞭策驾马，竭诚奉公”。

从此，这位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将军，就利用他手中的几十万关东军、宪兵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在东北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大掠夺。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日本派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不仅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控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而且是血腥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和刽子手。“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共1万余人，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沈阳至安东的南满铁路沿线。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和《日满议定书》中都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日本国军驻于满洲国内”。这就为关东军盘踞伪满洲国披上了合法外衣。关东军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二是积极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因此，兵力不断增加，除原驻部队外，第二十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九师团、第七师团、第四师团、骑兵师团、第十六师团、骑兵第三旅团、装甲兵团等，都曾调到伪满洲国。人数最多时，关东军曾号称100万人。另外，由于伪满洲国内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因而关东军有相当大的预备力量。

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是日伪军警镇压机关的首脑。原来关东军宪兵队只有1个中队，约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中队，1000人，以后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宪兵队增加到16个，计2000人。伪满期间，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有关东军宪兵队参加，而且都处于核心和指挥的地位。

为了大举侵华和破坏中国抗日军政团体和准备进攻苏联，东条英机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它是对中国和苏联搞特务阴谋活动的实际中心。这个中心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触角和耳目安设在四方，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安东、

佳木斯、间岛、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都设有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从而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与控制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一样，伪满的军警也处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严密控制之下。伪满洲军是由投降关东军的东北地方军阀部队所组成，共约 14 万人，关东军最初主要通过顾问团进行控制。1932 年 4 月 13 日，关东军向伪军派驻了以日本陆军大佐多田骏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它由 21 名关东军军官组成。继多田骏之后，板垣征四郎和佐佐木到一都曾任伪满军的最高顾问。顾问团控制伪军的着眼点在于“防止士兵动摇”，迫使伪军参加镇压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将伪军逐步改造成为完全由日军控制的附庸军队。

在伪满军中，还设有调查部，以少数日共叛徒为中心，充当伪满军内的高等文官，专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研究，其罪恶目的主要是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策反活动。

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标志之一，是伪满洲国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而这些机构和队伍是由日本大特务和浪人甘粕正彦一手拼凑起来的。他是东条英机镇压东北人民的主要帮凶和助手。甘粕充当日本宪兵期间，曾因残酷镇压进步人士而臭名远扬。窜入中国东北之后，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积极参与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成了伪满的警察头子。1932 年 3 月 1 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警务司，甘粕任警务司长，而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有警察厅，各县设有警务局，下设警察署和派出所，专门进行逮捕、侦缉和迫害抗日人员与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是 1937 年在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下，由关东军第三课的片仓衷和第二课的山岗参谋等人策划建立的。其目的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对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对内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关系的完全秘密的特务组织。该局设有庞大的地下网，特工人员都以秘密身分活动，并拥有极大的权限，可以对警察、关税、国道局、航空等部门下达业务上需要的指示，保安局的所谓防谍地下组织，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他们都有其伪装的秘密据点和进行迫害及屠杀的秘密监狱。例如，伪滨省保安局，设于哈尔滨市，下设三个股，外设“邮检”、“防电”两个班，其中邮检班对外名称是“冈田洋行”。伪奉天省地方保安局设于沈阳市，以“姜满洋行”为掩护，有 9 个特谍班，40 余人。城内育美屋书店、劝业商场内之秋江书店。协和街前英国领事馆址均为特务据点，他们还在加茂街的“敷岛素”和北陵警察学校内设有秘密监狱。

保安局作为伪满警察机构内部的特务组织，有两方面的任务，即所谓“谍报”和“防谍”。这就是一方面通过派遣、监听等手段刺探和搜集中国、苏联、蒙古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并掌管国境警戒、国境地带检查、治安管理等；另一方面侦察和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

东条英机就是依靠这些军、警、宪、特力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谓“治安肃正”，实质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不只限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对于手无寸铁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

1932 年 9 月 15 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

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当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处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日本法西斯强盗，这样干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销赃灭迹，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力围剿。他们的口号是推行“满洲国内治安第一主义”，即把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放到这方面来，自1933年初，日伪军就在临江、通化、辑安、桓仁、柳河、兴京等所谓东边道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三角地带”，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参加这一行动的日、伪军达3万多人。据伪满治安部编印的《满洲国警察史》记载，至1933年3月底，就屠杀了我抗日武装人员8728人。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一计划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1.6万余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日武装击毙11名。中山大尉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公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我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定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万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蓖梳山林的残酷围剿，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实行武装“肃正”和“清剿”的同时，还成立了各级“治安维持委员会”，伪满洲国中央治安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副委员长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和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主要是配合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武器，拼凑汉奸武装“自卫团”，调查户口，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设立交通通讯网，搜集情报，进行反动宣传。

日寇妄图割断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系，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1936年，建集团部落3261个，到1938年共达12565个。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群众大施淫威、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过程。他们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归屯并户和制造无人区是同

一过程。1934年至1936年，仅通化县即因归屯并户损失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1939年，日伪军在哈绥线实行大扫荡，方正、依兰、抚远等地均遭烧杀，仅抚远县就有6000户被烧，形成一片荒凉的无人区。伪松江省，牡丹江省及佳木斯一带，60万户民房全部被毁。同年，日伪军在热河滦平、平宁、兴隆、青龙等地，将10户甚至上百户的村庄全部烧毁。

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各地情况不一。伪间岛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建立的集团部落情况是，部落的纵横各为200米左右，占地5—6公顷，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通化地区的集团部落，通常都是100米见方，在外围挖土壕，壕内筑土墙，在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部落四周还有炮楼。北满的集团部落规模较大，炮楼也较大。伪热河省归屯并户搞得更为激烈。该省的集团部落，多筑以石墙，其上加设两道铁丝网。每隔100米设一座炮楼。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

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分为二五十户，多者百余户。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许多都是草棚子和地害子。人民生活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很多。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集团部落”传染病蔓延情况十分严重，通化县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8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08人。传染病的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日伪对部落的统治十分严酷，一般在部落中央都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百般勒索和刁难。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村而受害的达500万人，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10。

为了加强战时法西斯统治，东条英机及其同伙肆无忌惮地把抗日武装力量活动的地区，搞成彻底的无人区，禁止一切居民居住，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在这样的区域内，若无区、村长和警察署长联名签署的通行证，禁止通行或居住，不准向抗日武装活动地区运送任何物资，违者逮捕或枪杀。此外，日伪还颁布了所谓《治安维持法》和《时局特别刑法》，对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仅据4名日本宪兵、6名伪满警察、6名伪铁警和1名伪满宪兵的招供，他们亲自参与和闻知的暴行就有，逮捕165650人，投狱41308人，处死565人。这当然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仅是几个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通过“清剿讨伐”、“归屯并村”、“三光政策”屠杀抗日军民，而且还通过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毒杀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该所由日本著名细菌战专家、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阴河进行细菌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两支秘密部队，一支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支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两支部队分别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〇〇部队”。前者由石井主持，后者由若松主持。而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则是这两支秘密部队的对外总称。

“第七三一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20公里的平房一带，建有庞大的军用

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储存大量原料。周围划有禁区，严守秘密。部队占地超过7.5平方公里，拥有3000多工作人员。“第一〇〇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第七三一部队与第一〇〇部队，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这些支队的任务是，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以及其他细菌，在研制过程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为此，设有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第七三一部队还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如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石井式飞机弹”，等等。该部队生产细菌的设备，规模庞大。按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说，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细菌。

第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正式批准的。一个亲自进行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战犯，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这些人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遭受实验而发病的这些人，被严格看管，进行观察，而且为了保密起见，部队工作人员通常把被残害的人称为“木头”。第七三一部队还进行类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活人细菌实验。他们借助电流爆炸细菌弹，使被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受炭疽热的传染。日寇还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鼠疫病菌和坏疽菌的实验。凡采用这种办法实验坏疽菌的中国战俘，经受一周的痛苦折磨后，全部死去。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员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这些细菌部队，除了用活人进行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实验之外，还广泛进行冰冻活人四肢的试验。第七三一部队在做这种试验时，每次用2—10人不等。中国战俘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放在水桶里，然后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再带到监狱实验室里。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被割去四肢，直至死亡。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

1940年夏，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结果使该地区发生疫病，造成大量死亡。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七三一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

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贻患无穷。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的炭疽，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为了挑拨各民族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除了鼓吹大和民族富有优秀素质和卓越能力，是对其他民族进行启蒙指导、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外，还竭力歪曲和捏造中国的历史，胡说“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为了笼络满族上层，日寇在沈阳特别成立满族学校，专门收容清代皇族子弟，进行特别教育。另外，如满洲国军警卫连，均由满族士兵所组成，用以监视汉族士兵，防止暴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人口不到 100 万、居住地区占伪满洲国领土 3/1 的蒙古族的政策，也是煞费苦心的。

1933 年 7 月和 1936 年 5 月先后两次作出决定，对蒙古人的“指导方针”是：维护原有的旧制度，继续利用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广大蒙古人民进行统治；同时离间蒙古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并利用蒙古民族的懦弱性格力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为此目的，在蒙族地区特别设立兴安省，组成兴安军、兴安军区和兴安军官学校。后来伪满军改成所谓国军之后，蒙古人的部队称为第九军和第十军。这些部队多次被驱使到各处进行侵略战争，为日寇充当炮灰，例如，在所谓呼伦贝尔事件、哈尔滨事件、察绥作战、诺门坎事件以及伪三江省“治安肃正”、热河地区“治安肃正”等军事活动中，都迫使蒙古人军队参加。特别在诺门坎事件中，蒙古民族，尤其是中下层，和其他民族一样，一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并多次横遭屠杀和镇压。

此外，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北后，对东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肆意掠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伪满洲国居民有 85% 是农民，耕种着 1700 多万公顷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殖民掠夺和法西斯高压统治，竭力维护满蒙皇室和王公贵族的封建土地关系，又大量霸占和剥夺农民土地，进行移民侵略，扩大日本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制定的移民计划，以 20 年内移民 100 万户、500 万人为目标。从 1937 年起，每 5 年为一期。移民户数是递增的，第一期 10 万户，至第四期计划为 40 万户。

100 万户准备占地 1000 万町步（每町等于 0.9974 公顷）。在这一计划驱使下，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农民土地，截至 1944 年，除军事和铁路占地外，开拓移民占地共达 152.1 万顷，约占当时全部耕地面积的近 1/10。如果日本移民侵略计划得逞，岂不是东北的全部耕地和大部分荒地，均将被剥夺殆尽。

日本侵略者剥夺人民土地的惯用手段，是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为名，把人民赶走，随后没收。据敌伪档案记载，1941 年，日本统治者以维持珠河县治安为名，强令散布在该县所谓危险地区的 600 户群众，迁至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煤矿苦工，并决定将帽儿山胡家粉房的 33 户居民，作为第一批迁移对象，强制全部迁出。群众闻讯后，竞相逃走，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 30 多万移民中，有 8.6 万多“义勇队”移民，他们年龄多为 16—19 岁，持有武器。他们既是日本侵略军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别动队。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量霸占和兼并农民土地的同时，还疯狂掠夺中国的劳动力。据日本《满洲国史》一书提供的材料，每年日本要在东北强行征集 200—300 万劳工，用于开矿、伐木和其他军事工业设施。他们“将劳工装上闷罐车，铁门上了锁。劳工只能在闷罐里大小便、吃饭、睡觉，到了换车的车站，一停就是两三天，时常这样走上十天半月，不等到达工作地点，劳工就死了好多”，中国劳工的生活十分悲惨，住的是不避风寒的工棚，吃的是糠菜和橡子面。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输血打气，每年要从东北掠夺数千万吨煤炭、石油和大量的木材等战略物资和重要经济物资，仅据 1940 年至 1944 年不完整的统计，日本就从东北掠夺谷物 3329 万吨。日伪当局从农民手中掠走了这样庞大数量的粮食，留下的却是罄竹难书的无穷灾难。据 1942 年 7 月 3 日伪治安部警务司警特秘发第五六八号

文内载：“兴安省望奎县因食粮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暗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5月10日至20日，仅在5户人家中便有30多人自杀。”这就是东条英机之流在东北所鼓吹建立的“满蒙新秩序”和所谓“王道乐土”。

压迫愈甚，反抗愈坚。尽管日寇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东北的人民并没有被杀绝，抗日武装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但并没有被扑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的抗日健儿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勇敢战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

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她被党派往东北，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她先在沈阳满洲省委工作，1934年后调到哈东珠河县任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她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哈东区的游击战争。为了对付敌人扫荡，她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青壮年成立自卫队，带领他们积极操练，并在左撇子沟搞了第一次伏击，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只逃出两个敌兵。从此，铁北区的武装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1935年冬，党组织调赵一曼到抗日联军中工作，担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与团长王惠同一起带领战士们在零下30几度的严寒中出没在黑龙宫、秋安屯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二团奉令回铁北，配合主力作大规模出击。由于日本“讨伐”队的烧、杀、抢、掠，游击区遭到破坏，抗联的给养成了问题，不少战士在暴风雪中，几天也吃不到一粒米。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又被“讨伐”队主力包围了。敌人600多，而他们只有200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天，打垮了敌人6次冲锋，自己也伤亡很多。赵一曼和团长商量，决定突围，她主动要求留下来掩护。在战斗中她负了伤，左手腕被打穿，左腿膝盖被击断，左臀部也负了重伤。第二天突围以后，她和战友们在候林乡小西北沟又与日军遭遇。一个同志被打死，她与另外两个同志被敌人活捉了。

敌人把赵一曼押往哈尔滨伪警察厅，特务头子想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部队调集到松花江下游的行动意图与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开始，对她软硬兼施，后来见她坚贞不屈，就用竹签子扎指甲等酷刑折磨她，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赵一曼的革命意志。敌人从她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她只是愤怒地表示：“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开展反满抗日活动，这就是我的主义和信念！”

无奈，敌人把她暂时送进医院治伤，但常来病房审问，急切地想知道抗联的动向。赵一曼还是不予理睬。敌人经常把她从床上拖下来进行毒打，弄得她的伤口好了又坏，反复地遭受折磨。赵一曼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教育了看护韩勇义和其他医生与护士们，连看守警察董宪勋也感动了。董宪勋听到日伪要处死赵一曼的消息时，连忙跑来送信，并与赵一曼、韩勇义一块儿研究逃跑的办法。第二天，6月28日深夜11点，他们乘汽车来到离哈尔滨15公里的阿什河，天快亮时到了金家窝铺，傍晚雇了一辆马车奔往游击区。眼看只有10公里地时，敌人的马队追上来了。于是又被押回哈尔滨。在酷刑拷问中，赵一曼右膀被刀背击断了。一只手耷拉着，她被解回珠河。途中敌人问她有什么遗言，她只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敌人把她绑在马车上示众，她激昂地唱起

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尸首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赵一曼虽然被日本法西斯匪徒杀害了，但她却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她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革命战士们奋勇前进。正是：神州巾帼赵英雄，壮烈牺牲后世风；抗日战争风涌起，杀身成仁代代颂。欲知东条之流下一步如何动作，且看下章分解。

第五章 策动内蒙叛乱

煽动蒙奸复“帝国” 分裂中华用心险

阴谋诡计遭揭露 蒙族健儿抗日坚

东条英机在残酷镇压东北抗日力量的同时，又遣使特务加紧策划内蒙“独立”。早在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鼓吹扩大和加强对内蒙的工作，“使内蒙脱离中央”。

《对内蒙措施要领》说：

为了大规模侵华和“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致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苏尼特右旗方面。

“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文化，经济的措施。……

“为收揽内蒙的人心起见，努力宠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对于所要物色培植的傀儡对象，这一“绝密”文件指出：

“对于德王，事实上给予自治政府代表者的待遇，此外以培养他的个人势力为目的，应给予若干援助。对于云王和索王，如果态度良好，也给他们个人若干援助。

“对卓特巴札布，使他和德王日益加强合作，并在实际上就任察哈尔盟盟长，负责维持治安和行政工作。

“对于绥远，新设特务机关后，首先要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和真意所在，如果他没有诚意，就把他打倒。”

以上就是关东军《对内蒙措施要领》的要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选中德工作为培植伪蒙“首领”，是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的。

德王是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他的名字叫德穆楚克栋鲁普。“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逐步走上了背叛祖国、勾结日寇的罪恶道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蒙、把持军事。操纵政治、垄断经济制造了方便条件，给内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的侵略魔掌又伸向西部各盟旗，首当其冲的是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它初则以“满蒙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继又以所谓大蒙古主义煽惑各盟旗王公，说什么“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等等。日寇除派遣特务间谍深入各盟旗进行秘密活动外，并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来进行政治拉拢，威胁利诱。

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寇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希坦）为主要对象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曾派依田四郎到乌珠穆沁右旗劝诱索王“归向”伪满。嗣后又派参谋田中玖带同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诱索王赴伪满参观，并要求在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对日本帝国主义染指内蒙存有戒心，因而使日寇的两次诱骗均未得逞。

当时日本侵略者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但对德王这个副盟长也并没有放过。早在 1930 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德王所在的苏尼特右旗进行活动。1931 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在扶桑馆请他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从中进行煽动，1932 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等，伪充喇嘛，夹苏已特右旗进行间谍和诱降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处游说，活动“自治”，并于 1934 年 4 月下旬，在百灵庙正式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大会。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年老多病，德王即以蒙政会秘书长的身分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这样，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成为日寇主要的拉拢对象了。

当时日寇对于内蒙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胁迫利诱，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因此，他们对于德王发动的“自治”运动最初是不感兴趣的。就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拉拢各盟旗王公归向伪满，特由驻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氏松室孝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邀请锡、察两盟的王公和总管参加。会上，松室孝良竭力挑拨汉、蒙民族关系，怂恿各盟旗加入伪满。他说，“成吉思汗向西进兵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赫赫战功；反之，向东发展就受到挫折，例如元朝东征日本，曾全军覆没。根据这个历史教训，现在你们应当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蒙古要主动走向这条途径。”

之后，松室孝良又给德王发来贺函，对他发动的内蒙“自治”表示祝贺，并以所谓大蒙古主义来进行煽动，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西部盟旗王公在用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以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1934 年秋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飞机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其目的是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土肥原对他打气说：“你工作如有困难可随时提出，我当尽力帮助。”随后，关东军即派穴浦来苏尼特右旗任日本特务机关长，架设电台，以资加强联系。接着，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二课课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又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见面晤谈时，田中隆吉特在一张纸上写了“满洲国”和“蒙古国”几个大字，他拿着对德王说：“我们日本人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送来飞机 1 架，日币 50 万元，枪支 5000 条，供德王扩充军队之用。并盼望尽早成立蒙古政府和伪蒙古军司令部。

早在这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李守信甘心事敌，与日本特务山本信亲合谋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张北事件。

张北事件是多伦日本特务机关蓄谋已久的。根据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与

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 1935 年夏，山本和伪装日本“商人”的 3 名特务，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盖印的护照，强行进城，守城卫兵阻挡不准通过。因而发生口角，守城卫兵把山本等人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闻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方的侮辱，提出了强硬抗议，并屯兵察省进行威胁。国民党政府遂派察哈尔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6 月 27 日达成《秦土协定》。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在察省自由行动；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队张北、宝昌、保康、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一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的地带。

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就乘机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指使蒙奸李守信率部于 1935 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军民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增援进攻，并有日本飞机配合，疯狂轰炸扫射。当地抗日军民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八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并进占张北县城，德王就以蒙政会的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尤为副盟长，并定于 1936 年 1 月 1 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因此，野心家德穆楚克栋鲁普从张北返苏尼特旗后，就由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一批民族分裂分子，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这年正是成纪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标记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中国的隶属，走上了分裂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随着全国抗日斗争的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就加强了对蒙古革命工作的领导，因而处于国防前线的内蒙古抗日斗争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对德王来说是个严重的障碍。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代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宣言》。宣言指出了内蒙古民族存亡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趋于灭亡的道路；一条是奋起抗战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宣言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内蒙古地方为战场、以内蒙人民作炮灰、以进行反共反苏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阴谋之后，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内蒙古人民，无论平民还是王公贵族，一致奋起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对内蒙古人民的种种压迫，主张内蒙古人民有权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同时也希望他们不要让中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进攻陕北红军。这一宣言的发表，对以后内蒙古革命工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内蒙伊盟工作的领导。1936 年 5 月，红军东征回师时，又解放了定边、盐池二县，打通了陕北和伊盟的联系。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伊盟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在那里展开了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和争取上层分子的工作。

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组织了一支蒙族抗日游击队。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的侵略日益加紧。自从“内蒙古自治政府”演变为“蒙族政务委员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它的控制；而德王也更

加投靠日本，“蒙政会”的驻地百灵庙即设有日本的特务机关。1936年1月，日本派大批顾问前往百灵庙，这样就揭穿了“内蒙古自治”的伪装，激起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敌热情。于是在共产党员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在日本顾问到达百灵庙的前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百灵庙起义。

自察北抗日战役后，乌兰夫等人即转入德王的守备队中进行抗日活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和民族平等的正义主张，深深地感动了守备队的官兵和“蒙政会”的许多青年。当德王背叛祖国和分裂民族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的时候，他们的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1月26日，守备队官兵2000余人，在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分四路举行武装起义。一路抵抗日伪军；一路打开伪保安处的监狱，释放政治犯；一路捣毁伪自治机关；一路打开银柜，焚烧帐目和抄没逆款。各路起义军胜利完成任务后，想一齐奔赴陕北与红军汇合，但他们还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就被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国民党才没有消灭他们，被迫将他们改编为蒙旗独立旅。

百灵庙起义振奋了内蒙古广大人民抗日的精神，打击了内蒙古上层阶级中为虎作伥的卖国分子。由于这次起义，迫使德王集团把他们的驻地迁往察北的化德（嘉卜寺）。

1936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组织了以李守信，王英为首的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至此，德王集团便公开投敌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按着日寇的意图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为日本法西斯搜罗炮灰。这项工作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当时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2个军，下辖8个师、1个警卫师、1个炮兵团、1个宪兵队。第一军军长李守信，负责统率第一、二、三、四师和1个直属炮兵团。第二军军长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负责统率第五、六、七、八师、警卫师和宪兵队。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1万余人。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苏尼特右旗东营盘成立蒙古军官学校，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的训练成果，是年9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由德王检阅分列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前来参加。德穆楚克栋鲁普望着“浩恰荡荡的人马”简直飘飘然了。他想：“今天凭着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岂不可以称雄一方？”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根据关东军参谋部的建议，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金永昌为驻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从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伪蒙古军政府还与伪冀东自治政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德王又从冀东伪组织弄到协款100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待伪蒙古军政府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伪蒙古军就作为日本关东军进行侵略的一只“卒子”，大打出手。

1936年8月间，德化日本特务机关长换了田中隆吉，他奉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等人的指示，策划伪蒙古军进犯绥远。他对德王说：“‘九·一

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他指使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伪蒙古军督后，作第二梯队。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大蒙古国”的野心，积极赞同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上绥远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田中隆吉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德穆楚克栋鲁普命令李守信率领第一军驻南壕堑，作为第二线的支援，把第五、六、八、九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防守后方。这样部署就绪之后，德王就以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1月5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首先指责绥远省当局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五县收税；“越权干涉”西公旗事件，“煽惑”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叛乱”；在百灵庙以南修筑作战工事等。继则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反处分等项要求，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旋于8日复电，逐项予以驳斥。于是，一场对绥远的罪恶进攻就这样开始了。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而德王和王英则是他手中的工具。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的心理发动这次进攻的。他认为上有日本飞机助威，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一威吓，绥远军队就可能撤退了；大则可以垂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夺取陕甘宁；小则也可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料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绥远军民奋力抗战，英勇打击敌人，使日伪的进攻遭到可耻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对8月唆使伪军攻绥的失败仍不甘心。至11月间，日本又唆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再度向绥东进攻，企图攻下绥远，进窥甘肃、宁夏，把伪蒙的领土扩大，成立“蒙古大元帝国”。于是绥远军民再次奋起，与日伪军在红格尔图进行更大规模的激战，把日伪军再次击溃，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在这一战役中，伪军工英部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率众反正。他们在行动之前，杀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击毙李守信伪军数百人。他们的反正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绥远抗战的胜利消息，严重挫伤了东条英机的侵略气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农大众到兵学商，都一致奋起声援，连在狱的犯人，也以绝食的办法集资捐献，形成了1936年冬季的援绥热潮。

在全国援绥抗日声中，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7万多工人，先后举行了波澜壮阔的大罢工。他们把抗日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以达到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全国性的抗日时机即将成熟，抗日的大风暴就要来临，抗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冲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敌酋策划新阴谋。欲知东条英机和他们的后台老板下一步如何动作，且看下章分解。

第六章 大举侵华

芦沟桥上动刀兵 大举侵华奏折成
闪击察绥寇得手 中共奋战煞敌风

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四省以后，暂时改变了一下侵略中国的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以攫取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植亲日派进行拼凑伪组织的活动，嗾使汉奸殷汝耕和德王先后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政府”，以便把这些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中。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走向“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东条英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最为上策”。他在1937年6月9日，作为关东军参谋长，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东条英机所以狂叫大举进攻中国不是偶然的，是和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可分的。

当时在东京，歌舞剧院在大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则大放1932年进攻上海的《炸弹三勇士》。日本大本营为了表彰战死者，对这3个侵华“英雄”特升两级，授予金鸭奖章，举行了街村葬礼，摄制了100部以上的影片，并为他们树立了铜像和纪念碑。日本军国主义在不遗余力地煽动侵华狂热。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采取措施发动战争，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也是它企图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手段。同时，英美对日寇的侵华行动，仍采取观望的政策，这无疑对日本军国主义起了纵容的作用；而这时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初步形成，但还没有得到切实的巩固和广泛的发展。所有这些，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妄想趁此时机，尽快地占领中国。

当时，华北局势十分动荡，亲日分子非常嚣张，投降暗流蠢蠢欲动，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客肖振瀛经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进行了倒黄（郛）拥宋的活动。

宋哲元在任察哈尔省主席期间，由于日寇的挑衅行为，在1935年1月间发生了察东事件，同年6月间又发生了张北事件。在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看来，宋哲元如果继续主持察政，对于贯彻他们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在张北事件发生后，日寇有意将事态扩大，何应钦为谋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曾赴南京商讨对策，并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建议，以“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

肖振瀛，吉林扶余县人。1926年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时，肖被任为包临道尹，在后方筹饷。以后肖随宋哲元当幕僚，在1928—1929年间，宋任陕西省主席时，肖曾任西安市长。“七七”抗战前，肖任国民党北平分会委员，后任天津市长。与宋哲元关系甚密，是个怀有野心、八面玲珑、神通广大的资产阶级政客。芦沟桥事变后，肖避居香港，后曾为蒋介石、何应钦等的投降求和活动多方进行周旋。

汪精卫接受了这个建议，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主席职务，所遗察省主席一职，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暂行代理，同时，将第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以免与日寇发生冲突。

肖振流是一个颇有野心的政客，由于他对第二十九军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出过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这时，肖正谋求在华北取得北平或天津市长的位置，宋哲元被免去察省主席的职务，而第二十九军又将撤离华北，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活动。他希望第二十九军留在华北不动，但又不能违抗南京的命令。适于此时，在6月28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汉奸白坚武便衣队的袭击

北平当局感到惊慌失措。肖振瀛乃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利用他的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为辞，向军分会建议将第二十九军之一部移驻北平，以巩固城防。经军分会负责人同意后，肖即以电话通知了张家口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得到开拔命令后，立即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在数小时内就由察省开驻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

肖振瀛造成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进一步在华北展开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第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就八面玲珑，四处活动，假借日寇驻军华北而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第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他一方面电蒋介石陈说日寇入侵，因见第二十九军拼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第二十九军撤走，华北岂不断送；并说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甘心卖国，要保华北；必去黄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汉奸陈觉生的介绍，在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在既签约言和，便当蠲弃前嫌，化敌为友；并说黄郛不过是一空头政客，遭到军人反对，他亦不能解决问题。日方亦知拉一黄郛，无济于事，不如利用宋、肖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肖的主张。

经过多方周旋，蒋介石终于同意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为委员长，并将该会原来的建制，由辖华北五省二市，改为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并更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察哈尔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天津市长。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人权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肖：“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何在？”肖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1935年6月27日晚，由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驶抵丰台车站时，有匪徒百余人下车。于28日零时40分，匪徒突将车站占据，把守电报电话，声言组织“正义自治军”，推白坚武为总司令。匪徒嗣即胁迫停于该地的铁甲车向北平开动，1时许抵永定门东缺口，企图闯入城内，为城防部队所阻。匪徒即向城内发炮10余响，经城内及南苑驻军夹击，匪徒向通县方面逃遁。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政委会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既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他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上亲善，实际上敷衍”；他对付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冀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是向日寇投降，要么就是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而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态度，正是冀察当局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对抗战问题摇摆不定，终至因循坐误，造成军事上重大失败的历史根源。

在冀察政委会成立后，日寇对冀察当局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施加压迫，而且在军事上也步步进逼。

1935年冬，日寇指使刘桂堂匪部，由察东向河北省窜扰，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盘踞的据点，以威胁北平的安全。经第二十九军何基淬旅击溃，向南逃窜。1936年9月18日，日寇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在中途与第二十九军相遇，因让路发生争执，遂起冲突。经双方派员前往调解，第二十九军由丰台撤出。事态虽未扩大，然而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增兵进驻丰台，并且进一步要求在丰台至芦沟桥的中间地带修筑营房及机场，但均被拒绝。

1937年2月，日寇又指挥冀东“民团”宁雨时部3000余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之线向西活动，但被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六师何基淬旅包围歼灭，并俘获日人3名，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南和北面的阴谋。

“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使华北重镇的平津一带已成为国防前线。那时北平外围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本军队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寇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寇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的伪军。仅在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二十九军部队防守。当时，北宁铁路既为日寇所控制，而位于平汉铁路线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

芦沟桥是中国富有诗意的胜地之一。这里曾经是唯一通向“天朝”京城之路。远道而来的游客不顾旅途劳顿，总要在这一旅程中安排一天，早早起来，赶在天亮前登桥观赏一番迷人的“芦沟晓月”。

这里的景色十分诱人。低低的砾石河岸挟持着河床，黑森森的河面上波光粼粼，东方已是红霞一片，天空却还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月光一泻千里。这座栏杆上刻着狮子的白石桥仿佛是浮在月色中。银白色的月光和东方的玫瑰色的曙光交相辉映，像两条大河的水汇合在一起。石狮子的脊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这些狮子各具神态，有的凶猛欲噬，有的肥胖滚圆，有的意态懒散，有的昏昏欲睡，……485只石狮神态各异，生动雄伟。每逢拂晓或有月光的夜晚，来到这里游览、散步，格外感到心旷神怡，真是诗一般的美景啊！

据史书记载，芦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成于明昌三年（1192年）。全桥长265米，宽约3米，共有桥拱11孔。由于地处要冲，元、明、清以来，时加修建，乾隆皇帝题的“芦沟晓月”石碑竖在桥前。永定河上游即桑乾河，古名无定河。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指的就是这条河。

芦沟桥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4世纪中叶，元朝的上都诸王忽刺台等入紫金关，游兵进逼芦沟桥，为

燕帖木儿所败。

14 世纪末，明燕王朱律举靖难兵，建文帝派兵征讨，燕王为诱敌深入，特撤去芦沟桥驻军，建文帝派去的那位将军不知是计，还说“弃此桥不守，我知其无能力也”。

1922 年奉直战争，双方为了争夺这要隘，曾经在这里肉搏五昼夜，厮杀得永定河变成血河，尸积如山，造成军阀混战史上最残酷的一页，凡此都证明了芦沟桥的重要。

而今，芦沟桥的军事地位更非一般。若我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攻，退可守；而一旦为敌人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芦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成为军事上敌我必争之地。

日寇当时的企图是：伺机占领芦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陷入四面色围的形势，以便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后方，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这时，第二十九军共辖 4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和 1 个特务旅，并且把地方保安队编成 2 个旅，作为正规军训练使用，总兵力不下 10 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驻防的位置是：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河北省境内）。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河北省任邱、河间一带。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驻天津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南苑。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师部驻西苑，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何基洋旅驻芦沟和长辛店一带，陈春荣旅驻保定一带。

由于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于 1936 年 8 月，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做“基本国策”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对冀察的压迫也就一天比一天加紧。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冀察形势，对第二十九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除通过第二十九军内部进步将士直接影响该军上层人物的抗战情绪外，还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经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高呼“拥护第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对第二十九军表示大力支持。他们还经常趁着第二十九军部队演习的机会，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讲述抗日的重要意义。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更加鼓舞和激发了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内和平的实现、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它决不容许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要断然实行它的“国策”，发动对中国的全面军事进攻。特别是当它得到了德、意法西斯的支持和英、美的纵容之后，就更加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日军加紧在中国长城地区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现在是万事俱备，只要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事件”终于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古老的

芦沟桥畔发生了。芦沟桥离北京城 10 公里，特务头子土肥原事先曾到现场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那天晚上，日军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中国军队守卫在宛平城内，日军诡称从中国方面听到枪声，日本特工队长随即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他说，演习时有一个叫石山的士兵失踪了，很可能是被中国人打死或抓走的。于是，兵临城下，非要进城搜查不可。中国驻军拒不开城，日军一个营便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发起野蛮的进攻。

所谓“士兵失踪”只是日本的故伎重演而已。“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就借口一名军官中村震大郎上尉失踪而挑起事端，占我沈阳，陷我东三省。其实呢？这位中村上尉并未失踪，只是背着他的上司去搞罪恶的勾当罢了。后来日本当局怕露了马脚，不得不偷偷把他遣返回国。这次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又是借口在军事演习中一个日本士兵“失踪”了，从而无理闯入我吉星文团防区，狂妄要求搜查宛平，并且炮轰宛平城。正如冯玉祥将军在这次事变发生后两周对记者说的：“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偶然；日本人又欲以‘九一八’的故伎，重演于华北了。”

日寇的无理进攻激起了中国将士的愤慨，我当地驻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战士们豪迈地提出，“誓与桥共存亡，决不后退！”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 8 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日军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第二十九军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的影响，他们深刻地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日本侵略者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愈益加强了他们至死不退的决心。因此，我军官兵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奋勇杀敌，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某天夜间，敌人以坦克向我阵地冲来，我以一连的兵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前进，将敌人的 9 辆坦克全部打退。

附近军民看到了自己的军队英勇杀敌，在中共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的发动下，人们纷纷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救护工作，把受伤官兵送到医院，送水送饭、搬运弹药的群众更是往来不绝。有的群众看到我军伤兵，感动得落下泪来。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协助军队作战和固守宛平县城，很快就在城墙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

所有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愈加振奋了前线的军心，鼓舞了战士保家卫国的壮志。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

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接着，7月13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了有全市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毛泽东主席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大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从抗战开始的第二天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立即组织北平的各爱国团体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携带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在这一期间，冀察军政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的一批批的款项，作为支援抗战的经费，有不少国民党的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芦沟桥的炮声，已经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进攻中，仍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而夺取平津以至囊括华北的阴谋；它宣称华北事件可以“局部解决”，对冀察当局采取威逼和诱降兼施的办法。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在其主子的号令下大肆活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为他们的主子日寇效忠的大好时机。汉奸齐燮元，过去曾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国旗，现在又亲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寓所劝降，他对秦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壁、陈觉生等，还乘此机会秘密进行逼走宋哲元而使冀察进一步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而就在这威逼和诱降兼施的烟幕下，日寇却更积极地策划大规模的侵华战争。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16日即调派10万陆军来华；

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议动员侵华日军40万。

在日本帝国主义燃起战火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紧急形势下，在华北军民奋起抗战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怒潮下，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仍是议论纷坛，莫衷一是。亲日派大唱“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英美派则等候美国表示态度，以决进退。7月17日，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虽然宣布了准备抗战自卫的方针，但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而张群玩弄的“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真言”，竟成为国民党对待神圣抗战的秘宝。

所谓“十四字真言”，就是说在大敌入侵、举国要求抗战的情况下，一味求和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势必天下大乱。因此，必须假装抗战，应付一下，但一战就败，败而后和就可以遮人耳目了，和后再借日本的力量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一消灭，就可以“永治久安”了，当时在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言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除张群的“十四字真言”外，还有美国买办孔祥熙的“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十二字秘诀”。其真意是，参加抗战的招牌可以打一下，但实际上是观而不战，让共产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厮杀，待两败俱伤时，再收“渔翁之利”。

在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影响下，直接肩负着冀察军政重责的宋哲元，却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他把日军的大举进犯仍看作“局部的冲突，能随时解决”，这种苟安的心理，和蒋介石仍想寻求“外交解决”的侥幸心理一样。因此，在华北军民坚决抵抗日军的同时，宋哲元仍在日本的欺骗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本侵略要求的谈判。

就在谈判的过程中，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捷足先登，北宁路每天部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自东北络绎开进关内，从海道运来的大批日军也由塘沽口紧急登陆，热河省的日军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在空军方面，日本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侦察，当日本援军调齐后，便又开始向我大举进攻。

21日，敌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25日，炮击我廊坊驻军；26日，日机10余架猛烈轰炸廊坊。同日，北平广安门外有30多辆汽车满载日军，企图冲进城内。

27日，日寇一面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于28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退尽；一面即于当晚猛攻南苑和北苑。28日，日军继续猛攻，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守军死伤惨重。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团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宋哲元于28日晚自北平逃往保定。

30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天津也在日军的猛攻下，同日弃守。沦陷后的平津，又成为日军进一步进攻华北和全中国的重要基地。

芦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全面抗日战争便从此开始了。

平津沦陷后，华北战场上的日军就以平津为据点向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三方面进攻；又从长城线向西切断同蒲路，然后南下，从平汉路西取正大路，以会攻山西。夺取山西是当时日军在华北作战的首要目标。

这时身为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心急如火，认为为天皇立功的机会到了，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关东军一支“精锐”兵团向察绥扑来。东条为打开通往山西的道路，沿平绥线进攻南口，8月2日于张北击败了刘汝明的军队，越过长城线，攻占了万全县，夺取了八角台，8月24日侵占了张家口，沿线国民党守军，采取了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作战，坐待敌人的集结和迂回而不主动出击，其后则不战而退，以致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相继沦陷。接着，日军由察南向晋北挺进，晋北重镇大同守军又弃城逃走，使敌人轻易地于9月12日侵占了大同。

东条兵团进攻之“神速”，引起了日本天皇和法西斯头目的“惊叹”，被称为关东军的“闪电式作战”，并获得日本政府的第一张“战功奖状”。从此，东条更加神气十足，为了显示他的“赫赫战功”和法西斯军威，日本大本营特谱写了一首察南战役的军歌。歌词唱道：

热河狂风卷尘砂，
蒙古高原牧草芳。
挥师进军下张北，
夜袭长城无阻挡，
塹壕凋零夜来香。
八角台下水魁旁，
汤浅十川两旅困，

披荆斩棘直向前，
神迷攻占张家口。
木樨郁香葡萄甜，
察南自治已创建。

东条兵团所以进展如此“神速”，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负责晋绥防务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这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土皇帝，在反共、限共和统治人民方面，确实是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欺骗山西人民，阎锡山曾提出了“造产救国十年计划”。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建立了“西北实业公司”开办兵工厂，以巩固其经济和武器装备的基础；另外又修筑同蒲路，实行兵工筑路计划，采用窄轨制，以防外面势力侵入山西。他当时曾编有所谓《将来希望歌》，歌中曾有这样的词：

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
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
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
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但是，山西的实际情况是：贫富悬殊，实行“十年计划”的结果，穷的愈穷，富的愈富。广大劳动人民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一遇天灾人祸，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冻饿而死。

阎锡山手中的军队，虽号称数十万，但这些军队，军纪败坏，不少官兵染有吸毒恶习，吃喝嫖赌，欺压人民，战斗力极差，因此一击就溃，不战即败，遇到日军谈虎色变，望风而逃。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晋军官兵的控制，保持他个人的独裁统治，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了一个“铁军”组织。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给晋军薪饷，多被阎锡山挪用开销，以至晋军的服装、伙食非常困苦。当时士兵经常吃山药蛋，军衣破烂不堪，尤其冬衣多是旧棉花，不能御寒，士气低沉，缺乏斗志。因此，阎锡山就玩了一手阴谋，强迫中高级军官加入“铁军”，向阎锡山宣誓效忠，并用歃血为盟的办法为他卖命。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组织了“同志会”，这一组织的目的表面上是由民族革命达到民族复兴，实际上是把山西的军政人员宠络在一起，为他效忠卖命。誓词中有这样的话：“终身不准脱离组织和背叛组织，如有背叛组织、脱离组织的一律自裁”；“如有暗地里对会长（阎锡山）不满或侮辱会长者，一律自裁”，晋军师长刘墉之曾因背后对阎锡山克扣军饷表示不满；而被迫当面自杀，这就是阎锡山所说的“自裁”。再者，对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一律用乱棍打死，仅在平遥一地就打死了数百人。

不难设想，像这样一支腐败的军队，怎能保家卫国、抵御日寇的侵略呢？因此，东条兵团攻陷大同后，晋北门户洞开，如入无人之境，10月14日占领归绥（呼和浩特），16日又攻陷包头。南路日军，在占领石家庄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沿平汉线南下，一路沿正大线西攻娘子关，攻娘子关之敌，曾在旧关附近被中国军队围歼一部，但至10月26日，娘子关终告失守。从此，日军连陷阳泉、榆次，迫近太原近郊。至11月8日，太原陷落，太原的失守，影响到晋北。于是国民党军纷纷向汾阳以西、太原以南狼狈逃窜。

与国民党军队相反，“七七”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9月间相继从陕西韩城、潼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当时，平绥线上的敌军已经占领了南口、张家口、大同，并以精锐部队

向晋北的屏障雁门关及其他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一举突破晋北防线并占领太原。同时，平汉线的敌军也正积极向保定等地进攻，期与山西日军取得配合，会攻山西。

在国民党军不战而溃的情况下，山西人民见到了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开赴前线，无比兴奋。因此，八路军沿途所到之处，不论城镇、车站和村庄，都受到广大群众扶老携幼的夹道欢迎。太原人民，特别是东北流亡学生，彻夜不眠地拥挤在车站上欢送八路军上前线。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和对八路军竭诚的拥护和期望，给予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以莫大的鼓舞。

从太原北上的八路军，沿途目睹耳闻的尽是国民党溃兵的狼狈状况和他们散布的“敌人厉害”、“仗打不得”等失败言论，这种情况愈益使八路军将士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需要以实际行动来稳定战局，扫除这种失败主义情绪。

雁门关本是当时日军进攻的目标，但因为这里有天险作屏障。易守难攻，故日军又改向蔚县、涞源等处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直入繁峙、代县，切断雁门关后方，然后进逼太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以后，即于9月中旬赶到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集结，决定利用平型关险要地形，从侧背出其不意地予敌以猛烈袭击。

9月23日，当日寇侵略军占领灵丘并准备向平型关推进时，第一一五师已全部集中到平型关东南山地的下关和上寨，当即决定以全师主力埋伏于平型关到东河南镇以北的某高地，断绝敌人的归路；并派出骑兵全部、步兵一部向灵丘方面出动，担任牵制和打击敌人增援部队的任务。

9月25日，日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约4000人，100余辆汽车在前，200余辆大车在中，少数骑兵在后，完全联成一线，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内。约5时半，我八路军向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进攻。我全线部队居高临下，首先以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后一辆汽车，使其前面的百辆汽车无法逃走。由于敌人毫无防备，因此一遭袭击，数千人的部队即在短狭的山谷内乱作一团，汽车、大车、人员、马匹互相撞击。乘敌混乱之际，我军立即对敌人展开猛烈冲锋。这时，阻击敌人从灵丘增援的我军，也打退了前来援助的敌人。

日本侵略军已陷绝境，但仍企图顽抗。于是我军和日寇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在肉搏战中，我许多战士，虽两次、三次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终于以无比的英勇和坚强的战斗意志，把作困兽之斗的敌人完全消灭于平型关以东5公里内的地区。敌人死伤的人马、被毁的汽车、遗弃的武器，塞满了两山之间的公路。

平型关战斗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据统计，歼灭了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3000多人，击毁汽车百余辆、大车200辆，缴获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1000多支、日币30万元，以及大量军用物品，单是军用大衣一项，就足够第一一五师每人一件。

平型关战斗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事实，打击了汉奸亲日派的“抗战必亡”、“战不如和”等荒谬论调，给“唯武器论”者和害“恐日病”的人们当头一棒，推翻了日寇不可抗拒、无法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捷，向全世界爱好和平、关心中国抗战的人们说明，中国人民是坚强勇敢的，是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它也给殖民地反帝斗争的人民以精神上的支持，说明帝国主义是不足畏惧的。平型关大捷，有力地

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挫伤了日本侵略军的锐气，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平型关大战后，忻口会战开始，八路军在敌侧及敌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配合了忻口会战。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不断袭击敌人，破坏敌军的交通，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浑源、蔚县、阳原、涞源、紫荆关等地，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联络线。深入到平汉线方面积极活动的第一一五师另一部，在冀西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完县、行唐、满城等县城，进逼到保定附近。第一二九师开到西北以后，即深入到大同附近，开展雁北的游击战争。

10月18日曾伏击日军汽车500余辆于雁门关之南，并曾数度攻占雁门关，收复了宁武、扬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截断了日军在同蒲路北段的后方联络线。

八路军在敌后的广泛出击，使忻口战场日军粮秣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法供应，而机械化部队缺乏汽油则不能作战，因此敌人不得不用飞机从空中联络与运输。这时，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第三营，突于10月19日夜，冒雨奇袭阳明堡（代县南8公里）敌飞机场，焚毁日机24架，使日寇空运受到严重打击，创造了步兵毁敌机的奇迹。

芦沟桥事变后，八路军从出师至11月初，两个多月来，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敌1.1万余人，缴获步马枪1300余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多匹，毁坏敌飞机24架及汽车、坦克600余辆。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敌军，使其不得长驱直入，渡河西进，并解救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厄运，起了重大的战略掩护作用。

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场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正是：抗日旌旗战局开，红军东出晋燕来，英雄健儿杀敌寇，处处凯歌暖心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七章 滔天罪行

南京惨案鬼神惊 血债累累万千重
奸淫烧杀无不为 惟有蒋公不动情

话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东条英机率领的日本军团，在华北横冲直撞；与其遥相呼应的华东日本侵略军，在敌酋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本间雅晴中将的指挥下，于1937年11月突破上海方面的防线后，直逼南京。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军，拥兵20万，却惨遭失败，遂酿成中外震惊的南京大惨案。

虽说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卫戍总司令，但他也有苦难言。唐生智原本满腔热诚，决心坚守，不料发出10多道命令，大都行不通，唐生智悲愤莫名。最后他明白了：原来除蒋介石在汉口“直接指挥”之外，军委会副参谋长白崇德还留在城内，而且分辖20万大军的将领们，各有各的来头，简直毫无办法，急得直打转。敌军兵临城下，20万大军挤在一起，攻既困难，退又不能，军令又不贯彻，真是糟糕透顶！

12月12日，日军由光华门、通济门、武定门等分别冲入，巷战开始。南京四郊汤山、淳化、雨花台等相继失陷，情况已万分紧急，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可下来了。他给20万大军指定了一条同一地点的退却路线，一声令下，20万人像集体赛跑似的撒腿便跑，从新街口到挹江门路上，挤得满满的，人仰马翻，互相残踏。守城门的军官要设法把自己的队伍先撤，禁止其他部队通过，于是双方还没有同敌人对阵，却自相残杀起来，一阵机关枪乒乓乱打，死在城门口的不计其数。事后才明白，这原来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消灭异己的毒计！

敌酋松井石根，在日军进入南京前，曾命令其部队“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妄图以恐怖手段使中国人民屈服，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于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就在南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惊世界的烧杀奸淫大比赛！

13日，日军攻入城后，首先将我未撤退的士兵解除武装，强迫苦役，然后悉数杀死。日军在大屠杀之前，先将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10余年来辛苦经营的大建筑物纵火焚烧，多成瓦砾。日军在难民区内挨户搜查，凡被认为容貌像军人者，一律捆绑，每天用大卡车20余辆来回载运，总计不下四五万人，运往雨花台刑场用大刀斩首，或作肉靶子射击，惨杀后把尸体投入江中。闻之令人伤心落泪，毛发皆竖！蒋介石却不作正面指责，怕破坏了由陶德曼调解的中日和议。但南京被遗弃在敌人的魔掌下，宛如人间地狱。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的“杰作”，表现了史无前例的兽性行为。

大火烧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熄灭！日寇在杀害中国士兵之后，又搜寻有当兵嫌疑的老百姓。在难民区一建筑内，被捕者即有400人，他们被一串串捆绑起来，每串50名，夹在步枪和机关枪的行列中，押赴刑场。

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报道，南京一个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日军的暴行，作了如下的记述：

今天（13日），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假如看到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那就决不是安全的事情。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

一个铜子和一件棉袄都不准保存，连人力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经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去枪杀，或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我们看到大批妇女惊恐万状，悲伤哭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

14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问日军司令部，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的。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数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痛苦极了。

16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100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7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不知其数。

17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有塔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有1000人。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婴儿在旁哭声不断，便把他活活卡死。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

18日，星期六。早餐时，李格斯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威尔逊报告，一个5岁的女孩被送到医院，她被日本兵刺了5刀；一个男人身上有18处刺刀的伤痕。午后，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拥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

19日，星期日。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还有几处也要烧，一天内日本兵闯入若干外侨的住宅竟达10次之多，住宅内的难民被搜劫，妇女被强奸。难民区中的清洁队员7人，6人被杀，1人负伤逃出。街道上尸体甚多，全是平民。

20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我同史密斯乘车外出，城内重要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夜间我从窗口眺望，14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着。

21日，星期二。我们14人访问日本使馆的参赞田中，面交22个外侨署名的抗议书，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的花园里还有难民400多人，吃的问题愈趋严重。

22日，星期三。我同史波林走向离办公处很近的一个池唐，看见50具平民的尸体，反缚着手，其中一个被削去半个脑袋，他们大概是牺牲于军火的吧。黄昏，我同李格斯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54岁的老妇。

下关电灯厂的工程师吴君向我们讲起了一件事情：该厂共有54名职工，工作很负责，直到南京失陷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和记银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实际是民营），便把其中43人拖出枪决。

23日，星期四。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难民，又有70人被拖出枪杀。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意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有硬茧，就可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

中午从外面送来一个人，头部被烧焦，眼睛和耳朵被割去，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几小时后，他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人缚在一起，灌浇汽油，用火烧，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鼓楼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臀部受着同样的烧伤，真是令人不能

相信的兽行！

24日，星期五。7个日本兵盘据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并强奸妇女。靠近我们的办公处，3个日本兵强奸一个12岁的女孩子！街上被刺伤的人仍然很多。

27日，星期一。日军占领南京，今天已进入第三个星期了。日军仍毫无纪律，骚扰和暴行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我们所未听到或看到的，更不知有多少。

放火的行为仍未终止。今天南城有两所基督教教会学校被焚毁，德国商人的起士林糖果店也起火燃烧。……

另外，一个外国牧师在给友人的信中也陈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说：“万人以上赤手空拳的平民已遭枪杀，其中不少是老弱妇孺。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有2万件，其实多半是不止此数的。只是金陵大学一处，我知道全案细节者100件以上，获有证据者300件，这种痛苦与恐怖是无法想象的。只在金大一地，小至11岁的女孩子，老至53岁的妇人都被强奸。在其他难民群中，72岁和76岁的老太太也难逃。在校场上，17个日本兵在光大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这些强奸案有1/3以上是白天干的。几乎城内每一建筑都屡遭搜劫，各种车辆及食粮、衣服、被褥、金钱、钟表、地毯、书画、各式珍玩等都是搜劫的目标，大多数商店被无法无天地明抢暗窃之后，再遭三五成群的士兵在他们的长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用货车把它们洗劫干净，然后放把火烧光。

“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处火警，很多段路上的房屋被他们烧毁。我们手头还藏有一些日兵放火用的化学品导火线，我们从头到尾目睹了纵火的全部过程。大多数难民所有的衣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7年12月27日，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以《紫金山下》为题作了如下报道：最先攻入南京的谷寿夫指挥下的日军第六师团，有两个准尉，一个叫富冈，一个叫野田，两人约定作砍杀100人的比赛。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一个杀了105个，一个杀了106个，这106就是冠军了，赌一瓶白兰地酒。两人同作狂笑。因为确定不了谁先到达100之数，两人决定这次不分胜负，重新打赌，看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于是杀人竞赛又重新开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说的“中日亲善”！

屠杀逾一个月后，日寇复举办所谓良民登记，以诱杀我民众。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等广场，每天被迫集会的常达万余人。日兵诱令说：“以前充当士兵及无家可归的人，退列两旁，以便给予职业。”有信以为真者真的退列两旁，便被日兵拉出去惨杀，平均每天遭杀害者达千余人，这样的屠杀又继续了一个月之久。

大屠杀之中，日寇觉得单是砍头和枪毙还太平凡，又想出种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新花样来。其中最毒辣的一种是狗吃刑，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而令狼犬扑食上身。血肉淋漓，人世间实无比此更惨的事了。还有的把人吊起来，用铁钩钩着舌头，名曰：“钓鲤鱼”。或甩铁床架在一堆柴火上，将人捆放在铁床上，名曰：“烤全猪”，残忍之状可见一斑。

谈到日寇的强奸罪行更是令人发指，据红十字会的调查报告。山西路一住宅内，当一妇女被日兵强奸时，其夫在旁哀求释免，结果夫妇同遭刺死。时值隆冬，有一日兵发现雪地上有被奸死的裸妇尸体，乃捉一市民强与交台；市民抗拒，立遭惨杀，那裸妇尸体下部也被戳数刀。有一家屋内住有姑嫂三

人，一个少妇、两个少女，被日兵五、六人闯入，少妇机警忙往屋内草堆藏匿；两少女躲避不及，便遭日兵攫住。那少妇只听见那大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作声了，那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后也不响了，只剩下兽兵们狰狞的狂笑声。少妇听得直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少妇大着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涂满了血，胸口和肚皮被刀戳穿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那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床上，满身也是血，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少妇受刺激太甚，疯了。

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中华门斩龙桥，又遭日军将其妻奸杀，8岁幼儿，3岁幼女，因在旁哀位，被用刺刀挑入火中，活活烧死。

日军在中华门外，于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至死。

当时，我南京妇女莫不人人自危，乃相继奔避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垣入内，不择老幼，摸索强奸。金陵女子大学的情况就是这样，原来由国际救济委员会设有妇女收容所，收容妇女约7000余人。日兵在挨户搜索妇女而淫威犹感不足之余，每天到该所用大卡车劫走大批妇女，号哭之声，数里可闻。大凡自12岁至70岁的妇女都成兽兵奸淫对象，稍加抗拒，即遭惨杀。

难民区妇女为避免受辱而有女扮男装的，但又被日军拉去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某次，有二三十个壮丁被敌人捕去，正当绳捆索绑时，一日兵忽触及被捕者的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觉都是女扮男装，于是悉数加以奸淫。事后剥光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钉死，有的削去两乳，有的搅烂下部，有的切开腹部把肚肠挑出来，死状之惨，目不忍睹，据说这是“皇军的惩罚”！更有一批孕妇，也遭兽军奸淫，事后再用刺刀开膛破肚，胎儿则取出蒸食！

南京妇女被凌辱的至少在2万人以上，愤恨羞愧跳江自尽者不计其数！道路皆赤，流水为阻，全城腥臭之气扑鼻，嗅之令人昏厥！据调查资料统计，被害妇女最年轻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超过70岁！

被俘的中国官兵死得更惨，据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写的《昭和50年史后》一书记载，中国战俘“集中到市内广场上，用电线捆绑成数行，押到江岸的围墙里。然后拉出一队人，把这些俘虏作拼刺刀的练习工具。未死的人，浇上煤油点着，看他们在火中挣扎乱蹦，活活烧死。军官们以日本刀作把俘虏劈成两半的比赛。因为要杀害的人太多，即命令俘虏们自己挖一个大坑，叫他们排立在坑的边沿，挨个作为靶子射击，使他们掉入坑内。有的为了节省子弹，用刺刀扎死后，用土埋上。有一伙人，手和脚都被捆绑着，头冲下被倒埋在土里。被砍了头抛进河里或用机枪扫射倒在长江里的人，难以计数”。更为惨者，日本强盗把中国战俘手足紧缚，排倒于地，以军用卡车往来飞驰其上，以致辗压成连块肉饼，不分彼此！或用马匹分尸，然后给军犬分食。这些军人都是城陷前奉命在城内集结，动都不能动的！

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表明，敌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逾40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3/5，约20余万人；老弱与幼童约10万人；被害妇女达10余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已获得证据者也有30余万人。若连无从寻觅之尸体在内，已超过43万人，即希特勒也瞠乎其右，实属一骇人听闻之大屠杀案。

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本间雅晴，早年曾留学法国。当“八一三”事变之

初，日寇在上海被我军奋勇迎击，日酋松井石根指挥下的“皇军”死伤惨重，乃向东京呼援，于是日方派本间到中国来协助作战。一到南京，他们就伙同谷寿夫对中国军民横加杀戮，犯下了震惊中外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

其实，日寇在南京的暴行绝不是孤立的。兽军所至，生灵涂炭，精华尽毁。据上海一家报纸报道，长江京沪三角地带，至少有三四十万人牺牲在日本的屠刀下。松江原是沪杭路上一个繁盛的县城，铁蹄所过，满目荒凉。街市已被炸弹炸毁，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是完整的。断垣残壁，焦上灰烬。记者访问时，松江全城只看见5个老年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他们流着泪，已经断食了。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中国人事实上离开了这个区域。从上海到松江宛如一片沙漠，未收割的稻子倒在田里发霉，焦黑的废墟、毁去的村庄，点缀着沿途凄凉景色。

据当时的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报道，11月第二个星期内，日机开始向苏州市投掷高度爆炸性的炸弹，于是美丽古老的苏州城里35万居民，便面对着令人厌恶的野蛮势力，痛苦地挣扎着。重型巨量的炸弹从天空降下来猛烈爆炸，肢体、尘垢、砖瓦不断飞腾，古老的苏州城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被称为“小上海”的无锡，是一个工业中心。如今满目荒凉，生产停顿。医院里挤满了伤兵和平民。他们有的断臂，有的折腿，有的受伤甚剧，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另有3个妇女，都已锯掉一条腿，她们是日机轰炸车站时受伤的。情景实在凄惨可怖。11月10日，是日机轰炸最凶的一天。投掷的炸弹至少有一百几十枚，数处起火，损失惨重。被炸的地方有惠山、工厂区以及水西门外一带。惠山的军用医院中弹，伤兵多人被炸死。工厂区内平民的死伤，更不计其数。送到医院来的平民伤员都残缺不全，惨不忍睹！

在华北，东条之流似乎在与江南的同伙开展着杀人竞赛。日军攻下大同后，就对太原展开了进攻，飞机狂轰滥炸，尘土飞扬，硝烟弥漫。日军占领平定县城后，穷凶极恶地搜索妇女。被他们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被他们杀害的人不计其数，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怨恨，整个中国大地在受难，在流血。正是：日寇暴行震惊中外，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欲知东条之流下一步如何动作，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章 顽敌碰壁

武装挑衅诺门坎 东洋鬼子吃铁拳
顽敌碰壁暂收敛 扩大侵略指向南

话说东条英机率领兵团攻陷山西大同之后，他就急返伪满洲国的首府——长春，策划准备向苏联作战的阴谋了。从张鼓峰事件到诺门坎事件，身为陆军部次官和空军部长的东条，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为了进一步取得德、意法西斯势力的援助，以便早日征服中国，回过头来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经过谈判，于1937年11月6日同德、意法西斯签订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议定书》。通过这个议定书，意大利正式参加了1936年签订的日德“防共协定”。从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

事隔不久，1938年1、2月间，德国法西斯由于在欧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向日本提议签订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日本出于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也不满足于已有的“防共协定”，渴望签订三国军事同盟，于是一拍即合。5月初，近卫内阁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部），拟定了日、德、意三国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基本方案。其后，日德双方频频接触。日本政府发起进攻武汉战役时，日本关东军特种情报机关截收了远东苏军一份密码电报。其中提到“应在香山洞（位于张鼓峰东北约12公里）以西高地配置兵力”。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一下苏联的反应，也向其德国伙伴表明签订反苏军事同盟的决心，于是一场蓄意向苏联进行军事挑衅的阴谋就这样确定了。

张鼓峰临近中苏边界，在图们江口上游20多公里的东岸，是一个海拔只有150米左右的高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可以遥望海参崴海港。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北方2公里多的一个隆起的山峰，其高度略低于张鼓峰，所说的张鼓峰事件就是日苏双方军队围绕这两个山峰，反复进行决死战斗的地方。

7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东条等人，对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下达命令，要驻朝鲜第十九师团尾高龟藏的部队集中到边境一带，准备向苏联进攻。7月30日，日军一个营抢占张鼓峰，次日又一个步兵营攻击位于张鼓峰以北的沙草峰，进行武装挑衅。8月5日，苏军开始反攻，经过5天激战，击退了日军。8月1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日方出动7000人、大炮37门。苏军出动大约2万人，大炮近百门，还有200多辆坦克。由于苏军坚持自卫原则，日军也不敢扩大事端，张鼓峰事件便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失败而告终。

张鼓峰事件后，日德之间关于签订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继续进行。不过，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三国军事同盟的攻击对象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7月间，经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讨论决定，军事同盟为“防共协定”的扩大，日本分别同德国签订反苏军事同盟，同意大利签订攻击英国的协定。但是，以东条为首的陆军将领对此表示反对，不同意军事同盟是“防共协定”的延续，不同意分别签，而主张签一个包括针对苏、美、英、法在内的三国军事同盟。外务省反对陆军的主张。驻德大使东乡甚至要求停止谈判，以免恶化同美、英、法的关系，对日本的将来不利。海军也不同意陆军的方案。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认为，这样的军事协定会激起日本

同美、英的战争，而日本海军兵力届时将抵不过美国。海军和外务省的基调是只以苏联为对象。陆军的主张是全盘接受了德国的主张。德国预计将来对英、法、美作战，要求不仅把苏联，也把英、法、美作为对象。近卫内阁在争论中下了台。1939年平沼骐一郎组阁后，前后又召开70次五相会议，谋求统一意见。

这时，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攻占武汉，又陷广州，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事当局东条等人，渴望早日签订三国军事同盟，借以增加反苏的资本，为了用反苏的实际行动推动这一军事同盟的签订，以及对竭诚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进行武力恫吓，不使苏联通过蒙古就近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于1939年5月，又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发动了规模较张鼓峰事件更大的反苏军事挑衅。

早在军事行动之前，日本关东军就对诺门坎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及当地地形和自然条件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所谓诺门坎地区，是指海拉尔以南约200公里的地方，即从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古郎一线到哈勒欣河的地区。

诺门坎周围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哈勒欣河东岸到处分布着沙丘、风淤沙堆和洼地。事件发生当时，又遍地丛生着杂草和灌木。在地形起伏较多的地方，坦克、装甲车、汽车等都难以行动。浩尔斯丁河从诺门坎中间穿过，把这个地区分成南北两地。浩尔斯丁河是哈勒欣河的一条支流，它是一条宽3—4米，水深约2米的小河流，但其河谷的宽度约达1500米，是个泥泞地带。

1935年，日本关东军测量队员曾在这条浩尔斯丁河流域被蒙军抓住。

在发生战斗的地方，哈勒欣河宽约30—40米，水深约2米，流速每秒约1米，只要拥有渡河工具，部队渡河并不困难。

哈勒欣河西岸的台地，看来比河面至少要高50米。苏军炮兵就在这些台地部署阵地，并充分利用了制高点，猛烈地轰击日军。但从日军一侧，却完全看不到台上的苏军情况。

日本关东军在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和部署之后，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就命令所属各兵团司令官要执行《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纲要指出，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至于对由此而产生的事态进行处理和收拾局面，要“信赖上级司令部”。

5月11、12日，日本侵略军两次同蒙古骑兵交火。

15日，日军驻海拉尔第二十二师团的部队将蒙军赶回哈勒欣河西岸。6月，苏联集中兵力准备同日军一战，7月成立第一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2个坦克旅、1个空降旅和1支炮兵部队。为调整苏蒙军事行动，以后贝加尔军区为基础，组成远东方面军。日军方面，由关东军直接出面指挥，6月间出动一批飞机对塔姆斯克机场等军事设施轮番轰炸，并派第一坦克团的主力增援边境日军，一场激烈的军事进攻就这样开始了。

据苏联前线司令官朱可夫回忆，日军狂轰滥炸的目的在于夺取制空权，以保证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战役。后来证实，日军6月份确实在哈勒欣河地域集中部队，并正进行准备，以实施根据军事侵略计划制定的所谓“诺门坎事件第二阶段”的战役。战役的当前目标是：

- 围歼哈勒欣河东岸全部苏蒙军队；
- 渡过哈勒欣河，前出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苏蒙预备队；
- 夺取并扩大哈勒欣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为了实施这一战役，日本军事当局陆续增援部队，并下令组成第六军，司令部设在海拉尔。第二十三师团、第八边防警备队等编入第六军属下。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于7月上半月完成这一进攻战役，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东条英机对他们蓄意发动的进攻充满信心，为了宣扬日军的“战功”，他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邀请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有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

7月3日拂晓前，蒙军的苏联总顾问阿弗宁上校到巴英查岗山视察蒙军骑兵第六师的防御。但是，完全出乎意外，他发现那里有日军，他们乘黑夜偷渡了哈勒欣河，正向蒙军第六师进攻。日军由于数量上的优势，在7月3日拂晓前占领了巴英查岗山及其邻近地区。蒙军骑兵第六师退至巴英查岗山西北地区。考虑到新形势的危险性。阿弗宁上校立即向苏军指挥部报告了巴英查岗山的情况。很明显，从这个地域日军可以毫不受阻拦地对苏军主力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突击。

鉴于当时的情况，朱可夫随即命令所有的预备队立即向巴英查岗山方向前进，并向敌人展开进攻，同时命令炮兵和轰炸机、歼击机加强对哈勒欣河渡口的轰炸和炮击，阻止日军继续渡河和在巴英查岗山地域集中兵力。上午9时左右，苏坦克第十一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进抵巴英查岗山地域。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1万余人，而苏军只有1000人，双方力量虽然悬殊，但在进攻中，苏联的炮兵和坦克部队却表现了非凡的勇敢。苏军在行进间歼灭了刚渡河的日军，并向云集在巴英查岗山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下面是一个名叫中村的日本士兵，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7月3日的交战情况：

“90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鸣，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7月4日，白天和晚上，战斗都在继续着。直至5日凌晨3时，日军的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皇向渡口退去。但是，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河里，他们大部分溺死在水中。

侵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残余部队，全部被歼灭在哈勒欣河巴英查岗山的东面斜坡上。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冲飞机。

日军第六军司令官荻州立兵将军（曾任日本驻苏武官）看到战况发展不妙，于7月3日晚即率领其指挥部退至河对岸。日军士兵小谷中士，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第六军司令部撤离战场的情况：

“荻州立兵司令官的汽车缓慢地、谨慎地向前开。月亮把平原照得如同白昼。夜是静悄悄的、紧张的，像我们这伙人一样。月光映照在河面上，河水反映着敌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多么可怕的夜景！我们终于找到了桥，顺利地渡过河。据说，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大量的坦克围住，面临着覆灭的危

险。真要特别警惕！”

7月5日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欣河西岸已无枪声。这一带的战斗以日军主要集团被粉碎而结束。这一仗是苏联红军积极防御行动的典范。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不敢冒险跨过哈勒欣河了。

此时，在哈勒欣河东岸的战斗仍然紧张地进行着。在巴英查岗山被击溃的敌人，把残余部队调到河东岸，企图支援担任钳制任务的安岗部队，这支部队也遭到惨重损失，没有获得任何进展。苏军粉碎了日军在巴英查岗山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欣河东岸的防御阵地，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苏蒙军的斗志。

现在日军只限于采取战斗侦察行动，但8月12日，一个有炮兵，装甲车和部分坦克的加强步兵团，在22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向蒙军骑兵第二十二团进攻，并占领了战线南端的大沙高地。日军沿全线积极建立防御：运来木材，挖堑壕，构筑掩蔽部，进行工程作业加固阵地等。从7月23日到8月4日，日本空军遭受116架飞机被击落的严重损失后，目前只限于对苏方中央渡口、炮兵阵地和预备队进行侦察飞行和小规模轰炸。

这时苏蒙军指挥部正在紧张地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总攻预计不迟于8月20日，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日军，为了进行总攻，苏方除了增派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2个炮兵团和加强轰炸航空兵及歼击航空兵外，还必须把五六万吨的重要物资从650公里以外的供应站运来。要在战役开始以前运到这一批物资，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槽车，而当时集团军群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槽车。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英雄的苏联司机作出了非凡的努力。在热风灼人的条件下，往来一趟需行1300多公里，要花费5天的时间。他们日以继夜，终于按期完成了运输任务，对保证战役的胜利完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朱可夫认为，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克敌制胜的决定因素。为此，苏军在制定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制了在战役战术方面欺骗敌人的计划。其中包括：

- 隐蔽运输和集中为加强集团军群从苏联调来的部队；
- 隐蔽调动在哈勒欣河东岸进行防御的兵力、兵器；
- 部队和物资储备隐蔽地渡过哈勒欣河；
- 对出发地域、部队的行动地段和方向进行现场勘察；
- 参加此次战役的各兵种特别隐蔽地演练各种科目；
- 发布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日军弄不清苏方的真实意图。

为了欺骗敌人，掩护部队在夜间运动，苏军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这些器材能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飞行、坦克运行的声音。在突击队伍开始调动以前的12—15天，苏军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之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种模拟的音响当成部队真正运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音响的地方进行射击；可是后来，他们也许是习以为常了，便对任何声音都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苏军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部队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苏军对指战员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并对日军的兵力部署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队发起合围、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气晴朗。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不会进攻，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允许其军官星期日休假。其中不少人在这一天远离自己的部队，有的到海拉尔，有的到甘珠尔庙等地。朱可夫认为，这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情况，决定就在星期日开始进攻。5时45分，苏军炮兵对日军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开始进行突然猛烈的射击。部分炮火则对苏航空兵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幕弹。

在哈勒欣河地域，由远而近，飞机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在空中出现150架轰炸机和近100架歼击机。飞机的突击非常凶猛，红军指战员的情绪极为高涨。8时15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对日军目标开始火力袭击，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威力。8时30分，航空兵再一次飞临上空。通过各条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发出预定的密码命令——15分钟以后，开始冲击。苏航空兵和炮兵的突击非常成功，日军在精神上、火力上都被压制住了；在一个半小时内，日军炮火无力进行还击。日军的观察所，通信联系及炮兵阵地全被摧毁。

经过5天的激战，苏军终于在8月26日完成了对日军第六军团的合围。

27日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日军，由于流沙、沙坑、沙丘使战斗行动极为困难。日军异常顽固，战至最后一人。但是，士兵们逐渐识破了官方所吹嘘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某些日军士兵和军官所写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情。下面是日军连长福田日记的摘录：1939年8月20日。

从清早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歼击机和轰炸机50架，一群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所使用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7时45分。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隆隆爆炸，简直像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包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灵是悲哀的……我们的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

8时30分。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0时40分。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8月21日。

苏蒙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轰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射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8月22日，9时30分。

敌人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是在这个时候，福田的生命和日记都中断了。

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日军第六军团全军覆灭。这是对日本法西斯的严重打击，迫使日本执政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武装力量的威力。

然而，正当日军在中蒙边境的反苏战斗中被打得惨败时，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希特勒事先根本没有向日本打招呼，日本对此毫无所知。消息传来，日本政府大力震惊，于是便向德国提出抗议，责备它背信弃义，苏德条约加深了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平沼内阁被迫下台，不久日苏签订了诺门坎停战协定，这次相当于局部战争规模的反苏军事挑衅，

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军伤亡 5 万多人，损失飞机 180 多架，火炮损失达 72%。

东条英机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的鼓吹者和阴谋策划者。早在他担任伪满洲国宪兵司令和关东军参谋长期间，他在侵华的同时，就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在他升任陆军次官后，更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煽动反苏反华。这个被东洋法西斯匪徒称为“日本前进动力”的东条，于 1938 年 11 月 28 日，在日本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就发表过所谓“爆炸性的演说”。他声嘶力竭地狂叫，要确定“对苏支（对苏联和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紧急任务。

东条在阐述了必须对苏联和中国同时正面作战的所谓理由之后，鼓吹要进一步加强扩军备战。他说：“为确立皇国天赋使命之东亚永久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不见蒋政权之溃灭决不收兵。且当前蒋所有之兵力，虽已气息奄奄，犹有百余万，另外尚有企图扰乱我后方之共产党游击队，其数实达四五十万，由于以上实际情况，我依然须继续作战，故弹药之补充、资材之输送，今后仍将达相当数量是不言而喻的。……今后由于面临准备对苏中两国同时进行武力作战之必要，必须倾注人马资材之全力以建设新军备。”

东条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排除所有障碍，向军备之充实、军需生产之飞跃扩充以及基础生产力之扩充而迈进。”

东条的“爆炸性演说”发表之后，在日本经济界、舆论界引起大哗，兜町、北滨一带的股票界人士尤其痛骂东条是战争魔王。这是因为他讲演的消息发表后，次日股票便一齐下跌。

如今，诺门坎事件的失败，无疑对东条和其他军政头目是当头一棒。在这之后，日本法西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决定暂时把三国军事同盟谈判搁下来，留待以后解决。日本法西斯开始考虑在北方对苏联“保持静谧”，以便通过在南方扩大侵略来摆脱因全面侵华战争而造成的困境。正是：对苏挑衅遭痛击，侵华战争无转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章 诱降与抗战

速战速决遭破产 侵华策略大改变
百团大战显威武 诱降阴谋被戳穿

话说东条英机满指望向苏联挑衅，会旗开得胜，威震欧亚；不料却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使他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回头再看看中国战场，情况对日本侵略者也越来越不妙。“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在1年多的时间里，鲸吞了大半个中国，日寇气焰可谓十分嚣张。但是，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进攻力量大力削弱。而在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却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解放区战场已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使身为陆相的东条大伤脑筋。

在国民党的战场上，虽然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东方慕尼黑阴谋甚嚣尘上，但是蒋介石集团迫于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浪潮，还不敢轻易投降。那时侵华日军不足百万人，散布在纵横万里的中国战场上，进行稍大一点的战役，必须各处抽调兵力，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兵力严重不足。日寇再往中国西部山区追去，既无足够的兵力，也达不到侵华的主要目的。于是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毛泽东主席所科学预见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在速决战的幻想破灭之后，被迫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在政治上，它从反蒋转变为拉蒋，即着重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早在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提出“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阴谋拉拢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反苏反共。

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声明，改变了它在同年1月16日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公开引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参加所谓“新秩序的建设”。

日本的诱降策略首先得到国民党亲日派的响应。国民党第二号头目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假道河内，投敌卖国当汉奸去了。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根据汪精卫叛国的具体情况，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声明说：“日本认为，根据德意防共协定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力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1939年3月，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平沼演说标志着日本的对蒋政策正式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在军事上，规定侵华日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而不再是进攻了。在华北“确保现已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区重要地点的治安，并且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确保大体在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且要确保主要交通线”。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

在外交方面，日本加紧与德、意法西斯勾结，既作反苏姿态，又对英、美施加压力，诱迫英，美唆使蒋介石投降，企图从中国战场拔出泥足，以便

在同美、英争夺西南太平洋殖民地利益方面处于主动地位。日本以只反共不反蒋为核心的新策略，对英、美以及蒋介石集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英、美劝降、蒋介石投降的阴谋便紧张地活动起来了。

早在 1938 年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曾互相串通，坑漉一气，阴谋召开太平洋会议，解决中日战争问题。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一阴谋活动，时紧时松，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停止过。武汉失守后。英国不断示意蒋介石议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欧洲一味对希特勒采取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在亚洲也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1939 年 4 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口蒋之间，积极策动中日议和。卡尔在重庆曾和蒋介石密谈了 7 次。事后，他回到香港对外表示：“假使日本和中国两方都愿自动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上述消息和事实表明，英国张伯伦代表国际投降主义者策动的劝降，早在 1939 年就已经开始了。

同年 7 月，日本外相有田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就“东方慕尼黑”的基本方案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声明：一、它承认中国的现状和在华日军的特殊需要；二、不得赞助有碍在华日军满足这些要求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但日寇得寸进尺，不断炫耀武力。1940 年 7 月 17 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以攻城重炮 24 门编成第一炮兵队，作出南进香港的姿态。就在这一天，英国丘吉尔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封闭滇缅公路 3 个月，停止所有通过香港的援华物资运输，迫使蒋介石议和，力促蒋汪合流。总之，英国的东方政策就是远东的慕尼黑，它阴谋牺牲其一部分在华利益，换取日本充当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从东方牵制苏联。

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忙于应付希特勒的侵略，被迫减少了对远东事务的干预。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主角，由美国来扮演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扶植日本成为远东反苏反共的有效堡垒；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与日本均分赃物，共霸远东。所以，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方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市场，怂恿日本侵华；另一方面，它又接济中国一点东西，让中国作一定的抵抗，等待时机，出面干涉，在既保持它的远东利益，又不伤害日本反苏实力的条件下，结束中日战争。

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势力的纵容、绥靖由来已久，早在 1937 年 8 月，即“七七”事变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国民党政府特使孔祥熙说过：满洲国成立已有 6 年，现在不论法理如何，其存在已为事实。目下各国虽未承认，但将来不免有一两个国家与日本在互换条件下开始承认。在这里，美国的绥靖政策已经初露端倪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是日本国际市场与侵华军火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纽约《商业日报》宣称，日本是“商业权利的维护者”；美国漫画家笔下的日本侵略军则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与俄国熊搏斗；美国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曾把自己公司的资金提供给日本作战之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9 年至 1940 年，美国对日本石油和钢铁的出口创造了新纪录。仅据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的统计，1939 年 9 月 1 日到 1940 年 1 月，平均每月输往日本的美国“废钢”为 20.2 万吨，比 1938 年几乎多一倍。

东方慕尼黑的阴谋，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而没有得

逞；但是，东条一伙却竭力煽动蒋汪合流，加紧反共，而这些正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下怀。因此，在日蒋之间劝降和投降的活动一直在暗中进行。

远在1938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的科长董道宁，就曾秘密地到了日本横滨，会见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贞昭，回国时携带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亲笔信，内称：“董道宁来日，以身传达贵国诚意，使我当道大为感动。”4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另一要员高宗武与董道宁又从汉口去香港会晤日人西义显，高宗武传达蒋介石抗日之宗旨说：“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要求日本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之完整，此即蒋介石集团投降之条件。

1939年12月下旬，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会见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多次会谈后，日本又派今井武夫大佐去港，怂恿蒋汪合流。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和蒋帮代表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在香港召开中日会谈预备会议。日方提出陆相烟俊六的证书，蒋方提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讨论的问题有：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秘密防共协定；日军驻屯内蒙、华北；蒋汪合流，等等。后来由于蒋介石集团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不敢公开承认汪伪政权，而使会谈延宕下来。

日本诱降，英美劝降，蒋介石也确实想投降；但他们活动的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力量的壮大，形成了一条反动势力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在中国，谁投降敌人、出卖祖国，谁就是民族的罪人，就必然为人民所唾弃。正如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吐露的苦衷。他说，如果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条件，他的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中国就要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在中国取胜。所以蒋、日之间，讨价还价，终未成交。

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投降，但却适应日本的要求，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1939年1月，正当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他们把喋血抗日的共产党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叫嚷“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清扫”。他们准备把惨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作向日寇投降的献礼。

在山东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此外，还传布着这样三种对待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在这样的反共叫嚣下，1939年4月间，便发生了博山惨案。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6月，河北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同月，在湖南又发生平江惨案；

11月，在河南发生确山惨案；12月，阎锡山进攻山西决死队。

1940年2月，国民党将领石友三投敌，在冀南和日寇联合，向八路军进攻。就这样，蒋介石集团置日本侵略于不顾，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而且愈演愈烈。难怪日本陆相东条于1941年1月在日本两院报告战况时说：“昭

和 15 年（1940 年），重庆敌军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之反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丧失了大片国土，使中国无数同胞沦于日寇奴役之下，而却丧心病狂，大事反共！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大唱“曲线救国”，指使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自 1941 年后，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及其部队连续大批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据统计，到 1943 年 8 月以前，国民党叛国投敌的文武官员中，有中央委员 20 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 58 人，投敌军队达 50 万人，占伪军 80 万的 62%。

蒋介石玩弄的所谓“曲线救国”，是一个反动透顶的政治阴谋。一方面，他指使一部分喽罗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与日寇一起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另一方面，以蒋介石力首的一部分人，仍留在抗日阵营内，继续打着抗战的招牌，向英美索取援助，扩充他的反革命力量。这样，他就可以坐观形势的变化，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他就可以踏着这些“曲线救国”先遣队的脚印，完全投降日寇；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战败，这“曲线救国”的英雄们，又可摇身一变而为“中央军”，为他“收复失地”，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以皖南事变最为震惊中外了。1940 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叶挺军长，要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

要把为抗日救国而发展已达 50 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 10 万人。国民党顽固派不独想以此来削弱人民抗日武装的实力，更阴谋策划在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移动的过程中，发动突然袭击，以消灭这些部队。

在“别了，3 年的皖南啊！”一片悲壮的歌声中，1941 年 1 月 4 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等共 9000 余人，由泾县的云岭起程，向茂林前进。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 7 万多人。7 日，新四军到达茂林时，国民党军立即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妄图“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经 7 昼夜血战，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了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及干部多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

蒋介石干了这桩血腥罪行之后，随又在 1 月 17 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等的 20 余万国民党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皖南事变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形势下与日寇勾结反共、投降的第一步。他们还要大举进攻江北新四军，准备取消八路军番号，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消灭共产党！为此，日寇答应将从华中、华南撤退，让国民党军队接防，然后日寇集中进攻华北八路军。在这些活动得手之后，蒋介石即可与日本签订“和平”条款，宣布加入德、意，日三国反共同盟，结束抗战。

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大阴谋后，又坚定地指出：“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同时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 1 月 17 日的反动命令；惩办

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 12 条解决办法。最后郑重声明：“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如若他们估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并表示，八路军各部和留在华中。苏南尚有 9 万余人的新四军，无论将来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已随时准备予反动派以沉重的还击！

就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大事反共的同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事当局，则下令停止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将其主力撤回后方，集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主动出击，粉碎了日伪无数次的进攻，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国民党军弃守武汉。广州时，我晋察冀边区军民于 10 月间在晋北广灵地区进行伏击战，毙日侵略军独立第二旅团常冈少将以下 360 余人。

11 月末，在粉碎了日寇扫荡之后，乘胜大举向平汉路、正大路及同蒲路北段的敌人据点袭击。

1939 年 4 月，日寇调动精锐兵团 4 万余人，向边区发动春季大扫荡。5 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八路军在繁峙与涞源地区进行两次歼灭战，毙伤敌 1000 余人。9 月，日旅团长水原亲自率领 1500 多人向我边区腹地陈庄进攻，经过六天五夜的激战，敌军全部就歼，连增援之敌在内，共毙伤敌官兵 2000 人。

陈庄歼灭战后一个月，日寇又集中了 2 万人的兵力，开始了冬季大扫荡。敌人这次挑选了号称精锐的第二混成旅团，在阿部中将的亲自指挥下，分 12 路进攻边区，进攻的最后目标是阜平县。

反扫荡初期，我先以小兵力袭扰敌人，使其疲惫，然后集中主力，各个击破。在涞源县的岔口、黄土岭的战斗中，我军毙伤敌军 1500 人，并击毙阿部中将。华北敌人曾在追悼阿部的挽联上哀鸣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在这次反扫荡的后期，我又歼敌 2000 余人。总计在这次冬季反扫荡中，我八路军和游击队共战斗 108 次，毙伤敌军 4000 人，俘获日伪军 2000 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在这次反扫荡中，法西斯强盗在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便施以残忍的破坏，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据不完全统计，烧毁房屋 65300 余间，抢夺粮食 7900 余担，仅在阜平周围，就屠杀群众 255 人。

在这期间，我活动在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及华中、华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歼灭敌人、壮大自己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仅据 1938 年 6 月到 1941 年 5 月极不完整的统计，在华北，我对敌人进行大小战斗 15139 次；在华中，我对敌人大小战斗 4967 次；合计 20106 次，平均每天战斗 27 次以上。在此期间，共毙伤日军 125695 人，伪军 60486 人，合计 186181 人。抗日战争的第五年，即 1941 年 7 月 7 日至 1942 年 7 月 7 日，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 14648 次，平均每天作战 40 次，毙、伤、俘日伪军 132000 人。

中国共产党为进行人民战争，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解放区里，一切男女青壮年都在自愿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則下组成抗日人民自卫军。他们之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成民兵队伍。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民兵发展到 220 万人以上，他们平时参加生产，一有敌情，立即投

入战斗。有了这种民兵组织，敌后游击战争才能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没有这种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除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外，解放区里还建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抗日团体，从事援助军队作战的各项工作，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人民军队和人民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全体军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斗集体，实现了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

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抗日战争经验时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的威力是最大的，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在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解放区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数不尽的人间奇迹。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在岗峦起伏的山区、河湖港汉的水乡，进行游击战争是比较有利的。而在辽阔无垠的平原上，敌人容易施展淫威，进行游击战则确有不便。但是，困难吓不倒革命的人民。冀中人民创造了地道战，在长达数十里地内，可以不出地面而自由转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地道成了歼灭敌人的地下长城。有些平原地区的人民则挖掘抗日道沟，仅在冀南地区，自1938年到1940年间，就挖掘抗日道沟2.5万多公里。它既便于人民武装的游击战，又给敌人的现代化战争工具以有力的限制。这些斗争经验和创造，为坚持平原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实践中，我国人民群众对战争艺术也有惊人的创造。广大战士、民兵创造了麻雀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一整套战法，使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伤亡惨重，疲惫不堪。闯入我解放区的数十万日本法西斯匪徒，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处处遭袭击，天天有伤亡，弄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1940年夏天，希特勒在欧洲战场取得的“胜利”使东条等日本法西斯头目大受鼓舞。他们妄图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并扬言要进攻昆明、西安，威胁重庆，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一个稳定的后方。在此形势下，我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制止国民党妥协投降的逆流，稳定国内局势，鼓舞人民的斗志，随即发动了一次震惊国内外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是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进行的。于1940年8月20日20点，在50个地点同时开始，到12月5日结束，参加战斗的军队共115个团，近40万人，持续战斗达3个半月之久。

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中心任务是对敌人华北交通线总破袭。聂荣臻将军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指挥的第一二九师及晋东南新军等部队，贺龙、关向应将军指挥的第一二师等部队，对正大铁路全线和同蒲铁路全面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虽然日军拼命顽抗，并用百架飞机轮番轰炸，但我军不怕艰险，英勇杀敌，一个月的作战任务，20天就胜利完成，攻克山西的娘子关、阳泉，河北的定县、高碑店等重要城镇，彻底破坏了正大铁路，切断了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使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从9月10日到10月上旬，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的既得战果，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之敌伪据点。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占领了许多敌伪据点，歼灭了大量的敌伪军队，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日寇为了扭转败局，纠集了3万余人，向我冀西根据地反扑。因此，自10月6日起，我军进入反扫荡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大反扑。这样，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遂告结束。

据统计，“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军2.1万多人、伪军2.5万多人；攻克敌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公里，缴获敌军大量轻武器。“百团大战”以后，日军换了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

“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稳定了抗日大局，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逆流和反共阴谋；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时间，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设置了障碍，从而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投降逆流痛遭鞭打，抗战洪流滚滚向前！欲知敌酋东条英机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章 鼓吹南进

近卫内阁陆大臣 飞扬跋扈恶煞神
鼓吹南进急如火 称霸亚太已铁心

近卫第二期内阁，是日本历史上最不稳定的短命内阁之一。仅仅一年，内阁就进行了3次大改组。而东条英机的地位倒是巩固的，他飞扬跋扈，一任陆军大臣，就成了左右朝政的核心阁员。

1940年是世界局势急剧动荡的一年。希特勒在鲸吞了波兰之后，又于5月10日在西线发动了闪电战，低地国家陷入一片慌乱。4天后的黄昏，荷兰总司令投降。次日一清早，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从梦中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法国总理雷诺惊呼道，“我们被德国打败了！”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宣布投降，并拒绝到英国避难。不到一个月，法国投降，英国也危在旦夕。

希特勒的“赫赫战功”使日本军部东条一伙大力陶醉。他们认为千载难逢，法国已经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战略物资，还待何时！甚至几个月前，还担心对华战争失败的一些人，眼看着希特勒在欧洲的突然走运，不禁垂涎欲滴，一心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7月底，平沼内阁垮台，近卫公爵在皇室的举荐下重新参政，第二次组阁。内阁中两个要缺由两位锋芒毕露的人物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他是一位堂·吉珂德式的人物，遴任外相；另一位是东条英机将军，遴任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心毒手狠，果断专横，故有“剃刀将军”之称。由于他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战争中“功勋卓著”，深得天皇和日本统治阶级的赏识。东条虽然是一个法西斯狂徒，但他反对“下克上”，所以他在“二二六”事件中与其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将领们不同，他立即通电宣布满洲处于紧急状态，从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乱。因此，他赢得了军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的文官的敬重。

松冈洋右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虽然足智多谋，但浮夸外露，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口若悬河，有“五万言先生”之称。此人言行不一，经常出尔反尔。在国际开会辩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时，他像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溜出会场。他那修剪得像枪弹一样的脑袋，八字胡子，玳瑁边大眼镜，矮矮的个子，像个马戏团的小丑，以及他的戏剧性的表演，给各国使团和新闻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松冈的童年也与一般大臣不同。他出身并非豪门贵族，13岁就飘洋过海，被他的叔父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美国人收养了他，在尔后成长的年代里，他发奋自强，刻苦读书。他做过工，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甚至临时做过仆人。在俄勒冈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工作了3年，然后回到了日本，由于聪明伶俐，善于活动，一举成名，当了南满铁路的总裁，成了日本政界、财界的显赫人物。

松冈性格怪癖，故弄玄虚，经常说一些与他的信仰相反的话。他的想象力丰富，很少解释他所想象的事情，即使解释也是一场滑稽的问答戏，弄得大家都糊里糊涂，连那些认为他是日本俊杰的人士也为他玩弄外交游戏而焦虑。他一再向同僚们保证他是亲美的，但讲起美国来却深恶痛绝；他口称不

相信法西斯德国，却向希特勒献媚；他标榜反对军国主义，却发表主战言论。无怪乎有人称他是一位神经不正常的“智力体操运动员”。

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刚成立4天的近卫内阁就一致通过了一项新的国策。这项国策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日本的霸权，也就是说，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对内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加紧扩军备战，实行军事计划经济；对外，要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要设法与美保持“和解”；对华，加强诱降，促进蒋汪合流，争取尽早解决中国问题。总之，要趁欧战之机，日军开进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攫取战略物资，掠夺英、美的殖民地。

这项“勿误良机”的国策，是东条一伙炮制出来的。他们说服了近卫首相和内阁中的其他文官，使这些人相信，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在他们看来，法国战败了，英国在为自己的生存战斗，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和米“是丢在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主物”。

松冈对东条等人的谋略持有异议，他反对南进，但支持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他认为南进必然走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正面冲突的道路，而签订三国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要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再者，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那些不同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军政高级官员，因为敌不过松冈的唇枪舌剑，也违心地同意了。

1940年9月27日，条约在柏林签字。从此，日本就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拴在一个战车上，在开向死亡的悬崖上愈走愈远。

松冈自以为策划了一项争取“世界和平”的计划。有些认为他与美国友好的老朋友感到不解，松冈对他们说，这是避免与美国开战的好办法。他对他的大儿子说：“只要你坚定地站着，开始反击，美国人就会知道，他是在同一个男子汉讲话，然后你们两个就像男子汉对男子汉一样谈话。”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真正认识美国。

惯于拐弯抹角的松冈向内阁提出，实现他的外交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支持里宾特洛甫提出的把德、意、日与他们的共同敌人俄国联合起来的计划，他请求允许他到欧洲去亲自实现这一目标。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东条同意他去欧洲，由陆军代表永井大佐作为顾问同行，但拒绝了他提出的顺便带给希特勒的一件礼物——日本进攻新加坡的许诺。

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德国纳粹元首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说，占领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因为届时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同时，希特勒向他保证，日本一旦参战，德国“一定援助日本”，“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但是，一谈到新加坡问题，日本外相总是躲躲闪闪。例如，当戈林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画后，开玩笑他说：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松冈转向紧张不安的永井大佐，点点头说：“请你问他吧！”

松冈对他同苏联签订和平条约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但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他听到曾向他提出签订“四国联盟”这个主意的里宾特洛甫说：“怎么能在這個時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俄国是从不白给东西的。”永井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但松冈的热情并未减退；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私下告诉他，德国和苏联可能不久就要开战，但他还是那么热心。甚至在他离开

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国已入侵南斯拉夫时，这位外相还在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口袋中！”

果然如他所愿，在他抵达莫斯科一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在庆祝签字的宴会上，松冈向斯大林敬酒，并说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说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冷冷地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

此时，在世界的另一侧，松冈的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努力修补日美关系的谈判。原因是日本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后，美国立即进行报复，宣布把各种战略物资和航空汽油对日本实行禁运。当时，美国国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意见纷坛。主张进行干预的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前途和最终的安全，取决于帮助受害的国家粉碎法西斯的侵略。为此，他们刚刚设法在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使美国承担了义务向轴心国的敌人提供“除了开战以外”的援助。支持这个措施的有“英国拥护团”以及亲友在欧洲遭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迫害的少数民族。反对这一措施的是：查理斯·林德伯格的右翼“美国第一主义者”、参议员博拉和德美同盟以及历来主张孤立主义的中西部人士，这些人虽然同情被侵略的国家，却不愿参加真枪实弹的战争。

日美会谈初期，首先由日本方面起草了一个《日美了解协定草案》。协定中最重要的几条关系到中国，其中日本许诺：如果美国承认满洲国，如果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卫领导下的南京伪政权合并，那么日本就从中国撤军。赫尔没有对日本的草案正面发表评论，只是笼统他说，美国最关心的是，日本政府应该事先作出明确保证：它愿意并且能够执行一个关于和平解决各种问题的计划，放弃其目前用武力实行军事征服的政策。

外相松冈反对同美国进行谈判，他把协定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见。松冈向德国大使奥特将军保证，如果美国参战，日本肯定也要参战。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怀疑松冈。他对墨索里尼说，松冈是个天主教徒，但也向异教的上帝献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既有美国圣经传教士的虚伪，又有亚洲日本人的狡猾”。

5月8日，松冈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竟能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留任。”

美日会谈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加上美国截收到的日本密电，就变得更为严重。外交电报本应是破译不了的，但它却被美国专家们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驻各国外交使团的密电，不断地被截收和破译。这项工作是在“魔术战役”的代号掩护下进行的。因此，赫尔通常在开会前就能知道野村的想法。此外，由于赫尔对日本人永远挂在脸上的“冷冰冰的”微笑感到讨厌，他总是讥讽或嘲笑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和讲话时的“吸气音”。因此，赫尔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博士就很容易使这位国务卿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人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原则。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虽然赫尔和野村力图消除分歧，不过进展甚微，

在东京，松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发表挑衅性的言论。5月14日，他对美国大使格鲁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3天以后，他又写信给格鲁，解释他“与众不同”的态度。他说，他是从1000年、2000年、甚至3000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假如人家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他也毫无办法，因为他生来就如此。

6月21日，美国国务卿终于对日本的提案作出了正式的回答：“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此外还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一些其他要求。近卫及其内阁对美国的答复甚为震惊。尤其使松冈激怒的是，赫尔在答复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口头声明。大意是说，近日来，某些日本官员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谈判道路上无法克服的障碍。松冈认为这是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谈判的理由。第二天，6月22日，星期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日美双方的会谈就由此暂时搁浅了。

德国入侵苏联，成了全世界最关注的问题，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愤怒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而西方国家却竭力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打算。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表现得尤为积极。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预测，“希特勒大概6个星期到两个月就可打败苏联”。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禁觉得，如果我们立刻利用这个事件，能给我们和英国提供一个大好时机。”然后他对罗斯福说，他认为，德国只要1个月到3个月就可消灭苏联。格鲁大使认为，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只能对美产生好处。他在日记中写道：“让纳粹和共产党就那样去互相削弱吧，民主国家不久就可占上风，最少能从目前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星期天下午4时，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消息传到了东京。松冈对此喜出望外，几分钟后，他给宫内大臣木户侯爵打了个电话，请求谒见天皇。不到一小时之后，松冈拜谒天皇，很明显，他陈述的问题并没有和首相近卫谈过。他坚信德国能迅速击败俄国。他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天皇感到惊异，因为这个方针意味着朝两个方向扩张，他要松冈同首相商量。

就在松冈拜谒天皇3天以后，在近卫召开的由军政要员参加的联席会上，松冈力主进攻苏联的意见，遭到了以东条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鉴于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不主张急于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海相及川也说，同时与两国海战，实属困难。“为了这种局面，不要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

松冈说：“在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然后，他说了一些与外相身分不相称的话。“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开展外交。我看还是流血好些。”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他问道：“南边重要，还是北边重要？”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回答道：“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泄露他的想法，如果莫斯科8月底前陷落，陆军将进攻西伯利亚。

头脑伶俐、脾气暴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塚田说：“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齐头并进！”

第二天，松冈又找东条进行争辩，他说，根据德国的通报，俄国的战事不久就会结束，英国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们在德国击败苏联后再着

手讨论苏联问题，在外交上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假如立即进攻苏联，美国就不能参战。”他坚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国3个月到半年。“如果我们像统帅部建议的那样坐等结果，我们就将受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包围。我们必须先北进，然后南进。……”他像开了闸的河水，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直到他看见他的话毫不发生作用时，方才罢休。

最后松冈以挑衅的口吻说：“本人的预言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现在我预言，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英、美两国必然参战，不然我们走着瞧吧！”

就是在松冈找东条争辩之后，柏林方面忽然改变态度，立刻对日本施加压力。过去几个月，希特勒尽量唆使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新加坡，使日本成为他对付英国的军事盟友。现在形势变了，日本的战争机器必须掉转方向——对准俄国。这项工作责成里宾特洛甫来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里宾特洛甫绞尽了脑汁，极尽引诱欺骗之能事，催促日本尽早参战。为此，他约见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纳粹外交部长假惺惺地对大使说：

“贵国向太平洋进军固然意义重大，但是考虑到准备不足，不妨先解决俄国问题，参加德国的对苏战争。俄国溃败之后，贵国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南进了。”

在东京，德国大使欧根·奥特也奉命向日方指出：“鉴于事态的迅速发展，日本应迅即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并带有威胁的口气说：“若日方在苏俄被击溃后始采取行动，势必影响其道义和政治地位。”

陆相东条对希特勒出尔反尔的态度有些不解。他想：“过去一直鼓动我们南进，说我们的北方是可靠的；现在又要我们北进，莫不是想让我们去为他们探虎穴呀？……”

第二天，东条就带着这一问题前来拜会奥特大使，探询苏德前线的战况。这位秃顶短髭、眼睛狡黠、身着便服的将军，酷似一位审慎的生意人，在投资前掂量着他的同伙是否会破产。席间，奥特努力使东条相信，前线的战事顺利，莫斯科“厄运已定”。由于大使故意对“胜利”夸大其词，反而使东条提高警觉。他想，希特勒的闪击战并未取得成功！东条不相信奥特的话，悻悻地走了。不久之后，陆相又让大岛将军在柏林进一步摸底，为他取得第一手材料。

大岛大使很快来了答复。报告说，根据陆相的吩咐，专程拜访了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关于苏德战况，陆军元帅解释说，进攻速度放慢是由于交通线拉长，后勤供应跟不上。凯特尔说：“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实际进程比计划落后3周是不足为奇的。”

东条摸了底，更加坚定了他的“南进”决心。在下一次的内阁会上，他鼓动近卫通过了一篇题为《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的文件。这就是日本南进政策不变。第一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关于这一点，通过向维希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希望实现不流血的占领，如果劝说无效，就诉诸武力，甚至不惜冒与英美开战的危险。就这样，一场冗长的辩论宣告结束，从此使日本朝全面战争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为了清除松冈对军方政策的干扰，东条建议近卫首相立即把他免职。但是，近卫却不想与松冈闹翻，因为松冈在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谈后，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近卫决定找个借口把松冈搞掉，他要求全体阁僚集体辞职，然后重新组阁，起用别人当外相。他于7月16日6时30分召开内阁非常会议。近卫提出这个建议，没有人反对。松冈抱病在家。

这样，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的暴风雨般的生涯就宣告结束了。

第二天，天皇要求近卫重新组阁。新内阁不到两天就组成了。动作之所以这样快，只是因为几乎没有多少人事变动，松冈的职位由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丰田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是电告日本驻维希大使，不管维希政府决定怎样干，日本军队将于7月24日开进印度支那。限期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印度支那南部。

日本驻维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法国人如此痛快地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意志是何等坚决，我们的行动又是何等敏捷。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

赫尔读了“魔术”破译后送来的这份电报怒不可遏，竭力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冻结了日本资产。结果是，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全部停止。冻结资产是完成A、B、C、D四国（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圈的最后一个步骤，这无疑对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日本统帅部的挫折感近于歇斯底里，一些法西斯军官要求及早动手。早在1941年年初，东条英机就以陆军大臣的名义发表了《战阵训》。他要求全军“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韧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并号召全军为天皇敢于战死，发扬武士道精神，“生而下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

经过多方的磋商和长期谋算，一个进一步引向日本灾难的“南进计划”就这样出笼了。正是：排出异己专断行，南进计划急求成。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章 迫使近卫醇职

一心想当独裁王 抢班夺权作首相
军政大权集一身 我行我素谁敢挡

虽说南进计划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但对这样一个非同小可的决定，近卫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一天晚上，近卫把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叫到自己的私邸，问他进攻美国的取胜机会如何？山本说：“预计在头一年可能取胜；但一年后，我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更加深了近卫的疑虑，增强了他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的信念。

近卫文磨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出身于豪门贵族；他是近卫笃磨公爵的长子，近卫家族 250 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后嗣，他的曾祖父高兴得为此写了不少诗。他出生后 8 天，母亲死于产褥热，但一直到他成人后，他还以为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是他的生母。“在我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后，”他后来说，“我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

近卫年轻时患有肺结核病。有两年工夫，他除了瞪眼看天花板和胡思乱想外，什么事也不干。从这时起，他就对失败者抱有同情感。他鄙视金钱，鄙视百万富翁和政客，曾写过一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文章。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个“民主派”，对所有的人都以礼相待，所谓“叫化子也是宾客”。但他的灵魂深处却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和大帝国思想。

近卫 13 岁那年，父亲去世。作为上流社会的产物，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一只脚已踏进未来的近卫公爵，于 1919 年随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回国后任贵族院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 1933 年起，任贵族院议长。在日本横行侵略的年代，他曾两度担任日本的首相，第一次是 1937 年至 1939 年，第二次是 1940 年至 1941 年。在他的首相任期内，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侵华战争，挑起了反苏的张鼓峰事件，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组织“大政翼赞会”，建立法西斯“新体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而且也为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多少人惨遭屠杀？多少人死干战场？多少财产毁于一旦？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每逢想到南京的大屠杀，近卫就浑身出冷汗。那是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在谷寿夫等人的指挥下，日本匪徒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肆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就开枪射击。他们口口声声称日本是“日出之国，光照世界”，但日军野蛮的血腥暴行却在南京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结果，1/3 的城市淹没在火海中，数以 10 万计的青壮年被押至城外用刺刀或机枪杀害，许多妇女、少女被奸污、杀戮和肢解，不少老年人被活活打死扔在江中。真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这些滔天罪行，正是在近卫任首相期内之所为啊！

近来，近卫连日被恶梦惊醒。有时他梦见一只雄狮，张开大嘴，舞着利爪，要把他撕碎；有时他梦见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他独自乘着一只将要灭顶的大船，在拼命呼救，他想，这是不祥之兆啊，搞不好，大和民族就要完了，真要发生灭顶之灾了。到那时，罪孽难逃，近卫家族不仅不能像他祖训说的“流芳百世”，而且要遗臭万年了。

如今，正当日军在华战场上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时候，又要推行“南进计划”，这怎能不使近卫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呢？

就是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近卫在询问山本之后，又于8月4日召见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把自己要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争取达成协议的想法，征求两位大臣的意见。近卫说，他希望会谈成功，但不急于求成。东条和及川两人都拒绝在与同事商量前作出承诺。过了几个小时，东条向近卫报告说，他担心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三国协议为基础的政策，并在国内引起不利的反响。他估计谈判八成会失败，但只要近卫承诺，如果在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的立场后，他将领导日本与美国作战。

在好战的日本大本营内部，也有些人赞成会谈，陆军省岩畔大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最高级人士之间作了好几十次游说，极力主张要继续进行谈判。他说，美国的潜力远比日本的潜力为大，如果发生冲突，必然以灾难告终。然而，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却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在海军军令部，一位军官说：“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如今唯一的出路是——打！”

然而，岩畔并不因此而泄气，他遍访政府各部门进行劝说。8月末，他参加了一次军政高级官员联络会议。在会上，他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他指出，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的比例是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听众曾一度为之所动。东条对此十分生气。他令岩畔把他的发言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次日，岩畔到陆相办公室送报告时，东条粗暴地对他说：“你已经被派往去柬埔寨的部队了，你的报告没有必要再交上来了。”当岩畔登上南下的火车前，对送行的亲友们说：“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恐怕东京车站只是一片废墟了。”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日本外务省将那份“建议在支那问题解决后，就从印度支那撤军”的照会电告美国，要求日美双方对此举行首脑会谈。但到9月3日上午11时在宫内省举行联络会议时，还没有收到罗斯福的正式答复，与会者顾虑重重，担心美国是不是在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我们一天天弱下去，最终将无法支持。虽然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月前打一胜仗，恐怕随着日月之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没有办法将死敌人的主帅——工业潜力，而初战的决定性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大将提出了一个截止时间的建议，他说：“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进军。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

经过7个小时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了下列决定：“为保卫和维护帝国的生存，以10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作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与此同时，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以达到最低限度的目标。如果在10月10日前仍一无所获，那么便开战。

就在内阁举行会议期间，法西斯分子狂呼乱叫，在他们的煽动下，要求采取行动的各种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两个秘密组织在得悉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会晤的消息后，正在策划暗杀近卫的阴谋。其中一个组织企图在东京采取黑社会的蛮干办法，袭击首相；另一个组织则想仿效炸死张作霖的办法。后一种是一位名叫辻政信的中佐设计的。这位中佐是当时法西斯青年

军官们崇拜的偶像，他决心挫败“必将带来可耻的和平”的最高级会谈。

过政信挑选了最反动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儿玉誉士夫充当谋杀的凶手。儿玉是一个心毒手狠的法西斯狂徒，曾两度因谋杀的罪名而入狱。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他给天皇呈交了一份右翼请愿书；第二次入狱的罪名是向藏相家投掷炸药包。儿玉与过政信志同道合，他同意了过的行动计划。近卫要去会谈，必须到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去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面不好，他必然乘火车前往。东京城外有座桥，名叫六乡桥，儿玉就计划在这里下手。

为了破坏日美高级会谈，东条及其喽罗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对近卫进行攻击。他们不仅对他提出种种批评，而且于9月18日对他的人身进行袭击。当时他正离开距东京中心约45分钟汽车路程的郊区别墅获洼，四个身带匕首和军刀的暴徒，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已紧紧锁着，凶手们还来不及砸碎玻璃就被便衣警察抓走了。

近卫对日益迫近的期限的关心，超过了对个人安全的关心，他只有不足3个星期的时间去和平解决日美之间的问题了，而美国领导人，由于对日本法西斯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此拒绝为会晤安排日期。在9月25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最高统帅部要求把10月15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把阁僚都请到他的官邸，在那里，他问东条：“10月15日这个期限，是最高统帅部的强求还是请求？”

东条回答说：“这肯定是既定的意见，但不是强求。这不过是开始执行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而该决议是不容更改的。”

在这样的决心面前，近卫感到一筹莫展。他对木户侯爵说，既然陆军坚持那个期限，他只有辞职了事。“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木户告诫他要“慎重”。近卫没吭声。本来，他已垂头丧气，加上痔疮再次发作，情绪就更坏了。他对私人秘书牛场说，他需要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是，9月27日，他离开东京到附近的镰仓海边休养去了。

在远离日本9000英里的美国国务院里，人们对近卫的“和谈”诚意持怀疑态度。赫尔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侵略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是当时的首相。虽然近卫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四原则，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吗？由于这些理由，在细节草拟出来以前，罗斯福和他的任何会晤将只能以失败告终，赫尔的诸多忧虑使罗斯福初期对会晤的热情凉了半截。9月28日，总统从海德公园向国务卿发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完全同意赫尔对日本的分析所持的立场。

近卫从海滨休假回来，更加心灰意冷。他的同事同样失去信心。只有木户尚未放弃和平的希望。“从国内外时局看来，日美战争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他对近卫说，“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时局。政府应该明确，首先考虑的事是成功地解决中国事件，而不是立即作出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今后10年到15年是卧薪尝胆的年月。”

近卫认为，这种解决办法虽不尽合日本帝国侵略扩张之意，但比较现实，因此他决心付之实行。

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提出的四原则是（一）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二）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三）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四）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改变这一现状。

10月12日，正是他50寿辰，他再次把陆相、海相以及企画院总裁铃木召到他在获洼的别墅议事。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长官富田健治来到，带来了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写给近卫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海军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我们在会上不能公开表达这样的意见。”

不知怎的，东条知道了这条子的内容。当他抵首相别墅后，便下决心让及川海相和盘托出，指责海军“推卸责任，是懦夫行为”。当大家坐定要开会时，东条竟恼羞成怒，对海相及川很不客气。他十分冲动地喊道：“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在华盛顿谈判。”及川说：“我们正处在战、和的十字路口，如果要继续进行外交，那就要放弃备战，如果谈判了几个月，然后又突然改变我们的方针是不行的……海军愿完全由首相作主。”

近卫说，不管作出什么选择，都得立刻作出。“两种办法都是危险的。问题是哪一种办法危险性更大？如果我们立刻在此作出决定，那么我赞成谈判。”

东条把脸转向丰田海军大将，并带讥讽的口吻问：“外相先生，对谈判阁下有信心吗？从阁下发表过的高论看来，鄙人觉得阁下不能令总参谋部信服。我倒想听听阁下是否有什么信心。”

“权衡两者，”近卫代外相作答，“我们选择谈判。”

东条气势汹汹，咄咄逼人。“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他刻薄他说，“你说服不了陆军参谋本部。”及川表示同意和谈，这更惹恼了东条。他要求近卫不要仓促决定，并说：“我想听听外相的意见。”

“这要看条件是否许可，”丰田说，“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派遣军。如果陆军同意美国的要求，谈判倒不是不可能的。”

东条大声吼道：“在中国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那方面不能妥协！”他继续说，日本已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兵，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让步。现在，很明显，美国是要日本立刻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这是不可能的。有100万的日本人还被困在中国战争中。在中国的秩序恢复之前，日本不能完全撤军。“中国内地是共产党人和土匪的温床，只有驻守日军，才能保证法律和秩序得以维持。战争之目的未酬而先全面撤军，是与我陆军尊严不相称的。”东条特别强调，整个参谋本部以及国外的派遣军都同意他的看法。

近卫说：“你不认为现在正是弃虚名而求实的时候吗？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向美国妥协，即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兵，暗中在不稳定的地区留驻日军呢？”

东条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并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好比是多米诺骨牌，不仅华北，而且连朝鲜也可能丢掉。”

东条坚持陆军无意改变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他以挑衅的口吻说：“海相刚才说，是战是和全由首相决定。本人决不同意。战争的决定应由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共同作出。在现阶段我认为没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战争能否打胜，我没有把握，”近卫反驳道，“除了用外交谈判外，没有别的办法克服目前的困难。”然后，他转向东条：“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如果外交失败就开战，这不是已经定了吗？”东条勃然大怒，“你不是出席了那次会议了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出尔反尔？为什么不能对战争承担责任？！”

“我对中国战争负有重大责任。”近卫慢腾腾他说，“这场战争至今已打了4年，胜败未卜。我很难再下决心进行一场新的大战……”

陆相东条寸步不让，激烈反对首相的意见。他说，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一场战争。东条的话很像本世纪初日本进攻俄国前有人讲过的一句话：“只要战争打响了，枪声就会把国民团结起来。”

争论延续了整个下午，最后以妥协而告终。谈判延至10月15日。如果统帅部同意，还可再延长，但在中国驻军和同共产主义打仗这点上，决不作任何让步。

虽说内阁会议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是有关内阁危机和可能同美国宣战的风言却一时四起。近卫对妥协有些后悔，在中国问题上，如果不进一步作出让步，要与美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可能的。限期到来之前，能做些什么呢？他茫然。近卫决心找东条非正式地谈一谈。他于10月14日清晨，给陆相打了个电话，约好在10点钟开内阁会议前见面。

“除了你对中国驻军的立场外，其他我都同意。”近卫说。他建议立刻从中国撤兵“做个样子”。

东条气得毛发倒竖。他说：“如果我们让步，美国就会采取高压态度，而且会步步进逼。你的解决办法确实不能算什么解决办法，几年内战争必然再起！”

近卫提醒他说，我们“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东条听到“谨慎”两字，把身子挺了挺说：“有时候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庙的平台上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

近卫说：“作为个人来说是可以这样做的，而身居要职的人可不能这样想。”

东条轻蔑地看了看近卫，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之间个性不同而已，难道不是吗？”他暗自想，近卫这个人太软弱，在这个重要关头，不配当首相。

东条决心在内阁会议上采取强硬的立场，迫使近卫辞职。“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作！”东条大发雷霆。“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耻辱！我们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过去的论调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他把满肚子怒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因为他没有坦率地公开表态是否能打败美国。近卫和他的阁僚们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的“炸弹般的发言”吓得呆若木鸡。

东条这一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几小时，近卫提出了辞呈。充当近卫中间人的铃木将军来到东条办公室说：“既然陆相公开地发表了如此强烈的意见，近卫无法再当首相。”但东条拒绝收回意见，并说：“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留任，否则必须下台。”

宫内大臣木户所担心的局面果然出现了，他所面临的任務又被时局弄得更加困难。新内阁将是日本最苛求的内阁，而且得由他负起挑选人的重担。

清水庙是日本的一座和尚庙，位于京都的一个山涧边沿。

他想：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及川才是；但是，实际主宰陆军的青年军官，不会接受及川出任，他们不仅要反对，甚至可能发生叛乱。因此，首相人选就非东条莫属了。宫内大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军国主义十分猖狂的日本，只有东条才能控制日本的局势。

一位海军将领，即冈田启介大将，正是那奇迹般地逃脱了“二二六”法西斯匪徒谋杀的冈田首相，不同意遴选像东条这样的人出任首相。他说：“东条所代表的陆军统治集团，难道不曾表明是最顽固、最好战的冒险集团吗？”冈田对东条执政的前景表示十分担心。

宫内大臣虽然对东条任首相不尽满意，但他认为，当今的日本除了东条外，还有谁具有如此地位、威望和力量去控制青年军官和右派呢？海军里有这样的人吗？

经过重臣们的磋商，天皇授命东条英机正式组阁。为了表示对天皇的忠诚，他发誓要按新的座右铭来生活：“以吾皇为吾行动借鉴。”次日，57岁的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以便与其新职务相称。

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后，他坐上火车来到神社中最神圣的伊势神宫，并按习惯向天照大神朝拜。

法西斯头子东条担任首相，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密切的关注。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东条上台嗤之以鼻，担心他把日本人民引向更深的灾难，而军国主义分子却掀起了“拥护”的狂潮。《读卖新闻》宣称，这个抉择将鼓舞日本“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给予反对轴心的诸强国以巨大打击”。而比较实际一些的文武官员却暗地里感到担心。他们埋怨木户推荐东条担任首相，此人如此好战、蛮干，天皇又怎么会同意他呢？

东条就任首相的第二天，10月18日，就向国内外记者发表了他好战的政府声明，他说：“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既定的国策。而今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局势，务期对外愈益敦厚与盟邦之友谊，对内愈益完备国防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东条宣读完毕，就将军靴一磕，活像个刚入伍的新兵那样采取了立正的姿势，一瞬间来个向后转，皮靴又一响退出去了。施政演说虽然只用了3分钟的功夫，但字里行间却杀气腾腾，充满着侵略扩张的臭气。正是：好战之徒当首相，侵略扩张更猖狂。欲知东条要把日本这条大船开到哪里，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枪杀左尔格

上台伊始耍威风 残酷镇压留臭名
革命战士遭杀害 英雄事迹广传颂

在东条内阁就职仪式结束后，东条英机被钦定为陆军大将，并身兼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一事，正好说明了东条内阁独裁专政的法西斯本质。

东条上台伊始，就磨刀霍霍，大开杀戒。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了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苏联谍报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和他所领导的拉姆扎小组。这在当时是轰动全世界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东条还逮捕和枪杀了为数众多的日本进步人士。

拉姆扎小组一共包括9个国家的人：有日本人、苏联人、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南斯拉夫人和丹麦人。他们的核心成员除了左尔格外，还有日本著名国际评论家、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南斯拉夫记者、法国哈瓦斯通讯社驻东京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日本画家宫德四德和拉姆扎小组的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他们虽然国籍不同，信仰不同，却一致憎恨法西斯侵略战争。他们履行了自己的光荣义务，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近卫内阁的总辞职，正好发生在日本的间谍机关——宪兵队逮捕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的同一天。尾崎秀实被控为里通外国。但是，问题不仅仅涉及尾崎一个人。东条的宪兵队人员在多年毫无结果的搜寻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直在日本活动而没有被查获的秘密小组拉姆扎的踪迹。这个小组的名称也只是在逮捕尾崎前不久才探听清楚。6年来，日本反间谍机关一直解不开从日本发出的秘密无线电报之谜。宪兵队的档案里保存着一大叠叫人捉摸不透的电文，最有经验的密码破译人员也译不出其中任何一行。而秘密电波却不时出现，忽东忽西，难于捕捉。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深夜，一組组神秘的电码飞向大空。明摆着，从日本发出了一些秘密报告。可是，究竟由什么人发出？什么内容？发给谁？这些问题谁也回答不了。东条一直为此大发雷霆，责骂日本宪兵机关是“饭桶”。

首相顾问尾崎的被捕，只是一场引起严重政府危机的急风暴雨的序幕。法务相岩村向枢密院议员们报告说，被侦破的拉姆扎小组的领导人是里哈尔德·左尔格。他是德国记者，又是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的“密友”。根据宪兵队获得的材料，这个德国人，里哈尔德·左尔格，多年来一直是苏联谍报人员。

尾崎秀实的被捕，在日本政府内部好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不久前还是近卫的秘书兼顾问，在同首相共商机密大事的早餐会上每次必到的人，原来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间谍！谁也不知道尾崎秀实把日本帝国的哪些机密交给了左尔格博士，不过，尾崎和近卫私交甚笃，随时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最隐密的内情和计划。因此，作为《法兰克福报》记者、德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实际上是驻日本的苏联间谍里哈尔德·左尔格，对这些情况是洞悉无遗的。

震惊日本帝国的这件大事发生在公元1941年的10月底。以往在日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如此深入到“日出之国”的机密重地，这个外国人就是无形战线上的坚定战士、忠贞不渝的反法西斯英雄并因此而献出了

生命的里哈尔德·左尔格。他神通广大，机智勇敢，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西方，直到今天仍然把左尔格称为“20世纪最大的间谍”，至今不了解内情的人还在问，左尔格博士究竟是个什么人？

根据他在日本巢鸭监狱写的自传材料，里哈尔德·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父亲是德国人，在巴库一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左尔格3岁时来到德国，在那儿住了1/4世纪多，随后移居到苏联。

左尔格的祖父弗里德利赫·左尔格是马克思的战友。他同恩格斯一起参加过巴登起义，在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风暴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上个世纪中叶，革命战士们反复传诵着鼓舞人心的话：“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还有结尾的一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年轻的音乐教师弗里德利赫·左尔格曾和朋友们一起反复传诵着这些话。正是在《宣言》这部雄壮而激动人心的交响乐的鼓舞下，使老左尔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勇敢地参加了巴登起义。在共产党员奥古斯特·维利希领导下，起义持续了两个月。最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了，革命遭到了镇压。弗里德利赫·左尔格被缺席宣判死刑。后来流亡到美国，在那里又组织了“无产者联盟”，并参加美国解放黑人的南北战争。当时美洲大陆上的战火方兴未艾，欧洲又诞生了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它是由卡尔·马克思领导的。几年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到纽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由弗里德利赫·左尔格当了总书记。

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返回欧洲已经无望。不过弗里德利赫·左尔格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中断同德国的联系。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来往就是例证。他们的通信持续了几十年，弗里德利赫终身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并在去世前不久付诸出版。

年轻的左尔格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祖父而自豪，但真正决定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他参加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人纷飞的年代，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憎恨战争，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沿着他祖父老左尔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1917年，左尔格从前线回来后，进入柏林大学。这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革命洪流鞭策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在基尔，他主水兵中进行地下工作，秘密潜入兵营，号召士兵们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不久，德国海军的水兵们在基尔举行革命起义。后来他从基尔来到汉堡，在汉堡的大学里撰写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底，他在佐林根党报任编辑，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之后，他还参加过汉堡起义，参加过红色萨克森的革命斗争。当然，所有这些，在德国警察局的档案里肯定有共产党干部里哈尔德·左尔格积极活动的详细材料。当初，他曾经担心盖世太保会在档案里偶然发现。而现在，在巢鸭监狱里，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只是左尔格过去的经历，所以他才主动作详细地自述。让东条们了解，他们是在同什么人交手吧！左尔格像一艘高挂着战旗的军舰，投入最后的战斗。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使馆连续向东条政府提出抗议。奥特大使同左尔格

相处了整整 10 年，多亏左尔格的帮助，才使他爬上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的位置。他怎么也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间谍。他大骂日本宪兵队，脸色气得发紫。

“他们想挑拨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他大声嚷道，“那可以想别的办法么，干吗来这一手？！……简直是骇人听闻，想把左尔格打成苏联间谍？今天他们抓左尔格，明天就该抓到我头上了。这是侮辱国格……毛森格，你听我说，立刻到宪兵队找中村将军，要求释放左尔格。叫他们别装蒜，他们简直成了间谍迷！”

使馆特务头子毛森格上校蹙着眉头站在那里，用两只大拳头支着腰。

“大使先生，我真想把日本反间谍机构统统砸烂。这关系到党卫军的荣誉！我永远是左尔格的搭档。”

左尔格被捕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毛森格还奔走于宪兵队，想证明他的“牌友”是无辜的。有一天，毛森格又来到日本反间谍机关。大阪大佐请他查证一些有关左尔格博士的材料。党卫军分子欣然同意了，但是，当他读完一份材料后，不由得怒火冲天。怎么，居然说，左尔格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德国共产党首脑恩斯特·台尔曼的密友。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押犯左尔格的亲笔供词。”

这位特务政治专员两手一摊，纵声大笑，“这可真叫绝了，左尔格是台尔曼的朋友！想想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荒唐！好吧，我来查证。可是大佐先生，一旦收到德国秘密警察的答复，我可不会羡慕你们侦查员的本领！”

过了一些日子，毛森格上校接到柏林来电，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盖世太保头子缪勒说，从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左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警察局档案库的材料所证实。

毛森格这才明白是左尔格愚弄了他。现在他到处嚷嚷说，除了他以外，谁都忽略了这个苏联共产党的间谍。他要求宪兵队把左尔格交给盖世太保。

总检查长和侦查员都急待左尔格把他的书面供词写完。然而左尔格却不慌不忙地写着那些同秘密工作无关的事。

“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不受军事攻击的威胁。”

“我取得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东京的大使馆。这些情报是自愿向我提供的。我没有采取可以受到惩处的行动来取得这些情报。既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暴力……。”

这就是左尔格的自卫线。他像炮兵侦察员一样，在关键时刻力求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保护同志们免受打击。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瞬间的懦弱玷污自己，要昂首挺胸告别人间。

侦查员和总检查长总算得到了左尔格的书面“供词”，但大失所望。他们手里拿着的根本不是犯人的供词，而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和思考，是叙述革命生平的遗书。于是又开始了长时间的疲劳审问。现在侦查员已经掌握了拉姆扎的“罪证”。许多年来，他们向苏联中央发了大量的情报。仅在最后 3 年就发出了 65420 组密码，也就是 327100 个数字！

审讯员问道：“你承认这些数字吗？”

左尔格蔑视道：“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统计。”

“我们掌握的材料已足够判你的罪了。”

“如果是为判罪，那你们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几个事实就够了。”

我们向中央发出报告，几百万人就开始行动起来！”

当审讯员依次列举拉姆扎小组发往苏共中央的情报目录时，左尔格嘲弄他说道：“我真没想到，我们居然干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发出的情报有：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按德国样式使军队现代化，日本军事工业的现状和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希特勒进攻苏联及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的情况；最近密报有9个集团军在苏德边境集结的情况。接着是日本的汽油贮备量，以及最近内阁会议关于决定南进而下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重要情报……

侦查员念得非常单调，不时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看左尔格。这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听着敌人列举他们的工作成就，思绪万千，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是的，他同拉姆扎小组的战友们，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所做的工作可真不少啊！

左尔格是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年1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上了台，德国沦入极端恐怖之中。苏联谍报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来到这座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活地狱。在这种情况下，左尔格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法西斯德国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行动。可是，共产党员左尔格就这样去了。

当然，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员来到一家有名气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毛遂自荐要求当一名驻外记者，困难的确是不少的。为此，左尔格和苏联情报部门曾反复设想各种方案，有的推翻了又重来，再设计新的方案，逐步拟出了计划，定名为拉姆扎行动。决定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打进日本，再从日本收集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侵略意图的情报。

左尔格在中国曾专门研究过经济问题——银行业务和中国市场的容量，给化学康采恩帮过忙，因此建立了业务联系。而且这次的旅行就是德国化学协会安排的。他本人是协会会员。化学协会和《法兰克福报》实际上都非正式地接受这家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实力雄厚的康采恩领导。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左尔格的计划。

《法兰克福报》主编是个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纳粹党还没有来得及撤换他。他殷勤地接待了左尔格，详细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听取了博士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没有多加考虑就聘请他到报馆工作。

“博士先生，久闻大名！《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将为得到您这样的工作人员而感到荣幸。我已经听到别人介绍过您。不需要其他推荐信啦，您来得正好，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打算回欧洲。他那个位子现在还空着。”

里哈尔德·左尔格还有另一道难关，必须取得纳粹党驻报社特派员的同意。下午，左尔格专门拜见了这位年轻的头上留有几道伤痕的特派员。左尔格在门口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平伸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然后开门见山他说明来意：“我叫左尔格，”他在安乐椅上一靠，“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可恶制度，我在国外住了8年，现在回来了，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他们要我到东京去当记者，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左尔格对纳粹分子那一套不太复杂的术语和口号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不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为“元首”服务的坚定的纳粹分子。一小时后，就和这位特派员打得火热，晚上又一起到法兰克福纳粹党人经常聚会的皇家咖啡馆去喝烧酒、啤酒，用酒杯敲着桌子，一面唱歌，一面痛骂犹太人和共

产党。

特派员已经喝得有点摇摇晃晃，但头脑还相当清醒。他对左尔格说：“老兄，别介意，为元首服务到哪儿不是一样。我一定尽快地为你办。在日本我们也需要有可靠的人……来，干一杯！……祝你健康！”就这样，三个星期后，去日本的全部证件都办齐了。

左尔格来到东京最初住在佐野饭店里。这是一家中等旅馆，虽然比不上帝国饭店，却也有些名气。客房都是日本式的小间。旅馆不在繁华的银座，可是相距也不大远，旅客不至于远离市中心。对于一个初到日本尚未扬名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样的旅馆是最合适不过了。

最初几个月，左尔格是为自己“创牌子”。他给《法兰克福报》和通俗画报写了不少稿子，同外交官、工商界、政治家、演员、军官、新闻记者、德国侨民等广泛接触，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向新来的记者介绍东京的生活，晚上就带他到茶座和日本的小酒馆去玩，不过更多的是到德国人开的店里去，那里可以吃到油煎小灌肠加白菜，品尝巴伐利亚啤酒，高呼“万岁！”而碰杯，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

左尔格就是在这些社交圈子里巧妙地同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画家宫城四德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秘密地建立了联系。左尔格向他的战友们传达了莫斯科对他们小组的期望。莫斯科要他们查明：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政策？侵略成性的军界集团现在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如何？

左尔格列举了那些等待回答的问题。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左尔格说，“要进行许多调查。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传递情报的邮箱或转运站。自己也应当成为可靠情报的来源。为此，我们应该熟悉情况，细致地研究每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这之前，左尔格已经分别同每个人谈了他们的工作。拿尾崎来说，他是享有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德高望重，因此有机会接近日本统治集团。他应该探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相的计划。这个任务十分艰巨，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尾崎作为最大一家报纸的名牌观察家，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宫城应该扩大和保持同军界的联系，注意国内问题，收集事实，加以整理，作出结论；武凯利奇已经同各方面的记者建立了联系，他要在英、法、美等国记者中间收集情报，收集西方国家对远东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苏、日关系前景的推测。

左尔格本人则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像一架巨大的无形透光镜的焦点，国际政治的条条线索都在这里汇聚，并且被它所左右。谈到他的工作体会，左尔格说：“作为一个记者和情报人员，不仅要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要全面地通晓日本的情况。否则，我就很难比一个普通的德国记者高出一筹。凭着这些知识，我在德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日本问题记者。”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常常表扬他，说他的文章提高了报纸的国际声誉。也正是由于左尔格作为一个记者所获得的名声，德国外交部授予他以新闻专员的官衔，左尔格在新闻工作上获得的成就有利于掩护他对情报工作的开展。

为了获取德日两个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左尔格在德国大使

馆里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欧根·奥特的军官。奥特有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他穿着德国炮兵参谋的制服，盘花肩章，胸前戴一枚铁十字勋章。奥特说，他到日本有好几个月了，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派来的，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团的营房里，只有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目前，他正在替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对于外交部分感到很困难，不知道左尔格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熟悉情况的人。

左尔格面前这个人，长得粗眉大眼，仿佛刚刚用石头雕凿出来，这是典型的普鲁士军人。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当过黑色国防军的团参谋长，后来在德国谍报机关头子尼古拉上校领导下的新德国历史研究所工作过。这一重要细节像爱克司光一样，透视了奥特的整个生涯。左尔格了解历史研究所的底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军事指挥部、谍报机关和动员局都打着学术机关的招牌。奥特同德国将军团的最上层有联系，曾在中国干过谍报工作，因此他在日本干的肯定也是同样行当。左尔格的面前是一个有经验的德国谍报人员，目前他似乎需要一点帮助。

“我认为，”左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和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才能征服世界。这就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占领满洲，乃至全中国。在征服台湾、朝鲜、满洲之后，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从来不忘称霸全球的传统政策。在他们眼里，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

奥特聚精会神地听着左尔格博士的宏论。他的报告里就是缺少这样一些远见卓识。军事观察员心里明白，他的前程取决于他将向柏林提出什么内容的报告，奥特派驻日本的时候，接受了一项机密而具体的任务：为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德国两家的谍报机关建立合作关系。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不够，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预见到今后的前景。如果能吸收左尔格参加，那就太好了。

左尔格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不行！美国和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这就是我的浅见，不一定对。”左尔格最后说，“我再想想，看谁能给你帮忙。容我考虑几天。”

“我不揣冒昧，”奥特反问了一句，“请问，您本人能帮助我吗？”

左尔格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过早地表示同意。他笑道，“奥特先生，我对这些问题可是一窍不通！我能说出什么道道？我还要向您求教呢。我给您另请高明吧。”

“不必，不必，我恳求您。当然，要看您有没有时间。”

“那我们以后再说吧……”其实，左尔格的这些议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他只是迎合柏林的情绪，研究过纳粹的外交政策。他想，奥特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为什么不给他一些启示呢？

奥特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提升为

武官，不久又晋升上校。祝贺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有希特勒的顾问约德尔、冯·包克、凯特尔和其他将军。现在奥特青云直上。他的官运亨通也多亏左尔格暗中相助。如果没有他，这位擢在名古屋日本军营里坐冷板凳的炮兵军官，当然写不出那样出色的报告，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出人头地了。奥特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左尔格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一天早晨，他们出去散步。奥特让左尔格带上他的莱卡相机。他们溜达了一会，不知不觉进入了军事禁区，拍了许多照片。左尔格换上新胶卷，把照完的一卷装进口袋，他想再照一些，这样的好机会太难得了。突然从前面走来两个宪兵，还有一个便衣。幸亏有奥特这个保护伞替他解围，不然可就糟了。

傍晚，他们在凉台上下棋，奥特说：“左尔格，我给你安排了一项你想不到的活动，明天5点到使馆来。现在保密，包你满意！”

读过《日本纪书》这本古书的人，都知道1000多年前神武天皇诏书中的一句话：“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用日本话来说，就是“八 一字”。这是在日出之国生息繁衍的大和民族的先祖遗训。

到参谋总部军事学院参加招待会的路上，左尔格对奥特谈到了这句话。在被邀请的来宾中，非军人寥寥无几，左尔格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在东京声望日隆的奥特上校努力争取的结果。

他们进入军事学院礼堂之后，奥特悄悄对左尔格说：“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跟着我，别离开！”

学院院长忙着迎接来宾。这是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将军，肩头斜挂着一条绶带，胸前缀满了勋章。其他的将军也都受到天皇的“恩泽”，人人都有不少勋章。殷勤的值星少佐领着奥特上校，要把他介绍给这里的高级将领。这里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军事顾问、军区司令和舰队司令们。奥特指着一个宽脑门、蓄短髭的将军说：“这是东条将军，他代表最强硬的一派，”奥特指着另一个个子不高、推着光头、宽额大耳，再加一个蒜头鼻子的人说：“那是上肥原将军，走，过去见见。”土肥原是日本的特务头子，有远东劳伦斯之称。他衣着讲究，胸前是全套的“瑞宝”勋章，还有“猛虎”勋章、“金鸡”勋章、“旭日双辉”勋章等。左尔格借奥特的光，来到了日本军阀中间，这些人都掌握着左尔格需要刺探的军事机密和阴谋诡计。

土肥原打过招呼之后，用德语问道：

“咱们用什么语言交谈？”

“用蒙语吧。”左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土肥原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您好)!.....”

“得了，得了。”左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好吧，悉听尊便。”土肥原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凹凸不平的牙齿，表情是冷漠的。

他们谈了几分钟就分手了。土肥原走开之后，奥特说：“这个人会讲13种语言，在中国住了15年。”

左尔格在招待会上还认识了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他和土肥原一样，是国际挑衅事件、颠覆活动、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组织者，他们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反动的人物。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要了解日本统治集团的内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7年，日本上层人事变动频繁，这对拉姆扎小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里哈尔德·左尔格的助手、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近卫公爵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秀实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早餐客”又称“智囊团”，他们盘腿围着一张矮矮的长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讨论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制定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一年以后，也就是1938年春，德国使馆也发生了对拉姆扎小组有利的人事变动，左尔格的“亲密朋友”奥特上校被提升为大使，并且为左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这两件事情为拉姆扎获取有关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们就是通过这两个渠道，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拉姆扎小组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无形战线上拼搏着。他们有时觉得是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他们感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小组已经被严密包围。确实，日本宪兵队的特务近在咫尺，但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截听到大量的密码，可是无法破译，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东京反间谍局的局长大坂是东条的人，他们曾一起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大坂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当然也挨了东条不少的骂。最后，这位局长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密切监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会在哪儿出现。但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最新仪器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情况使大坂怒不可遏。的确，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着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

尽管没有任何罪证，宪兵队还是在几天前逮捕了画家宫城。他被带到筑地警察分局。宫城在一次审讯时就跳窗，但是自杀未成，正巧挂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他试图逃跑，又被警察逮住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找到了一封关于满洲铁路及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另外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了窗，自杀身死。

大坂大佐认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是不会跳窗的。”于是一场大的逮捕开始了。过了3天，首相的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被捕。这件政治大丑闻一下传开了，好像在政府人士中爆炸了一颗炸弹！

在逮捕尾崎秀实之后，法相岩村签署了拘捕外务省一公爵的拘票。公爵是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根据法相的命令拘捕了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但是岩村还不敢立刻拘捕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左尔格。这需要更大的人物签字。拘捕左尔格的命令是首相东条亲自签署的。

日本检察长芦川亲自主持了被捕者的搜查工作。在德国商人马克斯·克劳森（拉姆扎报务员）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里发现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但是在尾崎秀实和左尔格家里，却什么也查不到。直到后来，芦川才注意到，克劳森家里也有一本与左尔格家里相同的德国年鉴。里面有什么名堂？说不定是密码？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研究，终于解开了神秘电文的秘密。

逮捕后过了两年，1943年9月，才对潜伏日本多年的地下组织拉姆扎的成员正式开庭审判。左尔格和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武凯利奇、克劳森和宫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宫城由于肺病很重，已经奄奄一息；武凯利奇也是生命垂危。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处死刑，但都死于狱中。

以里哈尔德·左尔格为首的拉姆扎小组在监狱中虽然受尽了非人的法西斯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革命的秘密，维护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荣誉，因此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拉姆扎小组的战士们在东条的屠刀下英勇地牺牲了。日本法西斯头目自鸣得意，从而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但是，就在他们作孽的时候，死神已经向他们招手了。正是：革命英雄代代传颂，东条英机恶贯满盈！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三章 紧锣密鼓

军政会议接连开 南进计划不可待
日美和谈作烟幕 战备要求招即来

东条英机就任首相的第二件事，就是加紧进行南进的准备，并以此作为他当时工作的重心。他一面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协调行动，克服分歧；一面责令海军、陆军加强战备，并着手实施以“Z”命名的作战计划。

在10月23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说：“原定10月要作出决定，可是现在还是这个样。”海军每小时消耗400吨石油，每天要消耗9600吨。“情况紧急，非此即彼，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陆军表示赞同。参谋总长杉山将军说：“不能再花四五十天时间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东条首相故意装腔作势他说：“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才上任。”

尔后10天的联络会议，集中讨论有关华盛顿谈判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问题。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兵，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会议争持不下，东条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裁决。一是即使蒙受巨大的困苦，或者用木户的话就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做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

参谋总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杉山回答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

“立刻开战！”海军代表永野加重语气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主张应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继续同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局，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在东乡外相看来，完成这一任务是困难的，他说：“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

会议顿时乱了套，总参谋部并对东条施加压力，主张如果外相再阻碍战争的进行，就把他撤掉。东条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决定再作一次退步，把谈判的期限定在12月1日。会议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午夜，最后双方都作了妥协才算了事。

限期初步定了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了。他说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词比较婉转些，佯称，陆军同意在1946年前从中国撤出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方案乙是留作万一美国拒绝方案甲时准备用的。它包括一项在最后达成协议之前，作为最后一着的暂定协议，它的目的是要打消赫尔对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怀疑，并向他说明，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其在印度支那西部驻军撤向北部，而美国则要售给日本100万吨航空汽油作为报答。

在以后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中，陆军不但一直反对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建议，而且坚持要向赫尔提出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停止“破坏中国事件的和平解决”。陆军副参谋总长垠田说：“战争不可避免，假如现在不打，明年、后年也得打。打，现在正是时候：神圣的日本精神将照耀我们的事业。”他认为，日本向南挺进可能有助于德、意击败苏联，并迫使中国投降。占领东南亚对美国的资源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将建起一座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能将亚洲的敌人一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

塚田的紧急战争呼吁，意外地镇眼了以外相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如果坚持反对南进，会迫使东条解散整个内阁，而新内阁必然会更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其实以东乡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反对南进，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更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担心树敌大多会遭灭顶之灾。最后他们终于被迫同意了军方的意见。

意见“统一”后，现在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绝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务了。他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前去辅佐野村大使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东乡认为：“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就在谈判的同时，日本军阀在竭力煽动战争。铃木将军反复说明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简而言之，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的同时，还将同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任务是不轻的。然而，在最初几个月取胜的希望还是光明的。”因此，他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嘛”！

永野将军要求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他说“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杉山要大家考虑选择好时机的重要性。“就作战而论，如果把开始敌对行动的时间推迟，”他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之间的军备对比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取胜这点是满怀信心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这个现实。”即使这样，他认为日本能“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

东条则从另一方面阐述南进的必要性和绝对性，他在回答枢密院原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的问题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说最严重的争论是中国的驻军问题。当他谈到这场令人沮丧的侵略战争时，还动了感情。“我们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的伤亡，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历时4年的苦难，还花了几百亿日元。”他认为，如果把军队撤出，中国将奋起反对日本，“中国还将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东条决心破釜沉舟，宁愿冒民族剖腹自杀的危险，也要把侵略战争进行下去。

11月16日，来栖三郎特使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两天后，野村大使把他带到赫尔的办公室。对这位个子矮小、带着眼镜、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曾代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使者，看上一眼就足以使赫尔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和尊敬。”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诡诈的人……，在我眼中他唯一可取之处是，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因为他娶了美籍秘书为妻。”

赫尔认为来栖很可能企图利用谈判来麻痹他们，时机一到便会向他们发动攻击。他陪野村和日本这位特使来到白宫。罗斯福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说：“伯利安说过，朋友之间不是没有商谈余地的。”来栖回答说：“必须找到一种避免战争的方法，太平洋像个火药桶。”罗斯福表示同意应取得广泛的谅解。

就在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在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他主要讲华盛顿谈判问题，指出成功与否有赖于下述三点：“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事件的解决”；不应“对帝国实行直接武力威胁”，应该取消封锁；应尽力使“欧战不蔓延至东亚”。东条的演说在东

京获得军国主义分子狂热的欢呼和暴风雨般的掌声。

由于美国已从破译日本政府与日本驻美大使馆的来往密电中得知，日本已决心对美国发动战争，美国政府除在军事方面进行准备之外，也在外交上耍了一个花招。美国与中、英、荷、澳等 伯利安（1860—1925），美国民主党历史上有影响的人士之一，能言善辩，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0）手下当过国务卿。

国使节磋商之后，由赫尔拟定了一个综合方案，把美国描绘成维护国际正义、反对日本侵略的和平卫士，以掩盖它长期对日推行绥靖主义、纵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当然，美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处于无法改变的被动地位，从而为日本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制造政治上的困难。这就是经罗斯福批准、即将交给日方的《美日协定基础概略》，也叫《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到国务院。5时，赫尔把《备忘录》交给他们。东京的尚武心灵能有所悔悟，那将是“微乎其微的希望”。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同盟国、笼络人心，故意把《备忘录》写得冠冕堂皇。与其说这个文件是写给日本看的，毋宁说是让全世界人民看的。文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以及在实际上废除三国同盟条约。在过去几天中，赫尔一再强调，除非日本政府恪守这一条约，否则所谓和平解决就不能叫人相信。

赫尔的答复首次传到东京是在11月27日上午。电报被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会议休会，大家在进午餐。东条朗读了电报内容，一片死寂。不知谁说了一声：“这是一份最后通牒！”最使东条之流恼火的是，赫尔竟断然要求日本从中国全境撤兵。东条差不多为此暴跳如雷，他咆哮道：“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随后他就责令山本海军大将尽速实施以“Z”命名的对美作战计划。

山本原任海军次官，是一个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的传奇式人物。他的双肩宽阔，胸部又大得像个圆桶，所以给人的印象还是身材魁梧。他的父亲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他之所以叫山本五十六，是因为生他的那年，他父亲正好56岁。山本到过美国，在哈佛念书，后在华盛顿任海军武官，他时常警告一些不计后果的狂妄之徒，要当心美国的工业潜力。海相米内光政生怕山本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暗杀，遂于1939年8月派他当联合舰队司令，打发他出海去了。

山本虽说要当心美国的工业潜力，但从思想深处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他和东条考虑问题的角度虽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一丘之貉。他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就把理论上的战线延至马绍尔群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绍尔群岛连同加罗林群岛一起，成了日本的托管地，是日本在太平洋最东端的属地。1940年，在第一次春季演习中，山本和他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信步在旗舰“长门”的甲板上。当他看到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在飞行训练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时，他转身对参谋长说：“空军训练很成功，我想进攻夏威夷是可能的。突然的致命一击就能把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打得不能动弹。在美国重建其舰队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东南亚，并把它的所有资源拿到手了。”

偷袭的计划主要是以山本心目中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的战术为基础的。

1904年，东乡不宣而战，在旅顺港趁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司令参加宴会的机会，用鱼雷快艇袭击了这支舰队。此后，俄国便一蹶不振——俄国损失了两艘战列舰和多艘巡洋舰。次年，在对马海峡一战中，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这次海战中，年轻的山本少尉左手被打掉了两个手指。从此，靠一次突袭而一举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

山本认为，偷袭的成功有赖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在偷袭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母舰部队能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发现。只有赌徒才会冒这个大险，而山本却是个赌徒。山本打桥牌、打扑克、下围棋都是一位行家。一次，有个美国人问他，学打桥牌为什么学得这么快。他回答说：“5000个字我都能记住，还愁记不住52张牌！”他常对他最得意的参谋渡边安次中佐说，赌博一半靠算计，一半靠运气。至于偷袭夏威夷，虽然很危险，但机会难得，不能不干。

到了4月，偷袭珍珠港计划采用了新的代号“Z”作战计划。这是为了纪念东乡海军大将在对马海峡发出的著名的“Z”信号。山本默想：“我国命运赖此一役。每一将士都须尽力，”此时，这个计划将交给它的执行者第一航空舰队。

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少将接受任务后，琢磨了半天，越想越对它的成功表示怀疑：“太危险了！如果初战败北，全战皆输。”伴随着“Z”作战计划的进展，草鹿也越来越担心。6月底，他会见了制定作战计划的大西少将，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计划中的缺点。最后，大西也承认，这大像赌博了。草鹿建议两人去见山本总司令。大西说：“这场辩论是你挑起的，你去跟他说好了。”无奈，草鹿只好单独面呈总司令，山本听完草鹿的批评后说：“因为我玩扑克、打麻将，所以你说太危险了。事实却不然。”又说：“我明白你为什么反对，进攻珍珠港的确是困难的、危险的，但有取得成功的相当希望，我要求你停止争论，从今以后，努力贯彻执行我的决定。”

根据东条和山本的指令，大西将军忙于制定总计划，航空参谋源田实中佐则忙于研究空中进击的战术。源田自从1940年看完一部美国新闻片后，就一直在考虑用航空母舰集中进行打击。草鹿自己则集中考虑如何把进击舰队开到珍珠港飞机航程内，而又不被美国人发现这一要害问题。在进击舰队中，除了“翔鹤”和“瑞鹤”两艘航空母舰外，其他舰只的油量都不足以航行至珍珠港。在航行中如何加油？这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还应该考虑的是突袭性。选择哪条航线才能保证突袭成功？参谋长把雀部利三郎少佐叫了进来。此人是个航海专家。草鹿令他最近10年来通过太平洋的舰只的国籍和型号研究一下。雀部报告说，因为海面风浪大，在11月和12月间，没有舰只在北纬40度以北航行过。在阅读雀部报告时，草鹿首先注意到的是，在12世纪时，源义经用突然袭击攻下了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城堡的故事，源义经是从令人绝对料想不到的地方出击把它攻克的。草鹿也能从北面向珍珠港进行偷袭。美国舰队假想日本将从马绍尔群岛的基地发起攻击，所以一般都在夏威夷西南海面进行演习。有一点使他犹豫的是，如何在狂风恶浪中给船只加油？但他立刻打消了这个犹豫。加强纪律和训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东条要求海军必须尽快确定前往出击地点的航线。草鹿从夏威夷取得的情报中获悉，美国的飞机一般在珍珠港外500海里的海域上空巡逻，其他PBY

型侦察机则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以南 500 海里的海域上空巡逻。因此，他得出结论，要使进击舰队不被发觉。就得问正东行驶，穿过被忽视的海域，直至离珍珠港约 800 海里的海面。在这里，在偷袭的前一天，各舰只最后一次加油，傍晚则朝南向目标驶去。天一亮飞机就起飞了。

为了协调这次偷袭的统一行动，联合舰队确定由“赤诚”号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中佐统一指挥。这位 39 岁的侵华老兵，在空中已经度过了 3000 个小时。他的特长不在他的飞行技术，而在于他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根据航空参谋源田提供的方案，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舰列，即停泊在珍珠港中间的福特岛旁边的两排战舰。首先，由水雷飞机俯冲轰炸外排军舰，内排则由高空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解决。草鹿认为，如果没有精确的瞄准器，第二轮的攻击是不可能成功的。还需要有能穿透厚层甲板而不会提早爆炸的炸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从德国人那里抄来的 97 型瞄准器，靠勤练来弥补它的性能不稳定的缺陷。对第二个问题，源田和工程技术人员最终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即把战舰炮弹改装成炸弹，把外层大大加固，使它在碰击后不会马上爆炸。

大概就在山本认真考虑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东条又命令侵华部队中的 3 个师进行热带作战训练，为了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日本参谋总部还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特种战术研究部，其任务是在半年内收集有关在东南亚进行热带作战的资料。这个研究部由林义秀大佐指挥，但真正的推动力则来自有争议的迁政信中佐。迁这个人行为古怪，一次出于道义上的愤怒和冲动，他放火烧掉了一家艺妓馆，当时有许多同僚在里边作乐。他圆脸秃顶，一对小眼睛不时在眨动，看上去和别的参谋军官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他那种炽热的情绪在青年军官身上唤起了狂热的献身感。他们把他敬为日本的“战神”、“东方的希望”；但反对侵略战争的人却把他称为法西斯的狂徒和武士道的疯子。1941 年 1 月 1 日。这个奇特的人物来到了台湾，据传，他是被东条放逐到那里去的。他一到那里，就专心致志地研究未来的马来亚之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从各个渠道得悉，新加坡这个岛屿与马来亚半岛顶端只有一条 1100 码长的堤道相连。如果从海上进攻，它是攻不克的堡垒；假若从背后进攻，它就毫无防御能力。

6 月间，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海南岛，在林义秀和过政信的带领下，秘密训练开始了。目的在于试验以最近收集到的情报为依据的新的理论。从前认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热带气候中，如果连人带马挤在运输舰内，那就等于自杀。让深信，这不过是个训练问题和军纪问题。他把成千上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装入炎热的船舱，让他们 3 人睡在一张长 6 英尺、宽 3 英尺的席子上。在华氏 120 度的高温下，只让士兵喝少量的水，就这样把他们关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些骨瘦如柴的士兵。在最坏的条件下携带着马匹和装备，成功地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最后用一营步兵，一个中队炮兵和一连工兵，进行了实战演习。当时，万事俱备，只欠登陆点的海岸的地形和潮水涨落的情报了。为此，过把他的来去无踪的间谍网成员朝枝派进了马来亚。

对珍珠港进行偷袭的飞行训练，在日本闷大岛屿中的最南端的九州岛上加速进行。九州这个地方，以活火山、人的好战精神以及盛行娼妓而著称。除了参与策划的人员外，包括母舰舰长在内，谁也不晓得未来的目标在何处。佐世保空军基地的战斗机驾驶员，只知道他们正在为需要 4 艘母舰的飞机倾巢而出的大规模空袭作准备。轰炸机则集中在沿海岸向南约 150 英里的富高

空军基地。在这里，飞行员专门进行夜间轰炸训练和投弹准确性的训练；作为目标的木筏拖动时，在海面上犁出了层层浪花。

高空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的驾驶员，则在南方鹿儿岛海湾附近训练。这些飞机飞越鹿儿岛市背后的 5000 英尺高的一座山，然后直冲下来紧贴着山形屋百货大楼和车站的屋顶飞过，躲过电杆和烟囱，飞至码头上空时，突然把高度降至 25 英尺。此时，投弹员拉动套环，以示对在 300 码外的防波堤（舰列）施放了鱼雷。源田所以选中鹿儿岛进行训练，是因为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在这里会遇到将来他们袭击珍珠港时要碰到的大多数问题。这些飞机将不得不在烟囱和建筑物的丛林上空飞行，就像在鹿儿岛一样，然后要突然降低高度和速度，以便从极低的高度向舰列投放鱼雷。源田之所以坚持要进行这种自杀式的低空飞行训练，是因为珍珠港水浅，如果鱼雷从通常的高度投放，它就会一头扎进水底。就是在 25 英尺的高度投放，源田还嫌太高，他死死缠住横须贺海军基地的专家们，要他们研制浅水鱼雷。

在风景壮丽的弯弯曲曲的四国岛海岸附近，一支海军部队也在针对“Z”作战计划的另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训练。这种训练之神秘使当地居民摸不着头脑。每天早晨，19 名海军少尉驾着渔船，向三帆湾驶去，渔船后边拖着长约 80 英尺雪前形状的物体，用帆布盖着。傍晚，这些渔船连同帆布覆盖着的神秘物体，陆续返航。原来帆布覆盖着的物体，就是两艘小型潜水艇。驾驶员们使潜水艇偷偷地通过海湾的出口，演习如何对美国战舰进行鱼雷袭击，但是，连他们的教官也不知道这就是假设的珍珠港。

经过数周的刻苦训练，轰炸的结果非常可观，命中率高达 80%。最后一个技术问题，即找到合适的鱼雷问题，也由爱甲文雄大佐解决了。爱甲文雄是横须贺的一位鱼雷专家。他用飞机平衡器做成木翅，安装在鱼雷上。在鹿儿岛海湾经过数十次试验后，80% 的鱼雷都适宜于在珍珠港内的浅水中使用。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进击前赶制出这些木翅。

11 月 5 日，山本根据参谋总部的指示发布了“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这份命令长达 151 页。它概括了敌对行动开始后的第一阶段内海军的战略，它不但包括对珍珠港的袭击，还包括对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和南洋差不多同时进行的袭击。山本把所有飞行队长都集中在他的旗舰上，把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告诉了它们。山本说：“你们不能小看敌人，美国不是一个平庸的敌人，它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劲敌。”在 24 小时内，这位舰队司令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把敌对行动计划的时间初步确定为 12 月 8 日。从此，日本海军和陆战队进入临战状态！

在紧迫的内外形势下，为了对国民进行战争动员，东条于昭和 16 年（1941 年）11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七十七次临时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所谓“铁石般的斥敌壮语”的好战演说，他强烈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他号召国民精诚团结，节衣缩食，为 1 亿国民齐上阵大声疾呼。东条说，“百议不如一行”，要大家拿出实际行动。他不顾国民反对，在 9 分钟之内，强令议会通过了追加 38 亿日元的临时军费的预算案。他强调，现在已进入紧急关头，要求全体军民为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为称霸世界作出贡献，正是：紧锣密鼓齐动员，万事俱备箭上弦。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四章 深入虎穴

派遣特务探军情 珍珠港内情况明
乔装打扮多掩护 深入虎穴功到成

一旦日美开战，首先应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的一击，这是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早已下定的决心。

山本认为，为使夏威夷战役取得成功，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譬如：参加攻击的强大的航空母舰特遣队的编队和训练；用来攻击停泊在浅海的军舰的航空鱼雷；进攻夏威夷路线的选定；对海上舰只的燃料补给，等等。但是，决定夏威夷作战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作为攻击目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部队，是否确实停泊在珍珠港。

山本在想：即使日本机动部队在进攻途中不被对方发现，气候条件也很好，攻击机群长驱直入瓦胡岛。如果作为攻击目标的太平洋舰队出港进行演习或训练，珍珠港内空无一物，那么将会怎样呢？日本海军从战争伊始，就要迈出不可挽回的错误的的第一步。因此及时准确地掌握珍珠港美军的情况，就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重要任务。

在这之前，日本已有一个谍报小组在夏威夷活动。间谍组的成员，一个是胆小、缺钱论的德国人，一个是日本和尚，还有两个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但他们所提供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零星情报。日本参谋总部根据东条的要求，决定另派一名海军情报专家。

这个人就是吉川猛夫。尽管他有个断指，容易被识别出来，但他还是被选中了，吉川猛夫是海军情报部第五科的一个少尉，29岁，主管美国。他身材细长，长得漂亮，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年轻。

吉川曾在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求学。他是游泳冠军，剑道得了第四名。他是一个奇特的学生。当同学们在埋头准备考试时，他却在研究僧道，修身养性。即使如此，他还是按期毕业。之后，他在一艘巡洋舰上当了一期密码官，后来又进了水雷学校、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因为饮酒过度把胃搞坏了，不得不暂时退伍。重新入伍后，他在海军情报部任预备军官。开始他在英国科，后来调到美国科，在这里，他在堆积如山的情报中筛选情报，熟悉了舰只情况，记住了各种海军装备。

1940年5月的某一天，理查森司令指挥的美太平洋舰队，一反常规，接到了不返回美国海岸而驻留珍珠港的命令。就在同一天，日本军令部第五科科长山口大佐对吉川说：

“吉川君，准备派你去夏威夷，你看怎么样？”

吉川摸不着头脑，不知干什么，心想可能是信使之类的工作，去联系联系就行了。便说：

“行，我去。”

“那么，从今天起，你就学习有关美国海军舰船的知识吧！这些天我们和外务省为你联系好……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

“是，知道了。”

几天后，山口又把吉川叫去，命令他到外务省接受指示。山口压低嗓门只才他说：

“吉川君，要你去檀香山总领事馆工作，在那儿住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收集美国珍珠港的情报。手续由外务省办理。按指示行动吧！”

吉川接受了这个任务，脱去了军装，化名森村正。为在领事馆任职作好准备，他留起了长发，在日本大学学习国际法和英语。他通过了外交考试。然后，一半时间在外务省研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一半时间在第五科工作。

到山本大将提出要再派谍报人员去夏威夷时，已经是1941年春天了。这时，吉川已万事齐备。3月20日，他在横滨登上了“新田丸”邮船。一星期后，他抵达檀香山，决心与美国海军见一高低，喜多长雄总领事热情地欢迎了他，当晚就把他送进坐落在山头、俯瞰珍珠港的由日本人开设的春潮楼旅店。旅店的女老板藤原波子是爱媛县人，是吉川的同乡。她告诉他，她手下有5个艺妓，是在日本训练出来的，这里的差使不会使他感到无聊。

在当地的日本人中，只有总领事一个人知道吉川少尉化名的森村书记官，是军令部派到夏威夷来担任谍报工作的。总领事说：“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你就放手干吧！”

喜多的这番话，对于吉川来说，增添了不小的勇气。

“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吉川的眉宇间充满了决心。

原来，这次派遣吉川来的意图是利用总领事致外务省的密码电报，把吉川搞到的军事情报，经外务省报告军令部。

这时，吉川凭以前在军令部4年的工作经验，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搜集具有最重要价值的军事情报上。所谓重要情报就是：不同时期在珍珠港停泊的美国舰只的类型和艘数；部署在夏威夷方面航空基地的飞机机种和架数；以珍珠港为基地的舰船动态；防空状况；飞机和舰船的巡逻情况；舰船和军事设施的安全措施等。

吉川慎重地考虑了应该怎样把这些情报弄到手。他不靠外力，全凭自己的力量去干。关系战役胜负的情报，准确是绝对的条件。

因此，亲眼看、亲耳听、亲自动脑筋分析判断，才是最可靠的方法。这就是吉川得出的搜集情报的结论。幸而吉川的身分是外交官，夏威夷又住着许多日本人。这些对他搜集情报的活动极为有利。

吉川刚一到任，就开始了活动。他身穿绿色西装裤和夏威夷衫，头戴插着羽毛的夏威夷帽，以观光为名，雇上一辆出租汽车兜风去了。他查看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珍珠港以及希卡姆·菲尔德机场等军事要地，着手今后的准备工作。他想起了在军令部的桌子上几乎每天都仔细看过的地图，现在这些军事目标活龙活现地展现在眼前，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油然而生。

从小山上眺望，珍珠港就好比一只巨大的海盘车，发出闪闪白光。在阳光灿烂、四季如夏的碧空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大大小小的军舰，犹如涂了一层白奶油的漂亮糕点，排列在蔚蓝的海面上。此情此景，简直成了夏威夷的名胜。

自此以后，吉川大约每四天一次，从珍珠港旁边路过，仔细观察港内的情况，他每次都花几分钟的时间，日积月累，细致地把每天停泊在港内的舰船的类型和艘数，用除了他自己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一一记在黑色笔记本里。

吉川在领事馆的薪金是每月150美元，外加半年600元的活动经费。他随机应变地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活动。他在巡视了各主要岛屿之后，穿着印有“ALOHA”（欢迎、问候之意）字样的鲜艳的衬衣，挽着一位漂亮的艺妓，像所有游客一样，坐上飞机在瓦胡岛上空兜风，在第二次观察了各岛之后，他心中就有数了。除了在珍珠港内，其他地方都没有海军舰只。于是，他决定

把精力集中在瓦胡岛上，他除了坐上汽车每周两次在岛上来回转圈外，还每天观察珍珠港港区。他通常只是从山顶上居高临下察看，有几次却闯了进去。有一次，他带上饭盒，混在劳工队伍里，在那里逛了一天，也没有人盘问他。他用手指弹了一下一个大油槽，看了看里边究竟油有多满。他发现，装满了的油槽容易漏油，从篱笆外就很容易看清。又有一回，他说服了军官俱乐部的女主人，雇用他为一次宴会在厨房作帮手，不过，他所打探到的不过是美国人洗盘子的方法而已。

在夏威夷那里，日本人虽然很多，但都帮不上手。在领事馆内和他们一起喝酒时，吉川通常都要打探许多人的口气，但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忠诚的美国人。在他看来，一面在供神奉佛，给皇军慷慨解囊捐款；一面又要当美国人，这是毫无意义的。有一位日本侨民答应如果战争发生，他就放火烧甘蔗园，并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他所见过的大炮。当他说到金刚石山顶上有一尊大炮“粗得像庙里的大钟”时，吉川对他的话打了折扣。

与美国水手闲聊也一样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有用的却一点也没有。他的情报都不是用扣人心弦的办法得来的，而是用简单的方法搞到的。在春潮楼旅店里，他和艺妓们同坐在一张榻榻米上。望着山下绵延的海港，把在港内的舰只绘制成地图。在他定期的旅行中，他通常携带一名艺妓或一名领事馆的服务员出游，这为他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

一次，他坐出租汽车到了离珍珠港不远的希卡姆机场。这个大型机场是陆军航空兵口的轰炸机基地，在机场门口，他对哨兵说，他要会见一名美军军官，这位哨兵把手一挥便让他进去了。当他的汽车缓缓地在这个基地上转圈时，吉川默记着飞机库和飞机的数目和两条主要跑道的长度。他也观看了惠拉机场的飞行表演。这个战斗机基地正好位于瓦胡岛的中心。吉川与其他观众一起，坐在草坪上。观看了P—40战斗机驾驶员的特技表演。有几架飞机跑进了敞开的机库。他没有做笔记，但他记住了飞机、飞行员、飞机库、兵营和士兵的数目。吉川从来下照相，全凭他的“肉眼照相机”。

吉川每星期向喜多总领事作一次汇报，然后喜多派他的司机把译成密码的情报送到檀香山的麦凯电报局。吉川的工作受到了军令部的重视。但到了8月份，以日军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为转机，日美间的风云骤然险恶起来。他的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如此，东京还是发来了加紧搜集情报的密令。

不久，吉川便弄得满脸污垢，头发蓬乱，乔扮成菲律宾人，穿着素色的夏威夷衫到甘蔗田里帮工了。从甘蔗田眺望，珍珠港近在咫尺。后来，吉川的身影频频出现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黑色笔记本上分别按星期一、二、三、四、五……的顺序记下了停泊在夏威夷的美舰数字。

到了9月，可以看到吉川在东海岸持竿垂钓。他头上漫不经心地包着一块毛巾，脸上露出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有时，他的钓竿甚至大胆地伸到珍珠港的跟前。吉川那时专心致志于调查军事上至关重要的沿海水中障碍物、潮流、海滨坡等情况。他所擅长的游泳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夏威夷，定期往返的外交信使带来了一捆每张100美元的票子和一份指示。该指示要求将这笔款子交给一个被雇用的德国人奥托·库恩。奥托·库恩是德国法西斯特务头子希姆莱的相识，但希姆莱并不喜欢他。在脱离纳粹党后，奥托·库恩来到了夏威夷。在家具买卖中，他赔掉了老本，只好靠当间谍、和妻子开美容院来维持生活，那时，他除了在日本人面前夸口说自己

交往甚广外，实际上并没有做多少事情。

喜多总领事在纸上写下了“卡拉马”三字，从字中间把纸撕作两半，恰一半寄给了奥托·库恩。然后，他把吉川找来，把另一半张纸交给了他，让他送给“一个美籍德国人”。总领事走到保险柜前，拿出了用报纸包着的那个包裹，里边有1.4万美金和一封信，他说：“你将那半张纸给他看，如果他有另一半，就把钱给他。”还要吉川带回奥托·库恩对那封信的回音。

10月28日黄昏，吉川穿上一条绿色短裤和一件夏威夷衬衣，大踏步出了领事馆的前门，登上了一辆出租汽车。当它爬上了金刚石顶山后，便沿东海岸驶了几分钟，然后在离奥托·库恩的房子约半英里处停了下来，吉川付了车钱，把汽车打发走了。他沿着那条路信步向前走去。找到了他所要去的地方。那是一所宽敞的房屋；有一个人院落。吉川敲了敲厨房门，但没人来开门。他走了进去，边走边喊：“喂！哈罗？”他等了10分钟。然后，突然不知从哪儿闪出一个人来。这人40岁开外。

“是奥托·库恩吗？”

那人点了点头。吉川生怕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暗暗将那半张纸放在桌子的角上，那人立时脸色苍白，全身发抖。不过，他也抽出半张纸。吉川仍然一言不发，把两张纸对在一起——“卡拉马”。奥托·库恩此时也一言不发。吉川默默地跟着他从后门出去，来到了一座无顶的夏威夷式的凉亭里。在这里，他把那捆东西交给了奥托·库恩，并告诉他里边有一封信。奥托·库恩把这个包裹摸了又摸，最终找到了这封信。这是一封没有签名的指示信，让他试用一架短波收发报机，用EXEX作呼号，在频率11980处，于11月3日太平洋标准时间1时、11月5日5时30分，与日本电台取得联系。其任务是，在吉川万一出事后，由奥托·库恩继续同东京联系。

吉川回到马路上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心里很担心联邦调查局的人会随时向他扑过来。他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当车子往前开时，心头的千斤石才放下来。

与此同时，在邮船“大洋丸”上，另外两名谍报人员正在向瓦胡岛进发。其中之一是前岛寿英中佐，一位潜艇专家，化装成船上的医生；另一位是副事务长铃木孝顺。只有船长和事务长知道，他真名叫铃木英，是海軍中最年轻的少佐，一位飞行专家。他父亲是个陆军大将，叔父是有名的海軍大将铃木贯太郎，就是那位在“二二六”事件中死里逃生的侍从长，铃木的任务是确定目标的准确位置、应该使用何种炸弹、在紧急状态下的登陆地点和茅依岛的拉海那港是否仍是美国的海军基地。如果是，就不得不从进攻珍珠港的机群中抽出大批飞机去对付它。情报部还让他在前往檀香山的途中，注意海洋和气候的情况。“大洋丸”并没有按它的航线航行，而是沿着南云将军的进击部队将要航行的航线行驶。

11月1日凌晨，这艘邮船最终在瓦胡岛靠了岸。铃木站在船桥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珍珠港的进口处。这个进口处的宽度仅能容许一艘大型舰只出入。6点钟刚过，满满一汽艇美国海軍官兵就登上了这艘邮船，并在船桥上和机舱附近安了哨，那些哨兵像石人一般笔直地站着。铃木心想，这些大兵站岗的目的，是要防止有人把船搞沉，把珍珠港的出口堵死。

他向一群前来引水的港务局的官兵、包括几个美国海軍军官施了礼，并若无其事地问起水有多深，是否布了雷，这些问题一一得到了答复。在船上的酒吧间喝酒时，他打听到，在进口处布有自动开关的钢网，附近一艘英国

军舰桅杆上有个不断在转动的雷达。其余的任务无法再执行了。

就在“大洋丸”抵港的当天，喜多总领事把吉川叫了去。

“森村君，你认识铃木少佐吧？”

“认识，在东京一起共过事。”

“告诉你，他已经来了。你看是不是见见面？”

“还是不见为好。恐怕会有盯梢或窃听器。”

从船上回来的喜多交给吉川一件东西，说是铃木给的，一看竟是一根日本纸搓的纸捻儿。把纸捻儿细细地理开，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很小的字。这是给吉川提出的 97 个问题，铃木要喜多转告吉川，在大后天开船前对这个纸捻儿里的问题作出回答。

这天晚上，吉川根据过去 7 个月费尽心血搜集的情报资料，用一个通宵对 97 个问题作出了答复。其中有：

问：你推断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

答：星期日。

问：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如有，出动几架？

答：拂晓和黄昏均为 10 架。

吉川为了亲自弄清巡逻飞机出航和返航的情况，曾多次在黎明和黄昏时仁立在领事馆的草坪上观察。

问：湾口有无防潜网？如果有，速报其详情。

答：大概有。但种类及其他不详。

吉川预先考虑到这一问题很重要，曾多次穿着皱皱巴巴的夏威夷衫，扮成菲律宾工人，毅然潜入湾口。但始终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现在他决定再亲自去跑一趟。吉川穿上他经常穿的运动装，拿上钓鱼竿，沿着公路走去。他走过了希卡姆机场，穿过一片空地，朝珍珠港出口处走去，心想万一被抓住，就说自己是菲律宾人。他走进了一个离海军大楼不远的小树林中，几乎撞上正在晒衣服的水兵。他躲在丛林中，直到日落西山时才出来。

天黑后，他爬到了港口的出口处。他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连忙一动也不动，直到一切又安静下来，然后，他轻轻地下了水，无声无息地拨动着双腿，游了 50 码，进了航道。他用双脚在水下触摸，什么也没有。他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但由于过于激动，入水只几码，便憋不住气了。他一连又扎了 5 个猛子，还是没有发现钢网。他游回岸边。在他的特务生涯中，这几分钟是他最紧张的时刻，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以上报。

到了 11 月 5 日，即开船那一天，吉川把这份答卷交给了喜多总领事。喜多把它裹进腰里，甲手拍着肚皮笑着说：“一定亲手交到！”

那时，东条内阁正沿着战争的道路狂奔，军令部也横下一条心，力准备开战作最后的拼死努力。从前面谈到的 97 个问题中，吉川清楚地窥见了这种国内形势的只鳞片爪。

在吉川对 97 个问题答复后不久，肩负进攻珍珠港重任的日本海军的机动部队，在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会谈的掩护下，早在 11 月 22 日以前，就已悄悄地集结到择捉岛的单冠湾了。4 天后，即 26 日，“赫尔照会”的答复，事实上使日美关系宣告破裂。

决定开战时间是最重要的问题。按着东条的要求，必须选择珍珠港舰只集结最多的时间给美国舰队以致命的一击。

东京 12 月之日的电报，对夏威夷总领事指示说：“鉴于目前形势，战列

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在珍珠港停泊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今后望尽可能将这些情况每天报来。珍珠港上空有无观测气球或施放观测气球的某种征候，请电告。另外，也望告战列舰是否装有防雷网。”

本来，吉川刚到夏威夷任职的一段时间，要求每周报告一次。

而一过8月，就变为每三天报告一次。这回终于要每天报告一次了。当然，东京并未将意图告知吉川。不过，这种要求报告次数的增多足以暗示：开战时间迫在眉睫，攻击目标就是珍珠港。

吉川从这种指示中觉察到军令部的“焦急”，便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开车兜风、钓鱼、到春潮楼“玩乐”。

12月2日，“每天报告”的指示发到夏威夷时，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已向已从单冠湾出击、正向珍珠港挺进的机动部队发出了“登新高山1208”的隐语电报，这就是下达的开战命令。命令全军开始进攻的“X日定为12月3日上午零点”。东京时间12月8日上午零点，为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星期日）上午4点30分。上面已经提到过，吉川根据精心积累的统计材料，在回答前面的97个问题时提出，舰只在珍珠港停泊最多的日期是星期日。

12月6日，这一天檀香山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六，既听不到来自珍珠港方面的飞机轰鸣声，也听不到其他任何响声，吉川完成了上午的侦察，并向东京作了报告，很晚才吃午饭，随后拖着疲惫的身子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了一会儿，就一下子蹦了起来，再去侦察珍珠港黄昏的情况。只见金梅尔司令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船正静静地浮在四季如夏的海面上。

“嘿，两艘航空母舰和10艘重型巡洋舰怎么不见了！我上午还亲眼看见确实停在那里嘛。真怪呀！”吉川嘟囔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吉川在春潮楼吃罢晚饭便匆匆回到了领事馆，立刻动手起草发给东京的电报。吉川起草的喜多总领事致外务大臣的第二百五十四号急电，是在机动部队开始攻击珍珠港约12小时前发出的。这是吉川发出的最后一份报告。电报说：

“6日珍珠港停泊舰船如下：战列舰9、轻巡洋舰3、潜水母舰3、驱逐舰17。此外，轻巡洋舰4、驱逐舰之已入坞。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已全部出港，不在港内停泊。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

吉川在拍发上述《珍珠港停泊舰船》的电报之前，曾发了如下电报，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目前，尚无布置阻塞气球器材的迹象。而且，很难想象他们实际上会有多少这类器材，但是，为了控制海面和珍珠港附近以及希卡姆、福特岛。埃瓦机场陆上跑道上空，即使实际上进行此种准备，使用气球保卫珍珠港也是有限度的。我认为对这些地点进行奇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正是：深入虎穴探军情，特务吉川立首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五章 调兵遣将

意见分歧争吵响 胜败难定属哪方
一意孤行蛮到底 急忙调兵又遣将

虽说日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日本特使来栖和野村仍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赫尔“打太极拳”。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日本政府所要进行的谈判，只不过是以东条为首的军国主义集团调兵遣将、准备南进的障眼法而已。

11月6日，也就是早在赫尔11月27日照会之前，山本五十六就根据东条的指示发布联合舰队绝密的作战命令。

11月10日，特遣舰队司令南云中将发布了他的实施山本计划的第一号作战命令。虽然参谋总部和外务省达成了一项这样的谅解：如果与美国的外交谈判哪怕在最后一刻得到成功，对珍珠港的袭击也要取消，进击部队将回到北纬42度、东经170度的集结地待命。但是，在东条英机决意推行战争政策的情况下，这种谅解是无法实现的。相反，调兵遣将和临战之前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6艘航空母舰上的私人财物以及不必要的设备全被取去，换上来的全是一桶桶的汽油。所以舰只一律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通常，当某个舰队离开日本时，舰上装的是热带衣服和适合南方气候食用的特种食品；这次，海员们需要的却是适于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穿的衣服、防冻油。特种炮衣和其他防冷设备。参谋长草鹿希望，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尽早准备完毕。

11月16日，进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即所谓“木户部队”在内海口集中，这是一支强大的舰队，它包括6艘航空母舰、2艘配备有14英寸口径大炮的快速战列舰、2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9艘驱逐舰、3艘油船和1艘给养船。其中“赤诚”和“加贺”两艘母舰，是分别由1艘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改装的，排水量3万吨。“飞虎”和“苍龙”的排水量只有1.8万吨，但设计比较现代化。“翔鹤”和“瑞鹤”是最新最大的母舰，826英尺长，几乎与美国最强大的母舰“企业”号一样大小。6艘母舰上载有360架飞机，其中有81架战斗机、135架俯冲轰炸机、104架高空（平行）轰炸机和40架鱼雷轰炸机。

第二天傍晚，山本来到了“赤诚”，给南云和主要人员送行。天一黑，“赤诚”便在两艘巡洋舰一左一右护卫下缓缓地驶出佐伯湾。舰上的灯火全部关闭，通讯设备上晶体暂时全被取了下来，以保证不使用无线电通讯。但留在内海的舰只却只发射出强波无线电通讯信号，以迷惑敌方的监听电台。

在“长门”的后甲板上，山本背着双手在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凝视已在消失的母舰的黑影。对于“Z”作战计划他虽然怀有信心，但仍然害怕与美国开战，在不久前他在给军事学院的同学的一封信中，山本写道：“我的处境是何等出奇啊！我不得不作出违反我个人意愿的决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全力去实现这个决定。此亦命乎？”山本虽然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但他担心战争越打越大。会因力不从心而招来灭顶之灾。

为了迷惑敌人，攻击舰的其他军舰一艘艘按不规则的时间间隔先后起锚开航了，各自按自己的航线出海，朝东京以北约1000英里的海面上的集合点驶去。如果所有舰只同时直接朝瓦胡岛出动，那么目标太明显了。珍珠港进

志部队将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汇合。那里港湾水深，夏季浪涛汹涌，冬季出奇地平静。这个岛是个理想的汇合点。岛上只有一个三幢房子的村庄、一个小小的水泥码头、一个邮局和一个无线电台。为安全起见，“国后”号海防艇扣住了所有外发的书信和电报，巡回艇则在希图湾兜捕渔民，封锁消息。

“加贺”母舰是留在内海的最后一条舰只，正在把改进后的最后一批鱼雷装上。母舰一启航，舰长就把所有人员都集中在甲板上，宣布向希图湾进发，然后向珍珠港前进。在珍珠港，特务吉川正在注视着1艘战列舰和8艘驱逐舰驶入港内。正在那里停泊的有5艘巡洋舰和1艘“企业”号等级的母舰。

在“赤诚”号上，各舰长被告知了航线。有一位舰长问，如果在海参崴碰上苏联商船怎么办？回答是“击沉”。“不管挂哪国国旗，看见什么船只就击沉什么。”11月25日日落时，500余名驾驶母舰飞机的飞行员拥挤在“赤诚”舰上的飞行员室内。室内的睡铺和桌子全被拆除。南云将军简要地谈到了这次偷袭。只是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才听说珍珠港一词。接着由作战参谋源田和突击队指挥官源田，指着珍珠港的模型，详细地讲明了如何向珍珠港进攻。每个飞行员都发给有美国军舰的照片和瓦胡岛附近能迫降的各岛屿的照片。如遇迫降，潜艇将在指定的地点接应他们。之后，南云又作了一番动员，室内气氛异常激动，法西斯狂徒们欢呼声震耳欲聋。

随着战争的逼近，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在11月29日上午举行的军政高级官员联席会议上，东条首相对一些大臣的悲观情绪大动肝火。他说：“请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并取得足够的石油。3年内，我们逐步扩大这个圈（东南亚）。至于航空油，我们能想办法解决。钢铁呢，去年的产量是476万吨。3年后我们可以提高这个产量。”

“我不了解迄今为止我们所听到的一些说法，”冈田启介海军提督插进来接着提问，“比方说，欧洲战局的情况如何？”

“我们与德、意紧密提携，同他们订有条约。”东条回答说。这是战略需要，它能使日本西进，与希特勒的军队会师。“我们必须击溃英国。印度是途中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将配合德苏战争，在近东采取联合行动。”

冈田把攻击的矛头指到另一方向。他问：“日本的海军是否有实力打败美国？”

东条说，日本将逐个地攻下各战略点，准备长期作战，但最后胜利是日本的。

“目前倒一切顺利，”冈田苦笑着说，“但有许多未知数。就以美国目前的军事工业而论，你不觉得多少有点危险吗？”

“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东条又怒又气，满口喷着唾沫星子说，“就算我们不打，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不能向英美低声下气，在中国事变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丧失16万人，还有200多万人在吃苦头。不能再吃苦头了！如果再这样连续几年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我们已经丢了不少宝贵的战机！”

这个敢于向东条挑战的海军提督冈田启介，这个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侥幸活下来的前首相，他对东条的战争政策和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结盟，一向持怀疑态度。

会上只有两位“重臣”将军，即阿部信行和林銑十郎完全信任东条政府。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东条仍一意孤行，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他说：“日

本的兴衰全由神决定了。”

已经是下午4点，但东条的日程却没有结束。他立即召开第七十四次联络会议，与会者同意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打招呼，告诉他们日美谈判肯定破裂，战争危险已迫在眉睫。

根据会议的决定，外交大臣东乡草拟了致柏林和罗马的电报，并于当天深夜发了出去。发给大岛浩大使的电报，透露了日美谈判决裂的情况。电报要他立刻会见希特勒的总理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并秘密地将事态发展情况通知他们：“近来英美两国都采取了挑衅态度，正在策划向东南亚各地调动武装力量，为了与他们对抗，我们将不得不动调军队。看来，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间有通过某种武装冲突的方式突然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而且，“这场战争的爆发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要来得快”。

天皇批准是开战前的最后一道正式手续。

12月1日（星期一）下午2时5分，御前会议在皇宫与通常一样开始。东条首先发言，他说，日本不能屈服于美国提出的退出中国和废除三国条约的要求，否则将危及日本本身的安全。“为了保卫帝国，事态已发展到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地步。”

在东条详尽地阐述了日美谈判的冗长的经过后，军令部总长永野海军大将起立，激昂地宣称，海陆两军官兵都“热切希望以一死报效天皇，尽忠报国”。接着其他军政头目也报告了诸如国民士气、紧急预防措施、粮食供应以及国家经济和财政等问题。

最后，东条恳请天皇批准开战。他说：“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更紧密地团结，举国一致，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与会者除了向天皇鞠躬施礼外，再无别的话。就这样，裕仁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罪恶文件上盖了御玺。

就在天皇批准开战3个小时后，山本用新密码给进攻珍珠港的攻击部队发出另一份稍长的电报：“登新高山1208。”这就是说，按原计划于12月8日发起攻击。

机动部队为了节约燃料，以每小时14海里的速度缓缓向东驶去，舰队编成圆的队形，3艘潜艇为先导，侦察有没有中立国的商船；如果发现这类船只，便靠上去，登船将他们俘获。但是，倘若遇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对这个可能遇到的棘手问题，他们曾反复讨论。有一次山口半开玩笑似地建议说：“放几响礼炮，喊一声‘再见’！掉头回家。”他的建议使人不禁捧腹大笑。

“登新高山”的电报加重了草鹿的战争责任感。他顿时觉得，他们将发起一场突然偷袭，然后疾风似地立即退回。不过，随着机动部队接近珍珠港，美国的巡逻飞机总还有可能在发起进攻前先发现机动部队。如果是那样的话，草鹿已作好改变战术的准备，即使不能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也要全力进攻，力求重创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司令南云随即下令各航长熄灯行驶，并把“Z”行动向全体士兵传达，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为了欺骗对方，掩盖偷袭行动，在日本国内，宣传机器却大摆迷魂阵。

《日本时报》当天的标题是：《日本将重新作出努力，求得美国谅解》。

在世界的另一边，山下奉文中将正向各师团长、独立部队长及参谋人员宣读进攻的命令。他们一个个注意地倾听，他们知道日本的命运已处在紧要

关头。几乎每个人都泪流满面。

12月8日拂晓，日军将在马来半岛靠近边境的东海岸的3个地方同时登陆。有两个登陆点在泰国境内，即在北大年和未卡，另一个登陆点是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辻政信中受空想主义的启发，打算用现代特洛伊木马计占领中立的泰国。他打算让1000名日本人穿泰国军装，在宋卡附近登陆，兜捕一批咖啡馆的女招待和舞厅的舞女作为掩护，然后强行征用二三十辆大轿车，带上这些舞女快快乐乐地开到马来亚边境。他们一手拿着泰国国旗，一手拿着英国国旗，用英语高喊：“日本兵可怕！”“英军万岁！”辻政信满有把握地认为，在一片混乱中，边防军肯定会让他的士兵越过边境进入国界。

12月4日午后不久，东条召开联络会议，讨论向美国递交最后照会的日期。会议决定要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下午12时30分递交。第二天伊藤中将到外务省拜会东乡外相。他说，照会应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交给赫尔，比原定时间推迟半个小时。临走时，伊藤再次警告，外交掩护军事行动，切勿过早通知对方。

6日，东京报纸根据东条的指令，继续指责西方准备开战，为日军南进大造舆论。各报的标题是：《美国徒劳地拖延谈判，无意与日本和解》，《美领导人商讨对日政策，但未有改变固执态度之迹象》，《恶意中伤，包围日本，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

罗斯福总统看过截获的日本“停止谈判”的照会后，默默地给他的顾问看。霍普金斯读完后，罗斯福说：“这意味着战争。”虽然美国军政要员预感战争就要来临，但是他们却没有提高警惕，更没有作出必要的军事准备。就在12月6日星期六晚上，美国上下到处都是歌舞升平，欢度周末。海军部长诺克斯仍在国家剧场观看《学生王子》；陆军情报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将军认为日本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特别忧虑。他给他的远东问题专家布拉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没有理由发表戒备令或布置夜班”；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正与夫人在迈尔斯堡安静地度周末。

那天夜里，在华盛顿的军政高级官员，无论是总统罗斯福，还是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或是参谋总长马歇尔，都没有料到一大清早日本人会袭击他们的珍珠港。

在瓦胡岛，那里的情况也和华盛顿一样，夏威夷海陆两军司令根本就不愁珍珠港会遭到空袭。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在檀香山出席私人晚宴后，就上床睡觉，第二天上午要同陆军司令肖特将军去打高尔夫球，消除人们所传他们互不说话的流言蜚语。金梅尔和肖特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布长期戒备令。华盛顿的警告并没有说珍珠港会遭到轰炸，甚至连极小的可能性也没有。他们只计划在次日早晨派出数目有限的飞机进行例行的巡逻；珍珠港地区的高射炮也只派少量人操纵。港内94艘舰艇上的大部分人员，除少数值班者外，都已安然就寝，那不过又是一个懒洋洋的太平无事的热带夜晚而已。

经过周末的狂欢乱舞之后，正当美国人沉入甜睡之际，停泊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小岛柱岛海面的日本联合舰队，已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必要时驶入内海接应机动部队。山本已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他的命令与东乡大将在对马海峡发的命令完全相同。

当时，事实上正有两股日军向珍珠港进逼。

11艘潜艇用大包围圈的阵势向瓦胡岛围拢，还有9艘是从马绍尔群岛开来的，其中7艘潜伏在瓦胡岛南边，2艘潜伏在毛依岛附近，以侦察美国舰

队是否可能在拉海纳。特别进攻部队的另外 5 艘潜艇在夜幕的掩护下浮出水面，并从珍珠港西南海面悄悄向珍珠港逼近。每艘潜艇背上都载有一艘长 79 英尺的由两人操纵的微型潜艇。这种潜艇在水下能以每小时 20 海里的高速行驶。微型潜艇要偷入航道内，潜到战列舰停泊处附近静待空袭开始，然后浮出水面，把两枚鱼雷射向某一艘旗舰。起初，山本取消了这种袭击方法，原因是它危险到等于自杀。他在得到确切保证说会采取一切措施去救回乘员后，最终还是同意了。

在当地时间 6 日下午 11 时许，各母舰在离珍珠港约 8 海里的海面处停止前进，开始狡猾地放出微型潜艇。站在潜艇甲板上的人能看见岸上的明亮灯光，甚至识别出威基基海滩上的霓虹灯。海面上传来隐隐约约的爵士音乐声。几分钟后，5 艘微型潜艇相继下水，于是母舰下潜，栓钩脱落，微型潜艇慢慢地向珍珠港驶去。

机动部队以每小时 24 海里的速度，全速驶向珍珠港北面 200 海里的出击点。官兵都各就各位，炮手准备好向选定目标射击。飞行员和水兵们在夏威夷时间 12 月 7 日早晨 3 时 30 分就被叫醒。他们早就写好遗书，连同指甲屑和剪下的头发一起留在各自的橱柜里给家人。他们围上了洁净的腰布，系上“千针带”。这种腰带，作为吉祥消灾的护身符。由母亲、妻子或姐妹站在街头，招徕行人在腰带上缝一针，直到够千针为止。这意味着每根带上有 1000 人为他祈祷吉祥、武运长久。这天早餐非常丰盛，吃红米饭和鲷鱼，都是节日吃的东西。

舰只颠簸摇晃非常厉害，有浪头打上航空母舰的甲板。为了这个缘故，鱼雷手得到命令不得投入第一次进攻，必须等到天大亮后的第二轮进攻时才出动。这些鱼雷手多是一些武士道之徒，他们抱怨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不管风浪如何险恶，他们能够出击。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尽管负责监视的潜艇发出消息，联合舰队也拍来电报说，除了航空母舰外，美国太平洋舰队都在珍珠港内，但南云对于拉海纳那边还是不放心。他命令侦察机立即起飞作最后一次侦察。在天亮前一小时，“筑摩”和“利根”领航的两艘重型巡洋舰，当时离珍珠港只有 150 海里，各自在微风中弹射了两架水上飞机，其中两架朝拉海纳方向飞去，另外两架则飞向珍珠港。他们的任务是攻击前半小时飞抵目的地，把云层情况、风向、风速以及最重要的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究竟在哪里，用无线电报告回来。

在西南约 6600 海里的海面，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向马来半岛的 3 个地点逼近。主力由 14 艘舰只组成，目标是宋卡。主力的左方，有 3 艘军舰正向北大年挺进。再左，有 3 艘运输舰向哥打巴鲁开去。按计划，3 艘运输舰应首先驶抵目的地，并于东京时间午夜在城外不远的海面下锚停泊。当晚有月光，但幸运的是，乌云遮住了月亮。风浪不大，舰只行驶平稳。这一切都预兆着可以顺利登陆。然后，在凌晨 1 时 15 分，运输舰的护航舰开始炮击海岸，发出登陆信号。

在战争的第一枪打响时，机动部队的航空母舰已驶过出击点，即在珍珠港北部海面约 200 海里处。此时，东方已呈鱼肚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已进入机舱，马达开始轰鸣。天空中云层朵朵。汹涌澎湃的波涛使船身倾斜度达 12—15 度。在平常的演习中，倾斜度如果超过 5 度，演习就取消。但在今天，延期是不可能的。

在 6 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第一批攻击队的机群已经排列好。最前面的

是 43 架战斗机，接着是 49 架高空轰炸机和 51 架俯冲轰炸机，殿后的是 41 架鱼雷轰炸机，直到最后一刻还是决定让这些飞机冒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起飞。

在舰桥上，飞行大队长佐多直向航空母舰舰长报告说：“机群准备完毕。”于是，“加贺”舰长让航空母舰对准风向。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飞行员们正严阵以待，在听候东条和山本总司令的攻击令。正是：调兵遣将穿梭忙，远途奔袭珍珠港；一触即发就开战，美国海军要遭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六章 偷袭珍珠港

歌舞升平夏威夷 珍珠军港遭偷袭
美太舰队几覆没 有人狂笑有人泣

1941年12月6日夜晩，在东京来说是个不平凡之夜。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及其军政要员通宵未眠；他们在万里之外，通过电波，在指挥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向南亚和夏威夷群岛的进军。就在7日黎明（美国时间），日本联合舰队按照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的进攻，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它位于夏威夷群岛的中心瓦胡岛的南端，面积达598平方英里。港中央有个福特岛，是海军航空站。

1941年12月7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共有86艘舰只停泊在珍珠港，其中有战列舰8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8艘、潜水艇5艘，并无美国航空母舰在场。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特遣舰队拥有6艘航空母舰，载着423架飞机循序前进。担任护航的是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3艘潜水艇。另有27艘潜艇作为先遣队早已出发了。这支特遣舰队在11月26日离开择捉岛的单冠湾以后，选择了严寒和多雾的北方航线，隐蔽前进，以避免美国巡逻飞机和来往的商船。

12月7日早晨6时15分，日本特种舰队到达了预定的停泊地点，即瓦胡岛以北230英里处。特遣舰队司令南云忠一随即命令第一批183架飞机准备对珍珠港进行袭击。

晨7时48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批零式飞机飞抵瓦胡岛北端的卡胡库角。透过云层，“加贺”舰战斗机队长志贺淑雄大尉，只能依稀辨认伸出在海上的陆地和滔滔白浪。转瞬间，他瞥见了第一批突击队指挥官美津雄中佐的高空轰炸机长机，于是便等待着蓝色信号弹，那是令战斗机发动攻击的信号。这时珍珠港东西两侧的山峰上，云团簇拥，但在两山间宽阔的军港上空，云层稀疏。

阳光明亮，斜射的光线把一块块蔗田照得一片浓绿。

在这个区域里，有几架美国民航机在懒洋洋地盘旋，可是整个瓦胡基地上的陆军飞机，此刻却没有一架在空中。在希卡姆、贝洛兹和惠勒机场上，为了防止破坏，所有飞机都机翼对机翼地紧靠在一起。埃瓦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也是照此办理。在空中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海军的7架巡逻机，而它们正在西南方许多英里外巡逻。空防系统也毫无戒备。珍珠港内各舰上的780挺高射机枪有3/4无人值班，陆军的31门高射炮只有4门在阵地上，可是它们的炮弹在演习后已送回军需库，因为它们“容易松扣和生锈”。

到了卡胡库角上空后，渊田的长机开始从瓦胡岛西绕向珍珠港。晨7时49分整，渊田用莫尔斯电码向机动部队发出命令：

“托！托！托！”其含义是第一次全面攻击开始。它们的主要目标是8艘战列舰和其他军舰，以及惠勒、希卡姆等飞机场上的几百架飞机。由于日本特务吉川的长期活动和提供情报，日本侵略者对全港的情况了如指掌，战斗任务明确而具体：战斗机43架用机枪扫射机场，粉碎美机迎击；俯冲轰炸机51架，负责破坏惠勒和希卡姆等机场；鱼雷轰炸机40架和高空轰炸机49架，攻击战列舰和各类舰只。各类飞机腾空而起，在寻找自己的捕获物。

当渊田中佐飞近目标时，面临着一个战术抉择。如果他判断美国人果真毫无准备，那么鱼雷机就直接向舰列飞去；否则，战斗机就应该首先消灭前来拦截的飞机。前面的天空碧蓝碧蓝的，空空荡荡一片平静。此时，仍然没有一架美国战斗机升空迎战，也没有冒起任何高射炮火的烟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志贺的战斗机群后面，“苍龙”的鱼雷轰炸机穿过科拉科拉山口横越岛屿上空，朝泊在福特岛东南沿海的庞大的战列舰飞去。这里7艘战列舰排成2列，里排5艘，外排2艘。一连串的飞机像“蜻蜓下卵似的”把鱼雷扔了下去，然后升到高空飞走了。几秒钟的寂静，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战列舰“俄克拉何马”号左右晃动。几秒钟后，又有两枚鱼雷击中了舰身，军舰立时倾斜了约30度。

第二批鱼雷机和高空轰炸机对“加利福尼亚”号、“亚利桑那”号、“田纳西”号等战舰进行了袭击。鱼雷机没有击中“亚利桑那”号。然而几分钟后，高空轰炸机接连5颗炸弹命中，其中一颗炸弹穿过前甲板钻进了燃料储藏舱，引起了大火。顷刻之间，后舱储存的大约1600磅黑色炸药发生爆炸，并且引发了前舱的几百吨无烟火药。“亚利桑那”号犹如火山爆发。附近舰上的人目睹它几乎蹦离了水面，裂成两半。只过了9分钟，这艘32600吨的巨型军舰的两段舰身都葬身海底了，只剩下残骸的熊熊火焰。看来舰上1500多名官兵无一能生还。再往前就是舰列的最后一条军舰“内华达”号。它的左舷中了一枚鱼雷，后甲板中了一颗炸弹，船首下沉了几英尺。

各舰上的官兵纷纷弃舰跳海，企图游向不远的福特岛。但是水面已漂满了油，有些地方油层厚达6英寸。油终于着火烧起来了，在水中的人多半葬身火海。

9时45分，烟雾腾腾的珍珠港上空突然静了。到处是汽油燃烧的恶臭。“亚利桑那”、“俄克拉何马”和“加利福尼亚”战舰已经沉没。“西弗吉尼亚”拖着火焰正在下沉。“内华达”搁浅了。其余3艘战列舰“马里兰”、“田纳西”和“宾夕法尼亚”都已被重创。福特岛上的海军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没有一架能用了。

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和他的参谋们，从凌晨2时起，就在停泊于柱岛附近的旗舰“长门”上坐着等候消息。他们一声不响地围桌而坐，时而起身去看看一张大地图，正当他们焦急等待的时候，突然话筒里传来了兴奋的喊声：“奇袭成功了！”这是密码军官从电讯室里的喊叫。他通过无线电收到了渊田发出的奇袭成功的预定信号：“托拉！托拉！托拉！”参谋军官们握手相庆，欣喜若狂。山本五十六，这个曾在“八一·三”事变后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现在更加洋洋自得，大饮胜利干杯酒，兴奋得脸都烧红了。在他长期的心神不定后，现在如释重负。每隔几分钟，话筒里就重复一次前方飞机传来的捷报和美国人惊慌失措的报告。

的确，当日本轰炸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时，美国海军官兵有的在穿衣服，有的还在睡懒觉。夏威夷航空兵参谋长詹姆士·莫利森上校在听到第一批炸弹爆炸时，正在刮胡子，他连忙赶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肖特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菲利普斯上校，告诉他日本人来袭击了。

“吉米！你昏了头吧？”菲利普斯说，“是不是喝多了？快醒醒！”莫利森把话筒举得高高的，让菲利普斯听听爆炸声。这下，菲利普斯相信了，

其实是吓懵了。“一会儿再说，”他大声说道，“我马上叫联络官同你联系。”就在这时，莫利森头顶上的天花板塌下来了。

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正在宪法大街海军部的办公室里。时已过午，他感到饿了，正要叫入送午餐时，海军参谋长斯塔克将军冲了进来，手里拿着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的“并非演习”的电报。

“老天，这不可能！”诺克斯惊呼。“一定说的是菲律宾！”

斯塔克沉郁地对他说，电报说的确是珍珠港。诺克斯抓起了白宫直通电话。这是下午1时47分。罗斯福正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与哈里·霍普金斯一起吃午饭。诺克斯念了电报。

“一定有什么弄错了。”霍普金斯说。他认为日本不会进攻檀香山，但罗斯福认为报告很可能属实。他说：“这种料想不到的事情正是日本人惯于做的。”他谈了一些他曾如何努力避免战争，以期安然结束他的任期。最后，他冷冷地说：“如果这个报告属实，那么，事情就完全非我们能控制的了。”

下午2时5分，罗斯福打电话给赫尔，把珍珠港的消息告诉了他。赫尔说，日本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刚到，正在外交官接待室等着接见。罗斯福认为赫尔可以见他们，但不要提他已知道了珍珠港事件，态度要严肃、冷淡，“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总统打电话给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史汀生正在家里吃饭。总统激动地问他知不知道已经出事了。

“是啊，”史汀生回答说，“听说来了电报，日本人正在向暹罗湾挺进。”

“啊，不！我问的不是这个，”罗斯福说，“他们进攻夏威夷了！正在轰炸夏威夷！”

这一消息使史汀生十分震惊。作为陆军部长他还蒙在鼓里，感到惭愧。不过，他想，用不着再犹豫不决了。危机已经到来，它将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在国务院休息室里，野村和来栖急不可耐。直到下午2时20分才被引到了国务卿的办公室里。赫尔冷冷地与他们打招呼，拒绝握手。也没有请他们就座。

“我奉命应在下午1时向您递交这个答复。”这位日本海军将军一面用抱歉的语气说，一面把照会递过去。

“为什么要下午1时交给我？”赫尔面孔严肃、铁板。

“原因我不清楚。”野村回答。

原来，早在12月2日，以东条为首的日本军部最后确定12月8日（东京时间）发动战争，但为了麻痹美国，掩护突然袭击，以收出奇制胜之效，日本政府仍训令野村、来栖继续谈判，并警告他们不要使对方产生谈判已破裂的印象。直到12月6日20时30分，日本政府才把对美通牒发给野村，全文共分14段，陆续发出，至7日16时发电完毕。日本政府要求野村子华盛顿时间7日13时交给美国政府，即计划在进攻珍珠港之前20分钟通知美方，但由于日本大使馆译电、打字耽误了时间，所以当野村和来栖走进赫尔办公室并把对美通牒交给他时，正是华盛顿时间7日14时20分，即在日本第一批飞机开始袭击珍珠港之后1小时。

日本的这个通牒既未宣战，也没有断绝外交关系，只是在最后一段说：“鉴于美国政府的此种态度，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特此通告美国政府，表示遗憾。”

由于赫尔已知道了这个通牒的内容，他迅速读完这个文件之后，两眼盯

着野村和来栖厉声地说：“告诉你们，我在过去9个月里同你们所有的谈话完全有案可查。我供职几十年，从未见过一份如此卑鄙的弥天大谎和歪曲，我在今天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球上，竟然会有一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日本大使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赫尔把手一抬，朝门口扬一扬脸，示意他们出去。野村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就灰溜溜地走了。但就在这两个日本人低着头转身向外走的时候；赫尔轻声说出了一句他田纳西家乡骂人的话：“无赖加屎虫！”

晚上，美国助理国务卿阿道夫·柏利把两个日本使节软禁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野村大使要求给他一把武士刀，柏利拒绝了。野村一自杀，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有生命危险。

当晚8时30分，内阁在白宫二楼开会。罗斯福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阁员们脸朝着总统围成半圆形而坐。总统用庄严的语气宣布，这是自当年内战爆发时的那次会议以来最严肃的一次内阁会议，他首先列举了珍珠港的损失。这次太平洋舰队有18艘舰只沉没或受重创，188架飞机被毁，159架炸坏，美军死亡2403人，重伤和失踪2233人。但总算逃过了更大的浩劫，因为航空母舰幸亏出海去了，而且日本轰炸时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然后，罗斯福用缓慢的速度宣读了他打算在次日中午向国会提出的文告。

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文告写得有力，只是文内没有谈到日本“过去的肆无忌惮的行为，而且丝毫没有联系到德国”。史汀生主张趁国民怒火犹旺的时候向德国宣战。总统拒绝了，但是他答应在两天后把整个问题诉诸国民。

快到9时30分时，国会的领袖们进来了，罗斯福把夏威夷发生的事情坦率地告诉了他们。听的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片沉寂。罗斯福说完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问美国的舰队怎么会如此“睡在梦里”。其他人仍然一言不发。

历史证明，美国遭受这次打击完全是咎由自取。美国统治集团对于日本侵略者长期以来实行绥靖政策，对于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采取纵容态度，妄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北进去攻打苏联。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美国政府不仅不去制裁日本侵略者，反而公开声明要保持“友好公正的立场”，为日本大力输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米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所写的：“日本多年来一直利用从美国得到的物资建立海军和陆军以打击美国——当它反对我们的作战计划完成时，它就用这些东西反过来对准我们开枪。”美国姑息养奸，纵虎贻患，到头来自食其果。

其实，日本袭击珍珠港是预谋已久的。早在1940年11月，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日本南进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只有粉碎这支舰队，南进才能取胜。1941年1月7日，山本写信给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正式提出了偷袭珍珠港的设想，主张在美国舰队主力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的情况下，以空军彻底击溃它。美国大使馆从秘鲁外交官和其他方面得到了这个情报。1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把这个重要情报电告国务院。第二天赫尔就把它转告了海军部和陆军部。同时，海军部长诺克斯也早就预料到：“同日本的战争，极有可能是由其珍珠港的舰队或基地的突然袭击而开始。”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却认为：“日本人的策略将是避免同美国发

生冲突，他们既不会进攻菲律宾，也不会进攻夏威夷，而是将向泰国、法属印度支那推进，深入中国腹地，并且还可能进攻马来海峡。”他还认为：“日本人在适当的时机将要进攻俄国。”甚至就在12月6日下午日本进攻珍珠港前夕，罗斯福还在给日本天皇写信，呼吁和平。

罗斯福等人的这种错误的战略思想，使美国军政要人完全丧失了警惕性，以致对临战前夕的许多异常现象麻木不仁，熟视无睹。

在珍珠港上空，按驻地陆海军共同防御作战计划规定，陆军部队应在周围20英里巡逻侦察，海军应在周围700—800英里巡逻侦察。但据后来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查明，在12月7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当地陆海军部队都没有执行这项规定。

在瓦胡岛北边的一个雷达站里，雷达兵洛卡特和埃利奥特在7日早晨7时2分，发现荧光屏上出现了一堆堆闪闪发光的斑点，他们以为机器出了毛病，但反复检查都没有故障，又继续观看。7时20分，他们打电话向陆军情报中心报告：“自北向东3度，221公里的地方有大批飞机！”值班军官泰勒中尉断定是“自己的”飞机，这个小小的官僚主义者回答道：“把这件事儿给忘了吧！”谁知这件事竟载入战争史册，成为永远难忘的历史教训！

珍珠港事件促使了美国人的觉醒，罗斯福总统深感内疚。他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他决心把这一事件诉诸美国议会，并以此教育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次日（星期一），参、众两院根据总统的建议，举行紧急会议。正午刚过，议员们就鱼贯进入众议院大厅。在挤得满满的旁听席里坐着罗斯福夫人。坐在她旁边的是总统请来的另一位战时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夫人。快敲1点钟的时候，全体议员进入大厅。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朋敲槌请场内肃静，接着便高声呼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随着喊声由他的儿子詹姆斯扶着慢步走入会场。总统翻开一个黑皮记事本，开始宣读：“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将永远负着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到日本帝国海空部队的蓄意进攻……”

这篇讲话历时几分钟，频频为掌声所打断。最后总统说：“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无端和懦怯地发动进攻开始，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就已存在着战争状态。”罗斯福在如雷的掌声、欢呼声和激动的喊叫声中合上了记事本。这是他自担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代表了全体美国人民讲话。美国宣布了全面战争，从此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2月8日，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4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对日本宣战的还有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

在日本方面，以东条为首的法西斯政府，虽然对珍珠港和南亚已经发动了进攻，但还没有宣布战争。在日出前一小时东条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鸠田繁太郎报告了珍珠港的战果，同时提醒众阁僚，轰炸机飞行员不免言过其实，不可全信。会上匆匆草拟了宣战诏书，由阁员们署名后送往枢密院。

东京时间7时整，日本广播公司正式广播了日本南进的紧急新闻。消息说：“大本营陆海军12月8日上午6时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天明以前在太平洋同美军和英军进入战斗状态。”这条消息通过架设在大街上的广播喇叭

喇叭传开了。行人止住脚步，惊呆了。接着，喇叭里放送军乐，受军国主义熏陶的一些年轻人开始鼓掌，像看赛球时那样。不过，多数中。老年人神情紧张，对日本前途感到担忧。在广场上，腰挂铃铛的卖损人挟着“号外”东奔西跑，铃声之响在皇宫东厢第三接待室都可听见。

枢密院会议在一个宽敞的室内举行。讨论得最久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为何诏书中不提荷兰。对“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词也争论颇久。一个枢密顾问说，这种提法会引起误解，而且也不合礼貌。东乡坚持不改。他说，世界上谁都知道“美国”就是指“美利坚合众国”。午前，天皇在诏书上盖了御玺。战争正式宣布了。

随后，下午零点 20 分，东条政府发表了“贼喊捉贼”的声明。声明说：“盖确保东亚之安定，贡献于世界和平，乃是帝国既定之国策。”声明首先炫耀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赫赫战功——“支那重要地点悉归我手”之后，对英美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说，“东亚之安定与帝国的存在正濒临危殆。事已至此，遂颁发对美国及英国宣战之大诏。如今皇国之隆替，东亚之兴废，端赖此一举。”东条号召日本人民“铁石般团结，踊跃奋起，举国家之总力从事征战，以之永久剔除东亚之祸根，奉安圣虑”。

电台里接着播放了《军舰进行曲》。歌中唱道：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

那天下午，东条英机因为日军在珍珠港旗开得胜，显得特别得意。他穿着骑装准备出官邸郊游，后被他的秘书劝阻了。原来，东条曾经担心提前进攻马来亚可能影响偷袭珍珠港，其实是白担心。伦敦并无警觉已属可怪，更加可怪的是珍珠港被袭的消息是在第一批炸弹投下来以后两个半小时才传到丘吉尔耳中，当时他正在他的乡间别墅契克斯庄园与两位美国客人共度周末。这两位客人是美国租借法案调度人艾夫里尔·哈里曼和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他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不敢相信以为真，马上给罗斯福打电话：

“总统先生，日本是怎么回事？”

“是确实的。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

“这实际上使事情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

丘吉尔禁不住喜上心头。过去美国一直坚持所谓“不干涉主义”，迟迟不肯参战。这下美国正式和英国结为盟国了。他想起 30 多年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说过，美国像个大锅炉，“底下的火一烧，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日军对马来半岛的入侵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进攻时虽然浪高 6 英尺，但是进展顺利，到白昼时，哥打巴鲁机场已经在日军手里了。在宋卡，海滩坚实，过中佐想要乘着大轿车冲过马来亚边界的如意算盘果然变成现实了，泰国军警没有进行干涉。让大摇大摆地进了城，找到了领事馆，一阵敲门声总算把日本领事馆的人叫醒了。肥头大耳的领事先生睡眼睛陇地出来，见面第一句话是惊讶地说：“啊，怎么，是皇军！”原来，他把密码本烧得太早了，没能把最后一封通知登陆确切时间的密电翻译出来。

在马尼拉，麦克阿瑟的远东航空大队遭到毁灭性的轰炸。

12 时 25 分，27 架三菱制造的新式高空轰炸机隆隆飞到了克拉克机场北面只有 20 英里的打拉上空，对美国的“空中堡垒”和 P-40B 飞机进行了疯狂的扫射。随后，刚扫射了邻近一个战斗机机场的 44 架零式飞机意犹未尽。

尽，也赶来助威。曳光弹点着了油箱，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机场上到处浓烟滚滚，所有的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轰炸机和观测机都在燃烧。“空中堡垒”只剩下了3架，其余全部被毁，日本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战斗机也仅仅损失了7架。这是珍珠港第二。

届时，能用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三股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天之内就消灭了两股。这就是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那第三股威慑力量是英国海军上将“大拇指汤姆”菲利普斯将军指挥的强大舰队。但时隔不久，具有3.5万吨的大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被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从此，东条英机更加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他命令海陆军尽快占领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主要岛屿。

正当东条在太平洋取得赫赫战功的时候，希特勒从东线回到了柏林。他为两件事发愁，一是苏联在莫斯科前线开始了大反攻，二是太平洋传来的消息。珍珠港事件在顷刻之间解除了苏联唯恐东面受敌的后顾之忧，现在斯大林可以几乎把他在亚洲的力量全部用来对付德国了。几个月来，德国元首一再催促日本打俄国，避免与美国交战；与此同时，东条却迫不及待，一再督促大岛浩大使向希特勒索取书面保证，要希特勒在一旦日，美开战时进攻美国。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坚持南进，却不愿作出任何袭击苏联的承诺。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东条首相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他同时提醒“元首”，根据三国条约，只有在日本直接遭到进攻时，德国才有义务援助日本。

“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这个条约在政治上就死亡了。”希特勒说。

希特勒的态度如此大变，令人吃惊，因为他过去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美国不参加欧战，而现在希特勒却主张与美国公开摊牌了。这样一来，美国总统用不着担心对德国宣战会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了。纳粹元首开始狂热地打他的如意算盘。像美国这么一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国家，怎能指望保持团结呢？何况珍珠港事件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俄国人正在反攻，“德国人都在担心美国迟早要参加这场战争”。

外长里宾特洛甫知道希特勒“为了威信关系”已经打定主意要先宣战，于是他指示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托姆森，不要与美国国务院有任何接触，“我们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让那里的政府在这一步上抢在我们前面。”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发表了向美国宣战的狂妄演说。“我们总是先动手！我们总是先下手！”希特勒咒骂罗斯福是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的狂人。“他始而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再用基督教徒的伪善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肯定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旁人是多么正当。”

“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糟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大声喊叫道，“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谈判以后，也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感到深深满意。”

“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护照发给美国代办，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从即日起已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话被纳粹议员们疯狂的欢呼声、掌声淹没了。

正是在这一天，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申明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媾和的“决心”。同时规定了瓜分世界的范围，商定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后，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的精神，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合作。

条约签订三天后，希特勒为了进一步密切同日本的友好关系，特给大岛大使颁发了德国雄鹰大十字勋章。德国元首说：“你们用这种办法同美国宣战做得对。尽可能长久地谈判下去是恰当的，但是如果发现对方只是为了拖延，为了羞辱你，而不是想达成协议，那么就必须进行打击，而且打击得越重越好。”

随后，大岛打开地图，根据东条首相的指示，向德国元首通报了太平洋战局，“拿下新加坡以后，日本必须指向印度。”大岛说，他还建议德国与日本采取同一步调作战，“在日本从东面进攻印度的时候，德军如能从西面威胁印度的话，无比有利。”希特勒不肯作出承诺，但是答应要从高加索一路推进到伊拉克和伊朗，他想要它们的石油。

珍珠港事件之后，东条被胜利冲昏头脑，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决心一鼓作气，横扫东南亚，把英美势力驱逐出太平洋。而在美国方面，却如梦初醒，人心沸腾，决心要打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正是：麻痹大意损失大，绥靖政策结苦瓜；咎由自取教训深，奇耻大辱要洗刷。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七章 横扫东南亚

旗开得胜鬼发狂 南亚各国大遭殃
绥靖政策贻祸害 丢城失地折兵将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了改组。切斯特·尼米兹接替金梅尔指挥太平洋海军，这位头发斑白但看上去精神抖擞的将军，一到舰队就发现了他怕发现的东西——悲观失望的情绪。士气“低到无可再低”的程度，不少人患了“恐日病”，他甚至看到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已经使几位高级将领的头发都白了。

尼米兹召见了原来的参谋班子，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在遵医嘱吃镇静剂。“不会有任何调动，我对各位完全信任。”尼米兹说，“我们挨了一次猛揍，但是我对于最后结果毫无怀疑。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紧整顿军队，修复军舰，准备反击。”

正当美国大事进行战备动员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匆匆来到美国，他广泛接触，到处进行反法西斯的鼓动宣传。“今天是一个奇异的圣诞夜。”丘吉尔富有感情地说。他在白宫南阳台上站在罗斯福旁边，向聚集在南草坪参加传统的白宫圣诞树点灯仪式的3万名听众发表演讲。“让儿童们快乐欢笑地过一夜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玩得更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也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然后再重新去面对摆在我们前面的严肃的任务和艰难的岁月吧。我们决心要以我们自己的牺牲和勇敢使得这些孩子不致被人夺去他们的幸福，不致被人剥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安宁的世界上的权利。”丘吉尔异常兴奋，几乎一夜没有睡好。他对他的私人医生说：“这是一场新的战争：俄国打了胜仗，日本参加进来了，美国也完全卷入了。”

圣诞节过后，丘吉尔又向美国国会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妙的天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这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场内爆发了一阵自发的热烈掌声。

当天下午，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与美国军政要员举行了“阿卡迪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体制，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确定希特勒是主要敌人，认为太平洋战争暂时必须是一场固定阵地的战争，目前主要是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对敌，会议还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ABDA（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韦维尔将军任总司令。

“阿卡迪亚”会议又继续了两周。丘吉尔满心欢喜地回国了。他对会议上商定的两国某些武器生产的最后估计数字极其高兴。1942年生产坦克4.5万辆、飞机4.3万架，次年生产坦克7.5万辆、飞机10万架。丘吉尔被这些数字“灌醉了”。

丘吉尔刚一走，有关“阿卡迪亚”的各种决议就被一名日本特务搞到了。一个名叫“萨顿”的被革职的美国少校，在法拉格特广场的陆海军俱乐部里，从朋友口中套取了这个情报，把它传递给了在墨西哥城的间谍头子和智海军中佐。萨顿对其主子说，美国原先的全力以赴对日作战的意图已有极大改变，盟军将在尽量挡住日本推进的同时，集中力量击败希特勒。他甚至知道了击败日本的最后计划的详细情况：用潜艇群和大型轰炸机协同攻击，轰炸机从中国起飞轰炸九州，用潜艇把通向日本本土的水路全部切断。和智通过两个

途径把情报送回了日本：一个途径是当地的一个德国特务，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用密码向柏林发情报；另一个途径是用隐形墨水书写，墨水是花了 2000 美元从另一个德国特务那里买来的，写好后用普通的航空信写给中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本海军武官，转发东京大本营。

东条对这一情报十分重视，更加坚定了他横扫东南亚的决心。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夺取西南太平洋扫除障碍，在 12 月 8 日这一天，同时对南亚也发动了进攻。

按照东条的要求，日本南方军的作战计划主要是摧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主要基地，强占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加里曼丹）、西里伯斯（苏拉威西）、俾斯麦群岛、荷属帝汉等重要地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南方军主力包括 11 个师团和 2 个飞行集团。海军出动了第二舰队、第三舰队、南遣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陆海军航空队的第一线飞机共 700 架左右。总共约 40 万人。

12 月 8 日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以及香港发动了进攻。关岛于 12 月 10 日被日军占领，美军 330 人全部投降。同一天，日军还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岛和托拉华岛。威克岛上的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击沉日舰 2 艘。

12 月 16 日，进攻珍珠港返航的一部分日本舰只前去增援，到 12 月 22 日，美军被迫投降。守卫香港的英军吹嘘说，他们至少能守 6 个月，但到 12 月 25 日就投降了。

在东南亚，东条猎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泰国。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北与缅甸接壤，南临马来亚，是日本侵略者早已觊觎的前进基地。

1941 年 11 月 24 日，东条授权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就日军进入泰国的一切军事问题同泰国当局进行谈判，谈判应在 12 月 7 日 18 时开始，于 8 日零时以前结束。不论谈判结果如何，日军都将计划进入泰国。

由于泰国总理披汶·颂堪和海军部长都离开了首都，日本大使没有谈判对象，便于 12 月 8 日凌晨 1 时 50 分把日本的要求交给了泰国外长。3 时 30 分，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命令日军进入泰国。

12 月 8 日早晨，日本第十五军的部队从印度支那南部越过泰国东部边界，9 日天亮时先遣部队就进入曼谷。另一支从海上进发的日军，也在 8 日黎明前在曼谷附近登陆。

日军入侵泰国之后，东条政府又把同盟条约强加在泰国头上。12 月 21 日条约正式签字。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把泰国绑到它的战车上，给泰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马来亚战役是日军侵占南洋各地的最重要战役之一。担任陆上作战的是山下奉文指挥的第二十五军，由 4 个师团组成。海军专门建立了马来亚作战舰队。

马来亚在航海、经济和战略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和争霸东方的重要据点。所以英国先后调集陆军 10 万人来保卫马来亚，司令是帕西瓦尔中将。英国海军以新加坡为基地。12 月 2 日，3.5 万吨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却敌”号到达新加坡，组成了新的远东舰队，司令是菲利普斯海军中将。英国政府想以此显示威力，试图阻止日本南进。然而，日本侵略者包藏祸心，蓄谋已久，决不是两艘战舰所能阻挡得住的。

12月8日凌晨，日军开始在泰国最南端的宋卡、北大年和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黎明时，日本第三航空队大举轰炸，以消灭英国空军，主要目标是哥打巴鲁和吉打省。两天之后，英国飞机被消灭1/3左右，剩下的飞机都退到新加坡去了。第二天，12月9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由4艘驱逐舰护航，开出新加坡，准备去截击日本的运兵船。

10日正午时分，这两艘战舰在关丹以东约40英里的海面上被日本飞机发现了。这时日本航空兵的大量飞机蜂拥而至，对“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进行猛烈袭击，至14时50分，两舰全部沉没。这次战斗大大提高了空军在海战中的作用，对以后的海战有深远的影响。

号称“不沉之舰”的“威尔士亲王”号的被击沉，对英军士气影响极大。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写道：“这个损失对新加坡的精神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它预示着未来的灾难”。“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理由也同这两艘军舰一齐消失了——它现在是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也大为失望。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的确，英军失去这两艘战舰之后，士气沮丧，不堪一击，很快就退到槟榔屿。

12月18日槟榔屿陷落，月底关丹失守。

日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一开始就使英军在马来亚顾此失彼。论人数，英军超过日军一倍，但日军从未停顿下来巩固阵地或者重新集结或等待补给。他们成千地骑着自行车或坐着英国人丢弃的成百辆大小汽车，沿主要公路蜂拥而下。若遇到桥梁已断，他们就举着自行车涉水渡河，或者由工兵用肩扛着浮桥过河。

由于日本特务的长期活动，日本侵略军对马来亚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专门受过丛林战的训练，所以活动自如，进展迅速。1942年1月7日，日军攻入马来亚首府吉隆坡。1月30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了柔佛海，距新加坡不到20英里，第二天，日军开始攻打这个要塞。

新加坡位于马来亚半岛的南端，由新加坡岛及其附近的54个小岛组成。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船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世界南洋交通中心之一，也是亚、欧、大洋洲重要国际航空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以横越柔佛海峡的长堤与马来亚的柔佛州相连，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境内以新加坡岛为最大，面积538.1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91.6%，岛上地势平坦，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这时，由英国驻军司令帕西瓦尔指挥的英军有8.5万多人，而巨粮食充裕，岛上还有两个大水库，淡水供应不用担忧。但英军指挥不力，畏敌怯战。55天败退了550英里，不断的退却在部队中造成了失败主义情绪，兵无斗志。

2月8日早晨，日军开始发动总攻。战役之前，山下奉文司令召集师团高级军官进行了战地动员，为了激发将士的武士道精神，在宣读命令时，每人水杯里洒上了“庆功酒”，行传统的祝酒仪式：“在此处捐躯，死得其所，吾等必胜。”8日中午开始强渡海峡，并顺利登陆；9日，日军分两路进入岛上。

11日，山下奉文用飞机向多于他几乎两倍而且武器精良的敌人散发劝降书，他的心情是色厉内荏的。因此，劝降书的措辞颇有古时在求引渡47浪人而下的天皇招降书的味道。

“我基于武士道精神奉劝贵军投降。贵军以大不列颠传统精神为建军根

本，并正踞守业已孤立无援的新加坡，用艰苦卓绝的行动与英雄气概提高大不列颠的声威……然从此以后抵抗已属无益，促使百万居民遭遇更大的危险，置之于刀光剑影之中。战局既定，新加坡陷落已近在眼前，继续抵抗不仅徒劳，且将为城内广大非战斗人员带来直接损伤，陷百姓于更大痛苦与战祸之中，何况按我军之见，你等继续顽抗已不能再为英军增添声威。”

帕西瓦尔没有马上给山下答复。他已奉命“战斗到底”。新加坡虽然遭到了轰炸和炮击，但尚未出现惊慌失措的局面。国泰大楼的电影院前，仍有人排队买票看《费城故事》，拉弗尔饭店挤满了一边喝酒一边骂骂咧咧的参谋军官。不知道是谁用粉笔在墙上写道：“英国归英国人，澳大利亚归澳大利亚人，马来亚哪个混蛋要就归谁。”

虽然帕西瓦尔已意识到全线崩溃在即，新加坡的陷落已经决定；但是，他对投降仍下不了决心。面对着这种局面，山下奉文随即发出最后通牒：

“英军若不投降，我们就按计划进行夜袭！”

“日军能不能留在原地不动？”受了惊的帕西瓦尔问道，“我们明天上午5时30分再谈判。”

“不行！”山下故意用发怒来掩盖其内心的不安，“我要求今晚就停止敌对行动。我还要提醒你们：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我们将在晚上8时30分停止射击，今晚是否还是各自留在原地不动？”帕西瓦尔轻声地说。

“行，我同意。请在这份停战协定上签字。”山下用带有命令的口气说。

2月15日7时50分，帕西瓦尔沮丧地签了字。

40分钟后，照约定那样，隆隆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了。新加坡这个“狮子之城”、举世闻名的要塞，属于日本人了。前后70天，山下奉文以伤亡9324人的代价，自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650英里，直至占领新加坡，英军伤亡略少于日军，但是投降的军人是13万多。

这一胜利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他们再次戏剧性地向全世界炫耀了武力。在日本国内，东条政府得意洋洋地宣布，每家每户都发啤酒2瓶、赤豆1包、酒3瓶，13岁以下儿童每人发食品1盒，里面装的是奶糖、水果糖和点心。

日本报纸也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次战役的胜利。《朝日新闻》的大标题是，《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短短三天内攻下新加坡岛，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大本营报道部长大平秀雄大佐宣称：“日本乃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我庄严宣布，新加坡一陷落，战争大局已定。最后胜利非我莫属。”

马来亚战役的胜利，更加助长了东条英机称霸世界的野心。他对内阁说，缅甸和菲律宾可允许其独立，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必须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下，作为保留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据点。他说：“大东亚战争之目标，源于我帝国之基的远大理想，它将使大东亚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以日本为核心在道义的基础上确立共存共荣之新秩序。”

这一年新年，东京与往常一样庆祝了元旦。这是日本人喜爱的节日。陆军军务局长武藤中将到外务省拜会了东乡茂德。几杯屠苏酒饮过后，他说：“国民对胜利太高兴过头了，没有好处。今后的路途难走。所以，你的政策应该是尽快结束战争，第一步是把东条首相换掉。”武藤说完后告辞出来，

又去和长期以来反对东条的前首相冈田说了同样一番话。

在菲律宾的日军正按照东条的命令向马尼拉进军，那时，本间将军离马尼拉只有 70 英里左右。菲律宾战役是日本南进的重要战役之一。日本侵略者在战争初期的任务，主要是占领首都马尼拉和南部大岛棉兰老的政治军事中心达沃，马尼拉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日军进攻菲律宾的部队，为陆军第十四军和第五飞行集团，以及海军以第三舰队为主的菲律宾作战部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陆海军共拥有飞机 500 架。

在菲律宾群岛，麦克阿瑟上将指挥的美国部队有 1.9 万人，菲律宾部队有 11.2 万人，但后者大多是招来不久的新兵，装备不全，训练很差。在美、菲军队中，有 8000 名空军人员，他们拥有 200 架飞机。此外，美国还有一支小小的亚洲舰队。

在 12 月 8 日和 10 日，日本飞机连续对马尼拉附近美国的空军基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基本上摧毁了麦克阿瑟的空军。接着，日军就在吕宋北部的阿帕里登陆。此后，又在吕宋西海岸的维甘和东南部的黎牙实比登陆，美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麦克阿瑟估计到，日军主力将在仁牙因湾登陆，由于美国空军已损失殆尽，陆军也减员一半，无法阻挡，因此，美菲军队便主动撤退到巴丹半岛，凭借科雷吉多尔要塞进行防守，并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的城市，虽然这时日军离首都还有 150 公里。

1942 年 1 月 2 日，日军进入马尼拉。

东条英机的侵略野心很大，但兵员不足，力不从心。就在日军进入马尼拉的当天夜里，东条又指令南方军司令向巴丹半岛发动进攻，但因兵力不足未能得逞，且损失重大。东条对巴丹前线进展不力大发脾气。他在发给前线司令部的电报说：“处处都在奏捷，只有菲律宾除外。”这对本间雅晴司令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里的天气又闷又热，气温高达华氏 95 度。这位将军内心如煎，在巴丹战役中，他已经丢了近 7000 人，还有 1 万人患了疟疾、脚气和痢疾。他两次要求增援，两次遭到拒绝。

在美军方面，困难更多，不仅士气低落，而且粮食已成了头痛的问题。前线部队每天的口粮只有平常的 1/3。几次想通过日本海上封锁线向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运送给养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骑兵的马已经没有什么饲料可喂了，温赖特将军含着眼泪下令把所有的军马都杀了，包括他自己心爱的良驹约瑟夫·康拉德在内。

到了 2 月中旬，军内病倒的人多到了惊人程度。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而奎宁已几乎断了来源。由于饥饿和痢疾，兵员身体虚弱，仅 3 月份第一个星期就有 500 多人患疟疾住院，医生们担心疟疾即将流行，尽管还有人在说什么一支“一英里长”的船队满载给养和增援部队正在驶来，但无论是菲律宾部队还是美国部队都传诵着战地记者弗兰克·休利特写的一首诗：

我们是巴丹的孤零兵，
没爹没妈也没山姆大叔，
无阿姨无叔伯也无兄弟，
病无药，战无飞机大炮，
哪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来关照。

为了解决战场僵持的局面，3 月间，东条又向菲律宾前线增派了两个步

兵师团和两个炮兵团，大举进攻又重新开始。就在这时，美国政府为了保全面子，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了日军的俘虏，便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温赖特中将指挥，让他自己到澳大利亚去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3月11日晚，麦克阿瑟携夫人和4岁的儿子，乘着巴尔克利上尉的鱼雷艇偷偷地离开了科雷吉多尔。

在尔后紧张的45小时里，巴尔克利指挥PT—41艇穿过被日军控制的海面，于13日天刚亮的时候在棉兰老岛北岸靠近台尔蒙菠萝罐头厂附近靠岸登陆。下船时，麦克阿瑟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他对巴尔克利说，他要为他和艇上人员申请银垦章。“你们把我从虎口中救了出来，我不会忘记的。”

次日上午，麦克阿瑟的飞机在达尔文港南面30英里的巴切勒拉机场着陆。“好险！”他对在跑道上焦急地等着他的人说，“不过战争就是这样。胜败生死都只有瞬息之差。”麦克阿瑟抵达目的地后对记者说，“我来了，但是我还要回去。”

东条本来就为巴丹的僵局不高兴，得悉麦克阿瑟大胆脱逃后更加不快。他再也不相信，本间没人支援也有能力迅速取胜。东条不愿自己去向陆军参谋总长杉山直接谈，而是派他的秘书官西浦进大佐去转达他对巴丹的“悬念”。

麦克阿瑟的临阵脱逃，在美国军队中也引起了对他的蔑视，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老麦把他们抛弃了，所以当时军队中流行着一首用《共和国战歌》的曲调写的讽刺歌曲：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富兰克林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直跳。

4月2日是耶稣受难日的前夕。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天也是日本传说中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的生日前夕。夜幕降临时，5万日军已经集结待命，准备大举进攻。在他们后边，150门大炮、榴弹炮和迫击炮，准备举行这次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在前线的另一边是7.8万名饿得发慌的美军和菲律宾军，其中只有2.7万人是列为“有战斗力”的人员，而这些人中间却有3/4因患过疟疾而身体虚弱。一早，天气就晴朗。10点钟炮击就开始了。在日军强烈炮火攻击下，美军和菲军乱作一团，纷纷弃阵而逃，有的走小路，有的翻山越岭，有的则沿着海岸公路跑。到处是混乱，这些筋疲力尽的人在恐怖的驱策下迈动着脚步。

4月9日，吕宋部队司令爱德华·金少将率部投降，7.6万名美军和菲律宾军作了日军的俘虏。科雷吉多尔要塞守到5月6日。7日深夜，美远东军司令温赖特通过马尼拉电台命令菲律宾所有的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尽管如此，棉兰老的3.6万名军队只有7000人（主要是美国人）向日军投降，其余2.9万人拒绝服从命令，带着武器上山打游击去了。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菲律宾所有重要的城镇和港口，菲律宾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艰苦的抗战阶段。

荷属东印度是日本帝国主义与美、英、荷盟国争夺的主要战场。东条坚持南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侵夺南洋的重要资源，尤其是石油。为了不止荷印

当局把石油区设施破坏，不让他们把爪哇建成强大的堡垒，日本侵略者急于迅速占领荷属东印度。

爪哇处于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已有一个月了。在西面，苏门答腊遭到日军伞兵和新近登陆的一支部队的攻击。在东面，另一支入侵部队刚刚在巴厘岛附近抛锚。ABDA 联军总司令韦维尔断定，日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爪哇岛了。矮矮胖胖、头已秃顶的荷兰海军司令黑尔夫里希中将仍然认为能在海上打败日本人，不同意 ABDA 海军司令、美国哈特将军认为荷属东印度已无法防守的悲观估计。的确；开战以来荷兰舰队击沉的日本海军的吨位比美国的空中、海面与水下部队击沉的总和还多。

美国不愿在海面上作战，不但黑尔夫里希不明白，连日本人也弄不懂。日军在菲律宾以南，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们现在已占领了整个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群岛，并在新几内亚取得了牢固的立足点。爪哇一征服，东南亚的财富——石油、锡和钨矿就可以囊括了。

此时韦维尔的心情十分暗淡，他对防守爪哇已丧失信心。2月22日他电告丘吉尔：“我担心 ABDA 地区的防御已经崩溃，爪哇势难长时间防守。”当时盟国的空中防御已不再能提供有效的抵抗。在马来亚惨败后，英国飞机所剩无几；荷兰也只有几架陈旧的飞机；美国在爪哇的 111 架飞机至此也只剩下了 23 架重轰炸机和为数极少的战斗机。

3 天后，韦维尔把最后守卫东印度群岛的任务移交给了荷兰总督，自己离开了爪哇。现在，在两支正从海上逼近的日本部队面前保护爪哇的只有黑尔夫里希的舰队了。他下再抱有海上挡住日本人的希望，但他下定决心要在海上能杀多少日军就杀多少。

2月26日拂晓，日本由 56 艘输送船组成的西路进击部队离爪哇西端只有 250 海里。它由 1 艘航空母舰、3 艘轻巡洋舰和两队驱逐舰护航，由 4 艘重巡洋舰掩护。由 40 艘输送船组成的东路进击部队离目标东爪哇已不到 200 海里。它由 1 艘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护航，离它不远的海面上有 2 艘重型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这 18 条军舰的总指挥是高木武雄少将。

快到中午时，2 架盟军飞机发现了东路船队。已从哈特手中接过 ABDA 海军指挥权的黑尔夫里希，当即电令多尔曼海军少将在天黑后率领由 15 艘军舰组成的主力出港进行攻击。这支舰队虽然壮观，其实是一支拼凑起来的舰队，既没有共同的作战原则，也没有一致的作战技术，分属 4 个国家的 4 群舰只都是自成一体的、差别明显的待遣舰队。美国重巡洋舰“豪斯顿”号上一位年轻上尉当时触景生情地作了一个比喻：这支舰队犹如 11 位都是挂头牌的音乐明星，没有在一起练习过就奏起了《圣母颂》。

由于舰队没有统一的作战信号密码，多尔曼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只好通过无线电，旗语和信号灯用普通的英语传出：“跟着我，敌人在 90 海里外。”因此，高木少将对这支舰队的行踪了如指掌。随即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追击，当日舰接近多尔曼舰队时，身为潜艇专家的高木立即下达命令：“开始攻击！”在距离 1.6 万码时，日本驱逐舰放出了鱼雷。这种新设计的鱼雷的射程惊人，达 3 万码，它的氧气推进系统在开动时不会在水面留下痕迹，因为它不冒水泡。水雷放出后，顿时“德吕特”号响起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舰上的官兵还莫名其妙，随着火舌在用板上蔓延，火箭从“德吕特”上腾腾地腾空而起。原来是信号弹贮藏库着火爆炸了。

时隔不久，又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爆炸的是“爪哇”号。舰上火

势凶猛，舰首朝天。当舰身朝后倾斜沉入大海时，几百名水兵纷纷掉入水中。接着，“德吕特”号也消失了，只听得海水淹没火焰时的嘶嘶声。多尔曼和366名官兵随舰沉没。爪哇海之战就这样结束了。日本人几乎毫无损伤，而多尔曼却损失了3艘驱逐舰、2艘轻巡洋舰，还搭上他自己的性命。

在这次海战中，盟军残存10艘舰只。这些舰只在天亮时分别驶抵雅加达和泗水。4艘美舰要求逃往澳大利亚，得到批准，在早晨5时许悄悄地从“埃克塞特”号身旁驶出了泗水港，在昏暗中安全地通过了狭窄的巴厘海峡。当晚，“珀思”号和“豪斯顿”号离开了雅加达，在逃跑途中被日舰击沉。“豪斯顿”号的1000名官兵和“珀思”号的680名官兵大部丧生。

日军在孔雀湾和北岸一登陆，爪哇的盟军部队就瓦解了。英国的最后几艘军舰——“埃克塞特号”和2艘驱逐舰，企图乘黑夜通过龚他海峡逃跑。但是高木在2月27日上午9时30分发现了它们。在“龙骧”舰的俯冲轰炸机的协助下，将这3艘军舰全部击沉。午夜过后不久，最后一架美军飞机载着35名乘客飞离了垂死的爪哇，一架水上飞机从万隆附近的一个湖上摇摇晃晃地升起，飞往锡兰（斯里兰卡），里面的乘客是黑尔夫里希将军。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新入伍的少尉似的。

日本陆上部队几乎毫无阻挡地从两面包围了雅加达和万隆。指挥着已经七零八落处于混乱状态的盟军的荷兰指挥官，深知当地居民仇视统治他们的荷兰人，要开展游击战争是困难的。3月8日，他命令全体部队放下武器。最后一封发给外界的电报是从万隆的民用电讯局发出的，“我们结束了，”他说，“别了，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与马来亚和菲律宾一样，荷属东印度也丢了。石油和其他矿藏尽归东条之手。

缅甸是东条英机横扫东南亚的另一个猎取目标，其战略目的是截断供应重庆政府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开展使印度脱离英国的工作，保障日本侵略军北翼的安全。

日本第十五军入侵泰国之后，根据东条的要求即作进攻缅甸的准备，并趁有利时机轰炸缅甸南部的空军基地，以保障马来亚日军侧翼和后方的安全。

1942年1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越过泰缅国界，20日主力部队发动进攻，31日占领毛淡棉，2月4日攻下拔安。由于泰缅边境地区公路没有修好，日军运输困难，不敢冒进。但这时日军得到情报说，英军正从仰光得到增援，集结在缅甸地区的英国殖民军和中国远征军已达10万余人。同时，日军在马来亚的侵略也很得手。所以，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决定继续发动进攻，并于3月8日一举攻占缅甸首都仰光。

在日军攻陷仰光前一天，南方军总司令向第十五军司令官发出指示：在继续执行现在作战任务的同时，加强在曼德勒地区推进。3月10日，日军分两路北上，一路从勃固出发，直指锡唐河上的东吁，在这里打击英国和中国的军队，并沿东吁——曼德勒铁路北上，攻取这个军事要冲。日本空军对曼德勒进行了狂轰滥炸，使这座文化历史古城变成一片废墟。另一路沿伊洛瓦底江北上，3月22日进逼卑谬，4月20日占领乐可，然后改乘汽车，迅猛向滇缅路推进，于4月28日截断了这条公路。这一天，日军占领滇缅路的重要枢纽腊戍。

由于发生了这种灾难，英军放火烧毁了仁安羌油田设施，迅速向曼德勒

撤退，与中国军队会合。两军在曼德勒商定，中国军队退到八莫、密支那，以便同中国联系；英军向加里瓦撤退，以进驻亲敦江西岸。日军继续穷追，并沿途不断轰炸和扫射。英军销毁了轻重装备，轻装进入丛林。5月28日越过边界进入印度。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和史迪威将军带领的两个师退往印度外，大部退到中国云南南部，凭怒江天险挡住了日军的攻势。

历时4个月的缅甸战役就这样结束了。参与盟军指挥的史迪威将军在退却途中说：“我们进入了挨打的地狱。它就像进地狱那样丢脸。我们应当找出它的原因并且打回去。”

这样一来，从1941年12月7日到1942年5月上旬，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城市。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如此势如破竹，很快地打败了美、英、荷在东方的军队，原因很多，首要的是美、英、荷统治集团长期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奉行绥靖政策，助桀为虐，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加之，美、英、荷帝国主义者对东南亚各国人民长期实行殖民统治，同他们处于对立地位，没有也不敢依靠当地人民、武装人民进行战争。

虽然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总兵力大大超过日本，但兵力分散，没有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更无统一指挥，像一个没有指挥的管弦乐队，并且它们也没有估计到日本会同时从各个方面发动进攻，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

英、美、荷指挥官养尊处优，对于已有数年实战经验的日本侵略者怀有恐惧心理，怯敌畏难，使部队笼罩着失败主义情绪。加上军队本身大多由外国人组成，在异乡作战，没有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热忱，士气不振。结果日本侵略军所向披靡，迅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侵占了3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5亿。创造了日本在东方侵略的“奇迹”。

面对着日本法西斯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东条英机如醉若狂，紧步希特勒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后尘，大声疾呼要迅速建立东亚“新秩序”。正是：横归南洋鬼发狂，奸淫虏掠害四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八章 如此“新秩序”

东洋鬼子学纳粹 “共存共荣”胡乱吹

烧杀掠夺又奸淫 众怒反抗鬼所为

一手拿橄榄枝，一手拿枪炮，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东南亚的两件法宝。南进之前，东条政府就利用东南亚各国人民力求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大肆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扬言日本是亚洲的“解放者”，一旦日军进入这些国家，它们将永远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立即获得完全独立，实现“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然而，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之后，他们马上收起了伪装的笑脸，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实行极其野蛮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满以为大东亚殖民帝国的美梦即将实现。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国会演说中叫嚷：“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更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英美两国屈服为止。”并提出“战争即建设，建设即战争”的法西斯口号，以加强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尽速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

东条所要建设的“新秩序”，就是对占领区的人民进行奴役、掠夺和屠杀，使其服服贴贴地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服务。为此，首先取缔一切政党和工会，青年、妇女等组织，取消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日本军警、宪兵和密探遍布各国，严密监视和追捕爱国志士，首先是各国共产党人。稍有反抗嫌疑的人即遭惨杀。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宪兵屠杀了15万人以上的和平居民，其中大半为华人。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掠夺别国的资源。因此，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和剥削就成为东条“东亚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在1942年2月21日军政首脑联席会上，东条政府作出了所谓以“日本、满洲、中国及西南太平洋地区为资源圈”和以“澳洲、印度等地为补给圈”的决定，并制定了资源掠夺计划。计划今后15年，在南亚各国掠夺钢铁3000万吨、铁矿石6000万吨、焦炭1.2亿吨、煤2亿吨、石油2000万吨、铝60万吨、铝矾土260万吨，就在这一罪恶计划的驱使下，日本占领军把缅甸的机器设备大量运往日本；从印度尼西亚掠夺了大量的石油，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550万吨。

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的代表，紧跟侵略军进入东南亚各国，通过银行和各种商行控制着各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在占领区滥发所谓“南方开发金库券”，肆意掠夺和搜刮各国人民的财富。此外，日本殖民者为了满足军需，强制改变各国的农业经济结构，例如在菲律宾大力削减甘蔗和烟叶的生产，扩大棉花和大麻的种植面积。结果使烟农破产，制糖厂和制烟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同时还削减水稻种植面积，使大米减产，而日本占领军又恣意掠夺，结果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掠夺人力资源，日本占领军还在各国建立了大量的“劳动营”，强迫和抓捕各国劳动人民为日本侵略者修建军事战略工程。最突出的事件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劳动者被驱使去修建一条“死亡铁路”。这条铁路把缅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全长415公

里，从1942年11月动工，到1943年10月建成。在这期间，在日本侵略军刺刀的威逼下，许多劳苦大众于热带丛林中从事繁重的非人的劳动。据英国琼斯的《1942至1946年的远东》一书披露，各国战俘死去的大概有1.2万人以上，劳工死去的有25万人以上。

日本占领军在建设“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的招牌下，疯狂抓捕壮丁，强迫东南亚各国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炮灰。仅在印度尼西亚一地就被抓去30万人，开始作为“兵补”，后来以“志愿军”的名义送到新几内亚和缅甸去作战，其中90%的人都死在热带丛林中，只有少数人回到了爪哇。

到了1943年，日本法西斯开始改变统治手法。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转折，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美、英在北非登陆成功。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受挫后，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空前高涨，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严重威胁着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在这种形势下，东条统治集团认为，需要纠集“大东亚”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为此目的，日本侵略者于1943年8月和10月，相继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以宠络人心，但这种“独立”完全是假的，日本占领军当局实际上仍主宰一切。东条政府的意图只不过是把亚洲各国人民更紧地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上，驱使亚洲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付出更大的牺牲。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新秩序”的推行，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哪里镇压愈惨，哪里反抗也就愈烈。首先揭起斗争义旗的是最早被奴役的印度支那人民。

1940年6月，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以后，妄图称霸亚洲和太平洋的日本法西斯便准备南进，首先是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夺取南进的基地。9月22日，日本法西斯分兵水陆两路，从海防附近的涂山和北部的凉山侵入印度支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兵力虽然远较日军雄厚，但在失败主义情绪影响下，兵无斗志，日军一到，法军就望风而逃。法国殖民政府很快就打着白旗向日军投降。这样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

1940年9月，当日军进入凉山时，法国殖民政府的地方官吏和武装力量都仓皇逃命。越南北方的北山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趁日寇初进凉山立足未稳之际，缴获了法军的武器，举行了起义。

北山起义揭开了越南人民武装斗争史上新的一页。

1940年9月27日，起义队伍约600人攻打敌人的据点，消灭那些为人民深恶痛绝的法国殖民当局的代表，宣布政权归于人民，把没收来的越好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财产分配给人民，号召男女青年参加起义队伍。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

1941年7月29日，日本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正式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印度支那协定》。与此同时，日军就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在这种新的形式下，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于1941年10月25日发表了宣言、纲领和章程，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散发。越盟的纲领指出，它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革命政府。

在越盟的宣言和纲领的鼓舞下，越南驱法抗日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位于中越边境的高平省是越盟阵线的诞生地。到1942年，高平省的9个州中，有3个已完全被越盟控制。从1942年11月，越盟的组织已从高平扩大到凉山到北讲两省，从而成立了高（平）—北（ ）—凉（山）联省临时委员会。

联省临时委员会控制的地区，普遍成立了自卫队，到 1943 年，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越南革命也同样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后来解放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泰国也是较早遭受日本法西斯践踏的地区。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军队进入泰国。21 日，东条又把军事同盟强加于泰国政府，把泰国拴在“大东亚战争”的战车上，使泰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日本侵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桥头堡和后勤供应基地。泰国民族正陷于严重危机。从此，泰国各阶层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危机，便展开了驱逐日本强盗的广泛的反日斗争。

作为泰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泰国共产党，从它一诞生起，就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罢工、罢课，破坏日本工厂的军需生产。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强盗和披汶·颂堪卖国政府的斗争，把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建立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代表泰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披汶·颂堪政府，妄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推行其对外扩张的“大泰国主义”，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并于 1942 年 1 月 25 日向英、美宣战。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的部分亲英、美政府官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激发了广泛的亲同盟国的抗日爱国主义运动，这就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于 1942 年 1 月底创立和领导的“自由泰”运动。它的工作主要是和英美建立联系。争取同盟国的同情和支持，并准备发动反对日军的武装起义。

在国内，“自由泰”运动在摄政王比里·帕依荣的领导下，秘密进行了两年多的地下活动，并得到了以乃甘乍·帕廊古为首的“救国团”的支持。这时“自由泰”运动一面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一面积极和英、美进行联系，要求它们予以配合和协助。而英国正力图保持它战前在泰国的影响，美国则希望趁机扩展它的势力范围。

印度尼西亚是东条英机在东南亚建立“新秩序”的重点。

1942 年 3 月 12 日，爪哇的荷兰总督正式投降，被荷兰统治了约 300 年之久的印度尼西亚从此就沦陷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

东条政府对印尼政策的总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掠夺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供侵略战争之需。日本侵略军在完成对印尼的军事占领后，立即按照东条的指令把印尼分割成 3 个部分，分别置于当地驻军司令部的直接控制之下。爪哇、马都拉归日本陆军第十六军管辖，苏门答腊归陆军第二十五军管辖，荷属婆罗洲和东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归海军南方舰队管辖。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军政府成立不到两周，就于 1942 年 3 月 20 日宣布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一切政党，甚至不准对现有行政机构进行议论以及悬挂印尼红、白旗，不准唱大印度尼西亚歌。

占领当局的目的旨在使印尼日本化，各级学校中，口语代替荷语，成为必修课，废除公元纪年，改日本皇纪为纪年，每日清晨居民必须向东京“遥拜”，甚至连时钟也拨快一个半小时，采用东京标准时间。

在占领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还大力推行所谓“3A 运动”，鼓吹日本是“亚洲的光明、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一个战前曾任印尼殖民地国会议

A 是英文亚洲 Asia 的字头。

员的名叫桑萨丁的家伙出任“3A运动”的头目。但收效甚微，群众反应极为冷淡。日本占领当局认识到如欲顺利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推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必须寻求印尼有影响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支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让步。而印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长期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备受压抑，许多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流放；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幻想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荷兰殖民者垮台的时机，依靠日本人来实现印尼的民族独立、参与政权的政治目的。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协商，1943年8月建立了一个代替“3A运动”的由印尼人组成的新政治组织，称为“民众力量中心”。印尼政界和伊斯兰宗教界4名重要人士苏加诺、哈达、曼苏尔和德万托罗担任了该组织的中央领导人。一年后，日本占领当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尼的控制，削弱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又于1944年2月建立了“爪哇奉公会”，以取代“民众力量中心”。“爪哇奉公会”抛弃所谓印尼与日本合作的伪装，公开宣布该组织是为日本服务，旨在动员一切力量赢得战争，日本人也亲自出马担任领导工作。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占领当局还先后成立“兵补”和“乡土卫国义勇军”等军事组织和半军事组织。

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利用印尼民族主义势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它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得广大印尼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增加，在占领期间，工人被迫进行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不但实际工资降低，而且连名义工资也被削减了。农民必须按规定的低价把自己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以及牲畜等产品交纳给占领军。尤其严重的是，日本占领军征用大批劳力进行无偿劳役。据统计，爪哇一地被强征的劳力就有50万人，其中30万人被送往国外从事修筑铁路和其他军事工程。由于劳动条件恶劣、食物严重不足，爪哇劳工死于非命的高达23万人。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美丽的千岛之国饥荒迭起，许多人处于“青螺果腹，麻袋蔽体”的悲惨境地。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压榨和掠夺，印尼人民不断掀起反抗和斗争。在占领期间，规模较大的抗日斗争有1942年苏门答腊东部农民的抗日斗争、1943年安南由农民进行的反日抗粮斗争、1944年1月打横穆斯林的抗日武装暴动和1944年2月辛阿帕尔纳农民的反日抗粮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门答腊东部农民的抗日斗争。

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旅居印尼的广大华侨与印尼人民一起，为反抗共同的敌人并肩战斗。他们为印尼人民的抗日事业和中印（尼）人民友好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至1944年，西加里曼丹华侨与当地印尼人民共同举行两次抗日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有1200多人惨遭杀害。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雄事迹，有力地激励着印尼人民为打败日本强盗、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

1942年5月，菲律宾群岛上的美军投降后，日本帝国主义就顺利地占据了整个菲律宾。日军进入马尼拉的第三天就颁布戒严令。严禁一切抗日言行，凡采取反对日军行动的人均处死刑，并威胁如有1名日本人被伤害，就要处死10名菲律宾人质。占领者还通过御用组织“新菲律宾服务协会”和强行建立的联保制度对菲律宾人民进行严密控制。

在经济上，日本占领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力图把菲律宾由美国的农业附庸国变为日本的农业附属国。日本占领菲律宾后不久，就成立了许多名目繁

多的公司，控制了菲律宾的工业、交通、矿业和公用事业。日本缺少棉花，占领当局就不顾气候条件，强迫菲律宾蔗农砍掉甘蔗，种植棉花，而人民赖以生存的稻米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种植面积在占领期间减少了 100 万公顷。菲律宾生产的大米大部分供应了日本侵略军，广大劳动人民不得不以糠菜充饥。在日寇占领期间，大批人死于饥饿，甚至在马尼拉，因饥饿而倒毙街头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愤怒的菲律宾人民对东条大肆鼓吹的“共存共荣”的“大东亚新秩序”，斥之为“共穷圈”和“进地狱”。

日本占领当局为了保证南进计划的顺利实现，在菲律宾上演了一出“独立”丑剧，以骗取菲律宾人民的信任和当地地主、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占领期间，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中一部分人随麦克阿瑟逃往澳大利亚，后流亡到美国；一部分人则公开与日本占领者合作，他们与日寇狼狈为奸，甘心事敌，鱼肉人民。

就在美军节节败退、菲律宾资产阶级自治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党的领导人不是逃之夭夭就是甘心附敌的情况下，1940 年诞生的菲律宾共产党勇敢地担负起抗日的重任。菲律宾共产党是菲律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和组织者。菲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是菲律宾抗日武装的主力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抗日军作战 1200 余次，歼灭日伪军达 2.5 万名。菲律宾共产党人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人民抗日军主要活动基地是中吕宋，该地区是菲律宾的重要农业区。中吕宋土地高度集中，佃农占农户总数的 2/3 以上，历来土地问题严重。在中吕宋，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极其尖锐，战前农民运动就非常活跃，菲共在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吕宋的贫苦农民是人民抗日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鉴于敌对力量悬殊，人民抗日军的初期活动主要是小规模地伏击分散的日伪军，袭击军用仓库，夺取武器装备以及武装保卫农民收割庄稼，阻止日伪军抢粮等。人民抗日军的活动开始虽然规模小而且分散，但却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占领军的交通运输和粮食征集工作；尤其是其政治影响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占领当局的惊恐不安。

1942 年 9 月和 12 月，为了消灭人民抗日军，日本占领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出动三四千人的大部队对阿拉亚特地区和乌山渡地区的游击队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人民抗日军依靠群众，充分利用熟悉地形和游击战的特点，英勇机智地进行反击。经过军民团结奋战，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取得歼敌 1500 人的大胜利，并解放了中吕宋很多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抗日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建军时的 5 个支队、300 人，发展到 1942 年底的 42 个支队，总人数达到 5000 多人。

在抗日根据地内，广泛组织了人民防卫委员会，它负责组织群众保证部队的粮食被服供应，运送武器弹药，协助看护伤员，配合侦察敌情，担任交通联络。防卫会还拥有自己的地方武装队伍，平时保卫家乡，必要时参军参战，它成为人民抗日军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兵源。防卫会也是解放区的地方政权机构，每个乡村按民主方式选举 5—12 名成员组成基层防卫会。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和人民的意愿，没收了通敌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在合作的基础上开垦荒地，增产粮食，惩办奸商，稳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土地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促进了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

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人民抗日军创办了各种军政干部学校，让指战员学政治，学军事。由于缺乏教材，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成为学员学习游击战术的一本重要参考书，人民抗日军很重视文化宣传工作，他们出版了油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关报《民族解放周刊》和军报《民抗军》。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群众，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旅居菲律宾的广大华侨，从抗日斗争一开始就积极支援和参加菲律宾人民的抗日斗争，不少华侨还参加人民抗日军。在菲共和人民抗日军的统一领导下，组成了一支称为“四八”支队的华侨游击队。“四八”支队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武装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尊敬。“四八”支队英勇善战，为菲律宾人民的抗日事业和中菲人民的战斗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不仅与日，伪军作战，而且还要对付美国远东军领导的各式各样的游击队的骚扰和破坏。后者打着抗日的招牌，游而不击，专门鱼肉百姓，并常冒充人民抗日军打家劫舍，极力败坏人民抗日军在群众中的声誉，尤为卑劣的是他们还与日、伪军勾结，偷袭人民抗日军，美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和破坏菲共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从1943年起，就不断派遣特务潜返菲律宾。他们用金钱收买、武力威胁、直至个人暗杀等手段，控制了棉兰老等许多岛屿的分散零星的抗日武装队伍，并对中吕宋的人民抗日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是，英勇不屈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为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强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几乎和菲律宾的情况一样，1942年5月日本侵占了整个缅甸之后，6月初侵缅日军司令饭田祥二郎宣布实行军事管制，依靠武力推行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新秩序”。占领军司令首先把英国监禁的贫民党领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右派代表人物巴莫博士释放出狱，帮助日军助桀为虐，维持社会秩序。接着便大肆掠夺缅甸财富，剥削劳动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没收英国殖民者的财产，将保存下来的技术装备和原料直接运往日本；发行毫无物质保证的占领区纸币，就用这种纸币换取缅甸人民的财物：在农业方面，强制种植军需作物，并垄断了缅甸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横滨银行在所有的缅甸大城市部开设了分行，控制其金融业务。

日本占领军的法西斯统治和横征暴敛，戳穿了他们许下的给予缅甸自由、独立的诺言，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日军入侵之后，被英国殖民者监禁起来的很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纷纷逃出了监狱，开始秘密地组织缅甸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缅甸共产党的倡议下，1944年8月，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正式成立，参加者有缅甸共产党、人民革命党和昂山将军指挥的缅甸国防军。缅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也是同盟的组成部分。后来，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之后，爱国党、德钦党以及佛教协会等团体也都加入了同盟，使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组织的成员达到20万以上，其中正规军和游击队就有5万人。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成立大会上，29岁的昂山将军被选为主席，共产党主席德钦丹东任总书记。此后不久，又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政治纲领反映在它成立时所通过的宣言中。宣言痛斥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掠夺、专横压迫，指明缅甸人民正在日本法西

斯铁蹄下遭受苦难。宣言号召人民起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通讯工具，烧毁他们的仓库，拒绝参加战略工程，消灭叛徒和日本的走狗，建立同盟的地方支部，组织游击队和工人联合会，准备参加全国总起义。宣言最后号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缅甸，消灭法西斯主义。成立人民政府。缅甸人民的抗日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

同样，在马来亚，在新加坡，哪里推行东条的“大东亚新秩序”，哪里就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正是：“共存共荣”鬼把戏，众怒高举抗日旗。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战略转折

日军进攻中途岛 兴师动众未捞着
联合舰队遭重伤 战略转折开始了

东条英机在太平洋上接二连三取得的胜利，给日本统帅部带来的并不是团结，而是不和。当初，东条的战争计划是要攫取东南亚的原料，在占领地盘以后，应该使之成为要塞，在那里建立有利于海军长期作战的基地群。陆军仍然认为唯一明智的方针，是使这个基地群强大到足以迫使美国最终接受耻辱的和平。因此，要稳扎稳打，且忌轻举妄动。然而，这一意见却遭到了海军的反对。

日本海军在连战连捷之后，更加趾高气扬，它再也不愿意充当一个有限的防守性的角色了。他们质问：为什么不能对澳大利亚、夏威夷和印度发动攻势？进攻这些地方势必要进行大海战，那就和爪哇海战一样，定能把敌人消灭。直到现在为止，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只损失了不到 2.5 万吨的舰船，被击沉的最大军舰不过是一艘驱逐舰。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东条，实际上是支持海军的意见的。因此，海军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对陆军施加压力。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远远超出原定目标的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摧毁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与德军会师。还有一个是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供应线，假若美国军舰胆敢来冲封锁线，其结果正是与美国展开争夺太平洋制海权的决战。

海军设想用陆军 5 个师进攻澳大利亚。这个大胆的作战计划是海军司令部的一个名叫富冈定俊的大佐制定的。在一次联席作战会议上，陆军参谋本部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嘲笑这个计划。澳大利亚的面积等于日军在中国已占领的领土的两倍，要征服它，不但要使用联合舰队的主力，而且还需要出动陆军 12 个步兵师。光是运送陆军的船只吨位就需 150 万吨。富冈建议使用满洲的关东军。服部反对动用如此庞大的部队去进行一场实质上只是牵制性的行动。在日后举行的联席会上，陆、海两军又进行了争论。

3 月 13 日，东条英机代表内阁和大本营启奏天皇：“必须在国力所允许的限度下，抓住现在的战机继续扩大已有的战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长期不败的局面，同时迫使美、英经常陷于消极防御地步。对苏方针是：极力防止扩大战争对手，在对南方作战期间，努力防止引起对苏战端；在保持日、苏之间的平静的同时，阻止苏联同美、英之间的联系的加强，并尽力离间它们的关系。”

对于下一步的侵略计划，日本海军内部以及海军同陆军之间都有不同的看法，经过东条的裁决，双方都作了妥协。大本营认为，澳大利亚可能被美、英用作反攻的基地，因此必须破坏它同美、英的联系，断绝它的海上交通。为此，日本决定占领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以及莫尔兹比港。这样一来，美、日两国的战略计划正好针锋相对，这就导致了所谓珊瑚海之战和以后的一系列战事。

珊瑚海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以东。早在 1942 年 2 月，日军占领了新不列颠岛及其良港腊包尔之后，就想占领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和萨拉莫亚，尤其是它的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以便保障腊包尔的安全，袭击澳大利亚北部的飞机场，为以后进犯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奠定基础。同时，日军还企图占领图拉吉，利用它作为水上飞机基地，以掩护莫尔兹比战

事的侧翼，为以后向东南扩张创造条件。

1942年3月5日，由日本海军中将井上成美指挥的第4舰队和南海部队从腊包尔出发，6日夜在莱城和萨拉莫亚登陆，7日肃清了两地的澳军，但在3月10日早晨，停泊在两地的舰只遭到盟军飞机的袭击，4艘军舰被炸沉，7艘受伤。

对美、英来说，保住莫尔兹比港至关重要，它不仅能保障澳大利亚的安全，而且也是将来反攻的跳板，美国海军上将弗莱彻指挥的舰队，以两艘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和“莱克辛顿”号为核心，就在这一带水域活动。5月3日，日军在图拉吉登陆，并占领了这个小岛。第二天，美国飞机对它进行了袭击，炸沉了日本小型舰艇4艘。这次袭击向日军表明，美国航空母舰队在附近水域活动。

5月7日上午几时左右，日、美两国舰队在米西马岛（新几内亚东面）附近进行第一次空战，美国飞机向日本航空母舰“样凤”号（1.2万吨）投下炸弹13枚和鱼雷7枚，击中了要害，几分钟内使它沉没了。

7日下午，日本舰队司令官决心在美国航空母舰阻击日本登陆部队之前把它们消灭掉。他们挑选了长于夜战的飞行员27人，每人驾驶一架飞机于下午4时15分去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结果日机被击落10架，另有11架在夜间返航时误入海中，只有6架安全回到母舰上。

5月8日，日、美两国舰队又继续进行空战，这一天的对阵，双方势均力敌，各有2艘航空母舰和100多架飞机。战斗结果，日本航空母舰“翔鹤”号受到重伤，撤出战场。美国航空母舰“莱克辛顿”号（3万吨）受伤后，当时还平静无事；但到中午12点47分，舰内机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不可控制，于是舰上人员迅速撤离。8日下午7时56分，美国自己的一艘驱逐舰奉命发射5枚鱼雷把它击沉了。

这时，日本第四舰队指挥官井上成美决定撤回整个舰队，进攻莫尔兹比港计划无限期延迟，因为他仍怕进攻舰队遭到美国舰队的袭击。当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接到这个报告时，感到困惑不解，山本五十六命令井上继续追击，消灭残敌。大本营海军司令部也对第四舰队的行动不满，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为恼火，当即命令井上成美追击美国舰队。但美舰已漂洋而去，无影无踪了。在这次海战中，日本损失飞机105架，美国损失81架。珊瑚海之战是日本自发动战争以来，侵略锋芒第一次受挫，这对英、美军队的士气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在珍珠港被袭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就打算尽速轰炸日本本土，对这场偷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3月初，陆军远程轰炸机队，集中了24组机组人员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进行训练，练习在500英尺的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起飞。他们的指挥詹姆士·杜立德中校是个出色的人物。他既是航空学家，又是一个几次打破飞行速度记录的勇敢的飞行员。是他第一个以12小时的记录作了横贯美国的飞行，第一个完成了原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外圈筋斗的困难动作，又第一次做到了黑夜着陆。

4月1日，最后选定去执行这次任务的16个机组，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航空站登上母舰“大黄蜂”号。决定由13架飞机轰炸东京，每架投弹4枚。另外3架分别轰炸名古屋、大阪和神户。海军要把他们送到尽可能近的地方，然后从甲板上起飞。

17日，飞行员在母舰的飞行甲板上举行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

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 5 枚日本勋章交给了杜立德。拿到勋章的飞行员要求把它们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把这些勋章在一颗炸弹上系好以后，飞行员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的话，例如：“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

杜立德第一个起飞，4 月 18 日中午 12 时 30 分，他到达了目标上空。然后飞机一架接一架飞过市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没有遇到战斗机或高射炮火的有效抵抗。然后飞行员四处飞去。这次空袭所造成的物质破坏虽然不大，但在心理上却震动了这个世代代以为日本本上决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日本报纸宣称，这次空袭“彻底失败”，可是却把杜立德等人描绘成魔鬼，说他们“鬼鬼祟祟地进行非人道的、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

美国飞机对东京的成功空袭，震动了日本朝野，东条一伙尤为恼羞成怒，从而更加强了山本五十六要进攻中途岛的论据，他决心要打垮美国舰队。5 月 5 日，大本营终于同意了山本的计划，命令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

中途岛位于檀香山西北约 1900 公里，地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环礁围成泻湖，最深处约 20 米，是天然良港。该岛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由沙岛和东岛两个主要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4.7 平方公里。人口 2000 多。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 1000 毫米以上。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岛，岛上没有居民。1867 年被美国占领。1903 年起成为海军基地和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电缆站。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中途岛是美国海、空军的重要前进基地。如果没有该岛作为前方观察哨所，美国的珍珠港将无法固守，太平洋也会随之沦入日军之手。

日军把进攻中途岛的决定性日子定为 N 日。但实际上，作战行动将于 N 日前 3 天开始，届时日军将从海上向阿留申群岛发动牵制性攻击，美国人必定会派军舰前去侦查，于是南云的主力舰队就从西北面进攻中途岛。在 N 日那天，入侵部队将在近藤信竹将军第二舰队的炮火掩护下，从四面八方涌上该岛。山本的战列舰将在后面 300 海里洋面上，一俟美国舰队接近，即开入战域采取行动。随后，那些强大的战列舰上惊天动地的舷侧炮火，将实现这次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

5 月 20 日，日本海军力量已在柱岛内海锚地集结待命。这支力量拥有 11 艘战列舰、22 艘巡洋舰、8 艘航空母舰、2 艘水上飞机航空母舰、65 艘驱逐舰和 21 艘潜艇，连同后勤船只在内，总计 200 多艘。而美国方面所能集结的仅有 3 艘航空母舰、3 艘巡洋舰和 14 艘驱逐舰，日本人认为胜利唾手可得，他们决心继珍珠港之后，再给美国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按照联合舰队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进攻中途岛的舰队分为 4 支：山本亲自率领一支主力舰队，准备同美国舰队进行决战。南云忠一率领的第一航空母舰舰队担任主攻，它有“赤诚”、“加贺”、“飞龙”、“苍龙”4 艘大型航空母舰，运载 261 架飞机。另外，每一艘航空母舰上还有 36 架基地空军的驱逐机，准备在占领中途岛以后布置到岛上。另一支入侵舰队护送 12 艘运输舰，载着 5800 名官兵，准备在中途岛登陆。

15 艘潜艇组成的先遣队，要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的水域布置两道警戒线，以监视美国舰队的活动。此外，还有 3 支舰队开到北面去攻打阿留申群岛。

5月27日清晨6时，南云的航空母舰突击舰队徐徐开出了濑户内海，朝丰后水道驶去，联合舰队其他舰只上的水兵们向他们欢呼打气。次日，计划进攻阿留申群岛的舰队从九州北端的港口出发。6月3日，袭击中途岛的前一天，从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将轰炸荷兰港，以便把尼米兹的注意力引向北面。在大南边，满载着5000名进攻中途岛士兵的运输舰，也从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出发了。随同这些舰只出发的还有1艘轻型巡洋舰、1艘油船以及一支由4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掩护部队。

5月29日晨，联合舰队的其他舰只也从濑户内海出发了，扫头的是近藤信竹中将的中途岛进攻舰队，其后是以山本的旗舰“大和”舰为首的由34艘舰只组成的主力舰队。总共11艘主力战舰、8艘航空母舰、23艘巡洋舰、65艘驱逐舰和将近90艘辅助舰只向东行驶，去进行一场野心勃勃的大海战。仅这一次行动要消耗的油量，就等于和平时期海军一年消耗的油量。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选定6月7日作为N日。那时的月光将对夜间行动和登陆极为有利，预定在N日前两天，当南云的舰队仍在中途岛西北250海里处的时候，即发起大规模空袭，不仅要摧毁岛上的空军力量和防御工事，而且还将击沉附近的所有美国战舰。N日前一天，一支由藤田将军率领的小型水上飞机供应部队，准备在中途岛西北60海里的库雷小岛上降落，建立基地，一方面接应登陆部队，一方面进行远程侦察，监视诱人圈套的美国军舰的来；临。

6月7日天一亮，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在栗田少将的重型巡洋舰支援大队的炮火掩护下，对沙岛和东岛同时发起猛攻，并强行登陆。在实施入侵的整个过程中，近藤中将的主要入侵舰队将控制住中途岛南方和西南方的进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指望美国入会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同时进攻搞得惜头转向，以致在日本军队完成登陆之前来不及组织认真的抵抗。

尽管日本人玩弄诡骗诈术，想迷惑美国人，但是美国海军司令部对这暗中进行的一切却了解得一清二楚。尼米兹之所以如此，这完全归功于他的作战情报处。该处约有120名工作人员，由约瑟夫·约翰·罗奇福特少校领导，这些情报人员夜以继日地在海军大院的地下室里工作，日本联合舰队发出的密码电报，90%都被这些情报人员破译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关中途岛的一些情报是日本海军送上门的礼物。

5月20日，日本发出的一封长电被美国方面截获。这样，关于这次入侵行动的来龙去脉全都清楚了。山本的电报有15%没有收到，但这次行动的规模是显而易见的。唯一搞不明白的是这次行动的目标，因为电中只提到“AF”。罗奇福特相当肯定地认为“AF”代表中途岛。尼米兹同意罗奇福特的看法，并亲自飞往中途岛，以确定要击退一次大规模两栖攻击还需要些什么装备，需要追加多少兵力。他把所能腾出来的每一架飞机都派到了中途岛。尼米兹还把这个小岛上的驻军增至2000人，建立起3个弧形潜艇巡逻区，下令增设高射炮群。

为了证实“AF”的位置，尼米兹让中途岛发出一封假电报，明显地抱怨蒸馏水厂受到破坏，日本人果然上了钩。两天后，他们由告东京说，“AF”的淡水供应已经少得可怜。经这一证实，尼米兹决定给日军迎头痛击。随后他就调兵遣将，暗中部署。尽管他只有8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和2艘航空母舰，但他必须对付山本五十六的挑战。尼米兹召见了指挥官弗莱彻和雷蒙·斯普鲁恩斯少将。命令他们“用强大的攻势最大限度地重创敌人”，要

他们连续发动空袭，“并遵循盘算好了再去冒险的原则”。

在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离开濠户内海的次日，斯普鲁恩斯乘“企业”号驶出了珍珠港。构成第十六特遣舰队的其他舰只是6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两天后，弗莱彻也乘着“约克敦”号航空母舰率领2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跟着出发了。靠了1400名工匠的几乎是超凡的努力，预计要3个月才能修好的这艘航空母舰，只用两天就修好了。

同一天，行驶在南云后边600海里处的山本收到了3封令他烦恼的电报。最使他不安的是，11艘在中途岛附近水域巡逻的潜艇报告表明，中途岛的美军已处于严格的戒备状态，空中侦察十分频繁；还可以看见岛上有许多吊车，大概是在扩建防御工事。山本要把这份情报转给南云，但他的作战参谋坚持不让用无线电联络。此时，这支突击舰队在没有雷达帮助的情况下，正在浓雾中偷偷前进。

3日傍晚，日舰迅速地从西北方向朝中途岛聚拢，拂晓前就能抵达离目标200英里的起飞地点，当时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正在中途岛东北方向300海里之外的地方。统率这两支持遣舰队的弗莱彻正确地判断出，侦查机发现的舰只不过日本的运输舰而已，但是这说明航空母舰就在它们后面不远的地方。晚上7时50分，他朝西南方向驶去。他深信次日将是“美国海军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到拂晓，他就能驶抵中途岛北面，恰好能袭击敌军的进攻舰队。斯普鲁恩斯通过目视信号通知部下说，他们可能碰上占优势的敌人，有四五艘航空母舰，因此这次战斗的胜利“对我国是极为重要的”。他要全体指战员作好迎战的准备。

6月4日凌晨2时45分，日舰“赤诚”号上扩音器叫起来，飞行员们翻身下床，整装待命。此时，4艘航空母舰正迎风全速行驶在中途岛西北240海里的海面上。4时30分，草鹿参谋长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指挥起飞的军官挥了挥绿灯，第一架零式战斗机掠过灯火通明的起飞甲板，冲进了漆黑的天空。甲板上的人齐声欢呼起来，接着8架战斗机相继起飞，然后是18架俯冲轰炸机。没出15分钟，1艘航空母舰甲板上的飞机全部飞上天空。空中共有飞机180架，不过舰上的人只能看见一长串红灯和蓝灯朝中途岛方向飞去。

在中途岛，雷达于5时50分发现了正在飞往中途岛的第一批日本飞机。这时，空袭警报尖声呼啸，美机匆忙起飞迎战。但是，日本的零式飞机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了它们，而且在质量上也远比它们优越。15架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机被击落。日本飞机扑向它们的目标，此时已没有飞机拦截，俯冲轰炸机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频频俯冲，炸中了建筑物、油库和一个海上飞机库。当最后一架日机飞走时，中途岛的两个小岛，已经成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海。

7时整，第一批轰炸中途岛的日机指挥官返航归来，报告对中途岛还要进行第二次轰炸。因此，7时15分，南云命令第二批飞机准备进攻，卸下鱼雷，装上重磅炸弹（每个800公斤）。于是舰上人员又卸鱼雷，又装炸弹，忙得不可开交。13分钟以后，日本侦察机报告，在东北200英里处发现敌舰10艘。这个消息使南云十分震惊，因为根据他的经验，这么大的舰队后面，一定有航空母舰。

7时45分，南云又下达准备攻击敌舰的命令。这时，第一批轰炸中途岛的飞机正返航归来，但第二批飞机还在甲板上，返航飞机无处降落。南云只好命令把飞行甲板腾空出来，让返航飞机降落。9时18分，最后一架飞机降落完毕。于是，南云命令舰队向北撤退，以便重新组织，把所有的飞机都加

足油，装备好，然后向敌舰发动进攻。不久，甲板上的飞机都装上了鱼雷。由于时间紧迫，卸下的炸弹来不及送到下面的弹药库里，人们就随手把炸弹推在一边。

正在这时，美国舰队派出的两批飞机前来轰炸。日舰的 50 架战斗机腾空迎击，打落美机数十架，幸存的美机仓皇逃去。当日机回到舰上加油，水兵们欢呼胜利的时候（上午 10 时许），从美国“企业”号上起飞的 37 架俯冲轰炸机直扑“赤诚”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炸弹呼啸而下。从美舰“约克顿”号起飞的另外 17 架俯冲轰炸机也对准着“苍龙”号投弹。日本这 3 艘大型航空母舰中弹后，立即引起舰上飞机起火和在甲板上的炸弹连续爆炸，弹片横飞，穿过甲板，又在船体深处引起爆炸，机舱破坏，舰舵失灵，航空母舰东倒西歪，摇摇晃晃，舰上许多飞机不是被烧毁，就是落入汪洋大海之中。不久以后，这 3 个烜赫一时的庞然大物都变成一堆堆废铁，沉入太平洋中。

南云忠一离开了他的旗舰——正在燃烧的“赤诚”号，一时呆若木鸡。稍事镇定之后，他才把这个灾祸报告了山本五十六。而山本这时正威风凛凛地坐在他的旗舰“大和”号上破浪前进。“大和”号 6.4 万吨，装有 18 英尺 1 英寸长的大炮，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当初，山本以其强大的舰队为靠山，认为这次出征能稳操胜券，荣耀在望，珍珠港偷袭制胜的美梦又将重温。然而，这个惨败的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惊醒了他的黄粱美梦，使他默默无言，但山本无法抑制他的满腔怒火，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那样，命令所有的舰队向他集中，准备孤注一掷，向敌人发动猛攻，把中途岛夷为平地，以示报复。

6 月 4 日正午，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飞龙”号派出飞机，重创了美国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到 7 日早晨沉入海底）。而美国舰队立即报复，很快又炸沉了“飞龙”。这时，山本看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只好独自吞下这颗失败的苦果。但他还是打肿脸充胖子，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向手下所有的指挥官发出电令：“几乎已遭到全军覆没的敌人舰队正向东败退。”5 日凌晨，山本又发出命令：“取消占领中途岛的行动！”

中途岛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日本损失大型航空母舰 4 艘、重巡洋舰 1 艘、飞机 400 多架，兵员损失 3500 人，其中包括几百名熟练的空中飞行员。美国损失航空母舰 1 艘。巡洋舰 1 艘、飞机 147 架、兵员 307 人。

中途岛战役是美国海军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它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东条英机就不敢在太平洋上随心所欲地进攻了。日本人开始承认：“太平洋上的主动权已转入敌人手中。”

东条英机听到中途岛失败的消息犹如大火焚身，惊恐不已，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轻声地对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说：“切勿把这一消息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

次日，东条觐见天皇，但对中途岛失利之事只字不提。后来，在一次人数有限的帝国大本营会议上，东条建议公布阿留申作战计划，以便转移人们对海军溃败的注意力。开往中途岛去援助南云将军的舰队奉命折回北面。6 月 7 日，兵不血刃便占领了面积虽小但是战略地位重要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在美国，中途岛之战已家喻户晓。人们把这一仗当作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来加以庆祝。尼米兹将军则在 6 月 6 日的公报中声称：

“珍珠港之耻已得到部分洗雪，必须将日本海上力量打得再无行动能力，否则，不算完全报仇雪恨。如果说，我们这个目标走了一半路，大家也许能原谅我们冒昧。”

6月7日，《芝加哥论坛报》差一点把取得胜利的秘密——破译了日本舰队的密码——捅出来。它透露，美国海军人士对日军在中途岛使用的兵力，早在作战行动开始前好几天就了如指掌。在了解到“大批日本军舰在离开基地后不久就集结起来这一情况”之后，海军猜测到“其目标可能是荷兰港或中途岛”。

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相信自己的密码不可能被破译，日本海军把中途岛受挫的原因归咎于过分自信。草鹿自责不应该允许派出那么少的侦察机。6月9日，他身穿冬服，全身裹着席子，叫人把他放到小艇上，驶到“大和”舰旁边，由人把他像包裹一样提起来放在甲板上，负荆请罪。他向山本及其参谋人员亲自报告了此次战况，并要求海军向国民公布真相，因为这次战争与每个国民都有关系。

当别人都走开后，草鹿对山本说，“机动部队”应该对此次失败负完全责任，“如果你要叫人切腹以示负责，请让我来行此事，”但他又说，他真心希望再当南云的参谋长，指挥一支能为中途岛之战复仇的新的航空母舰舰队，“我希望你能考虑。”

“我明白。”山本声音嘶哑地回答。草鹿得到了原谅。说罢就上床休息去了。中途岛海战以来，山本一直为这一失败折磨得昼夜不眠，他的胃病又复发了。

在日本，东条关于对中途岛失败要保密的指示得到了贯彻。从被击沉的舰只上回来的幸存者被隔离起来。中途岛的真相既没有告诉公众，也没有告诉高级官员。6月10日，东京大本营宣布，日本终于“确保了在太平洋上的皇威”，这场战争“确系一战而成定局”。为了庆祝“胜利”，欢欣鼓舞的东京市民举行了彩旗游行和提灯游行。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中途岛一战只不过是日本要征服别人的希望破灭的开始罢了。正是：谎言骗人长不了，厄运接踵又来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章 在死亡岛

瓜岛地位殊重要日美激战血染潮
东条下令要死守尸体堆积比山高

虽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到了 350 年来的第一次挫败，然而它的陆军在入侵东南亚的迅猛突进中，却至今锋芒未折。

1942 年 5 月 3 日，一支日军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在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登陆之后，发现南面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有良好的基地可作机场，于是就运去工程兵，在那里修建机场和陆海军基地。

东条统帅部的直接目的是切断美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补给线。他们的全盘计划则是：夺取新几内亚和整个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然后再攫取远处的斐济和洛亚尔提群岛、萨摩亚、埃利斯群岛和菲尼克斯群岛，从而为他们在新不列颠岛腊包尔的那个迅速扩建中的新海军基地提供一道保护屏障。

这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则是确保美国同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巩固这个反攻基地，正好与日本的计划针锋相对，为此，就要在澳洲东北占有一系列的海，空军基地，而瓜达尔卡纳尔就是一个重要目标。为了把日军从岛上赶走，美军南太平洋司令罗伯特·戈姆利将军负责计划瓜岛攻势，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率领 1.9 万人担任进攻。这一地区的美国海、空军负责掩护和支援。

瓜达尔卡纳尔在所罗门群岛的南部，是日本控制南太平洋的前哨，北面离腊包尔 550 英里。这个小岛位于赤道南 10 度，是个宁静的地方，有 92 英里长、33 英里宽，约两倍于美国的长岛。岛上风光奇特，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奇峰、秃丘；既有珍禽异兽，也有鳄鱼、毒蛇；既有倾盆大雨，也有干旱酷热。美国小说作家杰克·伦敦曾说过：“假若我是国王，我惩罚敌人最厉害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放逐到所罗门群岛。”

一群蜿蜒起伏高达 8000 英尺的深绿色的死火山，像脊梁骨似的贯穿全岛，只有北部沿海起伏的丘陵与平原之间的狭长地带，才有可能展开军事行动，即使这块地方，也是河流纵横，山岭连绵，还长着一片片锋利如刃的杂草，人难以进入。

瓜达尔卡纳尔长期以来是默默无闻的，1576 年底，一个名叫唐阿尔瓦罗·德门达纳的年轻西班牙人，从秘鲁出发去寻找所罗门国王的金矿。在航行了 11 个星期后，他发现了这个绿色的岛屿。

不过岛上并没有什么黄金，而且又这么难以进入，所以在尔后的几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去。

当地土著人，头发蓬卷、肤黑如炭的美拉尼西亚人，对于谁来都不大在意。他们宁愿在自己人之间进行血腥的格斗和割取人头作为战利品，而不想去消灭浅肤色的入侵者。对传教士的布道，他们则是有礼貌地聆听。直到 1896 年才发生东西方之间的首次重大对抗。

那年，维也纳地理学会组织了一个“阿尔巴特远征队”，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他们穿过平原，越过山麓小丘，向一英里高的达图夫山前进。远征队的 18 名奥地利人打算攀登此山。当地土著人一再警告说，如果有人“征服”了他们这座“伟大神灵”之山，岛上所有居民都会死于非命。但是远征队置若罔闻。远征队长、奥地利著名地质学家海因里奇·福奥隆·冯·诺夫贝克回答说，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目的就是要攀登达图夫山，因此还是准备

这样做。次日早晨，正当奥地利人吃早餐时，一大群土著人悄悄地包围了他们。但由于怜悯那些即将死亡的人，土著们让他们吃完了早饭才开始进攻。奥地利人拼命抵抗，赶跑了土人，代价是自己死亡6人，包括他们英勇无畏的队长。瓜达尔卡纳尔的第一次战斗就这样宣告结束。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所罗门群岛是澳大利亚的托管地。首府图拉吉只有一家小旅馆、一个电报局，一条街有商店和几幢供官员们居住的平房。邻近的瓜达尔卡纳尔却连这样的文明都没有。这里只有几个天主教传教会，几座椰子种植园和一家“伯恩斯·菲尔普”贸易站。北部沿海只有一条小路穿过椰子种植园，内地的羊肠小道只有土人敢走，难得有白人敢跟他们走。

根据瓜岛当地官员的情报，到8月初，日军修建的机场将初步竣工。这时美国人考虑到，一旦日本飞机进驻瓜岛，那么进攻就要困难得多，所以美国海军司令部决定先下手力强。

8月6日薄暮，特纳将军的两栖部队奉命从南逼近所罗门群岛，4艘运输舰和4艘驱逐舰开往小岛图拉吉，另外15艘运输舰和货运舰则向瓜达尔卡纳尔驶去，它们由8艘巡洋舰和若干艘驱逐舰护航，在它们南面100海里海面埋伏下空中支援力量，计有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5艘重型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

进攻舰队共有舰只82艘，顶着濛濛薄雾，以12海里的时速向北面行驶。运输舰上的机械师们仔细地检查了登陆艇的引擎，水手们检查了缆绳和吊杆，平静的海面使士兵们“毛骨悚然”。陆地上吹来的微风，对长期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通常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但在此时，它却充满了丛林和沼泽的恶臭。

次日清晨，美国海空军对瓜岛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8日，美军登陆部队击溃了日本警卫队和工程兵的微弱的抵抗。至登陆当日黄昏，1.1万名美海军陆战队员登上瓜达尔卡纳尔，无一伤亡。海滩上堆满给养物资和弹药。第二天下午，一个营向机场挺进，陆战队员们发现被抛弃的即将完工的简易机场长3600英尺。日军驻防部队未吃完的饭还放在桌子上，他们除了被打死的外，大部分逃入狼地。逃跑前既没有破坏设施或各种物资，也没有炸毁道路。他们丢下许多步枪、机枪、卡车、压路机、水泥搅拌机、弹药、汽油、柴油和两个雷达示波器，以及大量的大米、茶叶、啤酒和米酒。附近有两座大型发电厂、一座机械修理厂、一座组装鱼雷的精巧的空气压缩机厂和一个制冰厂。制冰厂门上立即挂了个新招牌，上面写着：“东条制冰厂——新的老板”。

与此同时，美军也占领了邻近的图拉吉岛和另外两个小岛。

对于东条和日本大本营来说，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完全出乎意料。他们认为美军不会这么快就开始反攻，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美国将在1943年下半年开始反攻，而目前在瓜岛登陆只是一次侦察性的进攻。如果这次登陆是反攻的开始，那么敌人反正还没有充分准备，日本陆海军夺回瓜岛不会有什么困难。

8月13日，东条英机要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司令官和第十七军司令官发出指示，要动用陆军第十七军、以第八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大部为主的海军东南方面部队、以及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大部为主的联合舰队主力部队，进行东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战役，要求能迅速出动的第十七军的一部分与海军配合，消灭瓜岛美军，夺回岛上重要据点，特别是机场。然后迅速

攻占图拉吉岛。

按照东条的指令，三川的舰队开进了海水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所罗门群岛的通道，以 26 海里的时速开始朝东南方向直奔瓜达尔卡纳尔，后边激起了银光闪闪的浪花。旗舰“乌海”一路领先，接着是 3 艘重型巡洋舰和两艘轻型巡洋舰，各舰相距 1300 码，殿后的是那艘孤零零的驱逐舰，各舰都作好了战斗准备，甲板上的易燃物都抛进了大海，深水炸弹和其他非必需的东西都搬到下边，各舰舰长都把三川最后的指示传达给部下：“发扬帝国海军夜战传统，建立必胜信心。各将士冷静沉着、克尽全力。”

三川像一把尖刀插进美国两栖部队的中心，这亏得是盟军方面一连串的失误；三川曾被发现 3 次，但 3 次都没有引起美军的注意。1 点 36 分，“乌海”右舷观察哨喊道：“3 艘巡洋舰，右舷九度，向右移动！”这 3 艘军舰是美军克拉奇利的南线部队的骨干——两艘重型巡洋舰“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以及驱逐舰“帕特森”号。

“攻击开始！”三川沉着他说。这一命令立刻被传达到鱼雷发射手那里。三川的第二道命令是：“所有舰只同时进攻。”随即一串串射程 11 海里的远程鱼雷带着 1000 磅炸药，以每小时 49 海里的速度奔向“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顿时，“堪培拉”号被打得燃起熊熊烈火，之后，三川的舰队就转而攻击“芝加哥”号。就这样，三川以约 6 分钟的工夫便解决了南线部队，自己一颗炮弹也没挨上。他继续以逆时针方向绕萨沃岛行驶去寻找新的目标。

三川使美国海军蒙受了海战中最丢脸的失败。他的舰队击沉了多艘敌舰。“昆西”号在驶进“狭缝”后不久便沉入海底。一刻钟后，“文生斯”号也终于沉没。“阿斯托利亚”号和“堪拉”号在寒冷的大雨中猛烈燃烧，随后也相继葬身海底，这条海峡后来被称为“铁底海峡”。

拂晓，萨沃周围的海面漂着厚厚的一层油，到处是军舰残骸，半死不活的水兵紧抓住海面上的漂浮物下放。这次失败比瓜哇海战更惨。日本击沉了美国 4 艘新式重巡洋舰，打死美军 1023 人，打伤 709 人，自己一艘军舰也没有损失。虽然三川未去攻击运输舰，但他却使美国的所有舰只，不论军舰还是运输舰、货船以及扫雷艇，都丧魂落魄地逃向努美阿。被抛弃在瓜达尔卡纳尔和图拉吉的海军陆战队，不但缺乏武器弹药，粮食也只够维持一个多月。

在东京，萨沃的胜利掩盖了美国人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意义。尽管如此，瓜岛失陷却使海军感到恼人，他们抱着不情愿的心情非正式地询问陆军参谋部，是否愿意把这个岛上的美军消灭。陆军问这个行动需要多少陆军。海军回答说不用大多。美国人登陆只用了 2000 名左右的海军陆战队。敌人在一年内不可能沿所罗门群岛北上发动大规模反攻。

东条英机批准了陆军作战部夺回瓜岛的计划。随后陆军参谋本部便电令在腊包尔的百武将军派 6000 人扫荡瓜达尔卡纳尔。这 6000 人中，有海军特别陆战队 500 人、川口支队 3500 人，还有原计划用于夺占中途岛、此时已回到关岛的一木支队 2000 人。

川口清健将军，此时正在棉兰老岛以东约 600 海里帛琉群岛中的一个名叫科罗尔的小岛上。他一接到改调他到所罗门群岛的命令，便本能地猜到美军占领瓜岛的重要性。他召集部属开会，指着所罗门群岛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说：“这就是我们的新目的地——瓜达尔卡纳尔。我知道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确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过，我敢说这是极其重要的

一仗。这个岛将是争夺太平洋的焦点。”

两天以后，即8月15日，川口指示各队队长给士兵发足3个月的晌。他们即将去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许多人可能阵亡。“让士兵们把大部分钱寄回家，剩下的钱好好吃喝一顿，让他们在这里尽情度过最后一个晚上。”

黎明后不久，川口支队的3500名士兵，趁昨天晚上的余兴未消便登上两艘万吨运输舰。在热带的阳光曝晒下，“佐渡丸”以16海里的时速沿东南方向朝腊包尔行驶了三天三夜。虽然天气炎热，但士气很高。这支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部队，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夸口说，他们一点也不怕美国人，只要在夜间进攻就行了。他们的训练手册上写道：“美国人夜郎自大，毫无丈夫气，胆怯懦弱，最不喜欢雨天或夜间战斗。”他们津津有味地回忆，皇军如何横扫东南亚，他们这支劲旅如何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婆罗洲。

载运一木支队第一梯队的6艘驱逐舰，作为先遣队于8月18日午夜在瓜岛北岸登陆。他们和当初美国陆战队一样，没有遇到一枪一弹的抵抗。一木电告腊包尔：“我们登陆成功。”他命令部队集结待命，待其余部队在一周内抵达后再一同去夺回在7月份几乎完工的机场。

其实，一木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一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早有所准备。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认为，一次重大的反攻即将发生。他在西面、东面和东南面已作了周密的部署。待一木部队全部上岸集结时，美军就对日军团团包围，随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机枪子弹、炮弹像雨点似的射向日军，顿时尸体遍地。血肉横飞。尽管如此，日军却拒绝投降。因此，范德格里夫特决定派一排轻型坦克前去作战。当日黄昏前后，5辆坦克压过沙堤上一堆堆的日军尸体朝椰林冲去，从坦克上的37毫米炮射出榴霰弹。坦克撞倒棕榈树，击毙日本狙击兵，压死走投无路的日军。坦克履带看上去好像“绞肉机”一样。

天黑时，椰林里只剩下一小撮日军。他们团团围住一木。一木身负重伤，一手抓着军旗。“把军旗烧掉！”他下令。旗手连忙向染上一木鲜血的旗子浇了汽油，划火柴点燃。当美国坦克发现这群日军时，旗子已经着火。日军一个个被压死，一木在被压死前，拔出军刀切腹。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榴弹炮和榴霰弹的打击下，椰林内日军尸横遍野。在坦克走过的地方，履带把日军尸体压得血肉模糊。椰林里没有剩下一个活人。美军以死35人、伤75人的代价，击毙日军800多人。从此，一场旷日持久的日、美两军争夺瓜岛的浴血战就开始了。

在东京，海陆军领导人才第一次开始认真对待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军。此时，陆军企图夺回这个岛屿的计划已得到山本司令的全力支持。他把瓜达尔卡纳尔看作是联合舰队把美国舰只诱出进行海上决战的另一次机会。

在前往瓜岛途中，川口将军为了鼓舞士气，不时地向战士们作着动员。“诸位，”他说，“我认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力量。英勇的作战者从不怀疑能否取得胜利，他们是最最终的胜利者。我们要航行300海里才到达战场，我们很可能在途中就遭到敌人攻击。两天前，先遣部队曾遭攻击，但仍然乘驱逐舰在塔伊乌角安全登陆。不过，我们是受过训练的，难道不是吗？我向你们全体发誓，一定要粉碎敌人。向瓜达尔卡纳尔挺进！”

“向瓜达尔卡纳尔挺进！”

“我们庄严宣誓，一定血战到底！”一个军官高呼，举杯祝酒。

在紧张的白天，水兵们不断要陆军士兵们为在瓜岛牺牲的日军报仇。士兵们保证“要把美国佬一个不剩地消灭掉。”晚饭后，水兵们喝啤酒和苹果酒，抽烟吃糖。“海上我们负责！”一个喝醉了的水兵高喊，“岛上你们负责，行吗？祝武运长久！”说完匣和周围的士兵——握手。

8艘驱逐舰载着这伙武士道匪徒，猛烈地颠簸着，在黑暗中全速前进。它们的航迹掀起了无穷无尽的浪花。水面上，亿万萤火虫来口飞舞。在半海里外幽然出现陆地的黑影，这就是塔伊皂角。汽艇和划艇被放下水面，士兵们无声无息地上了小艇。在海军的掩护下，踉踉跄跄地走上了沙滩。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小小的萤火虫。在长长的岸上，组成一条萤光闪闪的长蛇阵。岛上幸存下来的日军见自己的军队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忙下命令似的说：“快把你们身上那些鬼虫子去掉，美军发现会把你们杀死的，”川口向驱逐舰敬礼告别，率部队进入丛林。

目下，川口手下已有3100名士兵，包括一木支队的第二梯队1100人。在亨德森机场以东10英里的科里角，他将折向正南，杀进丛林，从后面包抄机场，他打算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攻下机场。川口想：“如果在这里，在瓜达尔卡纳尔，我们打赢了，那将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川口带领部队向腹地进发，走进似乎无法穿过的丛林。他们披荆斩棘，穿过黑暗的热带森林，翻过悬崖峡谷，攀登崎岖不平的山脊。由于是在夜间行军，他们不时被树根绊倒或掉进深坑。不知谁发现了一种萤光苔藓，于是每人都把它抹点在前边那个人的背上。穿过充满腐烂植物臭气的沼泽时，有许多看不见的危险，花了几个小时才走了几百码。体力上的困难不说，还时刻害怕会遭到美军的伏击。

饮用河水使不少人患痢疾，半数以上的人又染上疟疾，他们只靠少量的干鱼、饼干和糖块维持生命。大米还有不少，但他们不敢点火做饭。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终于达到离亨德森机场7英里的马塔尼科河畔。总攻开始前，川口召集中队长、小队长，对他们说，必须在晚上突破美军防线，夺回机场。“你们必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于凌晨把他们消灭。你们为天皇献身的时刻来到了。”

当晚9时，全线一片响彻云霄的“冲呀！冲呀！”的喊声，在身上挂着神秘白十字布条的黑影的率领下，川口的2100名士兵向高地包抄过来。在整个高地上，美军的摧毁性的炮火挡住了日军最疯狂的冲锋。一发又一发的105毫米的榴弹炮炮弹，有些是在1600码的近距离发射的，在日军中炸开。天亮了，高地看来像是个屠宰场。此后，这个高地便被称为“血染高地”。激战结果，近3000名日本精锐之师，大部分被美军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从此，瓜达尔卡纳尔就被日军称力“死亡之岛”！

由于美军的严密封锁，岛上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的补给已被切断一个多月，他们大都靠吃草根、苔藓、树上的嫩芽和喝海水生存。“血染高地”一战中的余生者，个个骨瘦如柴，黑黑的头发已变成蜡黄，一抓就脱落一绺。他们的眉毛、睫毛都在脱落，牙齿也松动了。几乎整整3个星期他们谁也没有大便过，身体严重缺乏盐分，以至于连海水也觉得是甜的。一喝水就想大便，但因身体太虚弱而排不出来，不得不互相用手指去挖。便后之舒服感到无法形容！

从第一线活着回来的告田嘉七所写的《瓜岛战斗诗集》中，对瓜达尔卡纳尔日军的困苦厄运作了如下的描述：

行行复行行，
在黑黝黝的森林里。
辨不清前进的方向；
一天又一天。
夜里摸黑行进，
白天躲躲藏藏！
瓜岛的森林呀，
如此密密苍苍。
因为带来的粮食早已吃光。
吃着不知名的野草，
在难以攀登的山脊和断崖，
在腐朽的落叶层层堆集的林间徘徊彷徨。
几度跌倒又爬起，
爬起又跌倒，全身沾满泥浆。
血涔涔出，没有一片布可供缠绑，
连哄赶叮血的苍蝇都一点劲儿没有，
跌倒下来，几次想自杀……

但是，骄横狂妄的东条大本营，并不甘心失败，仍要决心夺回瓜岛。在一份缴获的日本大本营下达的文件中说：“重新占领瓜达尔卡纳尔的成败，……是敌胜或我胜道路上的转折点。”为此，日军一方面对美军展开海战，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向岛上运送援兵和物资，并组织所谓“东京快车”，即用快速巡洋舰和驱逐舰运兵，夜行日泊，以防英、美海空军袭击，利用夜幕掩护在瓜岛偷偷卸下人员和物资之后，就马上启航开走。与此同时，美军也尽量设法向瓜岛增援。虽然这时美军已准备在北非登陆，但还是把不少部队、飞机和给养送到瓜岛，顺便接走伤员。就这样，从10月份起，日、美两国在岛上的兵力都经常保持在二三万人，最多时美军竟达到5万多人。

由于瓜达尔卡纳尔所处的地位，两国增兵和输送给养都靠海运。同时，岛上的地面战斗也常以海空军的炮击和轰炸来支援。所以，围绕着争夺瓜岛的战斗，日、美两国海空军也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其中规模最大的有3次所谓“所罗门海战”以及圣塔·克鲁兹海战。这4次海战的结果，日、美各有一艘大型航空母舰被击沉。两国损失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总计在30艘以上，运输船舶的损失也很大，尤其是日本方面。双方飞机的损失更是数以百计。

这样一来，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部就向政府要求增加军舰和进一步征用商船。但资源贫乏的岛国，正需要更多的船舶来运进大量战略物资和原料以维持战争经济。因此，企划院不仅不同意军方再征用商船，而且要求归还过去征用的船只。这样，大本营和企划院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争吵不止。东条政府企图乞援于德国法西斯，想从希特勒那里取得50万吨船舶和100万吨钢材，但是希特勒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自顾不暇，结果交涉了一个月，只弄到了1万吨特殊钢材，丝毫无助于困难的解决。

即便有了船只，在美国海空军的严密封锁下，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运到瓜达尔卡纳尔也是困难重重，有一次，从肖特兰运来的1.2万名士兵和1万吨给养，只有4000名左右丧魂落魄的士兵和5吨给养安全上岸。为此，日本海军还损失了77600吨的舰只，其中有2艘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3艘驱

逐舰，外加 11 艘运输舰。因此，愈来愈多的人，对东条所叫嚷的“大反攻”的希望破灭了。

罗斯福对形势的发展感到高兴。几天工夫盟军取得了 4 次大捷：首先是苏联红军的斯大林格勒大捷，其次是美、英在北非登陆成功，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胜隆美尔，现在又加上瓜达尔卡纳尔。“过去两星期，我们听到了许多好消息，”罗斯福总统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说，“看来战争的转折点终于到了。”

在东京，在东条的授意下，陆军参谋本部依然决心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并重新改编了部队。自此以后，百武的第十七军将全力对付所罗门群岛，第十八军接替该军在新几内亚的任务，两军全归今村中将指挥。今村是陆军中被称为“智勇双全”的将军，他曾迅速攻下爪哇，并以最小的力量同伴迅速地在荷属东印度全境建立了“秩序”。如今他接到这个任务，感到忧心忡忡。

今村从前方的电报中获悉，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日军由于运输不济，平均每天饿死 100 人，而且势态在发展。为了解决运送物资的问题，海军曾提出一个代替船只的权宜之计。他们建议用大铁桶装药品或粮食，但不装满，使它刚好能在水里浮起，然后用绳子把铁桶拴在一起捆在驱逐舰的舰舷上缘。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后，将绳子割断，驱逐舰转身就走。由汽艇或让人游泳抓住绳子的一端送到岸上。但是收效甚微，在美国海空军的打击下，很少有铁桶送到岛上行将饿死的日军手里。

在瓜达尔卡纳尔，饥饿和疟疾已成了日军最严重的敌人。如果正式打起来，用不了几天就能将日军全部消灭。因此，岛上的指挥官不得不采取新的战术来对付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联合进攻。日军挖单人掩体，并得到命令说，即使阵地被敌占领，他们仍要留在洞内。每个掩体都要成为一个堡垒，各自力战。他们料想，美军不会冒这样大的损失来攻破这种游击战式的防线。

那些因病或饥饿而身体太虚弱不能战斗的士兵，则挤在海滩上，腐烂的尸体臭气冲天。成群的绿头苍蝇爬在伤病员身上，他们没有力气驱赶。士兵们列了一张死亡期限表：能站者，可活 30 天；能坐者，可活 20 天；躺着小便者，可活 3 天；不能说话者，可活 2 天；不能眨眼者，凌晨即死。

面对着这些困难，东京大本营对瓜岛的行动方针发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撤退，有的主张继续组织进攻。第一个公开提出撤退的是东条的顾问、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少将。参谋本部坚持再要 62 万吨船舶吨位一事，使他颇为不安。他对东条说，他们应该“放弃夺回瓜岛的打算”。

“你的意思是说撤退？”东条带着质问的口气问。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即使现在就撤，可能也已经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

东条听佐藤把话讲完，他虽然力主夺回瓜岛，但又深感力不队心。如今，制空权和制海权完全操在盟军手里。他无法满足参谋本部要求的全部船只。如果如数拨给，日本年产 400 多万吨的钢就得削减一半，仗就打不下去了。东条对此十分伤脑筋。

在内阁会议上，东条设法通过总共拨给海、陆两军 29 万吨船舶吨位的计划，并答应如果可能的话，以后再给，这个决议使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演变成危机。

会议结束之后，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叫东条顾问佐藤立即前往官邸，

就内阁的决定作出解释。

在田边官邸门口，佐藤听见了屋内愤怒的叫喊声，他听出那是易于冲动、性如烈火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的声音。进屋后，佐藤受到参谋本部七八个人的质问。

“八格牙鲁！”田中喊道，他正在饮酒。

佐藤转身想走。田中伸手去拿指挥刀。他的几个同事忙把他按庄，他却挣脱开来朝佐藤冲去，向佐藤脸上打了个耳光。佐藤还手，两位将军对打，几个参谋本部的军官在一旁借着“酒劲”为田中助威。佐藤挣脱开，冲出这个充满敌意的房间。

佐藤走后，冲动的田中仍然怒气未消。午夜过后不久，田中带青种种指责和要求闯进东条的副手、陆军次官木村平太郎的家里寻衅。木材是个沉着的人，他连声向田中道歉，表示“我所作的努力不够”，说服田中回家，次日清晨，田中尽管已经酒醒，但仍然继续进行攻击，田中这一闹，倒使东条横下了心，他让佐藤通知参谋本部“不管怎样”，陆军只能得到内阁决定的吨位数。

参谋本部已经明白，东条的最后通牒意味着最终停止瓜达尔卡纳尔的战斗。参谋本部各部长举行紧急会议，会后他们不经邀请集体驱车前往首相官邸。午夜前不久，东条身穿和服接见了他们。田中请求东条重新考虑参谋本部的要求。东条冷静地毫无冲动地加以拒绝。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半个小时，声音越来越大。田中控制不住自己，喊道：“你准备怎样对待这场战争？这样下去我们要失败的！科诺八格牙鲁！（你他妈的混蛋！）”

东条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你用的是什么骂人的话！”他说。

整个房间安静下来。最后，东条以参谋总长的身分说：“这是参谋总长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事后，田中因侮辱上级正式受到惩戒处分，并被解除作战部长职务。

日本大本营虽然在 11 月中旬专门建立了第八方面军来加强瓜岛的作战指挥，并从朝鲜和中国华北抽调两个师团准备去增援，但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同时在新几内亚方面，美，澳军队又步步紧逼。这就迫使东条和日本大本营不得不于 1943 年 1 月 4 日作出从瓜岛撤兵的决定。

据英国历史学家亨利·莫尔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一书披露，美国在瓜岛作战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先后累计约 6 万人，其中仅有 1592 人战死在岛上，而日军在陆上、海洋和空中的战斗中阵亡的有 5 万多人。就这样，持续半年的瓜岛战役就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在 1943 年 1 月份里，日军还退出了新几内亚东北海岸的布纳和戈纳，并永远放弃了占领莫尔兹比港的企图。

关于这次失败，正如山本的参谋长字垣将军在 1942 年最后一篇日记中所写的：

“我们旨在入侵夏威夷、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以及控制印度、挫败英国东方舰队的战略，成了一场黄粱美梦。此外，对莫尔兹比港和瓜达尔卡纳尔的占领也受挫。回顾往昔，百感交集。”

从 1943 年年初开始，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逐步退缩，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这时，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和朝鲜人民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新阶段，东条英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正是：西风落叶霜来到，天寒地冻鬼难熬。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一章 山本之死

瓜岛失败不死心 策划报复由山本
联合司令亲出马 呜呼哀哉命归阴

1943年4月18日，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被美国空军击毙的日子。这位曾经在太平洋上兴风作浪，并为日本取得赫赫战功的海军大将之死，无疑对东条英机称霸太平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东条对此痛哭不已。

2月初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撤退后，太平洋一度沉寂，同盟国和日本都在策划下一步的行动。早在1月份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决定把较大比例的兵员和物资送到太平洋战场，以保持攻势。在同年5月美、英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太平洋上“打击日本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封锁海防线，特别是不让日本取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持续不断地轰炸日本的城市；一有可能就打进日本本土，但是，由于西线战局吃紧，英国还不可能从地中海战场抽调足够的兵力来完成它所承担的任务，所以盟军首先在太平洋上从3个方向发动有限的进攻，即北太平洋的部队要把日军赶出阿留申群岛；中太平洋部队合作攻打腊包尔；然后西南太平洋部队沿新几内亚北岸向西推进。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指挥，美国海军参谋长厄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把美国所有的海军编为若干舰队。在太平洋地区，以珍珠港为基地的中太平洋海军编为美国第五舰队；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海军编为美国第三舰队，司令为哈尔西；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所辖的少量海军编为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是金凯德海军中将。金凯德还负责指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部分海军。

经过缜密的研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攻打腊包尔的战事由麦克阿瑟指挥，攻打所罗门的战事由阿尔西指挥，所有的海军部队都受尼米兹海军上将统帅。准备就绪后，3月2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作战命令。指示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新几内亚以东）建立飞机场，占领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萨拉莫亚和芬什哈芬，并征服所罗门群岛，这样，在西南太平洋，盟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沿所罗门群岛北上；一路从新几内亚西进。

在日本方面，日军虽然在瓜达尔卡纳尔遭到惨败，但东条一伙并不死心，他们要巩固自己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战略地位，阻止盟军的进攻。

1943年3月初，日本第十八军第五十一师团的部队6900人，分乘8艘运输舰，在8艘驱逐舰和若干战斗机的掩护下，从新几内亚的首府腊包尔开往莱城，船队航行到俾斯麦海的达姆波尔海峡时遭到美国空军的3次袭击，7艘运输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沉，3664人葬身海底，2427人得救后返回腊包尔，只有800人到达了莱城。

这次失败对日本大本营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它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新几内亚，集中陆海军的力量在此方向建立作战基地。3月25日，大本营又制定了“陆海军在东南方作战的中央协议”，责成今村均大将指挥的第八方面军和联合舰队去执行。

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根据这个协议，集中了300多架飞机，准备对瓜岛和新几内亚盟军的舰艇进行空袭，4月3日，山本带了字垣、黑岛、渡边以及其他重要幕僚，从太平洋中部加罗林群岛的首府特鲁克（联合舰队

司令部所在地)出发,来到腊包尔,亲自指挥这一军事行动,4月7日,瓜达尔卡纳尔遭到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集中的空袭,参加空袭的有224架轰炸机和几十架战斗机。与通常一样,驾驶员回来后,兴奋地报告战果;但也与通常一样,实际上并未造成多大损失,只炸沉1艘驱逐舰和2艘小军舰,击落7架美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

山本于是把注意力转向新凡内亚,在4天内连续在奥罗湾、莫尔比斯港和米尔恩湾发动3次大袭击。飞行员报告击落敌机175架,击沉敌巡洋舰1艘。实际上,盟军只损失1架飞机、1艘运输机、1艘商船,另1艘商船被炸后搁浅。然而,飞行员的报告却使山本误信他的攻击计划已经达到目的。

为了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山本计划于4月中旬率领他的参谋人员飞往所罗门群岛北部去视察军事设施和鼓舞士气,他将首先在布干准尔南部的小岛巴拉尔稍作停留,视察经历了瓜达尔卡纳尔的苦难后正在休养的丸山师团的士兵。他要亲自对他们所作的牺牲表示慰问。

今村将军对山本此行感到担忧,给山本讲了他自己在布干准尔附近险遇一架美国战斗机差点丧生的经历,但山本却坚持己见,就连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司令也未能劝止他,渡边中佐草拟了日程安排,亲自把它送到第八舰队司令部。他要求派信使把日程表送去,但通讯军官却说,必须用无线电报发出。渡边不同意,担心美国人能截收到电报,并可能破译。通讯军官说不可能,“这部密码4月1日才启用,不可能破译。”

渡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电报发出片刻就被美国人截获,并报送到珍珠港的战争情报总部。那些曾为中途岛战役胜利出过力的人们,在地下室里干了将近一个通宵。4月14日清晨,他们已把电报破译成日文明码。海军陆战队的外语专家们填写上电文中的一些外文空白,并辨认出密码代号所代表的地名。例如RR代表腊包尔,RXZ则代表巴拉尔。

上午8时2分,舰队的情报官员爱德华·莱顿中校特意到尼米兹的办公室向他作了汇报,尼米兹上将获悉,山本将于4月18日早晨6时,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离开腊包尔,于8时抵达巴拉尔岛。尼米兹看完电报后抬头笑道:“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活捉他?”

“他是他们之中出类拔萃的。”莱顿答道,“山本是日本少壮派军官以及士兵崇拜的偶像。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你是清楚的,这将使所有日本人大吃一惊。”

“我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物色到一位更有才干的舰队司令。”尼米兹说,“山本与其他任何日本海军将领相比都是出人头地的。”

尼米兹下决心活捉山本五十六,他随即电告这个地域的司令官哈尔西将军,并授权他起草作战计划。这个任务既得到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批准。4月15日,尼米兹批准哈尔西的作战计划,并祝他“顺利、丰收”。

4月18日是星期日,黎明时天气晴朗、潮湿。山本还是那样有规律,已作好出发的准备。他的副官劝他穿绿军装,不要穿目标显眼的白军服。当他走近他的座机时,他转向腊包尔的海军司令草鹿任一中将,交给他两个卷轴,请他转交第8舰队的新任司令。这是山本书写的明治天皇的诗。

山本的座机于东京时间6时整离开腊包尔。同机的有他的秘书、舰队军医长和航空参谋,字垣参谋长乘坐另一架三菱制造的轰炸机,机内还有另外几位参谋人员。渡边中佐眼看着两架飞机消失在空中,对没有能够与他们同

行颇感失望。

两架轰炸机在 5000 英尺高空向南飞去，相距之近使人担心机翼要碰撞。有 6 架零式战斗机在他们上面护航。当布干维尔在左方出现不久，机群开始降低高度，准备在卡希利机场着陆。

南面，亨德森机场起飞的 16 架编队严密的 P—38 “闪电式”战斗机，正以 2000 英尺的高度从南面朝布干维尔飞近。机群指挥官约翰·米切尔少校看了看表：9 时 34 分。他们在机翼上带着副油箱，只靠一个指南针和一个空速计航行，沿间接航线在公海上空飞行了 600 英里，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准时飞抵迎击点。山本的座机很有希望在一分钟内就要出现，它应该出现在西面 3 英里处。但却看不见一架飞机。

“国籍不明飞机 11 时方向，”米切尔的一个飞行员打破无线电沉默低声报告，“高度大。”

米切尔数了数敌机有 8 架。两架是轰炸机。当山本的座机准备降落时，美机蜂拥而上，对准它猛烈开火。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进行护卫，但已无济于事，山本座机中弹坠毁，策划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臭名昭著的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就这样毙命于布因城北的莽莽丛林之中。

第二天上午，哈尔西在军官例会上宣读了这一胜利的电报。海军少将特纳欣喜欢呼，拍手叫好。“得啦，凯利，”哈尔西说，“这有什么好的？我原想把那个坏蛋用铁链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街示众，让你们踢他，那才好呢！”他命令不得把此事泄露给报界。不然日本人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

山本五十六之死，在日本引起了难以估量的震动，渡边中佐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主持了山本遗体火化仪式。他把山本的骨灰装进一个垫着木瓜叶的木盒。在特鲁克，他登上“武藏”舰悲伤地护送骨灰回国。5 月 21 日，这艘超级战列舰抵达东京湾。电台广播员以悲痛的声音向全国宣布：山本“在一架军用飞机上壮烈牺牲”。

山本的骨灰被分成两份装入两个骨灰盒，一盒被送回山本的故乡长冈安葬，另一盒则国葬，国葬仪式于 6 月 5 日举行，这是日本另一位海军英雄东乡元帅的葬礼纪念日。东京有百万市民排列在街道两旁观看送葬队伍，渡边中佐手捧山本的指挥刀，走在拖载骨灰盒的炮车后面。骨灰葬在日比谷公园。

对东条英机说来，他的亲密朋友、“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悲剧性地死去，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紧接着又宣布美军夺回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的不吉利消息，更使他悲愤不已。他指令宣传官们，要把山本的死和阿拉斯加附近的这个荒岛上阵亡的 2351 人的事迹，渲染成鼓舞人心的史诗，使他成为“提高全体国民战斗精神的刺激剂”。

最近太平洋前线一连串失利的消息使东条大伤脑筋。他想：“如果再继续打这样的仗，那只会提高敌人的士气，如同瓜达尔卡纳尔一役那样。中立国就会动摇，中国就会受到鼓舞，对‘大东亚共荣圈’诸国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难道我们就不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用某种方法与美军对抗并打败他们吗？”

生产的缓慢及大幅度下降，也加剧了这种局势。战场上的物资损失再也无法得到补充，就连海陆两军的最低要求也不能满足。各占领区的司令官没有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即使生产出东西，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能运回日本本

上，因为日本的商船数目有限，美国潜艇又对不远千里北上的船只不断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原料不足造成的这种生产瘫痪状态，再加上层层控制的机构重叠和互不协调，使情况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动员却在加速。日本的生产在战争的刺激下增加了1/4，美国却增加了2/3，日本制造业的效率只有美方的35%。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若以1940年为100，到1943年初只增加了2%，而美国增加了36%。另外，美国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扩展生产的计划，日本却未能多样化。军人生产虽然扶摇直上，但却牺牲了非军事项目的生产。

船舶仍然是最关键的问题。阿图岛的陷落以及从它附近的基斯卡岛的秘密撤退，打乱了东京政府精心制定的预算。阿留申群岛中这两个桥头堡陷落，千岛群岛的防御就必须加强，增加兵力。所有这些会大量分散南方被围困地区的运输能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东条在6月间召开了军政联络会议。会议得出结论，必须把千岛变成一个要塞，尽管这样做意味着损失国力：钢铁生产将减少25万吨，铝减产6000吨，煤减产65万吨。随着危机的加重，海陆两军之间为争夺战略物资而进行的互相削弱的斗争加剧了，丰田辅武海军大将埋怨陆军作战不力，称陆军为“马粪”、“饭桶”，他公开说，宁愿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愿把她嫁给陆军军人。

几天之后，6月30日，关于船舶问题的辩论，由于宣布了所罗门群岛之战已告终结而突然变得黯然失色。哈尔西将军及其两栖部队，已采取蛙跳战术开进“狭缝”向通往所罗门群岛中心的新乔治亚岛挺进。日本驻军虽已严阵以待，而且很快就到达的增援部队，使兵力多达5000人，但守军却无法击退蜂拥上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陆军师。全岛被占领只不过是几个星期内的事了。这样一来，美国人与战略要点布干维尔之间便不会有多大的距离。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天皇召见了首相。东条晋见完毕后，为天皇陛下的“严重关切”所震动，忙要佐藤贤了将军去问问陆军参谋本部：“他们打算在哪里堵住敌军？”

“我们休想得到答复。”佐藤回答说，“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不可能订出堵住敌人的计划。”东条沉默下来，但他的脸色再也无法掩盖他的苦恼。

“宫里怎么样？”佐藤问。

“天皇对这一切非常担忧。”东条喃喃他说。“我去找参谋长杉山谈谈，你去找作战部长谈谈，必须坚持要他们订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明确说明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挡住敌人的反攻，我们最后一道防线在什么地方。”

佐藤同意这个意见，并且以迫切的心情劝告：“我们在贯彻政治策略时，也要牢记这一点。”

在连吃败仗的情况下，东条苦思冥想，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大东亚“共荣圈”。当前对占领区需要进一步贯彻“怀柔政策”，给予某些国家以假独立，诱使他们和日本“团结合作”，实行“以战养战”，共同抵御盟国的反攻。

东条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一贯全力支持侵华战争，疯狂推行“强化治安”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如今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想，若从中国和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取得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必须接受重光葵的建议，把苏州、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归还汪精卫政府，并洽谈签

订新的条约。对中国共产党加紧围剿，对重庆蒋介石政府加紧诱降。与此同时，给予缅甸、菲律宾某种程度的“独立”，竭力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人民心中的形象。为此，重光被召回东京担任外相。在国会中，东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讲什么“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要把亚洲“解放”出来，给予“政治自由”，大力推行所谓“亲善睦邻”政策。

在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骗政策的掩盖下，7月，东条首相亲自出使东南亚。在新加坡，他与占领军物色的缅甸元首巴莫博士会晤，东条答应将掸邦大部分交还给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但是，其中有两部分划归泰国。

巴莫百感交集。“把掸族人及其土地瓦解，无论是缅甸人还是掸族人都不会完全高兴的。”东条表示抱歉，但日本已答应把两部分土地给泰国作为结盟的代价。

“我们也是你们的盟友呀。”巴莫说。

“另外报答缅甸。”东条试图不了了之，开玩笑地答应。

东条到新加坡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他要与印度反对英国而与日本友好的领导人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会谈，鲍斯与甘地和尼赫鲁不同，他认为只有武力才能使印度获得自由。鲍斯身材高大，比东条和巴莫都高出一头，热情激昂，能言善辩。他来新加坡的目的，是来招募在马来亚战役中投降的数以千计的印度兵。这些士兵已表示支持他的行动，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同意他担任印度独立联盟的领袖。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满腔热情地对他的新兵说：“1939年，法国对德国宣战，开战时，德军只喊一个口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1941年12月，当英勇的日军开始远征时，他们也只喊一个口号‘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们，‘到新德里去！到新德里去！’就是你们的战斗口号。”

东条让缅甸独立的诺言于8月1日实现。上午11时20分，在政府大厦，缅甸被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由巴莫博士担任“国家元首”，当天下午，巴莫宣读了一份用缅文书写的宣言，向英国和美国宣战。他说：“我们既然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独立，我们必须用这场战争来保卫它……缅甸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站在前线……很明显，我们必须执行前线政策。”号召缅甸人民在保卫所谓东南亚的战斗中同日本合作。

10月14日，菲律宾宣布独立；一个星期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由鲍斯担任国家元首。这些新政府都是日本的傀儡，他们对日本摇尾乞怜，大加捧场，在11月初东条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达到了顶峰。缅甸、泰国、菲律宾，伪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都派代表到东京出席了会议。鲍斯则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会议。

11月5日，东京国会大厦议事堂的庄严布置同与会者的热情成了对照，会议桌上铺了蓝色的纯毛哗叽，桌子摆成方马蹄形，两旁是三棵盆栽树。东条作为主席与其代表团坐在马蹄的前端，坐在他右边的是缅甸、伪满洲国和南京汉奸政府的代表，左边是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的代表团。

东条首先致辞，他说：“大东亚各国，由于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各方面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本人坚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大东亚的稳定，建设共存共荣新秩序。”

南京伪政府中第一号大汉奸汪精卫宣称：“在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邻邦，热爱东亚。我们中国的口号是再兴中华，保卫东亚。”

接着发言的有泰国的旺·威泰耶康亲王、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和菲律宾的“元首”劳雷尔。这位菲律宾人的感情明显地溢于言表：“只要我们紧紧地、坚如磐石地团结在一起，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或拖延 10 亿东方人获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以及缔造自己命运的机会，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不会抛弃大东亚各国人民，上帝将会降临人间，与我们一起流泪，为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英勇行为增添光辉，使我们能够解放自己，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自由昌盛。”

缅甸“元首”最后一个发言是东条的精心安排，“这样一个时刻所产生的感情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夸张。”巴莫热烈他说：“多亏日本，我们才能又一次得到这个真理，并按照它行动，亚洲人当然应该收复亚洲，在这个简单的真理中寄托着亚洲的命运……”

“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亚洲人，发现了我们的亚洲热血，也正是这股亚洲热血将拯救我们，把亚洲归还给我们。因此，让我们前进，走完我们的路程，让 10 亿东亚人朝着东亚将永远自由繁荣并将最终找到他们归宿的新世界前进。”

奴才们的讲话，巴莫的颂歌，对东条说来，这几个小时是他的生涯中最满意的时刻。东条英机巧妙地操纵着整个会议的进程，在他那圆胖的脸上，不时地露出奸笑。他不只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军事联盟，他自己也被“泛亚精神”所陶醉了。

印度“临时政府首脑”鲍斯第二天下午的发言，使最后一次会议达到新的高潮。

“我认为，在日出之国举行这次会议并非偶然，这决不是世界第一次为了寻找光明和指导而向东方求教。在这个世界上，曾有人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在其他地方试图这样做，但他们失败“对印度说来，除了与英帝国主义作不妥协斗争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即使其他国家觉得能与英国妥协，至少对印度人民来说是绝不可能的。与英国妥协，意味着与奴隶制度妥协，而我们决心不再与奴隶制妥协。”

最后，与会者一致通过“共同宣言”，号召“在正义与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新秩序；在互惠基础上，努力加速发展经济；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东条对他导演的这场“大东亚新秩序”的闹剧十分满意。《日本时报》称这次会议是“骨肉兄弟的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盛会。

就在东条搜罗残兵败将举行傀儡会议的前后，苏、美、英三国为协调作战，先后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两次会议的宗旨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联合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

1943 年“是整个世界大战中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在苏德战场、北非一地中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反法西斯同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转入反法西斯同盟国手里，形势大好。但是，退却中的德、日法西斯军队尚在顽强抵抗，妄图把战争拖延下去。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战场上的每一重大胜利，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何利用战局的胜利转折，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便成了反法

西斯同盟主要国家的迫切任务。

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希望罗斯福、丘吉尔尽快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国法西斯东西两线作战，加速其灭亡。美、英统治集团虽然一再拖延，但看到苏联军队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正乘胜西进，希特勒法西斯暴政的覆亡已指日可待。因此，经过充分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霸王行动”作战计划，决定美、英军队大约于1944年5月1日在法国北部登陆，进攻德国心脏地区；并且准备在德国崩溃以后的12个月内，击败日本。

关于对日战争，斯大林对美、英首脑说：“我们欢迎你们在太平洋取得的成功，遗憾的是，因我们东线需要军队太多，目前苏联还不能发起对日战争。但是，一旦把德国打败，苏联即向西伯利亚增兵，然后我们将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三国首脑会议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东条英机一时呆若木鸡，远远超过山本五十六之死对他的打击。正是：东京魔酋仰天位，欧亚风云滚滚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

东条南进固后方 妄图消灭共产党
治安强化施毒伎 清剿掠夺大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妄图把华北变成他的“大东亚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动员了大量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疯狂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但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东条英机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随着日寇占领区的扩大和占领时间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发觉，仅仅依靠屠杀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在其占领区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即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政策。一般说来，日寇在其新占领区，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的地区，仍以屠杀为主；而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则以“怀柔”为主。

1938年底，日寇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大成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治安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敌人还着重怀柔政策的实施，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并建立和发展各种伪组织，企图以此巩固其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敌人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所谓怀柔政策，即加紧欺骗宣传，企图使游击区群众奴化；在恐怖政策方面，则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年春，日寇在我冀、热、辽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350多公里长、30多公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这一带村庄的人民都集中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围墙，这种集中起来的村落，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用严刑逼供，分别判以“思想犯”、“政治犯”和“运输犯”等，任意加以杀害。“人圈”内的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日罚做苦役，“人圈”附近5公里以内的土地，禁止种植，以利其防守。同时，敌人在此地区内，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反复进行搜索，名之曰“剔抉”。敌人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如热河南部的马尾沟，曾被反复地烧杀过14次。这个例子，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所犯下的无数罪证之一。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的两年中，日寇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至6月，其主要活动是加强占领区的基层组织，强化“自卫团”，调查和肃清“不稳分子”，并扩大日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达“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10月，其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之间、村与材之间的联防制，并在其省、道，具各级伪组织中建立“治安强化运动”的执行机构。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条为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了解放区的扫荡、烧杀和劫夺，第四次从1942年4月至6月，

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第五次从1942年10月至12月，敌人大肆喧嚷所谓“建设华北”、“肃正思想”，并配合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灭绝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沦陷区的人民肆行经济并吞和掠夺。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华北设立了20余家银行。这些银行滥发没有准备金的伪钞，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日寇对农产品的掠夺是极其残暴的。掠夺方式，一种是低价收购，例如优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65元，而日伪统一收购的价格为38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收购实际上和抢劫差不多，而这种收购又是由敌伪机关统一强制进行的，因此广大农民都逃不出敌伪贪婪的魔手。日寇掠夺的另一种方式是无代价的征发，例如当日军给养困难时。便“就地取粮”，肆意向人民掠夺或横征暴敛。

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到1942年6月以前，华北被劫走的壮丁约为600万人，再加以敌人残酷的屠杀和奴役，遂使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减产，广大农民无以为生。

在工矿业方面，开始日寇通过“军管”和“委托经营”（即由被委任的“会社”经营）两种方式，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但是，敌人这种“管理”，“经营”的办法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机器厂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人民不满，加之敌人资本的缺乏，结果使大部分生产和商运陷于停顿状态。因此，敌人也感到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随着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提出，日寇对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掠夺，改用了所谓“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据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合作”政策的规定，“华北开发会社”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敌人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资本家与之“合作”，并诱使国民党投降。但是，这种所谓“中日合作”，实际上不但所有企业的经营权全部归敌人掌握，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中国资本家得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残羹剩饭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军事政治攻势，宣扬“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反动谬论。与此同时，敌伪还把一切封建落后的会道门都利用起来，宣扬迷信，欺骗群众；大量散布黄色毒素，在敌伪的报刊、小说、电影、戏剧里，充满色情，恐怖等荒诞离奇的情节，海淫海盗，企图以此来腐蚀沦陷区人民，磨灭他们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双役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在经济生活上，沦陷区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由于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沦陷区的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以北平为例，1939年1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1943年1月，就涨到一元七八角；1944年的端午节，更涨到五元多。日寇为掠夺更多的粮食，于1942年先后在某些大城市实行了粮禽“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仅能吃豆饼，麸子。豆腐渣等牲口饲料。日寇在北平，最初还配给些粮食，到1943年，配给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所谓“混合面”。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是经常的。仅据敌伪报纸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年内，每天因饥

饿死亡的人数平均达 300 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 20 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坑中去做苦工。井陘青石岭等 12 个村庄，经常出伙 1000 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 年 3 月，河北省内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 月，唐县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 11 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 个伪县长及敌军 60 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 年 2 月，山西阳泉 17 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包围了敌军司令部 3 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博山 2000 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入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 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 600 多包大米运走；4 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 200 包大米；11 月，江苏如皋县农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 5000 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 和 1942 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早在 1939 和 1940 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较长，到 1941 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们集中了 64% 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笼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 1942 年 10 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 7700 余个，封锁沟壕 11860 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 6 倍，地球外围的 1/4。”以冀南区为例，1939 年该区有敌据点 50 余处，1942 年增至 800 多处，最高时达 1100 多处，全区平均每 14 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每 3 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 年底计长 2000 公里，1941 年春增至 2500 多公里。1942 年又增至 4500 余公里。与此同时，敌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锁沟墙也增加到 1600 多公

里。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株，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

就这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10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给解放区军民进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几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在日、伪、蒋对解放区夹击的形势下，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1941和1942两年中，解放区缩小了，人口由1亿下降到3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

面对东条英机发动的疯狂进攻，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同残暴的敌人展开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也在严峻的残酷环境中受到锻炼。

1941年8月，日寇集中10万人以上的兵力，在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13路出动，企图将我主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其扫荡计划准备在4个月内完成。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台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我军指挥部当时估计到，在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历时半个月到达我中心地区时，我主力已转移到敌后，我后方机关也早已疏散隐蔽，而游击队和民兵则到处袭扰敌人。日寇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9月起，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候反戈一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9月下旬，各路日军屡次失利，造成困顿混乱，我军又适时地集中了相当兵力，对敌人予以沉重打击，并收复了阜平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各部队同时出击，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占领了300多个敌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铁路线不时为我切断。

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军主力被迫自9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到10月中旬全部撤走。敌人撤退时，我军沿途设伏，予以重大创伤。在这次反扫荡中，总计我作战800多次，毙俘敌伪军8000多名，破路400多公里，击毁火车3列。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并以“狮子捕鼠，效力不大”来解嘲，此次敌人共烧毁我房屋 15 万多间，掠夺我粮食 2900 多万公斤，抢走我牲畜 1 万多头，残杀我人民 4500 余人，抓去 1.7 万多人。

在这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9 月 25 日，敌人企图以 2500 余人的优势兵力围歼我一个团于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当日军到达狼牙山时，我即以一个班的兵力据守险要，掩护全团安全转移。敌人对这个班施以数千发炮弹猛轰，并以优势兵力数度猛扑。但我战士英勇顽强，全班战士仅剩 5 人，仍坚持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在无法突围时，5 位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并将枪摔坏，在高呼：“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之后，纵身跳崖，结果 3 名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壮士被挂在崖中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

1942 年，是解放区军民斗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达 75 次之多，其中最残酷的一次是“五一大扫荡”。当时日寇集中了 3 个师团、2 个旅团，总计 5 万以上的兵力，从 5 月 1 日起，以两个月为期，对冀中解放区进行全面扫荡。在 8000 个村庄 1.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了 1500 多个据点。5000 公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有 700 辆汽车巡逻。敌酋冈村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用故留空隙“张网捕鱼”的毒计，企图歼灭我主力。在敌人合击时，我冀中部队已跳到敌人的腹地铁路线和大城市附近去，突然袭击敌后方，使敌人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仓皇后撤援救。战役后期，敌人进入全面“扫荡”时，我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留在当地坚持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武工队，依靠民兵，创造了“迎击、侧击、尾击”和“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积极歼灭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中，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我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5 月 13 日，八路军两个连埋伏在无极城外 4 公里地的小吕，日军加道大队长带领四五百步骑兵，保卫着伪正定道尹及所属 8 个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治安区”去视察，落入我军伏击圈，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打死伪道尹、骑兵中队长以下官兵 180 多人，并击毙敌人军马 60 匹。日军大队长腿部中弹，带残兵狼狈逃窜。整个战斗只用了 45 分钟，八路军指战员无一伤亡。又如 6 月 9 日的深泽宋庄之战，我军两个多连击破敌人 2500 多人的进攻，打死敌人板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 600 余名，伤 300 余，毙伤伪军官兵 200 余名，而我军伤亡仅 73 人。

在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中，我解放区军民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两个法宝。

华北解放区广大民兵大摆地雷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惊魂丧胆。群众就地取材，利用废铁、玻璃瓶以及石头等制造地雷。这种武器省工价廉，杀伤力较强，又不易为敌人发现。当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扫荡时，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地雷随处理设，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都是地雷。这样，使敌人到处触雷被轰，寸步难行。

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李勇就是很出色的一个。李勇是阜平县五丈湾的民兵队长，他领导着民兵队在斗争中学会了使枪

使雷。

1943年5月12日，他领导的民兵在五丈湾附近，布置了一个地雷阵，并使用了“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结果使进攻的日寇死伤惨重。从此，李勇的名字传遍了全边区。以后李勇的地雷战术更加发展，不仅做到了“敌到雷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李勇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无数的功绩，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并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像李勇这样的事迹，在各个根据地都曾广泛地出现，正如群众所唱的。

李勇变成千百万，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的地雷阵，管教他一个一个都送终。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的创造。平原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便于隐蔽，为了改造这种自然条件，群众便创造了地道战。开始时，村干部和民兵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各自在家中挖了地洞进行隐蔽。以后，这些地洞打通了并逐渐延伸到村外，使村与村之间的地洞都连接起来，便形成了地道。地道不仅起保卫自己的隐蔽作用，而且是积极打击敌人的坚固阵地，民兵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地扫击敌人。敌人经常在付出很大的伤亡后进入村内，但却找不到一个人；而民兵却可以利用地道的枪眼射击敌人，或者从地下转入村外，袭击敌后。敌人在发现地道后，曾经用烟熏、水灌及放毒等办法来进行破坏和杀害群众。但是，群众又在斗争中创造出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地道的构造一天天在改进，有防毒、防水、通风的设备，也有引诱敌人的陷阱，有的地区还在地道中没有医院。地道成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地下长城。

除地雷战，地道战外，交通战也更为普遍地展开了。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约8尺、深约丈许的道沟。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行进，但可掩护抗日军民的转移，因此解放区的群众把它称为“抗日道沟”。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割电线、毁围墙、烧桥梁等斗争也普遍展开。

1942年，仅冀南的民兵就收割了电线0000多公斤，毁围墙40多道，烧桥梁20多座。

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和青纱帐，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要进行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不仅青壮年参加了民兵，而且连妇女和儿童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中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东条英机和他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就像野牛冲入火阵一样，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是：“治安强化”施淫威，日本鬼子挨铁锤；人民战争威力大，定把野牛烧成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三章 “火鸡猎场”

马利亚纳好风光 炮火连天“猎鸡”忙

团团火球坠大海 东条痛哭舰机亡

马利亚纳海之战，日本舰队遭到惨败，陆基飞机丧失殆尽。参战的9艘航空母舰被击沉3艘，另斗艘受重伤，只有2艘小型母舰仍在战斗的行列中，特别严重的是参战的几百架舰基飞机，除25架外，架架都在硝烟弥漫的海天像燃烧着的火球一伴坠入海中。美国飞行员得意地把这次空战叫做“马利亚纳打火鸡”！

1943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转变的一年。在苏联，希特勒的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后，红军正大规模西进。到10月份，苏军已收复包括哈尔科夫、斯摩棱斯克和奥廖尔在内的约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向基辅有历史意义的城门逼近。

在西欧战场，西西里的陷落、北上进攻意大利，以及巴多格里奥陆军元帅率意大利投降，使盟军控制了地中海。德国本上正遭到空袭，晚上遭受英国轰炸机轰炸，白天则受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袭击。鲁尔地区几乎是一片废墟，汉堡则被夷为平地。

在中国解放区战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愈战愈强。

1942年7月7日至1943年7月7日，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275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近20万人，胜利地粉碎了东条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区面积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全面反攻打下了基础。

在太平洋战场，自中途岛战役后，日军转攻为守，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早在1943年5月底，尼米兹就派遣一个突击舰队夺回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8月中旬又收回了基斯卡岛。以上两岛都是1942年6月初被日军占去的。盟军在阿留申群岛和西南太平洋的进攻，迫使东条英机重新规划他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行动。

在1943年9月30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东条政府和大本营制定了它的战略计划，即所谓“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这个大纲规定：“为了完成帝国的战争，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龚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为应该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并要求“从战争开始到结束，要确保圈内的海上交通”。

与此相对立，在魁北克会议（1943年8月）上和会议以后，美国战略计划人员一直在寻求打败日本的途径。他们认为打败日本的关键，就是“通过中太平洋全面作战，南北两翼进行支援”。

美军在太平洋的指挥系统是，尼米兹海军上将是最高指挥，对整个作战任务全面负责；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是中太平洋部队司令，负责作战指挥。中太平洋部队的作战主力是美国第五舰队。这支舰队拥有6艘重型和5艘轻型航空母舰、8艘护卫航空母舰、5艘新型和7艘旧式的战列舰、7艘重型和5艘轻型巡洋舰、56艘驱逐舰、29艘运输舰和货船，还有大量的登陆舰艇。它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航空部队。

中太平洋美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塔拉瓦。美

国参谋部认为，这些作战行动是盟军通过太平洋进军的开始，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新阶段，主要是海战阶段。

马金和塔拉瓦都是珊瑚小岛，由珊瑚礁和很低的长条陆地组成。马金岛上有 800 多日军，防御较差。塔拉瓦驻有日军 5000 人，岛上安置了海岸炮、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防守坚固。

美军为夺取塔拉瓦岛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它先后派出 5 个营登陆，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经过艰苦的努力，付出很大的牺牲，激战 4 天才击溃了日军的抵抗，占领了塔拉瓦岛。美军伤亡和失踪者达 3301 人，损失巨大。但是，从战略上讲，攻克这一岛屿，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取得了空军基地，到 1943 年底，美国飞机已能从塔拉瓦岛上起飞了。其次，美军用血的代价换取了很多经验教训，为以后在横越太平洋的进军中避免了更大的牺牲。此外，美军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就迫使日军放弃了攻打埃利斯、斐济和萨摩亚群岛的计划。

吉尔伯特群岛的前方是马绍尔群岛。它是由 32 个珊瑚岛和许多小岛群组成的，在周围 40 万平方英里的洋面上有 800 多个珊瑚礁，所有的岛屿都很小，最高处只高出海面 21 英尺。但马绍尔群岛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有些珊瑚礁地段可以很快地改建成理想的飞机场。

美军情报部门获悉，在马绍尔群岛，日本的空军分布在 6 个小岛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指示，要尼米兹于 1944 年 4 月 1 日开始攻占夸加连等 3 个小岛。但尼米兹决定跳过其他两个小岛，只打夸加连。这个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状珊瑚岛，由大约 100 个小岛形成一个长 66 英里、宽 20 英里的巨大环礁湖。美军计划集中攻打两个最强的据点：北面攻击两个相连的小岛罗伊和纳默尔，东南攻占夸加连。而为取得海军基地，首先要拿下马绍尔东南部无人占领的马朱罗岛。

进攻马绍尔群岛的庞大舰队是由马克·米彻尔海军中将指挥的。这支舰队包括 4 个航空母舰突击队，拥有 12 艘航空母舰（其中包括护卫航空母舰），以及战列舰和巡洋舰等护卫舰只。舰基飞机首先打垮了群岛中的日本海空军，取得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接着，约 300 艘舰艇载着攻击部队进行登陆。

1944 年 2 月 1 日，夸加连的主岛遭到了太平洋战争以来最集中的炮击。海军舰只以及部署在附近小岛上的野战炮向该岛打了 3.6 万发炮弹，在炮弹弹道的上空，又有成群的“解放者式”轰炸机向火海扔炸弹，使这个岛成了杀戮场。一位观察家报道说：

“整个岛好像被抛到了 2 万尺高空又跌落下来。”

日本人完全没有料到美军会一下子插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岛上的 8500 名守军，大部分是后方梯队人员，只有 2200 人受过战斗训练，也缺乏反装甲的防御。沮丧的军官们用军刀敲打装甲车炮塔，他们的士兵则握着手榴弹站在坦克车上，等待手榴弹爆炸，他们认为美国人有秘密武器，能在黑暗中侦察出金属，因为只要有人走出隐蔽处就被击毙。于是，日军官下令，士兵们晚间必须脱掉钢盔和取下刺刀。但他们仍然被击毙。所谓“秘密武器”其实不过是既密集又准确的炮火。对日本人说来，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然而，如同在塔拉瓦一样，他们几乎战斗到最后—兵—卒。美军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以 373 名士兵生命的代价，才攻下整个岛。

这次作战非常成功，所以尼米兹马上就授权中太平洋部队司令斯普鲁恩斯进攻马绍尔群岛最西端的埃尼威托克岛。1 月 31 日，美海军快速航空母舰

突击队开始攻击；2月15日，美军在埃尼威托克岛登陆；2月23日就完全占领了它。

美军在埃尼威托克登陆的第二天，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又开始袭击特鲁克。特鲁克是加罗林群岛的首府，是日本所有委任统治地中最好的军港。从1942年7月起，日本联合舰队就以特鲁克的环礁湖为基地。特鲁克和其他珊瑚岛不同，是个人山岛，最高处高出海面1500英尺。战争初期，它常被称为“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特鲁克珊瑚环抱，从海上难攻，但空军容易袭击。它是个重要的海空军基地。

美国空军对待鲁克的袭击也很成功，两天之内计炸沉日本战舰九艘（共计2.4万吨）、运输舰只34艘（共计21万多吨）。炸毁飞机270架，炸死炸伤日军1700多人。

美军在埃尼威托克登陆和对特鲁克的打击，使东条英机大为震惊。2月日日，东京电台广播了美国空军袭击特鲁克事件，并且惊呼：“战局变得空前严重，而且空前激烈。敌人作战的速度表明，进攻的力量已经威胁到我们本上了。”

为了对付这种局势，1944年初，东条统帅部决定立即加强中太平洋的防御，2月10日，联合舰队司令部从特鲁克迁到帛琉群岛，同时水上飞机主力的前哨基地也迁到帛琉。2月中旬，直属大本营的第一航空舰队开到南洋和菲律宾一带。2月15日，新编第31军正式建立，司令官为小畑英良，司令部设在塞班岛，负责统帅5个师团和8个旅团，由联合舰队总司令统一指挥。

3月4日，大本营成立了中太平洋舰队，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任司令，作战时受联合舰队总司令指挥。这个新舰队的骨干是己在这一地区作战的第四舰队和新建第十四航空舰队。它的任务是和第三十一军协同作战，保卫中太平洋。与此同时，大本营又以第二和第三舰队为基础成立了第一机动舰队，司令官是小泽治三郎。第一机动舰队拥有2个战列舰分队、3个巡洋舰分队、9个驱逐舰分队和9艘航空母舰，共计360架飞机。5月3日，这个舰队奉命向菲律宾西南部的塔威塔威群岛集中，在那里作好战斗准备。

东条认为，日本海军的战斗力的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制止盟军进攻和一举改变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决战。为此，必须立即使部队作好准备，集中兵力，强迫进攻的敌人进行决战，消灭他们。从4月上旬起，在东条的指示下，海军省就会同陆军省着手研究作战问题。

随着形势的吃紧，日本海陆两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它们拼命争夺战争经费、战略物资和军事工厂，尤其是在飞机的生产问题上，因为两军都认为取得胜利要靠空军。两军最初同意平均分配计划生产的4.5万架飞机。但是，一个月后，海军要求把他们应得的数量增加到2.6万架。

海军的理由是有说服力的，东条默许了海军的要求。“这个问题太大，不宜过早决定。”东条的朋友兼顾问佐藤贤了反对说。直到此时，东条一直依赖海军在海上打胜仗并与美国“决战”，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今后，陆军要起主要作用，位于正在挺进的盟军与日本本上之间的各小岛，要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要成为未来的陆战的基地。因此，大部分飞机应该拨给从事这些战斗的陆军。

东条当初所以如此决定，主要是想缓和陆军与海军的矛盾，现在看来，佐藤的意见是对的。于是，东条就让佐藤去通知海军改变轻重缓急的次序。海军拒不接受修改过的决定。2月10日，在皇宫召开的两军参谋长及其顾问

的会议上，两军公开吵起来。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认为，同敌人的关键性战役还是在海上打的，已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杉山提出异议：“如果把你要的飞机如数给你，你能否改变战争形势？”

永野气得毛发倒竖：“我当然不能作那样的保证！你能不能保证，如果把所有的飞机都给你，你能改变战争形势吗？”

冈田海军大将建议大家休息喝茶，对立双方冷静下来。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后来佐藤独出心裁，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集中生产战斗机，不生产轰炸机。这样便能多生产5000架飞机，使总数达到5万架，两军平分，比海军的2.6万架只少10架，为了弥补这个差额，佐藤提出拨给3500吨铝。海军表示同意。

风暴算是过去了，但使风暴加剧的军事问题依然存在。日军仍然挡不住盟军穿过太平洋中部的挺进。美军在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之后，3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尼米兹于6月15日前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命令麦克阿瑟在今后5个月内在太平洋舰队支援下攻占棉兰老岛。

这一连串的灾难和美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促使佐藤又主动向东条建议：“我们应该撤到菲律宾，在那里决一雌雄。”

“你跟参谋本部商量过吗？”东条阴沉地问。

“问题就在这里。参谋本部肯定会反对这样一个计划。我认为应该说服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卡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退到菲律宾。

东条涨红了脸：“去年，在一次御前会上，我们把最后防线定在马里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你的意思是说，半年以后不打一仗就把它放弃？”

佐藤坚持己见：“在那个地区只有7个机场，美国人很容易在发动入侵以前就使这些机场失去作用。但在菲律宾，有几百个岛屿可以用作基地。”佐藤进一步强调说：“最后的战场应该在这里，因为如果那一仗打输，我们就没有能力再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集中力量打最后一仗的原因——然后展开和平攻势，求得体面的解决。”

东条打断他的话：“别再提‘和平攻势’了。如果你我一一提‘和平’，整个部队的士气就垮了。”

佐藤告辞，但是他的建议却导致了意外的后果。当晚，东条建议杉山参谋总长辞职。东条解释说，在此“严重局势”下，最好由他本人兼任陆相和参谋总长。

“这是违反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杉山抗议说，“不应一个人既作出政治决定，又作出军事决定。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就是希特勒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结果。”

“希特勒元首是兵卒出身，”东条说，“我是大将。”他要杉山元帅放心，对于军务和政务他会给予同等注意。“这点你不必担心。”

“说起来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人负责两项工作，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试问，你将重视哪项？另外，这也会给将来立下一个危险的先例。”

“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中，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即使打破先例也要采取。”

杉山按捺不住了：“如果你这样干，陆军内部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东条咄咄逼人，毫不示弱。“如果有谁反对，我就立即撤换他！”

第二天，即2月21日，东条解除了杉山参谋总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这样，他就把首相、内相、陆相、参谋总长4个要职集于一身。与此同时，

他还任命海相鸠田繁太郎接替永野大将，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职务。

东条巩固权力的专断行为，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严重不安，天皇长弟秩父宫亲王认为，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不应由同一人担任。与杉山一样，他向东条提出一个问题：“当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战争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时，你将怎么办？”东条愤怒地在书面回答中写道：“在目前这个阶段，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用我们全部国力去争取胜利。所以，在战争结束后，我将感谢你与我讨论这个问题。”“至于目前这个行动，如果你对此有什么疑问，我将乐于回答。如果我感到自己不再忠于天皇，那么，我将真心诚意地谢罪，并在御前切腹。”

重臣们与秩父亲王一样感到关注。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困境完全是东条领导的结果。他们都主张解除东条的首相职务，其中近卫和冈田尤为积极。他们认为接替东条的必须是一位“立刻与盟国进行和谈”的人。宫内大臣木户对此虽表同情，但却拒绝出力。

这时，在军方也有人暗中为谋求和谈而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高木惣吉海军少将。他是个敏锐的情报研究专家，鸠田海军大将曾令他彻底分析研究从绝密档案中反映出来的日本在此次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他对于海空力量损失的分析，使他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认为日本打不赢这场战争。在太平洋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使他丧胆，他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解除东条的职务，立即探求和平，不管后果如何。

但是，高木害怕如果把把这个情报呈交鸠田，不仅报告会束之高阁，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很难担保。因此，他秘密会见了和自己政见相同的前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和井上成美中将，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告诉他们。他们鼓励他把研究结果提交给冈田提督以及其他比较能采取行动的人。几个星期过去，东条依然在职。高木焦躁起来，他认为只有把东条杀掉，赶快同交战国和谈，才能使日本生存下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条英机见势不妙也在暗中寻求“和谈”。一天夜里，他秘密召见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将军，要他作出保证，除对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谈话内容。东条建议德国和日本秘密地与盟国接洽，提出“和平”。如果希特勒能派出一架远程飞机，他本人将代表日本帝国飞往柏林。希特勒的回答很婉转，但却是冷淡的。希特勒不愿冒这个风险让东条坐着德国飞机坠毁。德国缺乏热情一事，使东条感到沮丧，但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虽然他对于如何才能和平的想法是离奇的、不现实的。那年夏末，来栖大使从美国回来，在为他接风的宴会上，东条把他拉到一边，当着杉山的面对他说：“请安排早日结束战争。”这话从东条的嘴里说出来使来栖吃了一惊，他说：“发动战争容易，结束战争难啊！”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舰队和商船的损失正像水银柱一样，随着天气的炎热，逐日上升。9月份损失172082吨，11月增至265068吨。大部分损失是由于美国四出袭击的潜艇造成的，而东条政府和大本营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以对抗这一对日本补给线所造成的严重威胁。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年后，美国潜艇已击沉了日本139艘货船，总吨位达56万吨。此时，大本营才最终认识到，由于没有采取有力的护航措施，运输对战争的需求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困难。在国内，大家纷纷请求增加汽油、铁矾土以及其他重要原料的供应。前线指挥官请求运去粮食、武器弹药和援

兵，但却没有足够的运输船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每个星期都有商船被击沉。然而，直到 1943 年 3 月才成立第二运输护航舰队，司令部设在塞班岛。两支护航舰队的舰只总数少得可怜，只有 16 艘驱逐舰、五艘海岸防卫快速舰和 5 艘鱼雷艇，远不能应付美国“狼群”战术发起的袭击。

受东乡提督在对马海峡胜利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思想的影响，联合舰队新任总司令古贺峰一专心致志地梦想着一战而改变战争的进程。由于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也明白成功的把握极小，但却又是日本最后的希望。3 月 8 日，他发布了战斗计划，在挺进中的美国舰队一旦经由马里亚纳群岛或帛琉群岛或新几内亚闯入菲律宾海，联合舰队就全力出击。他高效率地开始集中日本的大部分海面力量。3 月底，他下令把设在“武藏”舰上的司令部从帛琉迁往菲律宾。

“咱们一起出击，一起捐躯吧！”古贺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中将说，然后他们乘飞机飞往南方。他说，“山本死得正是时候”，他“羡慕他”。3 月 31 日上午 9 时，他们分乘两架川西造四引擎水上飞机出发，朝西向棉兰老作 3 小时的飞行。但在飞抵菲律宾前，他们遇到暴风雨，古贺因飞机坠毁而丧命；福留因飞机在与暴风雨搏斗中耗尽燃料，被迫作了麦克阿瑟的俘虏。联合舰队不到一年失去了两位总司令，而且都是乘飞机在前线死去的。

1944 年 5 月 2 日，根据天皇的命令，丰田副武海军大将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5 月 3 日，东条和大本营向丰田发出“阿号作战”命令，或称“联合舰队必须遵循的紧急作战方针”，要求“集中大部分的决战兵力，一举消灭敌人的舰队，挫败敌人的进攻意图；预定以 5 月下旬为目标，在从中太平洋至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海域捕捉敌人舰队的主力”。但是，“在准备阶段，除特殊情况外，要避免决战”。

在“阿号作战”开始之前，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布置在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澳大利亚北面以及菲律宾的作好战斗准备的飞机，共 1188 架，其中舰基飞机是 360 架。日军摆出一副决战的态势，准备同美国海空军在加罗林群岛西部海域决一雌雄。

正好，美国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战略意义最大的塞班岛，由尼米兹将军指挥。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已经从新几内亚东路一直跳到该岛西北端的重要港口地区荷兰迪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使 1.1 万日本守军完全出乎意外的两栖作战，从而朝他自己的目标菲律宾跨出了一大步。盟军军舰上怒吼的大炮把日军打得鸡飞狗跳，5.2 万名盟军没有费多大气力就肃清了这个地区。麦克阿瑟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海空和后勤基地。

1944 年 6 月 6 日，即欧洲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同一天，斯普鲁恩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国第五舰队从马绍尔群岛的马朱罗基地启航，以米彻尔海军中将为司令的第五十八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为先导。这支突击队此时已有 15 艘航空母舰和 956 架飞机，紧接着是由 535 艘舰艇组成的两栖作战部队，载有 12.7 万名地面作战部队的官兵，其中 2/3 是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进发，直指马里亚纳群岛。

6 月 11 日，美军第五十八突击队到达关岛以东 200 英里处。米彻尔命令他的舰基飞机猛烈袭击马里亚纳南部诸岛。日军飞机损失惨重，反击微弱，部分原因是，日本在中太平洋的一部分飞机被调到哈马里拉岛保护比亚克去了。

6月13日，米彻尔派出7艘新型快速战列舰去轰击塞班岛和附近的提尼安岛。

14日，他派出两个航空母舰突击组去袭击硫磺岛和乳岛的飞机场，以切断日本本土同马里亚纳群岛的空中交通联系，从而完全孤立马里亚纳。另外两个突击组在群岛西南海域巡游，以直接支援攻击部队在塞班岛登陆。此外，还有若干潜艇在日本舰队附近进行监视活动。

马里亚纳群岛由一连串的热带火山岛屿组成，于1521年被麦哲仑发现。由于土著人使用的船只和他们的网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把这个群岛命名为“三角帆之岛”。

17世纪时，为了纪念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未亡人奥地利的马里亚纳，才正式改名为马里亚纳群岛，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西班牙的影响逐渐减弱。在美西战争中，美国占领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关岛。几个月后，在1899年，感到伤脑筋的西班牙人把他们在卡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所占领的其他岛屿，以约4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以“战胜国”之一的资格，从德国人手里得到这些岛屿，后来国联便把这些岛屿托管给日本。1935年，日本在马里亚纳群岛首府塞班建造了阿斯利托机场，稍后又在西岸建筑了一个水上飞机基地，在北端建造了一个战斗机机场。有些美国人指责日本违反国际联盟规约，把这个岛当作海陆两军基地，但那时岛上只有为数很少的军队。

岛上的土著是查莫罗族，他们的儿童必须至少上6年日本学校，聪明的孩子则被鼓励去上农业专科学校。当地主要种植甘蔗，在南洋开发株式会社的经营管理下，生产有了发展。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塞班已成了小东京，3万多人口中，查莫罗族还不到4000人。这个岛全长14英里，宽约6英里，总面积为85平方英里。岛中部有一座山，名叫达波乔山，高1154英尺，北端还有一座山叫马碧山。两山之间丘陵起伏，悬崖峭壁，有无数小山峰和数以千计的山洞。这个崎岖不平的山地，以及约占该岛面积70%的甘蔗地，是打一场保卫战的理想地带。

但是，美国第五舰队于6月中旬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完全出乎日本大本营意料之外，他们估计盟军将在6月以后发动攻势。所以，日本海空军的一部分兵力还在新几内亚西部同麦克阿瑟的部队争夺比亚克岛。

6月11日，美国空军轰炸塞班等岛屿时，日本联合舰队还认为这是一般的空袭，因为以前也多次轰炸过。6月13日，当美国海军对塞班和提尼安岛实行炮击以后，形势已基本明朗了。这时，呆在日本内海西部柱岛附近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便于13日晚间发出命令，要部队根据“阿号作战”计划准备决战，同时还命令在新几内亚西部作战的部队返回原驻地。

6月15日凌晨，美军陆战队在大量坦克和炮兵的掩护下，开始在塞班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便命令决战，要第一航空舰队开始进攻。这一天东条还把停放在横须贺的海军航空兵的120架飞机拨归联合舰队，丰田便用这批飞机组成八幡航空队，调往硫磺岛，由第一航空舰队指挥。然而，第一航空舰队的1308架飞机，有480架参加比亚克岛作战，无法调回。分散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陆基飞机又大多被炸毁，实际上能够参战的飞机不到总数的20%。

小泽治三郎指挥的日本第一机动舰队于6月13日从塔威塔威出发，向北航行，途中接到了准备决战的命令。于是小泽便电令参加比亚克岛战斗的几

个分舰队向他集中。6月16日，在帛琉群岛北面的公海上，小泽与他们会师。这时，由9艘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日本第一机动舰队便向东航行，直指马里亚纳群岛。丰田给这个舰队的命令是：“在马里亚纳地区进攻敌人，消灭他们的入侵部队！”6月19日天明，日本舰队到达塞班岛西面海域，小泽决定在这里击溃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其他舰只。在日本舰队进入战斗时，5分钟后，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又发出一电报，重复了1905年东乡海军大将在日俄战争中鼓舞士气的名言：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官兵，奋发努力！”

美国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是一个用兵谨慎的将军。6月18日下午，美军情报部门获悉，日本机动舰队在美舰队西南355英里处。第五十八突击队司令米彻尔建议星夜西进，以便在19日凌晨与日军交锋。斯普鲁恩斯在和参谋们讨论了一小时之后，决定下去迎击敌人。他在命令中说，他的主要目标是“攻下、占领和守住塞班、提尼安和关岛”。其余任何事情都必须服从这个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五十八突击队主要是掩护部队，保护塞班岛的滩头阵地。

6月19日清晨，第五十八突击队停泊在塞班岛西南90英里、关岛西北80英里处。美国舰队派出33架飞机去袭击关岛。当美机飞临关岛上空时，岛上的日机正起飞准备去进攻美国的第五十八突击队，于是便展开一场短促的空战。美机击毁日本战斗机30架，轰炸机5架。此后，在菲律宾海之战中，就再没有日本的陆基飞机参战了。

19日晨6时许，美第五十八突击队终于改变了方位，开向西南，等待进攻。到上午10时，美舰雷达发现150英里处，有飞机从西南飞来。这是日本机动舰队发动4次攻势中的第一次，共69架飞机。第五十八突击队随即开去迎战，行程20分钟，然后迎风而上，发动所有可用的战斗机，总共450架以上。接着，米彻尔又命令所有的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起飞，去轰炸关岛的机场，使日本飞机无法再利用它们。这次空战结果，日机被击落42架，只有27架得以逃命。

第二次，日舰出动飞机128架来攻击美舰，但在空中就遭到美机截击，不到几分钟就打下90多架，激战结果，日机只有31架安全返航。第三次进攻的日机是47架，由于弄错坐标，只有12架及时赶到战斗空域，其中7架被击落。

小泽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是82架飞机，结果大部分被击落，只剩11架逃回到日本母舰上。在这天先后持续8小时的激烈空战中，日本第一机动舰队只打下美机15架，而自己却损失飞机346架，从此日本的海军航空部队一蹶不振。

6月19日这一天，对日本机动舰队司令小泽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天。不仅他的航空部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他的旗舰、重型航空母舰“大凤”号（3万吨）和另一航空母舰“翔鹤”号被美国鱼雷击中。在“翔鹤”号沉没半小时后，一声极其猛烈的爆炸，“大凤”号也随之毁掉。站在舰桥上的高级参谋大前敏一大佐看见飞行甲板突然“像富士山那样鲜花盛开”。由于机库上面的船体爆炸，这艘航空母舰迅速下沉。

小泽望着缓缓下沉的战舰，心如刀割。他原要同航空母舰一起下沉，谁的劝告也不听。后来，小泽多年的亲信参谋大前严厉地警告他：“仗还在打，你要继续指挥到最后胜利！”这样，小泽才一言不发地跟着他的高级参谋下

了小船。在他们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 15 分钟后，又是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大凤”号向左舷大角度倾斜，尾部首先入水，沉入海底。

持续两天的马里亚纳之战，以日本的惨败而结束了，美国人称这次海战是“马里亚纳群岛火鸡大狩猎”。美军以 2 艘油槽船和 80 架飞机的代价，击沉了日本 3 艘大型航空母舰，重创 4 艘航空母舰，击毁小泽 92% 的舰基飞机，72% 的水上飞机，以及 50 架以关岛为基地的飞机，总数在 475 架左右。这一胜利为美军占领马里亚纳主要岛屿大开了方便之门。

海上的惨败，注定了塞班日本守军的命运。

美国第五舰队大败日本海军之后，它的舰基飞机和炮舰便大力支援向塞班岛进攻的美军，从而大大加快了他们的胜利。美军地面部队迅速向北部狭窄的半岛推进，日军则龟缩到洞穴里和地下防御工事里负隅顽抗。到 6 月 25 日傍晚，日军前线部队只残存不到 1200 名能战斗的士兵和 3 辆坦克。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条对反攻的失败仍置苦闷，命令部队继续拼死抵抗。他还令陆军参谋本部以天皇的名义给第三十一军发了一封电报：

“由于大日本帝国命运有赖于你军作战之结果，务必鼓起官兵士气，战斗到底，继续勇敢杀敌，以解天皇之忧。”

6 月 30 日，美军终于突破“死亡谷”，这是日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唐纳山的日军野战医院，收到了“玩死亡游戏”的命令。卫生兵分发手榴弹，每 8 人一枚。黄昏时，主治医生登上一个土堆大声喊道：“司令部命令野战医院要转移到西岸的一个村子里去，这个村庄在塔纳帕格上方一英里半，离塞班北端 4 英里，能行动的病人都跟我走。使我万分遗憾的是，我只好把不能行走的战友留下。诸君，要像日本军人那样光荣舍生！”

接着是一片哭泣声和伤兵们相互告别的祝愿声。这时，忽然在嘈杂的人群中，有人唱起了《九段坂》。这是在战争期间日本流行的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一个年迈的母亲拿着战死的儿子的金勋章，从乡下来到日本军国主义为表彰战死者而在九段坂修建的靖国神社。她唱道：

从上野车站来到九段权，
我心情急切，有路难辨；
我手扶拐杖，走了整整一天，
来到九段权，
我看望你，我的儿。
高耸入云的大门，
引向金碧辉煌的神社，
儿啊，而今你升天为“神”，
你不中用的老母，
为你高兴，泪流满面！

凄凉的歌声刚落，听到有人在喊：“再见吧！亲爱的母亲！”接着是“轰！轰：……”一个接着一个的爆炸的手榴弹，不少伤员就这样躺在血泊里。7 月 6 日美军宣布占领塞班岛。在塞班战役中，美军伤亡 16500 人，其中 3400 人阵亡，他们大多是在最初几天牺牲的。7 月 31 日夜，美军又完全占领了提尼安岛，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关岛了。

美军在拿下塞班岛和打垮了日本舰队的空军之后，便取得了马里亚纳地区的制空权。因此，在关岛登陆之前，海空军对它进行了 13 天持续的、系统的炮击和轰炸。到 7 月中，美军轰炸关岛的飞机约为 5500 架次，海军发射的

炮弹约为 18500 发。仅 7 月 19 日这一天，美机就在关岛投弹 727 吨，发射火箭 147 枚，就这样，经过 3 周的激烈战斗，美军终于在 8 月 10 日完全占领了这一重要的岛屿。

到此为止，马里亚纳群岛，这座被视为保护日本本土的屏障，所谓太平洋上的“防波堤”就完全落入盟军之手了，美军突破了这道“防波堤”之后，就切断了日本同加罗林群岛的联系。同时，美军取得后勤基地，可以继续西进；取得潜艇基地，可以袭击日本同南洋各地的海上运输船舶；取得空军基地，远程轰炸机 B—29 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对日本列岛造成直接威胁。所以美国舰队在马里亚纳海战取得胜利和攻占塞班岛以后，日本朝野惊恐万状，东条内阁遭到猛烈抨击；特别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东条煞费苦心，还想继续执政，但已徒劳。正是：连吃败仗罪难逃，统治集团大争吵；煞费苦心无所用，好戏在后等着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十四章 “一号作战”

血战玄黄春复秋 光明黑暗竞神州

东洋魔酋拼孤注 凶神末日快临头

鉴于盟军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阵地节节失守，其海上交通线也更加难以维持。对此，敌酋东条英机大伤脑筋。于是，日本大本营便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保持日本与南洋地区交通联系。同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于1943年11月26日第一次袭击了台湾新竹的日本空军基地，使日本大本营更加重视中美空军的活动，决心要消灭中国的空军基地。

根据东条的命令，这个行动定名为“一号作战”，要求于4月下旬从黄河两岸发动攻势，一个半月打通平汉铁路。6月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为了修复黄河大铁桥，恢复南北两岸的交通，日本大本营又命令关东军拨运铁桥。钢梁和架桥机械，由铁道兵在河南中牟县霸王城附近进行修复工作，同时还命令关东军拨运渡河器材和部分兵力，支援华北方面军。

这是东条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故称“最后一跳”。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约400公里；从湖南的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日军出动约50万人、10万匹战马、1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250架飞机。

面对着日军的猛烈进攻，蒋介石惜头转向，不知所措。随即召集军政要员紧急会议，要亲信们发表意见。

亲日派何应钦，对日军的意图了解得最清楚，作为总参谋长，他首先发言。“昨天同几位盟军高级军官在一起吃饭，”何应钦说，“他们向我转达了盟军对河南战局的看法。美方认为，东条看到欧洲战场上的苏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的盟军也发动了越岛进攻，海上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所以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配合海上作战，另一方面可与孤悬在南洋的日本兵联系起来。”

对于何应钦的看法，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吗？”

国民党空军头目周至柔说：“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昨天几位美国空军朋友也对我说，日军这次攻打河南，在于决定执行一个早已准备的企图，就是开放从东北到广西与越南的直接铁路交通线。”

因为盟国的潜艇与空袭一天天加强，日军在沿海的移动很受影响。而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在铁路沿线的活动更使日军伤脑筋。日本占领军有如一块紧张的皮，远布于东南亚，急需一道安全的输血管，而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已不再是安全的了。”

蒋介石对于两位军界头目所说的盟国的看法，认为“大体上是对的”，而对苏军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却认为是“偏见”。为了给将领们打气，他故作镇静他说：“我已经电告河南前线的将领，要他们一定顶住！日军在河南只有五六万人，而我们在河南却有40万精锐之师；40多万人对付五六万人，无论如何是不成问题的！”

“委员长”话音刚落，秘书陈布雷就送来一大卷十万火急的前线失利的电报。第一次电报报告：“郑州已告沦陷！”蒋介石惊恐万状，他说：“怎么来得这么快！蒋鼎文到哪里去了？！”何应钦忙说：“委座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后，他已奉命调走了3个军的兵力回陕西反共去了。”蒋介石又问，

“胡宗南上哪儿去了？”何应钦又答道：“胡司令奉委座的命令，派出两个军，镇压新疆叛乱去了。”

蒋介石又恼怒地问：“那么汤恩伯呢？！”

“汤司令今晨也曾给我一个电报，说是按着委座的指示，为了保全实力，不打算和日军死拼，他已征集了800辆大卡车，装运重要东西，看看风头再说。”

就这样，国民党虽说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号称600余万人，但是它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些爱国将领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些人以保存实力作为保持官位的手段，一见日军压境就仓皇退避，望风而逃，这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河南的汤恩伯就是这类将须中的一个典型。

话说1944年3月下旬日军修复了中牟附近的黄河大铁桥以后，这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面极其秘密地调兵遣将，把第十二军所辖的3个步兵师团共14.8万人，集结在黄河北岸的新乡南部和南岸的开封西部地区；一面进行虚伪宣传，制造假情报，以迷惑麻痹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使他们认为日军准备西进去攻打重庆。

4月17日夜，日本第十二军的部队强渡黄河，在中牟突破了守军的阵地，18日凌晨便向郑州突进，19日傍晚攻陷郑州。接着日军主力向新郑一带集结，并于23日攻陷密县。

河南守军司令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他拥有43个师，兵力可谓雄厚，武器可谓精良，但这个汤司令只知搜刮民财，祸害百姓，河南人民称他为“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一。若讲起对日本来，此人却是十分亲善的，这个号称“40万精锐之师”的统帅，与日军交战，一触即溃，望风而逃，20天之内就丧失郑州、洛阳等49个县市。

5月1日，日军从许昌沿平汉路南进，5月5日占领郾城。这时奉令调往武汉之敌第二十七师团继续南下，9日到达确山。同时，司令部设在汉口的日本第十一军也从长台关（信阳北面）北上，9日进抵确山，与南下的日军会师，至此，平汉线南段完全沦入敌手，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又恢复了交通。

日军侵华方面军司令部本来认为，汤恩伯的主力是布置在区域以西地区，但后来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北面。因此，日军在占领许昌之后，便于5月1、2日转向西进，攻打郟县、登封、禹县、襄城，对中国军队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术，然后围攻洛阳，在它的周围消灭汤恩伯的主力。5月8日，在洛阳东南地区，一部分中国军队陷入日军包围圈，损失很大。敌第十二军主力乘胜前进，向洛阳、新安猛扑。

与此同时，侵占山西的敌一军约两个旅团，从垣曲南下，5月9日强渡黄河，攻下澠池，向新安推进，而孟津之敌也从北面近逼洛阳。至5月14日，敌人从四面包围了洛阳。19日，敌人以部分兵力攻城，但被击退。23日，敌第十二军主力开始攻打洛阳。25日，我中原名城洛阳终于陷入敌手。这样一来，日军就完全占领了河南全境。

38天完成了“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计划。

在河南战役临近结束之际，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于5月28日从南京潜入汉口指挥部，准备向粤汉、湘桂铁路发动猛攻，以打通这两条铁路线，消灭沿线两边的中、美空军的飞机场，并威胁重庆，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

为了完成这一计划，除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的8个师团，又增调了3个师团归他指挥，总兵力达到36.2万人。另外，海空军还不算在内。为此，在1944年初即着手进行准备。

5月27、28两日，第十一军第一线5个师团，约12万人，从湖南岳阳一带分3路向南进军，准备在长沙北面的沉水和益阳之间，新墙河和汨罗江之间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然后迅猛南下，夺取长沙。长沙守军还没有望见敌人影子，内部却先争吵起来，城外岳麓山炮兵要求城内步兵保护，城内步兵立即拒绝，说是要请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然后才能决定。但哪儿都找不到薛岳，炮兵们赌气不于，一窝蜂散了；步兵没有炮兵掩护，也乱糟糟地撤退，走得慢的便做了日军刀下之鬼。日寇占了长沙，继续南攻。指挥部却还在那里同重庆辩论长沙失陷的责任问题，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薛岳等人各有一套，分别下令，弄得指挥官们无所适从，糊里糊涂；日寇一冲过来，便都七零八落，一哄而散。

中外记者们为这风卷落叶般的战事吓住了，纷纷前往采访。蒋介石的发言人奉命答复：“此乃诱敌深入之计，不必惊慌。”正赶上日本兵冲到衡阳城下后暂告停止，从事诱降，于是重庆的政治寒暑表突告上升，说是日军已遭阻止，国军即将反攻。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光荣的战绩”，蒋介石对守衡阳的方先觉慰勉有加。

日军占领长沙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衡阳。衡阳地处战略要地，它不仅是粤汉、湘桂铁路的交结点和湘水、蒸水的汇合处，又是我东南各省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公路枢纽。日军夺取长沙之后，立即派出两个师团沿粤汉路和湘江南下，水陆兼程，妄图在行进中急取衡阳。

7月底，日军准备就绪。7月30日，日军下达进攻令。在此后的一周中，日机开始对衡阳市区狂轰滥炸，地面又以4个师团发动猛攻，并以重炮轰城。这时中国军队困守衡阳近40个日日夜夜，从未轮换休整，伤亡重大。加以盛夏酷暑蒸人，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将士多患腹痛痢疾，医药不济。中国后方曾派出几个师的部队为守军解围，但均被日军击退。由于日军攻势越来越猛，8月8日拂晓，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奉蒋介石密令率部投降。在衡阳保卫战期间，战士们出于爱国热情，违令奋勇抵抗，日寇第六十八师团长久间为人中将与他的参谋长被击伤，日军共伤亡1.9万余人。

日军虽然在国民党战场上取得局部胜利，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海空军节节败退，损失重大。在缅甸北部，日本侵略军在美、英、中、印联军的打击下，也处于绝望的境地。所以日本大本营秉承东条英机的意志，这时更加殷切期望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妄图阻止盟军在太平洋地区推进。

为此目的，日军在占领衡阳之后便进行休整改编，建立第六方面军，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兼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十一、二十三、三十四军以及长沙、衡阳地区的直辖部队。与此同时，日军又赶修粤汉铁路和公路，补充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作继续进攻的准备。

9月初，日本第十一军占领了湖南的零陵，14日又攻下广西的全县。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又发动了桂林—柳州战役，国民党第四战区张发奎的部队望风披靡，狼狈逃窜，桂林、柳州混乱得不得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大公报》报道：“日来列车秩序极乱，马桶、浴盆与乘客争登，小鸡、小鸭与物资抢位。”桂林有个站长，以5万元卖出一辆无盖车皮，又把列车座位卖给某银行，索价14万元，半路上还对乘客重重勒索，并且对

乘客说：“坐我的车便是黑市，没有钱便不能上来！”

9月9日，侵占广东的日本第二十三军也从三水、四会西犯，于22日占据了广西的梧州。然后这支侵略军继续西进，11月24日占领了南宁。这时侵占越南的日本南方军，派出一支部队进入中国国境，向南宁推进，12月10日，在绥远与从南宁南下的日军会师。这样一来，日军就打通了从黄河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在桂林、柳州陷落之后，山城重庆为之震惊，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安，急忙从四川、陕西等地调遣部队，赶运贵州，守卫西南门户。但因交通不便，现代化运输工具缺乏，部队机动性能极差。而广西、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尽成惊弓之鸟，望风而逃。日本第十一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3日又攻都匀。

面对着这样的败局，蒋介石唉声叹气，有时急得双脚直跳，大骂张发奎。原来，在日军攻占桂林、柳州之后，陷宜山，渡龙江，骎骎乎有直犯贵阳之势。张发奎率部在怀远镇迎战，一连10天却不见蒋介石派兵增援。到11月27日，日寇自怀远镇西南渡金城江入河池，28日又陷南丹，29日向大山塘进击。大山塘方面守军受不了车河方面日军的威胁，当晚败退六寨之东。糊里糊涂，一队美国飞机把南丹以北贵州省境内的“六寨”，当作河池县龙江北岸的“六甲”，大炸一番，惨不忍睹！几十万难民。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挤满了黔桂公路和铁路。千辛万苦从大山塘到六寨的人，有2万人的鲜血在此流成血海。张发奎再也没想到有此一着，险遭不测，狼狈而退。实在令人寒心！

贵州危机直接威胁四川。如果贵阳有个二长两短，那重庆岂非完了？蒋介石焦急起来，于是急忙把河南败将汤恩伯调来，借以加强贵州方面的防务。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征得美国同意，于1944年12月从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中调回两个师，加强昆明的防务，使西南门户转危为安，暂时支撑了摇摇欲坠的重庆政府的局面。

从1944年4月中旬到12月初，日本侵略军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干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和福州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主庆等146个大小城市，取得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取得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但是，从日本战略全局来看，多占一些地方无异于作茧自缚，使日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形成强烈的对照，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开始发动局部反攻。在东条英机发动“一号作战”时，侵华日军中有50多万人用于豫、湘、桂战役，在其余广大占领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这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更易于进行局部反攻。在这一年里，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在山东解放区，1944年间，在鲁中、鲁南、滨海、渤海和胶东等地区，八路军向敌人展开了多次的进攻，共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伪军向我军反正投诚者共计37个中队又2700余人。在晋察冀解放区，从1月到10月，我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深入昌黎、博野等24县，并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主要城市，使我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我军还推进到热河，解放了该省的大部分。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从2月至12月，先后攻入

19个县城，攻克碉堡据点千余，收复国土5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余万。4、5月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溃败以后。

八路军立即组织豫西支队，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解放区。到1944年底，这个支队共作战130多次，解放人口113万。并建立了16个县政府。

在华中，陈毅将军统率的新四军在1944年也广泛出击，积极反攻。3月6日，粟裕将军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以3个团为主力。

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向苏北淮安的重镇车桥一带发动攻势，4日夜间，第七团战士用云梯爬上7米多高的围墙，进入镇里，只花30分钟，1000多名指战员就冲到车桥街上，猛袭睡梦中的敌人。5日黎明，50多个碉堡即拿下。至下午4时战斗结束，我军解放了车桥，并击退了前来增援的敌人。这次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线，使我苏北、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一年中，新四军第一师共毙俘敌伪军1.5万人，攻克据点135处。新四军第三、四、五师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豫湘战役后，第五师在李先念将军的指挥下，即分兵向南北两面出击，收复了大片国土。到1945年初，第五师活动的地区已发展成为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人口为920万的解放区了。此外，活跃在苏南、皖中、浙东等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在频繁的攻势中取得了显著的战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华中解放区。

在华南，东江纵队和海南岛的琼崖纵队都有很大发展。到1945年初，华南解放区已拥有300万人口，有正规军1.5万余人，民兵数万人。这时，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

除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各个解放区战场，利用日寇南进之机，积极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外，当时在延安总部，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那时，第一二师三五九旅，正在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屯垦练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展大生产运动，保卫陕甘宁边区，随时准备打仗。194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向王震将军布置了一个任务。要三五九旅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首先向王震将军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然后指出：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大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第五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第四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三五九旅南下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这样，”毛泽东同志停了一下又说，“在日本军队退却到山东等沿海地区集结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

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对形势分析得那样清楚，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讲得那样明白透彻，不但适应全国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表达了革命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愿望。

就在这年 11 月，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告别延安，开始长征了。第一步经山西、河南，于 1945 年 1 月底，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第二步，同第五师张体学部队一起，渡长江南下，深入敌后，严重打击了盘踞在华南地区的日伪军，坚决消灭了勾结日伪的反动顽军，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下，初步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系起来。

7 月初，支队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南下，于 8 月底打到广东南雄县境，进入五岭山区，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只有 50 公里路程。这时，时局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所预料到的那种突然变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提前结束了。过去我们可以利用的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国民党反动派全力对付我军，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会合东江纵队，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湘粤赣边的五岭山区建立战略根据地，已不可能实现。南下支队被迫北返，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正规军的重重包围、尾追堵截，日夜苦战，又返回我中原解放区。

南下一支队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虽然由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未能全部实现，但是它在两年中间，南下北返，经过晋、豫、鄂、湘、赣、粤、陕、甘八省境地，跋涉 1 万多公里，克服了严寒酷热和高山大河等自然险阻，历经 100 多次血战，英勇地打败了日寇、汪伪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撒播了革命火种，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南进取得了“赫赫战功”，击溃了国民党 50 多万大军，但在解放区战场，它却节节失利，遭受重挫，中国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正是：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宝塔山。欲知太平洋战局和东条命运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五章 众矢之敌

塞班惨败东条惊 众矢之敌无地容
被迫下台无济事 战争路线仍推行

对东条英机来说，中国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推进、马里亚纳群岛的陷落，不仅是军事上的败北，也是政治上的败北。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他越来越不得人心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秩父宫亲王称他是“东条天皇”。海军的某些部局里悬挂木牌写着，“杀死东条和岛田！”在陆军的知识分子中，东条被称为“上等兵”，他的政府被称为“上等兵内阁”。

陆军参谋本部所属的战争指导班刚结束的一次调查的结果，给这种谩骂提供了依据。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诚大佐报告，在经过他自己和几位同谋者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日本已没有希望扭转战争的不利形势。日本今日之处境与德国不相上下，且日见恶化”。

过去几个月中，前首相近卫公爵成了对战争的进程和东条的领导感到不满的高级文武官员的同谋。陆军参谋本部的酒井镐次将军到近卫在郊区的寓所秘密拜访了他。“为安全起见”，酒井穿上了便衣。“如果东条获悉我要跟你讲的话，我肯定他会报复。”酒井警告说。他要对近卫说的是，应该尽早结束战争。“德国仍然还有力量防御，我们要趁敌人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时，利用这种形势开始和谈。到德国失败后再谈，对我们就不利了。”为此，必须迫使东条下台，建立新内阁。

在现代日本领导人中，还从来没有像东条这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从表面上看来，东条的地位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实际上他的统治却处于崩溃的边缘，自中途岛战役以来，随着美国加强潜艇战，日本船舶的损失继续增加。北面，在阿留申群岛的前哨阵地他已放弃；南面，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已被占领；太平洋中部的防线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崩溃了。

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而且愈战愈强。他们抗击着 2/3 以上的侵华日军和 90% 以上的伪军，已成了打败日本、解放中国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国内，生产水平日益下降，许多民用企业转为战时生产，更多的妇女投身于重工业，连 10 几岁的孩子也成了重要的劳动力，上课时间缩短到最少限度，7 天一周的工作制被取消了。汽车、火车拥挤到有些婴儿被憋死的程度；出门到 100 公里以外要有警察局的证明；餐车和卧铺取消。人们对晚点的火车出气发火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偷座垫，砸破车窗进出。各种日用品大大减少，食品定量供应，衣料昂贵，取暖的煤气或木炭少得可怜。约有 1 万个娱乐场所关闭。日本的生活已变得日益艰难。喜剧演员古川绿波在日记中哀叹：“活着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

这些极端严厉的措施，加上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连续败北，更助长了忧郁不安的情绪，愤恨、不满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头号战犯东条身上。

人们嘲笑东条，允许他的夫人公开发表演说和广播讲话，或从事其他支持战争的积极活动。她得到的一个外号叫“东美龄”，这是中国独夫民贼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日本版。塞班惨败后，东条夫人接到无数匿名电话，问她的丈夫自杀了没有？

但是，有些人不愿让首相本人采取这一最后行动。除了高木惣吉海军中

将的小组正在策划用机枪伏击东条外，陆军内部的反对派也想暗杀东条。一个刚从中国调回大本营的名叫津野田的少佐，与东亚联盟东京分会会长牛岛达熊一起，密谋在祝田附近皇宫前广场趁东条的汽车拐弯放慢速度时向他扔一枚特制的氢氰酸炸弹。时间已经定下：7月的第三个星期。由于密谋者的一个朋友，无意中向天皇幼弟三笠宫亲王泄露了这一计划，被亲王出卖了。三笠宫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将这一计划告诉了大本营。宪兵队逮捕了牛岛和津野田，并处以死刑，但如同先前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缓期执行。

在这样的广泛不满面前，东条只好求助于提名他当首相并在过去几个月的危机中一直支持他的宫内大臣木户。东条得到的回答既出乎意外又使他扫兴。由于马里亚纳群岛的陷落，木户十分恼怒，他对东条不久前把权力集中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告诉他，人们对此感到不安，“天皇本人也极为生气”。

东条碰了一鼻子灰，十分不爽，蓦地站起来：“今天跟你谈毫无意思！”“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就独自走了。回到官邸，他同好友兼顾问佐藤贤了说：“如果木户采取那种态度，这就是说，天皇对我已失去信任。因此，我放弃改组内阁的想法。我要辞职。”

“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怎么谈得上辞职！”佐藤大声说。他要东条任命米内海军大将接替岛田。这样做就能安抚海军以及近卫那样的所谓“开明派人士”。但是，解除岛田职务是很不合乎东条意愿的，因为岛田曾忠诚地支持过他。佐藤劝他要“大义灭亲”。他说：“不管如何，你都得‘灭’岛田。你对岛田所承担的义务是私人交情。战争是你发动的，你不能中途甩手不管。”

这正中东条的下怀。他召见岛田，要他辞去海相职务。岛田“落落大方”。“我辞去职务倒是无官一身轻，你却必须肩负重任继续干下去。”他预祝东条在未来的斗争中“斗出成绩”，他俩握手告别时，这个嗜杀成性的东条竟为他的老朋友去职失声痛哭。次日，7月17日，岛田送了辞呈，但与佐藤的预言相反，反对派并未就此罢休。木户也如此。他在近卫的鼓动下，答应把“重臣”们对东条的意见奏明天皇，虽然政治上的重大问题是该他管的。

木户的明朗态度，使近卫喜出望外。他随即驱车前往平沼男爵寓所。另外两位“重臣”冈田海军大将和若槻礼次郎男爵也在平沼那里。近卫把木户主动提出的出人意料的主意告诉了他们。“现在我明白木户一直在于些什么了。”冈田大将说。6时30分，所有“重臣”都到齐，经过几个月的没有效果的私下发牢骚后，如今他们对东条的看法相当投契。“请诸位注意，即使东条内阁改组，”若槻警告说，“国民也不会支持它。”米内大将透露，他刚接到“热诚”请他人阁接替岛田的邀请。他拒绝了，但完全可以预料到东条将亲自敦请他，如果还不成功，东条会请天皇支持。“即便他使出最后一招，我也下定了决心不接受人阁的邀请。”米内斩钉截铁地对他的朋友们说。

室内的气氛非常活跃，议论纷纷。但并不是所有的“重臣”都要求东条辞职。阿部信行陆军大将指责说：“仅仅谈论倒阁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有什么把握能成立一个更好的内阁呢？”

“倒阁与否，下届内阁是强是弱，这都不是问题的所在。”平沼插嘴说，国家已到危急关头，必须更换内阁，而且应当尽快地更换。

“请我入阁我也不去。”“二二六”事变后当过首相的外交官广田说。最后，“重臣”们搞出了一个除阿部之外大家都同意的决议：

“帝国如欲渡过当前之巨大难关，必须给国民的精神注入新生命。全体

国民必须同心协力。部分改组内阁毫无用处。必须组成能坚定前进的强有力的新内阁。”

阿部想知道是否把会议结果转告东条。回答是一致的，“不告诉他”。此决议由专人送到宫内大臣木户寓邸。木户答应于第二天上午呈交天皇。

正当“重臣”们在密室里起草倒阁决议的时候，东条首相却在办公室与他的顾问佐藤在讨论米内为什么拒绝入阁的问题。佐藤认为，问题出在代表东条的中间人身上。“没有把你的真实意图向米内讲清楚，”他说，“让我直接跟他说吧。”于是，佐藤换了便服，悄悄地直奔米内官邸。恰好米内刚开完“重臣”会议回来。佐藤受东条的委托，试图说服米内，在战争中中途拯救内阁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他接受入阁就能做到这点。“东条唯一的愿望是要改变战争的形势。在此关键时刻，我请求你与东条内阁合作，渡过目前的难关。”

“搞政治我不是内行，”米内苦笑着说，“这点你可从我自己的内阁看出来。我是个海军将领，不是政治家。我希望我死的时候也是个海军将领，如果你们想用我，就让我当海相的顾问好了。”

从米内的语调中可以听出，他是劝不动的。佐藤回到东条的办公室，时间已是凌晨2点。但东条仍抽着香烟在发愁，烟雾袅袅上升，在他头上的灯罩缭绕。整个房间都是乌烟瘴气。

“请辞职吧。”佐藤说。

东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将在明天上午谒见天皇，”他说，“请你用书面形式写下我的辞呈吧。”佐藤坐下来动笔时，他心里清楚战争完了，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为他的朋友操劳国事、出谋划策了。

第二天，7月18日上午，东条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用恼丧的语调对内阁说，由于塞班失陷，他决定辞职。他之所以踌躇这么久，是因为日本也有“巴多格利奥”派，担心有人会“举着白旗投降”，接着，他又挖苦他说，日本战败的责任必须由“重臣”和其他迫使他辞职的人来负，他的双肩垂下去，然后愤愤他说：“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

会议室的气氛非常沉闷，犹如乌云压顶一样。除了东条，没有一个人在讲话，大臣们都在低着头，默默地写自己的辞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好是在4年前的这一天，东条当上了陆相，不久又窃取了首相。如今他的“宏大的抱负”还没有实现，就要下台了，这怎能不使他心烦意乱呢！

大臣们都走了，东条独自一人还在抱头沉思，他心里犹如怒海翻腾，思绪万千，就是在4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这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战犯曾经发誓要用东洋军的刺刀，用日本人民的鲜血征服中国，征服印度支那，征服东南亚，乃至征服整个东方世界，好与他的盟友希特勒平分秋色！正是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他当上首相50天后，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接连侵占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时的东条神气十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如今丢盔卸甲，连吃败仗，到处挨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又怎能不使他发愁呢？！

内阁会议结束后，东条没有顾上回家就无精打采地把辞呈交给了木户。木户问他想让谁接替他的职务。“我不想说我看中谁，”东条讥讽地回答，“我以为重臣已经选定了人选。”然后他便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天皇的办公室走去，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分拜谒天皇。

7月18日下午，“重臣”们在开会物色接替东条的人选，会议是在皇宫

西厅内举行的。侍从长和枢密院长也参加了会议，一向支持东条的阿部大将提议由米内出来组阁。

“我确实曾一度从政，”米内说，“我不妨试试再当海相，但我不能当首相。军人受的教育是片面的，不宜担当这个角色。政治要由政治家去搞。”他强调说。

近卫赞赏由海军大将米内出任首相，但是木户反驳说：“本土防卫的强化，本上陆军兵力以及宪兵力量之增强，迫使我们在陆军中物色入选。”若槻和米内也默认，几分钟之前，米内还曾警告选择军人的危险性；此时，他提议由上一年晋升为元帅的现任南方军司令的寺内寿一伯爵组阁。

近卫是一个饱经世故的资产阶级政客，鉴于连吃败仗，人心浮动，担心爆发革命。他说：“国民现时似乎是在向左派革命漂移。一切都朝着这个方向。打败仗是可怕的事，但革命却更可怕得多。打了败仗，我们经过一定时期还能恢复，但是左派革命起来了，却会破坏国体。”他想知道寺内元帅能否控制不同政见分子。

“他行，”木户说，“但他还在前线，远离本土，请他回来很困难。我们还是另外物色人选吧。”

米内又提名一个陆军军人，是梅津美治郎大将。梅津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早在1935年7月6日，他任天津驻军司令时，就与国民党政府的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出卖河北主权的《何梅协定》。如今，这位关东军司令刚被召回，接替东条的参谋总长职务。

“刚任新职就调走，不好。”木户表示异议，他私下想，梅津可不是个好人选。

近卫又提出一位海军军人，即在“二二六”事件中曾差一点遇害的年迈的铃木贯太郎。“他跟我一起在枢密院工作，”院长原嘉道说，“我很了解他。他决不会接受。”平沼提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大家反应冷淡，没有再议。

米内又提出一名陆军军人小矶国昭，“这人不错，有能力，又勇敢。他在我内阁中任职时，我很了解他。”米内介绍说。

“他与陆军相处得如何？”木户问。

“我想是不错的。”阿部大将回答道，“他与东条不同。”

“他是第一流的人物，笃信宗教。”平沼评论说。

“我不反对，”若槻说，“虽然我并不了解他，”

冈田认为，他们物色人选太仓促了，近卫同意他的意见。这样便使争论变得冗长而无结果。最后，他们只好让天皇在3个陆军军人寺内寿一，烟俊六和小矶国昭中选择一个，时钟已指向晚上8点，他们已经争论了4个小时，由于把责任推给天皇，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木户立刻启奏天皇，建议在作出选择前先问问陆军寺内能否回来。答复是东条提出的，他为梅津大将接任他的参谋总长一事刚好在宫里。东条反对在这一紧要关头解除寺内南方军司令的职务。这样便只剩下烟俊六和小矶国昭了，而天皇在考虑了木户的陈述后，选中了后者。

夜里，近卫辗转不眠，开始为小矶担心。他能控制住左翼分子吗？他能保持独立于陆军吗？也许应采取二人联合首相制，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例如小矶和米内的结合。既然米内自己举荐了小矶，俩人显然是能相处的。

第二天上午，他与平沼男爵商讨了这个问题，平沼认为这个主意很好。

更重要的是宫内大臣木户也同意。但米内不愿任首相。他既然拒绝东条让他入阁的邀请，现在却接受显赫得多的职务是“不恰当”的。不过，他答应出任海相。

近卫非常高兴，好像米内已接受了联合首相职务一样。米内入阁，又有木户和天皇强有力的支持，那也无异于联合首相。

次日下午，小矶大将从朝鲜返回日本。事先没有给予说明，他就立刻被带到侍从室旁边的候见厅。他的外名叫“朝鲜之虎”，与其说是因为他的长相——斜视的猫眼、扁平的鼻子、紫紫的嘴唇，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朝鲜人民的残忍，小矶喜爱酒宴，绰号“日本的秃头冠军”。他知道自己很可能被任命为首相，口袋里已带了一份要担任内阁职务的在朝鲜的亲信名单，但米内一进来就使他的希望大大缩小，他还来不及向米内发问，木户就来领他们俩去见天皇陛下。该谁走在前面？小矶问。木户回答说：“小矶。”但天皇对他们二人却一视同仁。天皇说，他们二人应协力组阁，并警告他们不要与俄国对立。

米内同小矶一样迷惑不解。拜谒完毕后，米内问木户，究竟谁是首相。“当然是小矶。”木户说。

小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对话呀！他转问米内：“你想担任什么职务？海相？”

“我所能担任的只有这个职务。”米内回答后，小矶才完全放心了。

东条被迫辞职使他的“东美龄”夫人松了一口气。她每天为丈夫会遭暗杀而担心，现在至少危险算暂时过去了。说来也巧，正是在东条刚辞职的那天，7月20日，他的盟友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刚从炸弹爆炸中死里逃生。特别是当她从报纸上看到希特勒挨炸后，被凯特尔搀扶着的那张狼狈十足的照片时，简直吓呆了。“谢天谢地，总算下台了。”她的推想是正确的。例如，高木将军取消了他要枪杀东条的计划。东条此时已成了纯粹起咨询作用的高贵的“重臣”。

东条下台了，但小矶内阁并不比东条好，它实际上仍是“没有东条的东条内阁”。7月22日，小矶内阁正式宣誓就职。在皇宫举行第一次内阁会议后，这位“朝鲜之虎”、露骨的扩张主义分子发表政策声明，决心团结大和民族，坚决地把侵略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还妄想称霸亚洲和太平洋，继续沿着东条的道路走下去。正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菲律宾之战

日本舰队几覆没 莱特战后险更多
满腹愁肠对谁讲 小矶首相无奈何

东条下台后，日本的战局并没有丝毫好转，特别使新首相小矶国昭惶恐不安的是菲律宾莱特湾之战，这是一场关系到日本海军命运的决战。早在 11 月 8 日，小矶在一篇广播讲话中，把莱特湾之战，比作 1582 年决定由谁来统治日本的天王山之战，妄想一举扭转战局，如今却一败涂地，日本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怎能不使他伤心发愁呢！

美军占领马里亚纳主要岛屿之后，就突破了日本大本营于 1943 年 9 月规定的“绝对确保”的防御线，根本地改变了日本的战略态势。此后，盟军可以任意选择进攻目标，甚至轰炸和进攻日本本土。这时，以对外掠夺和海上运输为基础的日本战争经济的弱点，日益暴露无遗。战略物资储备已消耗殆尽，经济实力日渐衰落，加以马里亚纳陷落后，日本海军机动性能锐减，而盟军舰队和潜艇更为活跃，因此，日本海上运输船舶的损失日甚一日。早在 1943 年 9 月，日本政府就撤销了商工省和企划院，设立了军需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资源生产飞机和船舶。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弥补不了损失，如 1942 年 11 月底，日本拥有 594 万吨商船，到 1944 年 10 月底只剩下 290 万吨。

根据新的形势，1944 年 7 月 21 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决定，要加强菲律宾、台湾、琉球群岛、日本、千岛群岛这一带水域的第一道防御线，以防盟军一旦在这防御线上的任何地方发动进攻时，都能集中陆、海、空军力量阻截和消灭敌人。在这条战线上的作战，统称带有决战性质的“捷号作战”。

根据大本营的决定，各个方面军都作好进行决战的准备。规定菲律宾地区为“捷一号作战”；台湾、琉球群岛为“捷二号作战”；日本本土为“捷三号作战”；千岛、库页岛等地为“捷四号作战”。

8 月 4 日，日本联合舰队得到大本营的指示，要在菲律宾方向作战，在决定性的海战中打垮敌人。为此，要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和巴洛德两机场为第一和第二航空队准备基地。水面舰艇的兵力是：第一机动舰队配置 7 艘航空母舰，第二舰队拥有 5 艘战列舰和 11 艘重型巡洋舰，第五舰队有 3 艘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空军由第四军担任菲律宾防务。陆军建立第三十五军，以保卫菲律宾群岛南部，该军属第十四方面军统辖。以这些兵力准备迎击美军的进攻。

这时，美军在太平洋上已拥有海空军优势，可以任意选择进攻目标。但由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总司令，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和海军上将尼米兹意见不一，各有主张。前者要迅速占领菲律宾，以实现他在 1942 年春天离开菲律宾时许下的诺言：“我还要回来！”后者认为在棉兰老取得空军基地之后，孤立吕宋，进攻台湾和中国沿海，进而打击日本本土，这样会缩短战争的进程。而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厄内斯特·金各支一派，都为自己的部下撑腰，僵持不下。最后，罗斯福总统只好亲自出面协调，于 1944 年 7 月底跑到珍珠港，召集这两位将军开会，希望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会上，麦克阿瑟向罗斯福力陈占领菲律宾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这位总统也表示信服，虽然这次会议没有作出具体决定，但从以后的事实看来，尼米兹显然是作了让步。

日、美双方之所以都把菲律宾作为决战的首要战场，主要是这里的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菲律宾群岛由 7000 多个岛屿组成，离亚洲大陆约 500 海里，在台湾以南 230 海里。它从棉兰老岛起向北延伸，通过比萨扬到最大、最重要的岛屿吕宋，共长 1150 英里。

只有 11 个岛的面积超过 1000 平方英里，其中棉兰老和吕宋两岛占陆地总面积的 2/3 以上。莱特是菲律宾群岛的心脏，它的海湾宽广，是招引海上进攻的好地方。特别重要的是，菲律宾是防卫日本本土的最重要的屏障。

1944 年 8 月，尼米兹命令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从南太平洋北上，接替斯普鲁恩斯指挥中太平洋舰队，并计划参加即将到来的对菲律宾的进攻。为了给进攻菲律宾的部队准备前进基地和后方供应基地，哈尔西的部队要在 1944 年 9 月 15 日拿下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以及帛琉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犹里蒂珊瑚岛。此外，哈尔西还要支援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于 9 月 15 日攻入摩罗泰，然后再向菲律宾南部和中部进军。

9 月初，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在他的旗舰“新泽”号上与第三十八突击队会师，并开始对菲律宾中部进行空袭，以便对即将进行的进攻摩罗泰岛和佩列流岛给予战略支援。空袭结果令人振奋，美第三十八突击队以损失 8 架飞机和 10 名驾驶员的代价，击毁日机约 200 架，炸沉货船 12 艘、油船 1 艘。哈尔西从这次空袭中得出结论，菲律宾中部日军防御空虚，因而他急电尼米兹，建议麦克阿瑟尽可能早日进攻莱特。尼米兹把这个决议转交当时正在魁北克开会的美国参谋长们。他们在征得麦克阿瑟同意之后，就命令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联合起来，于 10 月 20 日向莱特发动进攻。

首先，美国西南太平洋部队和中太平洋部队协同一致，于 9 月 15 日对日军控制的两个岛屿摩罗泰和佩列流发动突然袭击。西南太平洋的第七两栖作战部队越过了重兵防守的哈马里拉岛，运载 2.8 万名部队，一举攻下了摩罗泰岛。岛上日本守军几百人仓皇逃入山中。美军工程兵很快就在摩罗泰修建好两个轰炸机场和一条战斗机跑道。

进攻 4 公里长的佩列流岛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岛上日军约 1 万人，一半是精锐部队，并且贯彻了日本大本营的最新指示，采用纵深防御，负隅顽抗。美军伤亡 1 万人，直到 1945 年 2 月才完全肃清了岛上的残敌。

9 月间，美军还占领了附近的小岛安戈尔和东北部的犹里蒂岛。这两个小岛也作为空军基地和后勤基地，为进攻莱特提供了方便。

对菲律宾群岛的空袭是从 10 月份开始的。美国第三舰队的任务是打击菲律宾的北翼。10 日空袭琉球群岛，11 日袭击吕宋机场，12 日开始，连续 3 天轰炸台湾。据累计，在 9、10 月间，第三舰队在一系列的空袭中，炸毁日机 1200 架以上，其中很多是新近从日本本土起飞的。

以中国为基地的第二十轰炸机队的 B—29 和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的中程轰炸机，也袭击台湾和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日本空军基地、军舰和运输船只。

美国第三舰队的舰基飞机和其他地区空军的广泛出击，收效良好，使麦克阿瑟的进攻部队平安到达莱特地区。这支大军由 700 艘舰只组成。海军中将金凯德指挥的第七舰队提供海空支援，它分为南北两个突击队轰炸莱特和阻击敌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鲁洛上将指挥地面部队：第十军偕同北路突击队登陆，第二十四军随同南路突击队进攻。从 10 月 10 日到 15 日，他们分为几个梯队向莱特进发。

在麦克阿瑟的目标莱特岛上，日本守军只有第十六师团，不到 2 万人。

这支部队是在 1941 年圣诞节前夕在吕宋东岸登陆的，在参与夺取马尼拉之役后，曾在巴丹作战。但这支部队现在的大部分成员，包括司令官牧野四郎中将都是新换来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个师团在日本的名声也不好。他们大都是从京都、大阪地区征集来的，“做生意还可以，打仗却不行”。

莱特像个楔子插在两个大岛之间，东北面是萨马，南面是棉兰老，形状像颗日牙，牙根指向棉兰老。其东海岸沿莱特湾是一片长 35 英里的肥沃平原，海岸空旷，没有暗礁保护沙滩，是理想的登陆作战地点。但进入内陆几英里后，麦克阿瑟的部队就必须越过地形复杂的沼泽地、河流和水稻田，在雨季时除非走大路，否则几乎无法通过，而雨季已经开始。岛上其余的地方是山区，到处是茂密的森林，攻或守同样困难。岛上还有众多的小股游击队，他们经常袭击日本人，对麦克阿瑟部队的登陆起了有力的配合和支援作用。

岛上人口约 100 万，除了 3000 多名华人和少数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外，都是靠种田和打鱼为生的比萨扬人。主要作物是水稻、甘蔗、玉米和椰子，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富饶的鱼米之乡。

此时，在东京方面，大本营为了加强菲律宾的防务，迎接美军的进攻，解除了黑田将军的菲律宾方面军司令官的职务，因为他散布了悲观情绪，曾经公开地预言，日本陆基飞机不能挫败美国的海上力量。接替他指挥各岛地面部队的是早期取得胜利的英雄之一、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在新加坡战役以后，山下被调往满洲去训练部队。山下接到命令后心神不宁，他在南下途中私自对他的亲信作战参谋说，他深恐菲律宾战役“将是又一次凑川之战”，是一场指挥官一开始就知道没有希望打胜的战役。但是，他却不能向其他的参谋人员流露他的悲观情绪。

山下奉文于 10 月 6 日抵达设在马尼拉附近的第十四方面军司令部后，对幕僚们动员说，日本之命运就看这场战斗的结局了。

全体将校都有“重任”，要坚决战斗，树立必胜信心。“如果我们大家都记住这点，日本陆军必将最后胜利。”尽管山下反复动员，但他的部下对战争前途仍没有信心，全军上下充满着忧郁绝望的情绪。

但是，日本海军将领却没有像陆军那样泄气。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决心冒死决战，要在菲律宾海域进行“捷一号作战”，消灭美国海军主力。他认为，如果日本失去菲律宾群岛，那么日本同荷属东印度之间的生命线被切断，日本就会失去石油供应，而且本土也就难保了。因此，他要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舰艇，进攻在莱特湾登陆的美军。

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使东条顾问、陆军作战局长佐藤贤了将军甚为忧愁。他想，如果海军败北，陆军“决战”还有多大把握？“联合舰队不仅属于海军，也属于国家，它的毁灭将使本上无法防止敌人入侵。只有舰队的存在才能使敌人不敢妄动。”他用哽咽的声音说，“所以，请诸位慎重。”

“我非常感激，”海军作战部长中泽将军说，“我现在才知道陆军如此器重联合舰队。”他请求“死得其所”。菲律宾将是最后的机会，“请给联合舰队一次机会开出死亡之花。”他的声音颤抖着。

佐藤禁不住流泪，也无法再辩论。他痛快地表示同意。就在这天下午，天皇同意了“捷一号行动”。

正当大本营如何谋划阻击美国的进攻时，一支由 420 艘运输舰和 157 艘军舰组成的庞大的美国舰队，在菲律宾以南好几千平方英里的海面摆开阵势，逐渐向荣特湾驶去。领头的是支援炮击部队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10月19日刚刚拂晓，他们驶进莱特湾，开始炮击登陆地段的海滩。与此同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则攻击比萨扬的各个空军基地。这一地区残存的日本航空兵力几乎全部被摧毁。

为庞大的进攻舰队的到来所做的准备工作终于完成。当晚11时，舰队在莱特湾以东17海里的海面汇合，在迪纳加特和荷蒙汉两岛上的标志灯的指引下，缓缓地驶入进口处。广播喇叭里放出新教和天主教的祈祷声，不少人感觉到好像是参加一场隆重的葬礼。隐隐地可以听见驱逐舰在前方向登陆地区炮击的沉闷炮声。

10月20日，东方刚刚放白，3艘美国战列舰开火打破沉寂。杜拉格附近的“紫滩”和“黄滩”一带升起一团团灰色浓烟。7时许，另外3艘战列舰加入炮击，他们的目标恰好在莱特岛首府塔克洛班下方的“白滩”和“红滩”。不到一小时，运输舰沉着地驶过水平如镜的海面，进入离岸7英里的位置。各战列舰停止了射击，以便让巡洋舰和炮舰开得更近一点继续炮击。隆隆的炮声突然被一片可怕的嗖嗖声所掩盖，数以千计的火箭同时从炮舰上飞上天空。几秒钟后，只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整个海岸线成了“一片火海”。待浓烟消失后，那些站在运输舰上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前长着茂密树木的海岸，现在却成了“一片荒凉、乱七八糟、烟雾弥漫、尘土覆盖的废墟”。

到20日日暮时，6万名进攻部队和10万吨物资和装备已经上了岸。莱特湾两岸的滩头阵地都扩大到1英里以上，塔克洛班飞机跑道也落入美军之手。日军大多退到西北部山区事先准备好的阵地，滩头抵抗甚微，与进攻太平洋上其他岛屿相比，莱特的登陆算是比较顺利的。

当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得知美军先头部队已在莱特湾登陆时，他马上命令日本机动部队分4路向菲律宾进军。18日下午，停泊在林加岛的，由栗田武雄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一突击舰队，离开锚地北上，经锡布延海，从北面进入莱特湾，以打击美国舰队，在滩头附近攻击美国两栖部队的运输舰只。

栗田舰队的其余舰艇——2艘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由西村章二海军少将率领，开向莱特湾的南口，从南部打击美军，配合栗田南北合击。

停泊在琉球群岛北部天见岛的清英志摩的第二突击舰队，在接到丰田命令后，率2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立即驶向莱特湾南口，与西村章二合作，打击美军。

泊在日本内海的小泽治三郎的主力舰队，也迅速南下菲律宾海域，其任务是引诱美国第三舰队离开莱特湾附近到公海来决战，使美国舰只无人掩护，好让栗田等突击舰队进攻。

为了使自己的舰队能最大限度地避开美国的搜索机，栗田决定让舰队的大部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一个由西村祥治中将率领的由两艘老战列舰和四艘巡洋舰组成的支队，则走南面距离短得多的近路进入莱特湾，集中攻击美国运输舰及其护航舰只。

栗田已准备最少损失半数舰只进行决战，但他的部下许多军官公开反对这种蓄意的冒险。于是栗田在他的旗舰、重型巡洋舰“爱宕”的甲板上，召集各级指挥官及参谋人员开会，发表了“激昂”的讲话。他说，战局比他们所了解的要危急得多。“如果国家亡了，却保持舰队完整无损，岂不可耻？我认为，大本营正给我们一个光荣的机会。你们必定记得，世界上是有奇迹

这种事情的。谁敢说我舰队没有机会在决战中挽回战局？”

栗田的讲话，博得了东洋军一片“万岁！”的欢呼声。

这时，美国第三、第七舰队正在四处搜索日舰，准备决一雌雄。这两支舰队实力雄厚，计有轻、重型航空母舰 16 艘、护卫航空母舰 18 艘、战列舰 12 艘、防空巡洋舰 2 艘、轻重巡洋舰 24 艘、驱逐舰 144 艘。此外，还有若干潜艇在菲律宾海域活动，监视和袭击日舰。

10 月 22 日，在靠近巴拉望岛暗礁的湍急水域中，有 2 艘美国警戒潜艇“飞鱼”号和“鲛鱼”号在水面上并排巡逻。零时 16 分，“飞鱼”号发现日本舰队，艇长麦克林托克随即把这一情况告知“鲛鱼”号艇长克拉杰特。“我们上去干掉它们！”克拉杰特回话说。于是，“飞鱼”号在前，“鲛鱼”号在后，全速追赶。到清晨 4 时 50 分，他们接近日舰，“飞鱼”号上的全体人员都已进入战斗岗位。5 时 10 分，“飞鱼”号掉转航向，潜入水下。在晨曦中麦克林托克通过潜望镜看到远处一大片灰色物，一列日本舰队正迎面朝他开来！他向东南看去，发现若干海里外又是一列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迎面朝他驶来的灰色的舰只变得越来越大。5 时 25 分，麦克林托克认出为首的一艘是重型巡洋舰，舰首掀起巨浪。这时，所有的鱼雷发射管已作好准备，在距离刚好不到 1000 码时，日舰队向西转，构成极力理想的角度。“发射！”麦克林托克下令，接连发射了 6 枚鱼雷。他第一次发射的鱼雷，正好奔向“爱宕”。在舰桥上的栗田及其参谋长小柳富次海军少将，突然觉得舰身连续 4 次大震动。这艘巡洋舰开始下沉，给一艘驱逐舰打了信号，于是栗田及其幕僚人员就游泳到这艘驱逐舰。

在“鲛鱼”号上，克拉杰特通过潜望镜仔细观察到这一情景。“我的老天爷！”他喊道，“真像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的情景！一艘正在下沉，一艘在燃烧，日本人在胡乱打炮。真好看！做好准备，他们来了！”他研究了朝他开来的两艘日舰，“让他们过去，它们不过是巡洋舰。”后边是一个更大的目标，他误认为是“金刚”级的战列舰。“发射一！发射二！发射三！发射四！发射五！发射六！”克拉杰特命令，之后，潜艇急速返航，“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们听见鱼雷击中目标的声音，以及劈啪劈啪的爆裂声。重巡洋舰“摩耶”解体了。就这样，栗田还没有到达菲律宾中部的危险海面，就已丧失了两艘重巡洋舰，第三艘“高雄”的情况也很糟，只好驶回婆罗洲。

拂晓，其时已是 10 月 24 日，栗田登上新的旗舰——巨大的“大和”舰。他的舰只排成两个圆形阵，彼此相距 7 海里。“大和”和它的姊妹舰“武藏”部署在第一组的中心；“金刚”在第二组的中心。“大和”的甲板上好像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宝塔，栗田的战斗指挥部就设在接近塔顶的信号甲板上。

上午 8 时刚过，栗田的舰队又被美国探索机所发现。他急忙电请马尼拉派战斗机掩护。能派出的“零式”战斗机不过 10 余架，但一架也没有飞抵第一进击舰队的上空就被美机击落了。

话说哈西尔将军在锡布扬海发现了栗田的舰只后，紧追不放，一如以往亲自指挥战斗。8 时 37 分，他通过舰对舰无线电话，直接向他的特遣部队的 3 个指挥官下令：“攻击！攻击！祝你们胜利！”不到两小时，参加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从“无畏”号和“卡伯特”号上起飞的 12 架战斗机以及同等数量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向“大和”扑去，进行猛烈的轰炸。只见“大和”前方和左方四周突然升起 6 很大水柱，接着就倾斜了。时间不久，

具有 6 万吨的“武藏”号也被鱼雷击中。就这样从 10 月 23 日到 26 日，连续 4 天的海战中，美国舰队共击沉日本战列舰 3 艘，航空母舰 4 艘、轻重巡洋舰 10 艘、驱逐舰 9 艘，使日本总计损失战斗舰只 30.6 万吨。美国方面只损失轻型航空母舰 1 艘、护卫航空母舰 2 艘、驱逐舰 3 艘，共计 3.7 万吨。这是美国海军的一大胜利。日本海军几乎全军覆灭。现在的残余舰队，除了在保卫本土方面还能起次要作用外，再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了。

日本舰队在遭受这次惨败之后，分头逃回各自的锚地。但在莱特岛上，日本陆军仍按东条原先的决定进行陆上决战。他们迅速从菲律宾其他岛屿调集 4 个师团的援兵，还从上海调去精锐的第一师团。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到 1945 年 1 月 1 日，莱特战役基本结束，但美军还要进行小规模战斗，以肃清残敌。在莱特战役中，日军地面部队伤亡 7 万人。美军地面部队总共伤亡 1.5 万多人。

还在莱特战役期间，美军就在民都洛岛登陆，以便取得进攻吕宋的基地。进攻吕宋的日期定为 1945 年 1 月 9 日。此时山下奉文的第十四方面军在吕宋已增至 25 万人。岛上只有 150 架日本飞机，但日本海军第二十六空战部队司令有马正义想出一个新花招：他驾驶一架载有鱼雷的飞机，直冲美国军舰，进行自杀突袭。于是，日军中便出现一大批这种亡命徒式的“神风特攻机队”，使美国军舰遭到可怕的损失。从 1 月 4 日开始，到 13 日最后一架日本飞机完蛋，10 天之中共炸沉 17 艘美国舰艇，重伤 20 艘，轻伤 30 艘。

山下奉文失去海空军支持，孤立无援，很少有守住吕宋的希望。因此，他计划进行拖延战术，尽量阻挠吕宋落入美军手中。他把部队分为 3 组：北部 14 万人，防止盟军从仁牙因登陆；中部 3 万人，保卫克拉克机场设施；南部 11 万人，保卫南吕宋。

1945 年 1 月 9 日，美国第六集团军的 4 个师在仁牙因湾登陆，31 日占领克拉克机场及其要塞等设施。2 月 3 日，美军进抵马尼拉外围，但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美军才肃清了菲律宾首都的日军。此后，吕宋的日军退往东部山中负隅顽抗，直到 1945 年 9 月上旬才全部投降。

美军在莱特登陆时，菲律宾抗日军为了配合盟军的攻势，即对日军展开了大反攻，解放了许多地方，其中包括邦板牙省首府圣费尔南多，打拉省首府打拉、内湖省首府圣克鲁斯。人民抗日军还在新怕施夏、邦板牙和内湖三省建立了省级政权，任命了省长，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为解放自己的祖国、打击日本侵略者而建立的不朽功劳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

菲律宾已从日本法西斯铁蹄下获得解放，现在除了硫磺岛和冲绳岛之外，日本本土已暴露在盟军面前，更可怕的事情在等待东条和小矶。正是：西风落叶鬼凄凄，灾祸临头在旦夕。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七章 政府危机

日军连续吃败仗 举国上下人心慌
硫磺冲绳军情急 小矶内阁命不长

小矶国昭接替东条英机刚过半年，就爆发了严重的政府危机。中国敌后的反攻、莱特和硫磺岛的陷落，使小矶将军的内阁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硫磺岛的失守，在日本引起了难以估量的震动；再加上美机连续轰炸东京，全城一片火海，举国上下人心惶惶。

硫磺而是小笠原群岛的中心岛屿。它在塞班以北 625 海里，东京以南 660 海里，是远程轰炸机的理想中继基地。“超级空中堡垒”如果受伤可以利用它作紧急着陆点；航程较短的 P—51 “野马式”战斗机可以从这里出发护送 B—29 到日本，从海上望去，硫磺岛像一条半浮半沉的鲸鱼。它长约 5 英里、宽 2.5 英里，从空中望去则像一块肥猪排。该岛最明显的特点是在狭窄的南端有座死火山，山高只有 556 英尺。耸立于海上，显得格外威武雄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折钵山。

这座火山虽然不活动，但整个岛屿蒸汽弥漫，到处是沸腾的硫磺坑，显得生气勃勃。沿海的悬崖峭壁与折钵山加在一起，像宣布罗陀。然而，当地的居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担心这个岛随时可能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

硫磺岛呈三角形，北部宽，是个海拔约 350 英尺的高地，海滩上岩石遍布，无法通行，但靠近南端折钵山的宽阔地带却适合于两栖登陆，海军陆战队的登陆地点选在其东面的海滩，但看来是黑沙的沙滩，实际上却是轻松柔软的火山灰，身体较重的人踩下去会陷到膝部。虽然长年受风吹雨打的海滩和高原并没有多少天然作物，但在小山上及山谷里却是茂密的丛林。

硫磺岛是一连串岛屿中的一个。这一串岛屿像一串连结得很松散的项链，从东京湾进口处开始，一直挂到离马里亚纳群岛 300 海里处：首先是伊豆群岛，然后是小笠原群岛。最后是大山列岛，该列岛由南北一线的 3 个小岛组成，硫磺岛居中。

1861 年日本宣称，小笠原群岛是小笠原公于 1593 年发现的，从而把它全部吞并。20 年后，日本政府把第一批定居者送到硫磺岛。从此，同这一串岛屿中的其他岛一样，它由东京府作为日本本上的一部分加以管辖。

到 20 世纪 30 年代，殖民者的人数几乎达到 1100 人，他们住在摇摇欲坠的日本式平房中。主要的村落元山位于该岛正中稍偏北，靠近硫磺坑。岛上种蔬菜、香蕉、菠萝、木瓜、甘蔗和谷物供当地消费，但主要的经济却是一家榨糖厂和一家硫磺加工厂。糖厂办得很糟，后来不得不改为草药加工厂。岛上有所小学，有 7 名教员；还有一家小旅店“太平轩”和一个有 3 名女招待的酒吧间。一年有 6 班船从日本来到这里，给当地带来日用品、访问者和新闻。

在这一连串的岛屿中，只有硫磺岛适于建造机场，但多年以来，帝国海军除了在该地建立电台和气象站外，不大注意该岛。1940 年马渊建设会在折钵山麓附近开始修建一个有两条长约 1 英里跑道的机场。翌年春，一名海军大尉带着 93 名士兵来建设炮台，一下子来了 20000 名工人，直到 1944 年初马绍尔群岛被美军攻陷时，硫磺岛才得到大本营的充分注意。第一任司令官和恒藏中佐带了 5000 名小兵登陆驻守。于是，开始在中部建造第二个机场。刊 5 月末，陆军也派了 5170 多人驻守。6 月，为了加强岛上防御力量，

东条派栗林忠道陆军中将到硫磺岛建立第一九师团司令部，并担任全岛总指挥。临行前，东条对栗林特别强调了硫磺岛对防卫日本本土的重要性。他说：“军部和国家就靠你去守卫这个重要岛屿了。”

栗林来到硫磺岛之后，首先按照东条的指示疏散平民，加速在多孔的火山岩中建筑地下防御工事，他决定在纵深地区坚守，而不是集中力量在海滩消灭敌人。到仲夏时，硫磺岛已是洞穴星罗棋布，地道纵横交错。栗林准备利用纵深坑道工事，坚持持久战。

1945年2月16日，美国第五舰队完成了支援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攻入菲律宾主要岛屿的任务之后，就开始了硫磺岛的进攻，岛上有飞机场两个（这时正在修建第三个），是日本与马里亚纳群岛空中联系的唯一中继基地。盟军一旦占有硫磺岛，陆基飞机即可直接袭击日本本土。硫磺岛的地形很利于防守，东北部是熔岩高地，南端是海拔550英尺的折钵山。日军把炮位集中在该岛两边的制高点上居高临下，控制着四面的海滩。此外，日军还在高地上修筑了400多个地堡和火力点，有坑道贯通其间。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日军竟派出海陆军2.3万人防守该岛。

美国舰队把事先侦察清楚的目标都在地图上标明了，每摧毁一个就划去一个，新发现的目标就加到控制图上。美军开始炮击之后，日军马上还击，但重型海岸炮却保持沉默，以免暴露目标。17日上午10时左右，当12艘步兵登陆炮舰掩护水下破坏小组进抵东海岸时，日军以为登陆开始了，这时重型海岸炮开始射击，打沉了9艘炮艇，打伤了3艘。于是美国战列舰便对准新的目标猛烈射击。舰基飞机在确定日军炮位和投掷凝固汽油弹烧毁障碍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月19日，美军开始登陆，特纳海军中将亲自指挥两栖支援部队。第五十八突击队也派出100多架飞机在岛上盘旋，发射火箭和进行机枪扫射，投掷普通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一时间，尘土飞扬，烟云蔽日。约近500艘登陆艇把海军陆战队第四和第五师的8个营的士兵运到海滨。上午8时30分，第一批登陆部队乘坐68辆两栖装甲车驶向海滩。海军立即给予相应的炮火支援，同时50多艘步兵登陆炮艇也向前提供近距离的支援。但因海岸陡峭，美军战士逐级攀登，伤亡很大。2月19日这一天，有3万名陆战队员上了岸，但伤亡2400多人。后来，美军分左、中、右三路进军。2月20日，中路陆战队员拿下了第一号机场；右路向东北高地推进；左路开始向折钵山进攻。

120架舰基飞机用火箭、燃烧弹和炸药对东南海滩、折钵山进行密集轰炸，这些飞机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飞机一走，又恢复炮击。整个海岛烟尘弥漫，火光冲天。

日本人的抵抗仍然比美国人预计的顽强。为了对付美军用火焰喷射器喷射坦克，他们采取拼命战术：志愿者将炸药捆在自己身上，变成活的饵雷，隐伏在美军坦克经过的路上，使美军受到很大的损失。

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国海军的支援舰艇发射炮弹近30万发，约1.4万吨，舰基空军的支援也有显著的效果。虽然如此，岛上许多防御坚强的据点，还是由步兵在坦克的近距离支持下，一个一个摧毁的。美军本来计划5天拿下硫磺岛，但结果整整打了1个月的硬仗，直到3月26日才宣布占领硫磺岛。

整个战斗算结束了，只是3天后，还约有350名海陆军军人，包括40名大刀队员在内，高喊“万岁”进行最后一次冲杀。他们从岛西北端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像穴居人一样半裸着身子爬出来，狂热地冲杀，一路上见什么

就攻击什么。他们的疯狂袭击使美军蒙受很大损失。经过一整天激烈的白刃战，才杀掉 2/3，把其余驱散。

次日清晨，即 3 月 27 日，在转移时受了伤的栗林将军，带着他的一个名叫中根兼次的参谋来到自己的山洞口，栗林脸向北，朝皇官方向跪了下来，庄严地叩拜 3 次。他用刀刺进自己腹部后，头垂下来。中根举起军刀，朝将军的脖子砍下去。在一名军曹的帮助下，中根掩埋了栗林的尸体，爬回洞内，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栗林的参谋长高石正大佐，然后与高石一起回到栗林切腹地点。两人都开枪自杀。

硫磺岛一役，使美海军陆战队阵亡 7000 人，负伤 1.9 万人。按这一战役的时间之长和伤亡人数之多，是美军在第二次大战中所罕见的。在 2.3 万名守岛的日本军人中，只有 3000 多人活了下来。这 3000 多人中，有 216 人当了俘虏，其余的也都已丧失战斗力，他们像被猎的野兽一样缩在又闷又热、充满硫磺气味的山洞里——腹饥、口渴、绝望和惊恐。他们过着现代人类所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

美军占领硫磺岛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东京和日本其他本土的轰炸。夜间的空袭目标通常都在居民区，这比日间空袭带来更大的恐惧。3 月 9 日午夜前后，空袭警报声划破夜空，接着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向东京扑来，在市区倾泻下数以千计的燃烧弹。火越烧越旺，成了广泛蔓延的大火。巨大的火球以暴风骤雨之势从这幢建筑物跃至另一幢建筑物，构成白热的浪潮，温度竟达华氏 1800 余度。

东京市中心燃烧得犹如太阳一样炽烈。阵阵浓烟卷向空中。街上到处是歪七扭八倒塌的房屋，到处是死尸，有些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全身漆黑；有些双手合十在祈祷；有些则奇形怪状地站着；有些在那里似乎冥想着什么。有一具尸体的头已缩小到抽子一样大小。一座学校的院子里尸体堆得高高的，上面盖着稻草。空气中充满着死尸的臭味。有 16 平方英里的东京市区被烧为平地。市政官员后来估计死亡 13 万人。

在国外战场连续失利、日本本土横遭轰炸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个生产大幅度下降，终至一蹶不振。据联合国盟军总部统计，如果以 1937 年为 100，日本的生产总指数在 1944 年达到 144 而到 1945 年一下子就降到 57。造船工业的生产，1944 年最高时为 158.4 万吨，到 1945 年一下子就降为 49 万吨，远远弥补不上日本舰艇，船舶的损失。飞机制造业的生产在 1944 年最高时为 28392 架，到 1945 年则猛降为 1.1 万架。其他生产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也就宣告了日本战争经济的彻底破产。面对这种局面，1945 年 6 月召开的一次御前会议的报告哀叹：“随着战局的紧迫，陆海交通及重要生产日益停滞不前，粮食的紧张也日益严重，因而综合地发挥现代化的物的战力则极为艰难。”

与此同时，日本军费则无限地膨胀，到 1944—1945 年预算年度时，日本政府编制的非常时期军事预算达 380 亿日元，竟占国家财政岁出的 85%。这是骇人听闻的军费预算。然而，日本的财源早已达到枯竭的地步。日本广大人民的血汗都被法西斯统治集团榨干了。反动统治当局又拼命滥发国债，但也远远填不满战费的无底洞，结果，弄得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垮到底。

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把日本这个国家弄得民穷财尽，满身疮痍，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由于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连广大人民维持生命的口粮都难以为继。战争末期，即 1944 年末到 1945 年春夏，日本反动统治

当局只许 11 岁至 60 岁的人，每天领大米 330 克的配给量，有时还领不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也只能领到 390 克的配给量。其他生活必需品也非常匮乏，因而黑市猖獗，人民怨声载道，反战厌战情绪日甚一日。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勤率不断提高。

1943 年 10 月至 1944 年 9 月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包括军工生产在内的企业部门，工人缺勤率达 20%，后来竟增长到 49%。这就是说，在战争末期，经常有几乎一半的工人用实际行动拒绝为侵略战争服务。不仅缺勤率高，消极怠工现象更为普遍。仅据日本官方统计，1944 年就发生 216 起大的怠工事件。人民不仅散发反战传单，匿名投书，而且发展到公开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这些都是日本法西斯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也是日本法西斯统治上崩瓦解的预兆。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内阁书记长官迫水久常在 1945 年 6 月惊呼国内出现了“对现存制度的不满”！

日益发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使小矶国昭的内阁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小矶是被有意识地扶植上去当过渡首相的，因此从他任职的那天起，他就没有明确的章法。他和东条不同，他代表不了军方，对这场战争如何打法几乎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对暗中鼓噪的求和活动也毫无影响。对于国家在这样的领导下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的天皇，召见了木户侯爵，建议他有必要就正在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向各位前首相“重臣”征求意见。

木户把“重臣”逐个请到宫内，以免同时进去引起军方的猜疑。这样也使每个人能畅所欲言。但是，除近卫的建议外，别人的建议都含糊糊，考虑不周，或者只是感情冲动地请求坚决打下去之类。近卫认为，除非短期内实现和平，否则日本将陷入灾难的政治和军事深渊。他预见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东欧和朝鲜实现。但是，他又指责那些提出“一场决战”口号的人，是“受了试图使国家陷于混乱，从而实现革命的共产党”的煽动。他说，这些极端分子“不过是披着国体外衣秘密策划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

尽管小矶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但是小矶却还在竭力试图挽救他的内阁。他初则向天皇建议大改组，继而又提出辞职，使天皇莫名其妙。他也向木户提出改组的建议，木户的反应很冷淡。小矶垂头丧气再晋见天皇。天皇只简单他说了句要“慎重研究”。

天皇的话是婉转地暗示小矶下台，但小矶继续献媚取宠。他对东久迩宫说，如果让他复出，他能“把这场战争打好”，可以任命他当陆相。他抱怨说，陆军省一再拒绝他要换掉杉山陆相的请求，他准备直接向天皇提出这件事。天皇还是不表态。

为了挽救自己的政府，小矶已用尽了一切办法。一气之下，4 月 4 日下午他对木户说，他准备次日辞职。内大臣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挑选新首相。按照传统，木户必须首先召集“重臣”征求意见，然后再向天皇提出建议。但是这次却必须立刻进行初步调查，以保证挑选出来的人既能力和谈努力，又能被陆军所接受。

4 月 5 日，在小矶向天皇提出正式辞呈的同时，木户侯爵分别试探了 4 位军方首脑。他说，现在也许是建立“大本营或战争指导内阁”的时候了。这个内阁的首相当然是个军人，不但要能控制国务，还要能控制最高统帅部。然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和陆相杉山都对这样一个内阁表示冷淡。梅津承认，冲绳的战况很糟，4 月 1 日，美军已开始冲绳登陆，但日本“必须准备打到底”。杉山也同样悲观，但仍抱着幻想认为苏联打败德国后可能会向他的

同盟国建议与日本讲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对战争的结局将会如何拿不出定见，他不相信今后即便能打一胜仗就能结束战争。

这 3 个人的意见向木户表明，统帅部私下已认识到，战争是打不赢了，至于第四个人，即海相米内，他秘密鼓吹和平，木户当然是很清楚的。此外，米内已物色到一位合适的首相人选：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木户觉得这个推荐似乎是理想的。这位前侍从长是个“大人物”，天皇亲切地称他力“亲父”。

下午 5 时，所有“重臣”都聚集在宫中，挑选新首相。木户和枢密院新议长也参加，新议长刚好是木户看中的首相人选铃木大将，东条是第一次以“重臣”身分出席会议，他警惕而咄咄逼人，从一开始就使人看出他反对任何主和派人选。全体“重臣”都反对他，但不公开表露出来。他们生怕惊动好战主义者，不能冒公开冲突的风险。

“小矶的辞呈说，无论是国务还是统帅机构都需要改正，”东条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既是提问，又是挑战。

“小矶首相没有加以专门的说明。”木户回答说。

“战争期间政府更迭频繁不好，”东条满有情绪他说，“下届内阁必须是最后一届！目前，国内有两股思潮，一派有人认为，为了确保国家的未来必须打到底；另一派人则想迅速实现和平，即使无条件投降也在所不惜。我认为，我们必须先解决这点。”

“下一届内阁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冈田启介海军大将说。他像铃木一样，在“二二六”事件中死里逃生。“这是一届肩负日本命运到底的内阁，它将集结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战问题不能在这里决定。”

室内一时沉默下来，气氛别扭，两位文官，即平沼和广田，想抚慰东条一番。两人都假情假意他说，战争一定要打到底。“重臣”们开始讨论未来首相必须具备的条件，却没有提出具体的人。一小时过去了，最终还是枢密院议长铃木建议从“重臣”中选择一人担任。“当首相是很累的差使，我想请我们当中最年轻的近卫公爵出任。”

近卫谢绝，他由于自己过去三届内阁所犯的错误以及施政不当而名誉受损。平沼根据这些理由同意不让近卫出任。他先对东条重申战争必须打下去，然后他提出木户和冈田的意中入选——铃木海军大将，在座的都表示赞成。

“我同意。”近卫说。

“这意见很好，”若槻说，“没有再好的人选了。”

铃木自己却反对。他曾答应家里人不接受这个职位。“我记得，我曾对冈田将军说过，如果军人执政，必定会把国家引向失败。罗马的覆亡、德皇的下野和罗曼诺夫皇朝的命运都证明了这点。鉴于这个原则，我不能接受这种荣誉。另外，我的听觉也不灵。”平沼请求他重新考虑：“公众信任你的正直和忠诚。”

就是东条也难以不同意铃木。他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出身军人世家，他兄弟是受人尊敬的一位将军。东条先是对铃木赞扬一番，但对他的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信条却提出异议。“敌人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他挺而走险，可能试图在日本本土某地登陆。那时保卫本土将是生死存亡的事。政府和统帅部必须融为一体。因此，首相必须是现役军人才行。”他提议畑俊六元帅出任首相。

木户控制住自己：“你的意见呢，广田先生？”

“咱们得从陆军或海军里选个能控制和领导他们的人。”

“请发表你的意见，冈田将军。”

除了铃木外，冈田不愿提别人，而东条又断然拒绝铃木。冈田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木户承认，本上不久就将成为战场，因此新内阁必须得到全国的信任。然而，就在这点上他与东条分道扬镳。“我个人意见是，”他说，“希望铃木阁下能出马。”他把脸转向东条：“我们必须以比你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时局。”

东条眼瞪瞪地望着木户。直到此刻之前，他一直抑制着他对木户的憎恨心情。他认为，自己的下台是木户造成的。“要非常谨慎，入选不当，我怕陆军会不服。如果是这样，新内阁就会垮台。”

这句话，与其说是吓倒了木户，倒不如说是激怒了他。“陆军不服可是非常严重，”他说，“你自己是否也这样想？”

“我不能说我不这样想。”

木户寸步不让，“国民也许会不服从陆军！”

东条的高压态度惹得冈田也奋起行动。“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他愤怒地大声说，“一个曾当过首相的人怎敢说陆军会不服！”

东条自知话说过了头。“对不起，”他说，“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我的意见是说，陆军不会同意这样的人选。”

东条孤立了，会议的整个趋势不利于他。

“我将牢记这一切，”木户总结说，“向天皇陈述我的见解，请陛下裁决。”几分钟后，8点钟，会议休会，“重臣”们到附近一间房里进晚餐。饭还没有吃完，木户请铃木同他一起回会议室。“打算请你组阁，”木户对他说，“我们将要你担负重大任务。”

铃木固辞。他认为自己不宜担任此职，也缺乏信心。

木户坚持要他出任。时局大险，不容许他以军人不得过问政治来推辞。

“还不止如此，将军。我们必须向天皇举荐陛下绝对信赖的人。”

铃木投降了，“如果陛下命令我组阁，我就接受，”他说。他的声调既下动感情，也没有丝毫勉强。10时，这位78岁年老弓背的海军大将走进天皇书斋。除侍从长藤田尚德外，只有天皇陛下一人。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命令阁下组阁。”他没有按传统发表几句训诫和组阁条件。

“陛下器重，我不胜欣喜荣幸。但正如在今天下午的‘重臣’会议上那样，我恳请辞去。”不到一小时，他两次变卦。“我不过是陛下一个卑贱的海军军官，对于政治毫无经验。另外，我也没有政见。我的座右铭是遵循明治天皇关于军人不要干预政治的格言，因此，恳请陛下宽恕，我不能领陛下大命。”

天皇裕仁会心地笑了：“铃木，我懂得你的意思，理解你的处境，但在紧要关头，除你之外，没有人能担当此重任。我委你以大任就是这个原因。”

铃木缓缓退出说：“如陛下准许，我想再全盘考虑一下。”但是，天皇的信任已又一次使他改变主意。由于他担任过7年多的侍从长，他还能理解天皇没有说出的话：尽早收拾战局。

在天皇的规劝和授命下，铃木被迫接受了组阁的任务。这一消息传到家，下届首相的独生子铃木一却一夜没有睡好觉。他的父亲在“二二六”事件中曾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穿过胸膛的子弹现仍嵌在背上。毫无疑问，这次他又面临着来自少壮派好战军官的危险。铃木一已经不是孩子了，觉得应该庇护

他的父亲。次日清早他就对父亲老铃木说，他要辞去在农林省的差使，当父亲的私人秘书。

“你别陪我去死，”老铃木说，“我离黄泉已不远，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小铃木不听，他认为在战败的日本，个人的雄心壮志是毫无意义的。

在此局势下组阁，对铃木来说，的确是个难题。他把冈田启介海军大将请到自己家里，要他在新内阁里担任军需大臣。铃木的建议使冈田吃惊不小。他退出海军已7年，但仍是法西斯军官的诅咒对象，冈田发现，铃木周围全是些“好心”但办不了事的外行人。连电话都用不好，更不用说帮他挑选阁僚了，冈田给他的女婿迫水久常打了个电话。“我现在在铃木将军家里，你帮他组阁吧。”他说。既了解政界又了解军界的迫水，是铃木理想的助手。不到一小时，迫水就辞掉在大藏省的职务，当上内阁书记长官。

铃木最初深信自己是最有资格结束战争的人，但在目前，对于应如何进行，他还心中无数。如果他宣布这样的“失败主义”的政策，哪怕只对内阁宣布，他也会被迫离职或遭暗杀。他暂时不得不玩弄一下“腹功”、就是说，在寻求和平的同时假装支持战争。因此，近卫由于铃木没有保证“为和平工作”而拒绝在内阁任职。另一方面，他又匆匆向杉山元帅保证，他将把战争进行到底！还对记者说：“现在是1亿国民都要改变萎靡不振，成为护卫国体的光荣后盾的时候了。当然，我会处理国政，并非你们、我国国民的先锋。我要请你们、我国国民，以勇敢决然的意志，表现出新的战斗力，跨过我的老骨，奋勇前进，以慰皇心。”

此时，铃木还未向任何人透露他“和谈”的策略，但他的儿子铃木一却本能地理解他父亲的心事，便写了一个通知，把他父亲的真实意图告诉亲密的友人。

铃木的新内阁于4月7日成立，不过重要的外相职务还没有人担任。其他大臣基本上是根据“重臣”和迫水的意见选择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铃木看中的是东乡茂德。调查表明，在珍珠港事件期间担任外相的东乡曾不同意与美国开战，后来又因与东条的“独裁高压政策”不合而辞职。此时，东乡正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外交人员喜欢去的避暑胜地。他接到铃木的中间人、长野县知事打去的电话转告铃木的意图。东乡的回答是直率的：要同新首相商谈并“取得一致看法”后才能定下来。除非让他放手工作，否则他不准备再任公职。

然而到东京后，东乡发现铃木不愿放弃“腹功”，即使与观点相同的人密谈时也是如此。下面是他们两人的对话：

“我猜想，你肯就任，心里一定是有主见的。”铃木说。

“现在要处理国务确实不容易，因为战争活动已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东乡用很重的九州口音说。

“我认为我们还能打两三年。”

“即使是我觉得本人能承担外相的重任，只要你我之间对战争前景的看法不同，首相与我就不可能有效合作。”

于是东乡拒绝出任外相。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告终，许多人都认为东乡是主和的，他们轮番给他施加压力。不到24小时，就有6个领导人，包括两个“重臣”和天皇的首席顾问，硬要他出任。例如，冈田海军大将就解释说，铃木的政策“不一定是不能变的”，东乡可以“帮助修正”。冈田的女婿迫水也为铃木辩护：“第一次见面时就谈论早日实现和平，对铃木说来太冒险。”

“这种话如果从首相口中说出，而且又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出口；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响。”

这样的兜圈子东乡实在不懂。对实现和平，如果铃木同意他的意见，为什么在私下交谈中不让他知道呢？如果铃木连他看中当外相的人都不信任，在未来危急的日子里他怎么可能合作？

下一个请求来自内大臣。木户的秘书长松平透露，天皇本人希望结束战争，这种协调一致的邀请使东乡再次来到铃木那里。这次铃木已认识到自己应该更直率一点。“就战争的结局而论，”他对东乡说，“你的观点使我很满意。至于外交，你可以放手去办理。”

东乡仍不愿意出任。他要求得到保证，如果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战争不能再打3年，内阁就要支持和谈。铃木丢掉了一切虚伪矫饰，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东乡的条件。但对局外人，铃木仍继续搞他的“腹功”，装得与东条一样，致力于要苦战到底。

铃木的内阁算是组成了，但是在这危机四伏的险滩里，他要把日本这只破船开到哪里？正是：疾风恶浪破船行，航程艰难万千重。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八章 垂死挣扎

鬼子败极红了眼 特攻飞机撞美舰
孤注一掷不要命 “本上决战”大动员

日本联合舰队，在菲律宾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剩下的败兵残舰也不堪一战了。在盟军攻击冲绳时，恼羞成怒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海军大将，要第二舰队司令伊藤整一中将率领这些残余舰只去袭击停泊在冲绳海面的敌舰。

丰田把这一自杀性的出击通知了联合舰队的所有指挥宫：

“帝国命运确系在此一战。卑职已号召组织一支海面特攻部队，以壮烈无比之英勇突入作战，以此一举振我帝国海军声威，发扬帝国海军海面战斗之光辉传统，荣光后世。各部队，不论是否特攻部队，都要下定决心殊死奋战，彻底消灭敌舰队，为皇国奠定永恒基础。”

当晚在濑户内海，大大小小的告别宴会使第二舰队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及另外9艘军舰充满狂暴喧嚣的气氛。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决别前的一场痛饮。每艘军舰都只有刚够单程航行的燃料，军官们知道此去必死无疑，有去无还。这倒使他们无所顾忌了。他们在高唱《樱花之歌》这首歌时，古村启藏海军少将和“矢矧”舰长原为一大佐离开了他们，随意到舰上各处看看。在水兵船舱，他们发现士兵们在吊床上睡得很安宁。在轮机室，有个轮机兵满身大汗地检查发电机，他对自己的舰长说，他要绝对保证到冲绳不发生电力故障。

原为一舰长深受感动，又加喝过酒，爬上了甲板，他靠着一根柱子站在那里，心里十分激动。“矢矧万岁！日本万岁！”他一边喊，眼泪一边流下面颊。

丰田的参谋长草鹿龙之助中将，是一位参加过袭击珍珠港、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海面航空母舰战斗的者将。他曾极力反对第二舰队的自杀性出击；然而，被选派到濑户内海亲自解释这次任务意义的却偏偏又是他。草鹿于4月6日上午飞往那里。伊藤懂得这次任务的意义，只有一件事需要向这位参谋长问明，“如果我们在途中就受重创，不能继续前进，那该怎么办？”

草鹿无法解决他的问题，“这要你们自己去决定。”于是，他们干了最后一杯酒。

“我明白了。”伊藤说，“请不必为我不安。我的心情很平静。我没有值得遗憾的，我心甘情愿出征。”他请草鹿代他向各位上级长官致意，草鹿对他们说，这不但是日本的最后机会，也是联合舰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必须在冲绳海面突破美国的海军部队，让自己的舰只搁浅。“大和”的大炮射程为25英里，能够摧毁敌人的阵地。

冲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守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这个岛呈窄长形，南北长60英里，中部附近只2英里宽，地势平坦，可筑机场，还有两个深水湾，宜做海军基地，是进攻日本本土的理想中继地区。

冲绳是东方的交叉口，与日本、中国的距离几乎都一样，它既受上述两国的影响，也受太平洋诸岛的影响。早在14世纪，冲绳就是中国的属地，后来从九州来的日本人劫掠了该岛，但仍允许当地居民继续向中国进贡。这种独特的双重从属现象一直延续到1875年，那一年裕仁的祖父派兵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4年以后，明治天皇正式吞并该岛，规定日语是官方语言，派出

知事取代冲绳王。作为殖民地，冲绳的 45 万居民，仍像世代那样。

主要以农业为主，生活比较艰苦。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头 3 年里，在琉球群岛驻防的日军不到 600 人，到 1944 年 4 月 1 日，才在冲绳配置第三十二军，由牛岛满中将负责指挥。除此以外，牛岛还有两个船舶工兵联队（团），以及各种各样的勤务部队和一支拥有 2 万人的殷切要效忠天皇的民间防卫队，为了使更多的军事人员能参加战斗，把 3900 名冲绳人临时编入第三十二军。其中 750 人组成一支特别“铁血勤皇队”，训练他们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冲绳两大城市那霸和首里上方，有着防守理想的地形。牛岛就在这里建立防御阵地，包括一系列同心碉堡。这些碉堡朝北，横断全岛。在高地和丘陵有无数洞穴、暗堡和炮台，还同错综复杂的地道相连。连星罗棋布于乡间的七弦琴形状的中国式墓碑，也不顾许多冲绳老年人的反对而被改力碉堡。如同在硫磺岛一样，牛岛的战术是让敌人上岸，只在准备好的阵地上与之交锋。到 3 月间，包括“防卫队”在内的 10 万名守军已各就各位。

牛岛正确地预见到美国人的计划。3 月 24 日，美军拿下那霸以西 15 英里一群多山的小岛庄良间列岛。3 月 31 日，炮击达到高峰，这天在冲绳落下了 2.7 万多发重型炮弹。4 月 1 日拂晓，有 1300 多艘舰艇云集在近海。到晚上，已有 6 万余美军登上一个长不足 3 英里、宽不到 1 英里的滩头阵地，美军除了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未遇到什么抵抗外，这次登陆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战役中代价最小的，他们死亡和失踪只有 55 人。

为了消灭在冲绳登陆的美军，日本联合舰队在 10 艘军舰缓缓驶出濑户内海的同时，开始了对集结在冲绳海面的美国舰只的 10 次大规模空袭的第一次。

341 架轰炸机进行了近 4 小时的常规轰炸，350 架“神风”攻击机撞击了美舰。到黄昏，已有 3 艘美驱逐舰、1 艘登陆艇和 2 艘弹药运输船被击沉，另有 10 艘舰只受重伤。

在“大和”舰上的伊藤中将，听说目睹 30 艘敌舰沉没、20 艘起火的消息后，十分高兴。草鹿乘水上飞机跟随着这支舰队，直到他飞机上的燃料刚好够返航才告别，他向舰队挥手致意，小飞机便飞回去了。当晚，“矢矧”的 1000 名海军在甲板上集合，倾听原大佐宣读丰田大将激励他们殊死奋战的最后一封电报——帝国命运“在此一战”。“万岁！”声过后，原舰长又作了一次训话。他说：

“我们的任务，看来像是自杀，而且的确也是。但是，我想强调说明，自杀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目标是胜利。你们并不是被赶上祭坛的羊群……一旦本舰受重创或打沉，你们要毫不踌躇地逃生，以便再战。仗还有的是打的。你们切不可自杀，你们要把敌人打败！”

晚 8 时，第二舰队小心翼翼地驶过丰后水道的水雷区，进入太平洋。伊藤下令舰队以每小时 20 海里的速度沿九州海岸而下。拂晓时，10 艘军舰已开进九州以南的公海。他们把队形调整成环形，以“大和”居中，采取之字形曲折航线南下冲绳，时速为 24 海里。最后一批护航舰返航。九州海岸消失后，海上便只有舰队了。

仍然担任第五舰队指挥的美国斯普鲁恩斯将军，曾告诉马克·米切爾的第五十八特遣部队，让日舰继续南下，用海面部队的大炮去对付它们。但是，米切爾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证明，他的飞行员是能够用飞机炸沉这艘最强大的

水面舰只的；海军航空兵曾声称他们在菲律宾炸沉“武藏”，现在，“武藏”的姊妹舰“大和”的突然出现，“提供了证明飞机的优越性的大好时机”。

午后不久，在“矢矧”舰桥上的古村将军首先看见有飞机飞来，“他们来了！”他对原大佐喊道。舰队散开队形，乘员们奔向战斗岗位。突然，下起大雨，把舰队掩盖起来，但只下了10分钟。“矢矧”的一个观察哨喊道：“左前方发现飞机！”原转过身来。

40多架飞机穿过低厚的云层俯冲下来。“大和”的150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踌躇了片刻，然后空中出现一团团黑烟，还有曳光弹。但美机却冲破这道火网。两颗炸弹在“大和”的主桅杆附近爆炸，一枚鱼雷打进这艘战列舰的左舷。为了逃避这次猛攻，8500吨的“矢矧”冲进大雨区。

12时45分，“矢矧”中弹一枚，舰身震动。几乎就在同时，舰身大震，原来左舷舰身吃水线以下中鱼雷一枚。“矢矧”停了下来，一筹莫展，死在海上。原舰长察看了自己受重伤的巡洋舰，十分沮丧。古村将军想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去，继续前往冲绳。于是向驱逐舰“矶风”发出信号，叫它开过来救援余生者。正当“矶风”缓缓驶近这艘不幸的巡洋舰时，被第二批突然从云端飞出的美机捕捉住。“矢矧”也遭机枪扫射。古村拒绝登上小艇脱身。他宁可死在“矢矧”舰上，也不愿死在一条无名小艇上。

几海里外，“大和”歪七扭八的甲板上躺着一大堆尸体，有的流出肠子，有的断肢缺腿。鲜血顺着甲板排水口外流。舰身已歪，速度降至18海里。但有贺将军仍朝冲绳前进。下午1时35分，第三批美机，约有150架，朝“大和”飞来，集中轰炸已损坏的左舷。“大和”转身逃跑，左舷又中两枚鱼雷。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半数高射炮手中弹身亡。方向舵已被炸毁，舰身倾斜至15度。下午2时，“大和”中了第8枚鱼雷，倾斜增至18度，时速降至7海里，这时，巡洋舰“矢矧”正在迅速下沉，甲板已浸水。不管原大佐往哪里瞧，他看见同来的驱逐舰不是在下沉就是在燃烧。有两艘似乎还没有受伤，它们正在“大和”周围来回保护“大和”。但是，美机像蚊子似的围着“大和”转，盘旋轰炸。2时15分过后不久，第12枚鱼雷打进中左舷。有人说，这是缩短痛苦的“慈悲的一击”。“大和”3332名官兵，除269人生还外；全都丧于海底。

美国两个陆军师登上冲绳一周后，在向首里北方挺进时，遇到强固的防御阵线。这里，岛宽个英里，石灰石的丘陵连绵起伏。有许多天然山洞。坟墓垦罗棋布，还有许多台地、悬崖和山谷。由于山的走向全是由东向西，美军遇到了一道接一道的天然防线。

那天下午，日军连续不断的火力使美军东翼完全停止不前，西翼则被一块高地所阻。这块高地从海岸向东延伸1000码到5号公路，该公路穿过防线中心，一直通到首里，这个高地叫嘉数高地，两面是山，中间呈马鞍形。看上去，这算不了什么障碍，因为它既不高也不十分崎岖不平，不过是长满了野草、灌木和小树。然而，这个又矮又胖的丑陋的小山，则是保卫首里的关键。当美军4月9日上午涌上山头时，却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到了傍晚，由于弹药用尽，加上伤亡甚重，美军只好退下来。尔后的两天，美军从两翼反复进攻，都败下阵来，形成流血对峙局面。

次日一早，185架“神风”飞机，在150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轰炸机的掩护下，开始攻击冲绳周围的美军舰只。然后又飞来8架双引擎轰炸机，机身下挂着一种新式武器“樱花弹”。这种单程的滑翔机由3支辅助火箭为动

力，看上去像装了小翅膀的鱼雷，驾驶员可以带着一整吨强力炸药以 500 余海里时速俯冲。美国人给这种新式自杀武器起了个绰号叫作“八格弹”（“蠢弹”），但这个绰号并没有减轻“八格弹”立即在各个舰队引起的恐怖感。约在下午 2 时 45 分，一枚“樱花弹”从母机的腹部落下射进刚被一架“神风”机撞中的驱逐舰“曼纳特·艾贝尔”号。这艘驱逐舰被劈成两半，几乎立即沉没。另一枚“樱花弹”在“斯坦利”号上爆炸。与此同时，“神风”飞机和常规飞机炸沉 1 艘大型登陆艇，炸伤 1 艘战列舰、3 艘驱逐舰和 8 艘其他舰只。

正当美军向冲绳进军的时候，4 月 12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世长辞了。那是下午 3 时 55 分。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纳粹指望罗斯福之死能使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挽回败局。“命运已经夺去了你最大敌人的生命，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戈培尔在电话中兴奋地对希特勒说，“上帝曾两次把你从野蛮的暗杀者那里拯救出来。敌人 1939 年和 1944 年对准你的死神，现在却把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打倒了。这是奇迹！”

日本新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像纳粹那样狂欢乱舞，但他们的宣传工作者却利用了这一局势制造谎言，说罗斯福是由于困难重重、战局不利，在极度苦恼中死去的，日本报纸还为此发表了一些评论。《每日新闻》写道：“这是天罪，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化身，罗斯福在全人类中产生了极可恶的影响。”

《朝日新闻》引用曾在华盛顿工作过的野村大使的话说：“说来也许可笑，不过在四五天前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在白宫，我走进罗斯福的办公室时，看见放着一口棺材。副官指着棺材告诉我，罗斯福在里边。这个梦现在成了真事。但是，不管谁死了，美国的战争倾向不会改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打到底。”

冲绳日本陆军中的宣传工作者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印了许多传单，把罗斯福之死与冲绳岛上的美军命运联系起来。传单写道：

“我们对于罗斯福总统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他的逝世给冲绳造成了美国的悲剧，你们的 70% 的航空母舰，73% 的战列舰，或则是沉没，或则是受伤，使 15 万人伤亡。不仅已故总统，就是其他任何人，听到受了这种毁灭性损失的消息，都会因忧愁过度而去世。导致你们已故领袖去世的可怕损失，将使你们成为本岛的孤儿。日本的特攻队会把你们的舰只炸沉，连一艘驱逐舰也不剩。你们会亲眼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在罗斯福逝世的当天，铃木贯太郎的内阁为准备本上进行决战，决定组织国民义勇队。报界仍继续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守卫冲绳充满信心的报道。冲绳一旦陷落，动用国民义勇队便势在必行。一位名叫安藤的退伍海军舰队司令说：“敌人的行动同我们当初制定对付敌人的计划细节时的估计完全一样，允许敌人侵占冲绳的战略与背水阵的战略有许多相似之处。除非我们自己确信有以我之皮取敌之肉、以我之肉取敌之骨的力量，否则不能采用这个策略。”

然而，栗原悦藏海军少将却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在 5 月号的商业杂志《实业的日本》上写道：

“有些人喜欢用以我之皮取敌之肉、以我之肉取敌之骨的方法。本人反对这样的战术。我倒同意以我之骨取敌之骨的战术。每个日本人都能做到这点。它适合日本的民族性，也适合日本的国情。这个战术就是所说的特攻队战术。”

自莱特海战以后，日本人一直试图对美国人使用“神风”战术，在冲绳保卫战中，这种战术成了保卫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自复活节登陆以来，日本人对集聚在冲绳周围的数百艘美国军舰已发起5次大规模“神风”攻击，动用飞机1500多架。数百架飞机冲破密集的高射炮火力网，撞上目标爆炸，把近20艘美军军舰送入海底，并把另外25艘撞得遍体鳞伤。美国兵眼睁睁地看着一架架日机，下顾死活地向美军的舰只撞来，驾驶员决心与美舰一起炸得粉身碎骨，这简直使一些人“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为了配合牛岛从首里撤退，日本人于5月25日发起第七次“神风”攻击。在“神风”袭击前，一支敢死队乘坐5架轰炸机。对冲绳中部的读谷机场进行攻击。4架双引擎飞机被击落，第五架擦地着陆。敢死队员从舱内爬出来，向停在那里的飞机扔手榴弹和燃烧弹，美国人眼巴巴地瞧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击毁7架美国飞机，打坏26架，烧掉储有7万加仑汽油的油库。袭击者自己也被打死。

在海面上空，“神风”飞机朝运输舰停泊处飞来。在接着的12小时中，176架“特攻”飞机闯进目标，撞沉Lsm—135登陆舰和驱逐舰护卫舰“贝兹”号，还有4艘因重创不得不凿沉、废弃或退出现役。

日本飞行员的疯狂行为使美国人不寒而栗，但这种与西方哲学如此不同的行为，好像是被施了催眠法似的着了迷。布郎海军中将评论说：“随着一架架‘神风’冲将下来，我们一个个魂飞魄散，好像在目击某种惨象时那样。顷刻间，我们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是受害者，而是不由自主地猜测从高空飞来的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从这种可怕的病态的着迷现象产生了种种说法和谣传：“神风”飞行员参加战斗时像僧侣那样身穿长袍戴着头巾；他们吃过兴奋剂；他们是破锁在驾驶舱里的；他们是自动进行过自杀训练的精锐部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事实上他们是在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参加这一自杀性的疯狂行动的。他们深信，“特攻”是克服因日本比美国生产率低所造成的劣势的最好办法。只用一人就可以击伤或击沉一艘航空母舰或战列舰，并让1000名敌人与自己一起葬身鱼腹。

恰好美军在冲绳登陆时，正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进入最后挣扎的时候。这时，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条之流的煽动之下，也完成了自杀性的保卫本土的最后计划“决战行动”。他们集中了1万多架飞机——大部分是匆忙改装的教练机，这些飞机的2/3将用来保卫九州，其余则用来击退在东京附近登陆的敌军。他们吸取了塔拉瓦和塞班的教训，计划用53个步兵师团和25个旅团的兵力，共计235万人，准备在海滩上击溃美国人。支持这些部队的还有近400万海陆两军的文职人员，25万人的特种卫戍部队和数以千万计的民兵。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强制通过了国民总动员法，规定15岁到60岁的男人和17岁到45岁的女人，都得参加义勇兵。所谓2800万民兵这支庞大的力量就是根据这条法律组织起来的。以激昂的发言使这条法律得以在国会通过的军方头目，后来请铃木及其阁僚观看了要让这些义勇兵使用的武器：步枪、竹矛及封建时期沿用下来的弓箭。

这些战争贩子们，秉承东条的意志，逆潮流而动，继续利用报刊舆论和手中的宣传工具，煽动人民负隅顽抗。但是，败局已定，他们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应得的历史惩罚。正是：劫数已到，罪孽难消；垂死挣扎，全然徒劳！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九章 幻想破灭

军方狂吠打到底 反对投降举白旗
苏联出兵如惊雷 “体面和平”该休矣

7月2日，历时3个月的冲绳战役正式宣告结束。日本丧失11万陆军。另外，平民的伤亡也达到空前的数字，在两军对阵下，约有20万居民死于非命，生存下来的冲绳本岛及其所属岛的人口还不足30万。从此，日本又输掉了在本上外打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战役。“太阳之国”的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了。围绕着战和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原小矶内阁外相重光葵同瑞典驻日本公使维德·巴那进行了接触，建议由瑞典替日本向美国说情。这个建议由于遭到重光的继任人东乡茂德的反对而一事无成。东乡相信他能找到一个影响比瑞典大得多的中间人。

在欧洲，美国战略情报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触角也伸向日本，他曾和日本驻伯尔尼的海军武官藤村义郎中佐和大阪航运公司驻欧洲代表津山重美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晤。

5月8日午夜前后，即德国投降的当晚，藤村与津山就和谈问题向东京发了密码电报。在接着的8天中，他们又秘密发了6份电报，报告德国投降情况和英、美军队准备从欧洲调至远东的情报，并告诫要尽早寻求和平，切勿错过时机。海军省沉默了13天，密谋者又给米内和丰田发了急电，要求对第一份电报尽早作出答复，因为美国“紧催着”他们要回音。

事实上，这些电报在海军领导层中引起了激烈分歧。海军作战部长、军务局长和高木惣吉海军少将，强烈主张接受杜勒斯建议，他们自告奋勇，愿意飞到瑞士去谈判。然而，丰田军令部总长以及其他幕僚却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杜勒斯的建议，“要么是想探测日本的战斗精神的试探气球，要么是要降低士气的阴谋”。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内把这个建议转给外相，东乡由于对杜勒斯很少了解，对此提心吊胆，要求米内对这个建议进行“透彻的研究”。

当日本在寻求和平方面举棋不定时，它的城市却一个个化为灰烬。美机对工业中心的轰炸，像洪水猛兽一样达到了高峰。名古屋已成废墟，在4次破坏性的空袭中，东京有34.2平方英里的面积被焚。5月23日下午，562架B—29轰炸机再次飞来，将包括工业区和居民区在内的东京港西侧地带炸成废墟。

36小时后，502架“超级空中堡垒”又飞来轰炸东京的心脏，投下3262吨燃烧弹。

4天以后，美机又把矛头转向日本的第五大城市横滨。当517架前来空袭的飞机飞来后，该市85%的地方已成一片火海，把东京、横滨地区炸成废墟后，B—29轰炸机又集中炸大阪和神户两市，不到两个星期这两个城市便被摧毁。在各主要城市中，有100平方英里面积被夷为平地，200万座建筑物，几乎占全部建筑物的1/3被削平，至少1500万人无家可归。即使这样，东条及其死党却不顾人民的死活，仍狂妄地叫喊“血战到底”！

早在东京第二次灾难性大火前，铃木内阁就曾指示内阁书记长官迫水秘密地对日本资源情况作一番调查，看看日本是否还能继续把仗打下去。于是，便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局，人员包括内阁计划局、外务省、大藏省、军需省以及海陆两军的军职和文职专家。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

都要严重。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

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 10 万吨，比官方的估计少 2/3。同样，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 1/3。煤的缺乏使军人生产削减 50%。船舶总吨位也只有 100 万，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迫水的报告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将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

国民食物的供应，由于粮食作物的减产已降低到最低限度。政府制定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的居民要完成收集 500 万石橡子的任务。官方的每天食物定量已降到 1500 卡路里以下，只有日本人以前最低标准的 2/3。城里人苦难最深，每星期天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物品，跑到乡下去换白薯、蔬菜和水果。

迫水的报告呈给了新近成立的“核心内阁”。这个“核心内阁”的正式名称叫“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因为它是首相、外相和军方 4 个首脑组成的，所以通称为“六巨头”。迫水报告的含义是无可辩驳的，在 5 月 12 日举行的一次“六巨头”会议上，米内提出一项建议，这个建议若是一个星期前提出，可能会使他被开除出内阁，甚至会遭暗杀。他提议请苏联出面调停，结束战争。“和平”这个禁忌的话题，现在终于公开了。然而，有位军人却忧心忡忡地建议，他们只限于在这里讨论，免得“严重动摇”军队士气。在密谋般的气氛中，他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请瑞士、瑞典或梵蒂冈出面调停的可能性。结论是，通过这些渠道必然会导致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内阁对此顾虑多端，意见纷坛，莫衷一是。

然而，企图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希望的第二次会议上就发生了变故。那天是 6 月 6 日，“六巨头”再次开会。有人递给东乡一份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编写的题为《今后指导战争之基本大纲》的文件。文件要求正式再确认把战争进行到底：

“感于忠贞不渝之信念，加之地利人和，必能力发扬我国体、保护皇上、实现征服之目标而殊死战斗到底。”

很显然，这一文件是东条的同党炮制出来的。接着，该文件便列举了一系列需要采取的步骤，包括全面准备保卫本土和组织国民义勇军。东乡一边读，一边发楞。这，谁也没有和他商量过。如果接受它，日本就肯定要覆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迫水的报告也被作为附件附了上去，还断章取义地摘了几条，目的显然在于给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见解增加分量。

看问题比较实际一些的东乡站起来，挥动着迫水的报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继续进行战争。依我看，你们的建议草案与提出的具体条目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讥笑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所有理论，包括所谓“战场越接近日本便越有利”的说法。“如果负担极重的国民不愿意那又该怎么办？”

至此，丰田将军再也按捺不住了：“即使日本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阿南将军大怒，“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他喊道，“我们就应切腹，真诚谢罪！”

又过了一个小时。因为孤立无援，东乡无法拖延作决定的时间，打到底

的决议就此通过了。离开会议室时，东乡走到米内将军面前。“今天我原指望你的支持，”他抱怨说，“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6月13日上午，铃木首相在国会发表了所谓有关当前时局的讲话。这位78岁的首相，一开始讲话，就提到27年前当他指挥正在受训的海军舰队时，在旧金山发表的一篇讲话，原准备听取这位老人回忆往事的听众，不禁为他提出的论点大吃一惊。

“我那篇讲话总的精神是：日本并不好战，它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它和美国没有理由要打仗，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战争将打得很长，结局也是很惨的。太平洋，顾名思义应该是太平之洋，不允许在它的洋面上运送军队。然而，如果这样一个不幸事件果然发生，双方都会受到神明的惩罚。”

铃木的讲话显然是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进行辩解，正是他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侵略了中国，霸占了朝鲜，使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遭到涂炭；正是他的这个“不好战的国家”，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侵略践踏了众多的东南亚国家，使太平洋内无太平。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混沌的讲话，由于提到了“和平”这个词，也在大厅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在结束讲话时，铃木告诫说，应该举国一致打到底，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民族的毁灭，但是他的讲话的后果却没有因此减弱。当他转身走下讲台时，敌对情绪顿时爆发出来：轻蔑的嘘声、威胁的拳头和“打倒铃木内阁！”的呐喊声。

铃木对这些讥笑声置之不理，只是心不在焉地向听众挥挥手。他推开挤上来的人群，前往宫内省按照传统去向天皇汇报。然后，他沿着走廊来到木户的办公室，看了内大臣的关于“实现和平”的独特计划全文。这是个一相情愿的所谓实现“体面和平”的计划。计划提出的“和平的最低限度条件”是：

“如果保证太平洋确实太平……如果太平洋各国民族能取得独立，日本将放弃其占领权，放弃对所有占领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将主动撤出在这些地区的日本武装力量……”

在这个“和平”计划内，丝毫也看不到认罪的成分，甚至对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造成的灾难，也没有表示“遗憾”，而是以战胜国的姿态提出的。作为受军国主义熏陶出来的铃木，当然对这个计划表示满意，答应尽一切努力实现其目标。但是，和米内一样，他似乎也有一些保留：“我想知道米内将军对此怎么想？”

“米内也是这样说起你的。”木户对他说，这使铃木觉得好笑，但木户却感到痛心。在战争如此危急的关头，怎么首相和海相连对方的“心事”都不知道？

铃木保证支持木户一事并没有改变他公开的立场。在次日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铃木的讲话仍和东条一伙的腔调一样。“如果我1亿国民决心战斗，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我相信要实现保持我日本国体的伟大目标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皇军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有一支这样大的军队的德国不能坚持到底。就武器和物资的数量而言，我们可能比不上敌人，但是我们在火线上的决心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用这个强大的力量，万众一心，战斗到底，”

此时，木户把第三个阁僚。外交大臣东乡请来，东乡的支持是举足轻重

的。外相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并说“如果天皇说现在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为结束战争而工作”，他就会感到兴高采烈。“因为没有什么比天皇的讲话更能帮助达到这一目标了。”

木户原不想让另外3位军方领导人过问，但有一天，出于一时冲动，却把他的建议告诉了陆相阿南。事情是这样的，当阿南离开内大臣的办公室时，他随便问了一句：“听说你要辞职，是真的吗？”从前他们的关系很亲密，木户当内大臣的首席秘书官时，阿南任天皇的侍从武官，也许是这点才促使木户说：“我不打算辞职，但是我把心笋告诉你，你可能会叫我辞职。”

“什么心事？”阿南想知道。

木户把整个和平计划和天皇打算结束战争的意图透露给了他。阿南没有马上表示反对，但是他对时机问题却有相当大的保留。他指出：“等美国在日本海滩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后，日本再求和较为有利。”

接着木户把集中几千架飞机以对付入侵者的做法贬低了一番，“在飞机出动以后你怎么办？”既然日本力量只能消灭1/3的登陆美军，那还是在入侵前达成协议好。阿南承认木户的战术结论有权威，虽然他不支持木户的计划，但他答应不在“六巨头”面前“过分强烈地反对它”。

阿南和东条一样，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好战之徒，他的想法试探出来了。这个意外的机会是“天赐良机”，现在木户觉得，他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支持，可以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抗衡了。6月22日，在内大臣的鼓动下，天皇突然把“六巨头”召至御文库议事，天皇首先讲话，以示会晤是非正式的。他说：“上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采取一项新政策，准备防御本土。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考虑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实现和平的行动。请你们立即采取步骤去实现我的愿望。”事前木户没有征求过意见的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长不禁为之一怔。

天皇问内阁是否考虑过“和谈”。铃木吃力地站起来汇报政府是如何考虑和谈问题的。东乡和盘托出广田与苏联大使对话的情况，日本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实现和平。

“什么时候把使者派到苏联去？”天皇问，“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东乡估计使者或许能在下月中旬以前抵达莫斯科。但他提醒说，日本无疑将被迫向苏联作出许多让步。

天皇把头转向那两个一直一言不发的陆军代表。阿南恪守他对木户许下的诺言：他不公开反对“拯救局势”的任何尝试，但表示担心，如果日本显出急于结束战争的样子，那可能会被解释为日本的软弱。另一方面，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大将却公开表示沮丧。他认为，有关和平的任何建议都会在国内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应该“万分谨慎”。

御前会议开过之后，6月24日，广田应东乡外相的要求再次拜访苏联大使马立克。这一次，广田抛弃了外交辞令，开门见山地要求日苏新约去代替即将到期的中立条约。马立克冷淡他说，第一个条约还没有到期，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新条约。

在绝望之下，广田提出用日本的橡胶，锡、铝和钨去换苏联的石油。“如果苏联陆军和日本海军联合起来。”他说，“日本与苏联加在一起就将变成世界上箭强大的力量。”

但是，马立克对此毫无兴趣。他十分清楚，日本的海军大部已安息在海底。他回答说，苏联的石油还不足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苏联大使又唐突他说，

除非日本拿出“具体计划”来，否则没有必要再见面。

不到一个星期，广田拿着一个书面的东西又去找马立克。作为换取互不侵犯条约和石油的条件，日本答应让满洲独立，放弃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马立克仍不置可否，他要得到莫斯科的回答后再答复广田。

一个星期过去了，莫斯科还未对日本政府一相情愿的建议作出回答。天皇这回却按捺不住了，7月7日召见了铃木首相。“切勿错过探索苏联真正意图的时机。”他说，“不能直截了当地请俄国出来调停吗？为什么不能派一名特使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苏联呢？”

显然，天皇心目中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选是近卫。7月12日，近卫被从他轻井泽的别墅召到东京，近卫平民打扮，身穿普通卡叽装。天皇裕仁免去宫中的礼仪与他私下交谈，没有他人在场，天皇问，近卫作为前首相，对战争一事是怎样想的？“国民厌战，”近卫直言不讳地答道，“他们都希望陛下能屈从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想法把他们从苦境中解救出来，有人甚至说陛下应该负责。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天皇叫他准备启程赴莫斯科，虽然近卫心里反对依靠苏联调停，但是愿意采取任何步骤尽快结束战争。他说，在签订三国条约时，天皇曾警告这个步骤将最终导致与英、美开战。“那个时候，”他继续说，“承蒙陛下告诉我，不管后果是好是坏，我必须与陛下共同分担。现在，如果天皇有令，我愿为陛下效劳，万死不辞。”

近卫离开皇宫后，外相东乡就奉天皇的指令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左藤尚武发去了一封密电。电报说：

“天皇陛下极其渴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果敌对行动继续延长，只能加深交战国国内亿万无辜人民的无比痛苦，天皇对此深为关切。然而，如英、美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为维护帝国名誉及祖国生存，日本将被迫全力战斗到底，这只能引起继续流血，使日本遗憾万分。因此，帝国政府出于对人类幸福的真诚关怀，希望早日谈判，使和平得以恢复。为此，近卫公爵将携陛下亲笔信前往莫斯科，请苏联政府为此行提供方便。”

佐藤大使不相信这种行动能产生什么好的结果。他在圣彼得堡曾呆过9年，自1942年初以来就担任驻莫斯科大使。他对苏联人是深有了解的，他在回东乡的电报中说：

“通过谈判的方式去缔结和约是得不到苏联支持的。归根结底，如果我国真正希望结束战争，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外，别无他途。”

8月6日广岛的毁灭，使日本更加迫切而不现实地希望通过苏联出面为和谈斡旋，东乡致电驻莫斯科大使佐藤称：

“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即复告。”

8月8日下午，佐藤大使请求立刻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几个星期来，这位外长一直避而不见佐藤，莫洛托夫原该晚上8时见他，但几分钟后又不加解释地要求把会见时间提前到下午5时。5时前几分钟，当佐藤进入雄伟庄严的克里姆林宫时，他强作镇定。他被领到莫洛托夫的书房，当他还来不及用俄语向这位外交委员致意，莫洛托夫就把手一挥，打断了他：“我这里有一份以苏联的名义给日本政府的通知，我想向阁下转达。”

凭着多年的外交生涯，佐藤本能地想到这是一份宣战书，虽然这并不出他之所料，但是这件事之成为现实，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莫洛托夫起身离

开办公桌，在一张长桌的一端坐下来。佐藤被示意在桌子的另一端的椅子上坐下。莫洛托夫开始宣读一份文件：

“在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后，日本是继续进行战争的唯一大国。

“美国、大不列颠和中国三大国 7 月 26 日关于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日本的拒绝。因此，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的远东调停的建议失去了全部基础。

“考虑到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已与苏联政府接洽，提出参与同日本作战的建议，以缩短战争时间，减少伤亡，为尽速恢复和平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盟国，苏联政府恪守其义务，接受盟国的建议，加入盟国 7 月 26 日宣言。

“苏联政府认为，这个政策是唯一能更快实现和平，使人民免作进一步牺牲和进一步受苦，使日本人民有机会避免像德国在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毁灭的危险。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政府宣布，自明日，即 8 月 9 日起，苏联认为自己已处于对日战争状态。”

日本政府接到苏联这一声明后，犹如晴天霹雳，简直吓呆了。正是：苏联宣战似惊雷，“体面和平”彻底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章 无条件投降

忧心忡忡度艰年 人民渴望早停战
困兽犹斗不济事 被迫投降无条件

话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苏、美、英三国为了处置德国和解决它们对欧洲及其他问题的安排，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三国首脑和外长会议。会议期间还就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在公告发表之前曾征得了中国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又成了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这项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要求“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的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宣言说：“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宣言最后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最后通牒，这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日本法西斯领导集团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在进行垂死挣扎，对于这一通告采取极不认真、置若罔闻的态度。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大郎发表谈话，竟说什么“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他们幻想通过苏联或其他什么国家调停，实现所谓“体面和平”。所以，要使日本法西斯真正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举手投降，反法西斯同盟国还要在战场上作最后的斗争，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严重的打击。

从7月27日到8月1日，盟国飞机在日本各大城市上空散发了150万张传单和300万张《波茨坦公告》。传单对这些城市发出警告，说它们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而每次警告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次常规炸弹的猛烈袭击。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任何迹象。这样，美国政府便按着原定计划，不顾日本平民的生命，悍然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

8月6日早晨，天气晴朗，气候闷热。7时9分，美国飞机数架飞入广岛上空，盘旋几周，即行离去，并未轰炸。8时整，美机B—29两架又从高空进入广岛上空，户外广岛市民有很多人并未进入防空壕，而是在仰看美机。8时15分，一架美机投下降落伞后，立即发生令人眼花缭眩的强烈的白色闪光，广岛市中心上空随即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城市即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全市立即被这黑暗的烟云所淹没。接着即冒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遂化为灼热的火海。

这时广岛人口为34.3万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计为78150人，负伤和失踪者为51408人。全市建筑物总数是76327幢，全毁者48000千幢，半毁者22178幢。

8月6日下午，设在广岛的日本第二总司令部，经由吴镇府转报东京：敌人使用了具有从未见过的破坏力的高性能炸弹。第二天，即8月7日，日本收听到美国广播，杜鲁门总统声明：“7月345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

通牒，旨在拯救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毁灭。他们的领袖迅速地拒绝了这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自空中而降……”在美国广播之后。日本陆海军统帅部才从广岛和吴镇府接到了关于新型炸弹造成危害的稍为详细的报告。

这时，日本有些人士对于在广岛爆炸的是否为原子弹还有怀疑，8月7日，参谋本部以第二部长有未精三中将作为委员长，由原子能最高权威仁科芳雄博士等有关人员组成调查委员会，派赴广岛。仁科芳雄一行于8日下午到达广岛，立即证实新型炸弹确为原子弹，并报告东京。这立即在日本皇宫和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一片慌乱。

8月8日下午11时（莫斯科时间为8日下午5时），根据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协定，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3个月后，即1945年8月，苏联实行对日作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亲手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早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美、英领导人说，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联就把增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与盟国共同打击日本。

8月9日零时一过，苏联红军百万雄师在远东军队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

苏联红军分4路进军。第一路是后贝加尔方面军，其任务是担任主要的突击，从西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部平原，同远东第一方面军相呼应，形成一大包围圈，切断关东军同华北日军的联系，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三方面军主力于长春、沈阳地区。第二路是苏蒙联军，向承德、锦州和张家口进攻。第三路是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其任务是从东面突入东北的中部平原，分割和围歼日本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然后向吉林、长春、哈尔滨突击。第四路是远东第二方面军，其任务是策应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担任辅助的突击，在红旗黑龙江分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进击，牵制并歼灭关东军的独立第四军。此外，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切断关东军和日本本土上的联系，并向朝鲜北部进击，歼灭那里的日军。

这4路大军共有80个师、4个坦克机械化军、6个步兵旅、40个坦克机械化旅。总计157.7万余人。此外，还有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黑龙江分舰队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苏军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仅作战飞机就有3400多架、坦克5500多辆。苏军的兵力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形成强大的优势。

苏联红军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有力的配合下，经过20多天的凌厉进攻，一举打垮了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整个远东战役中，苏联军队共击毙日军83737人，俘敌59.4万人，缴获大炮1565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以及许多轻武器。

与此同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解放区各战场，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总反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发生根本的转折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也由战略相持阶段胜利地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继1944年局部反攻的重大胜利之后，1945年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以更大的规模对敌寇发动进攻，使局部反攻不断向总反攻发展，特别是这一年4月到6月，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前夕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是指引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光辉里程碑。

到 1945 年春季，中国解放区的正规部队已增加到 91 万人，民兵发展到 220 万人。全国解放区已增至 19 个，总面积达到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解放区已成为打败日本、解放全中国的主要力量。

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第二天，即 8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就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伟大号令。8 月 10 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的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向日军展开全面进攻，并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如遇反抗，即坚决歼灭之。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在东北前线，解放区正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解放了日寇久已霸占的整个东北。在平津地区，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截断了敌人所有铁路线，攻下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普通县城几乎全部解放，残敌被迫龟缩到平、津、保（定）几座孤城里，在归绥前线、太原前线、平汉前线、山东前线及华中、华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解放了广大的土地，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据不完全统计，从 8 月 11 日总反攻开始到 10 月 10 日两个月期间，解放区各部队共毙伤敌伪 23 万多人，缴获长短枪 18 万支、轻重机枪 2500 多挺、大炮 600 多门，收复国土 31 万多平方公里。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中国的反攻、美国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和对日本本土的猛烈轰炸，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促进了日本政府迅速投降。

8 月 9 日上午，铃木首相召开“六巨头”紧急会议。“在目前形势下，”这位年迈昏庸的首相说，“我的结论是，唯一办法就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关于这点，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会上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米内海相问道，“除非大家直率讲话，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军方另外 3 位领导人对米内愿意讨论投降事宜甚为不满，但是苏联进军满洲比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更使他们丧胆。

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拿着一份电报走进会议室。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投下。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加上中国东北传来的消息，因而对阿南、梅津和丰田 3 人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就公开爆发出来。他们 3 人心下明白，投降是不可避免的，送硬着头皮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即使允许天皇继续统治也不行。此外，他们还坚持要让日本人自己审判战犯；军队由日本军官来解散；占领军的数量应受到限制。

外相东乡很下耐烦，试图使他们承认局势的现实。日本已到了接近崩溃的地步，盟国无疑会拒绝这些条件，这样就会危及谋求和平的全部努力，“军方能拿出任何导致胜利的希望吗？”陆相阿南拿不出来，但他仍要求在日本本土上再打一场大决战。“你能阻止敌军登陆吗？”东乡继续问。

“要是运气，我们能在侵略者上岸前把他们击退。”参谋总长梅津回答说，“无论如何，我敢说，我们能将入侵部队的大部歼灭，也就是说，我们能给敌人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东乡紧追不放：“那又怎么样呢？敌人会组织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你能阻挡吗？”会议开了 3 个小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铃木宣布体会，并亲自把这个毫无结论的会议向宫内大臣木户报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对木户说，“我们请天皇作出决定。”

当天下午继续召开内阁会议，但与上午开的“六巨头”会议一样，没有解决问题，军方除海相米内外，再次一致反对文官。米内认为，继续战争不可能有任何收获。“所以，我们必须丢开面子，尽早投降，立刻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把国家保存得最好。”

海相的话使同僚军官大怒。阿南简直无法克制他的憎恨。“敌人入侵日本时，我们肯定能使他蒙受严重损失。”他说，“反败为胜，扭转战局也不是不可能的。还有，前线的陆军部队也不会乖乖地听令解散，皇军士兵将拒绝放下武器。他们知道是禁止他们投降的。除了继续进行战争外，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法子。”

4位文官——农林、商工、运输和军需大臣，不同意军方的意见。他们说，国民已处于筋疲力尽的边缘；稻谷收成是多年来最少的；国家已无力再战。

阿南不耐烦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这一切谁都知道，但是不管对我们多么不利，我们必须打到底！”

在东京，当晚内阁继续开会，辩论毫无结果。作为军方的代言人，作为东条“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南仍像以前一样寸步不让，坚决主张打到底。快到11点钟时，一直小心谨慎地避免卷入争论的铃木首相宣布休会。很明显，内阁本身无法作出决定。现在，最后一招就是把天皇请出来。

午夜前10分钟，裕仁天皇进入会议室。他显得疲劳和不安。近日来，他吃睡不宁，为前方的战事伤透了脑筋。面对着目前的败局，裕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裕仁吃力地坐上御座，铃木简短地汇报了“六巨头”会议和内阁会议的辩论情况，然后请“六巨头”一一发言，当面向天皇申诉。室内酷热难忍，与会者焦虑不安。东乡首先表态，只要能保持国体，就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米内海相同样抑制着感情说：“我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

米内毫不含糊地同意东乡的意见，使下一个发言的阿南陆相大怒。“我反对外相的意见！”他喊道，“除非盟国允许日本自己解散军队、自己审判战犯和限制占领军数量，否则陆军不同意投降。不然，我们就拿出勇气继续打下去，死中求生。”他的双颊流满了眼泪，声嘶力竭，请求在本上最后决战。“我们一定能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即使我们战败，我1亿国民也准备为名誉而死，使日本民族的事业名垂青史。”

剃光头的梅津起立。他严肃宣布，在那么多的英勇将士为天皇捐躯后，无条件投降是不能想象的。

下一个发言的本该是丰田，但铃木好像有点糊涂，但也许是有意请平沼男爵发表意见。阿南和梅津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他，在军方眼里，平沼可能像大多数“重臣”一样是个“巴多格利奥”式的人物。平沼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要求军方直接答复：他们有没有能力打下去？

梅津向他保证，可以用防空措施阻止原子弹轰炸。“我们一直在为未来作战保持实力，”他说，“我们预期总有一天要反攻。”

丰田最后发言，他试图再次强调军部的立场，但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我们不能说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我们也不相信会完全失败。”他讲了将近两小时，几乎逐字逐句重复了一遍过去的论点。

海军军令部总长讲完后，铃木再次缓慢而慎重地站起来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多个钟头，依然没有结论。时局确实严重，但时间也没有

白浪费。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我也觉得难以启口，不过，我现在必须仰请天皇陛下圣断。”

铃木一坐好，天皇便站起来激动他说：“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与会者都垂头聆听。“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受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国家之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战争。”

天皇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每想到那些忠心耿耿为我效忠的人，想到在遥远的战场上牺牲或负伤的陆海军将士，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掉家业、往往还丧失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不胜痛心。不言而喻，我不忍看到忠勇将士被解除武装。我同样不忍看到曾献身于我的人反被作为战争煽动者受到惩罚。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当我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在1895年俄国、德国和法国三国干涉时的感情，我只能咽下眼泪，按外相所概述的批准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

天皇说完后，铃木和其他人都站起来。“我已聆听陛下圣言。”铃木说。

天皇好像要作答，但只是点了点头。他似身负千斤重担，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离开了会议室。

“现在，”铃木说，“应该把天皇陛下圣断变成本次会议的一致决议。”首相先让迫水书记长官宣读《波茨坦公告》，然后亲自宣读下列议案：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公告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之特权的的要求。”

接着，与会者开始依次签字，从而批准在盟国承认天皇合法地位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虽然军方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但是在天皇离开后，他们又把“受挫折和被出卖”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在铃木身上。“你违背了诺言，首相阁下！”以干事身分出席的东条的同党吉积正雄中将大声说，“你现在高兴了吧？”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内阁会议，几乎开了一天一夜。会议时间之长，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罕见的。会议一结束，铃木即上楼就寝，他的老骨头快要散架了。迫水没有走，他倒在扶手椅里，很快就进入梦乡。其余的人都各自回家了。唯独东乡还在忙碌，当他驱车赶到外务省时，东方已呈鱼肚白。他要在10日上午6时45分，打电报给日本驻中立国瑞士和瑞典的公使，请驻在国政府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美、英、中、苏四国政府。照会内容除上述御前会议决议外，还说：“日本政府真诚地盼望这一谅解能得到保证，并迫切地希望能很快地获得对上述谅解的明确指示。”

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日本政府没有在国内公布这项决议。军方不愿意透露天皇的决定，因为担心这样会立刻破坏日本的战斗意志并造成混乱，结果达成折衷方案：只发表一个含糊的声明，使国民对投降有点思想准备。这份声明是情报局总裁下村海南及其手下人员起草的。声明把胜利吹嘘了一番；谴责了原子炸弹，说是残酷的、野蛮的；并警告说，敌人即将入侵本土。只是在最后一段里才指出，公众即将面临空前未有的局势：

“确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已处在极其困难的局势中。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卫本土，保卫国体，维护国家荣誉，国民也要有所准备，克服各种困难，保卫帝国国体。”

另一方面，军务局军官稻叶按照东条的旨意发给陆军官兵的指令中，不但一点也不暗示投降，反而要他们“把圣战进行到底”：

“虽然可能要吃草、吃土和露宿荒野，但我们决心战斗。我们相信死中有生。这是七生报国的伟大的捕公救国精神，这也是时宗的以‘莫烦恼，蓦直前进’精神粉碎蒙古入侵者的战斗气魄。”

几乎就在同时，东京的街头响起一阵手榴弹爆炸声。陆军内的反对派，包括稻叶在内，企图制造乱子引起全市戒严。东京一旦被军方控制，天皇便可能受到影响，改变主意，继续进行战争。然而，已经习惯于轰炸的东京，把这种一阵子的爆炸不当回事。

在世界的另一侧，8月10日上午7时许（华盛顿时间），美国政府收听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杜鲁门总统当即同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海军部长以及总统参谋长举行会议，并且逐个征求他们的意见。陆军部长史汀生主张保留天皇；国务卿贝尔纳斯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盟国而不是日本；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议，美国可以在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于是杜鲁门就请贝尔纳斯起草一个可以表达这种意图的复文，并征求了英、苏、中三国政府的意见。

在贝尔纳斯的答复通过瑞士正式发出的同时，旧金山电台也用短波向东方广播，其目的是要在日本一般民众身上产生宣传效果。8月11日午夜刚过，同盟社的长谷川才次（前曾秘密播发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的答复）从一个监听台收到盟国对日本电报答复的英文本的全文：

“我们收到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的电报，但电报内称了解到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损害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权的要求。对此，我们的立场是：

“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该司令将采取他认为贯彻投降条款应有的步骤。

“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须的投降条款；并命令日本陆、海、空三军当局及其所控制的一切力量，不论在何处，均停止行动，放下武器；以及发布最高司令力使投降条款付诸实施需要发布的命令。

“投降后，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把战俘及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运到指定的安全地点，以便迅速登上盟国的船只。

“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根据《波茨坦公告》按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愿望建立。

“盟国部队将在日本驻扎到《波茨坦公告》中所指的目标实现为止。”

盟国的答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关于保留天皇的要求，但天皇的最终命运如何却也没有表示，这样使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找到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借口。他们抢先，甚至先于外相东乡，上奏天皇，表示反对。

当天下午，内阁举行全体会议，讨论盟国的答复。东乡认为没有理由不接受它。第二段文字在原则上并没有损害天皇的地位，而第五段则允许日本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说：“不可能设想占压倒多数的忠诚的臣民不想维护我国的传统制度。另外，如果要求修改措词，可能会引起盟国敌对天皇制的人要求废黜皇室。”

然而，阿南将军却坚持己见，坚决反对，而他又得到平沼和另外两名受

平沼影响的文官的支持。这两名文官是内务相和法务相。他们坚持盟国必须明确确保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也有人支持东乡外相，但只有米内海军大将公开表态。在经过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的辩论后，一直保持沉默的铃木终于启口：“如果强迫我们解除武装，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战争。”

急于结束战争的东乡，不相信铃木竟会左右摇摆，便尽量抑制住自己，他不得不设法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既然盟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抵达，”他说，“我们最好还是等收到正式答复后再行讨论。”没有反对意见。东乡跟着铃木到他的私邸，责备他一番。

他大声说，是什么时候，你还提出解除武装的问题！“除非我们准备使和谈破坏，否则就得接受目前这样的答复。首相难道不知道天将要结束战争吗？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有关皇室的存亡吗？如果你坚持这种态度，我可要单独上奏天皇！”

东乡把铃木的“背信”通知了木户侯爵。随后，木户即对铃木进行了指责。“我不想贬低那些渴望护卫国体的论点，”木户说，“经过仔细研究后，外相向我们保证，对于照会中有争论的那段话，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假如在目前阶段我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进行战争，那么千千万万无辜日本人民就会死于轰炸和饥饿。”铃木的防守姿态松下来了。木户继续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实现和平，我们当中可能会有四五人被暗杀，但这也是值得的。咱们还是毫不动摇地执行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政策吧！”

“咱们干吧！”铃木突然喊道。

12日下午6时后，日本驻瑞士和瑞典公使相继发回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正式复照。当天晚上，内大臣木户又在宫中和铃木首相恳谈，告知陛下意图，劝首相断然接受同盟国的复照。

在此期间，日本皇族也举行会议，表示团结一致，协助天皇。陆相阿南曾试图拉拢一名亲王出面反对，但遭申斥。与此同时，以陆相阿南为头目的一些法西斯分子，在东条的怂恿和支持下，还阴谋发动宫廷政变，隔离主和派要人，占领皇宫，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迫使日皇出面支持他们的要求，但他们的政变计划终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没有同意而未敢实施。

8月13日下午，日本方面收到美国广播，其中谴责日本故意拖延，迟迟不作答复。与此同时，美军舰基飞机猛烈轰炸关东和东北地区，迫使日本从速投降。从13日下午5时起到14日清晨，美国飞机在东京等地大量散发日语传单，载明8月10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和同盟国的复照。这样就把日本政府一直讳莫如深的交涉秘密公诸于日本人民，使日本统治集团深为不安。

14日上午8时，内大臣木户携带同盟国一张传单晋谒天皇，奏请迅速下令完成终战手续，当即得到许可。

此后，铃木首相来访木户，两人商定，共同奏请天皇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和内阁成员同时参加的御前会议，一举解决终战问题，天皇立即应允。

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御前会议于皇宫防空洞内举行。铃木首相上奏近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情况，并说在阁议中，赞成外相议案的占八成，但尚未获得一致通过。现请陛下亲自听取反对者的意见，再乞圣断。

首相发言后，陆海军两总长和陆相阿南相继起立，声泪俱下，恳请陛下

准予再照会，希望同盟国同意维护天皇制度。如果同盟国不允许，那就只有继续战争，死里求生。

这时会场凄惨沉寂。最后天皇裕仁发言：

“我的异乎寻常的决心没有变。我不是轻率地作结论，而是根据内外形势和彼我双方的国力，战力来判断的。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

“……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或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

“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希望赞成此意。”

在天皇讲话时，会场上时有呜咽之声，有时甚至放声大哭。穷兵黩武的侵略者自食其果，落得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裕仁讲话后，日本政府随即根据这次御前会议的决定，赶忙拟就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以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发出的最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稿。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荣幸地就美国、大不列颠、苏联和中国四国政府8月11日对日本政府8月10日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的照会的复照，通知四国政府如下：

“一、天皇陛下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所必需的各项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对日本陆、海、空当局及其所属不管驻何处之所有部队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放下武器，并发布盟军最高司令认为在执行上述条款中有必要发布的其他命令。”

到此为止，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但是，以东条为首的一批法西斯死硬分子妄图作最后挣扎，他们蠢蠢欲动，继续寻衅闹事。正是：战败投降心不甘，法西斯狂徒谋叛乱。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一章 未遂政变

宫廷叛乱敲丧钟 政变策划密室中
逆流而动终失败 亿万国民听“鹤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陆军省的一些死硬的法西斯分子，在东条和阿南等战犯的直接和间接怂恿、鼓动之下，竭力作最后的挣扎，仍在疯狂地进行反对投降的活动。他们狂吠要把战争进行到底，阴谋叛乱，发动政变，妄图把日本人民引向毁灭的深渊。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终归落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可悲下场。

这批以东条的亲信下属畑中少佐、阿南的妻舅竹下中佐和东条的女婿古贺少佐为首的叛乱分子，许久以来就蠢蠢欲动，准备阴谋闹事。

自从8月9日那次讨论投降的马拉松内阁会议之后，陆军大臣阿南就耿耿于怀。越是回味过去36小时中发生的事情，越是对铃木和东乡感到恼恨。8月11日早晨，阿南在花园练完射箭之后，他在办公室向他的秘书林三郎大佐和妻舅竹下中佐在内的五六个军官大发牢骚，痛骂东乡、铃木是“巴多格利奥”式的人物，说什么与会者是受人操纵同意投降的，发誓要与投降派斗争到底！

阿南的不满，与其说是牢骚，勿宁说是煽动，使陆军内的反对派，一批狂妄的法西斯分子，再发动一次“下克上”的叛乱。在陆军省里，20名反对分子已秘密集合在一起，计划发动政变。作为一个军官，竹下警告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会被处死刑的。他建议，首先将天皇和那些怂恿他求和的人区别开来，然后再谋取阿南的支持，让阿南去进谏天皇，继续把仗打下去。在本土打一场硬仗，即决战能使美国人遭受巨大的损失，以致有可能安排体面的和平。如果不行，他们就将上山打游击，把战争进行下去。

密谋者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计划。他们将动用驻屯东京的军队包围皇宫，切断通讯联络，占领电台。报馆和主要政府部门的大楼，然后逮捕铃木、东乡和木户等那样的“巴多格利奥”式的人物。

竹下满有信心地以为阿南最终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接着把参谋总长梅津也带进来，届时，东京当地的两名司令官，即近卫师团长森猛赳中将和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大将，就不得不与他们合作。有了陆军参谋总长和陆相的支持，他们就不会失败，这实质上将是一次陆军的行动。他们声称，这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在最高司令官指挥下合法的行动”。

在内阁会议上，阿南将军一直毫不含糊地反对接受同盟国的促降公告。他认为，日本的光荣道路就是继续战争，不成功便成仁，不过要得到天皇陛下的允许。为此，他试图说服三笠宫亲王去帮助改变他皇兄的主意。他带了秘书林大佐驱车前往一个防空洞访问了这位亲王。三笠宫怀着敌意接待了他，这使阿南很懊丧。夜里，阿南无法入眠。午夜过后很久，他还把秘书叫醒，派他去找他的坚定的同盟者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建议由梅津将军请陆军元帅畑俊六代表陆军高级军官向天皇说情。

“你必须原谅我，”梅津一边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一边对林大佐说，“我现在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

即使在梅津戏剧性的变心后，阿南还再一次私下企图动摇天皇。8月13日清晨，他违反礼仪地打断了木户的早餐，简直是“咚咚咚”地闯进去。木户从来也没有看见他那样心神不定，话好像从他口中倒出来一样。同盟国的

条件会毁灭大和魂，应该打一场决战。“你难道不能再求一次天皇重新考虑接受公告的问题吗？”

“我不能那样做，”木户回答说。他不同意阿南提出的关于让国民选择政府标志国体终结的指责。木户甚至说：“假定天皇改变主意，取消10日的和平建议，发布最后决战公告，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毫无疑问，同盟国会把天皇看成蠢人或者疯子。让他受到这样的污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阿南从木户那里出来，急忙来到内阁会议室的隔壁房间，给他的追随者陆军军务局局长吉积正雄将军打电话。“我在开内阁会议，”阿南说，“正向各大臣做说服工作，要他们同意你们的看法。你们大家不要走，等我口来。”阿南的话进一步激起了谋反分子们的狂热。下午3时45分，内阁会议突然中断。有个收发员送来陆军一份将在15分钟后在电台和报纸发表的声明。声明捏造说：“皇军收到新敕令，已重新开始对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中国发动进攻。”

“这，我可一点都不知道！”阿南极力表白说。他立刻给刚回大本营的参谋总长梅津打电话。与阿南一样，梅津也不知道。按规定，大本营发布命令必须得到陆相和参谋总长批准，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梅津都未曾批准。这肯定是参谋次长和陆军次长干的。虽然陆相曾用电话具体指示吉积将军不得有任何行动。梅津下令废除这个声明，总算在播发前把它扣住。

会议重新进行，但阿南无心与会，处在即将被审判的战犯地位，他心潮起伏，情绪不安。那天晚上，他约密谋者的核心人物在他家里会面。他的寓所是木头结构，在东京遭燃烧弹轰炸后，这座房子就成了他的官邸。烟中认为，要使政变成功，争取4位将军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东部军区司令官田中和近卫第一师团长森猛赴。烟中一开始就把外边的谣传告诉陆相，说一些“巴多格利奥”式的人物正策划暗杀他。阿南觉得滑稽，一笑置之。对于这一政变的叛逆性质，阿南一概不问，只建议他们要注意通讯联络，这对于政变成功与否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避免正面回答密谋集团要他入伙的问题，他答应“明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向梅津施加影响，他知道梅津已决定支持天皇。但少壮军官们却要求采取更迅速的行动。阿南同意在午夜会见他们中的一个成员荒尾大佐，暗示说，到那时他可能会更加充分地考虑政变一事，说完便把他们打发走，阿南把他们送到门廊上时，嘱咐他们：“要小心一点！你们可能已被监视。再来时最好分开，别一起来。”

大家走后，竹下还和他姐夫在一起。“你参加我们的行列吗？”竹下问。他以为依仗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会开诚相告的。“在这么多人面前，怎么好暴露真实思想。”阿南将军说，他没说的，竹下便走了。竹下心里重新高兴起来，认为阿南定会支持他们。

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大将，虽然表面上支持内阁决议，但暗中却加紧进行反对无条件投降的活动。

13日晚，他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一起，把东乡外相从晚餐会上叫到首相官邸地下会议室举行秘密会谈。但东乡不愿在最后一分钟修改条款。他反复说：“不可能！不可能！”正说着，“神风”特攻队创始人西海军中将也插了进来。他说：“如果我们采取特攻办法，牺牲2000万日本人的生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假如有获胜的现实希望，谁也不会想到接受《波茨坦公告》。”外相

说，“然而，一役之捷并不能力我们赢得战争。”

空袭警报开始尖叫，东乡借口散会。他驱车经过漆黑的街道回家时，不禁想起大西所说的牺牲 2000 万生命的建议。必须在明天作出实现和平的最后决定。他后来写道：“只要国家有希望能恢复，我们能忍受一切，而军人所炫耀的弓箭、竹茅却不能带来任何希望。”

8 月 14 日，这一天无论对日本内阁还是对密谋者来说，都是最紧张的一天。上午刚一上班，就有两个密谋者突然闯进梅津的办公室，把他臭骂了一顿。为了安抚他们，梅津说，他并不是“绝对”反对政变，他们鲁莽地跑到竹下中佐的办公室。“梅津支持我们啦！”其中一人高声喊道，“应该把事态发展立刻通知阿南才是。”于是，竹下便驱车前往首相官邸。他发现内阁会议已经中止，大臣们开紧急御前会议去了，这使他目瞪口呆。到皇宫后，他等了许久才见到阿南。竹下说：“梅津将军改变主意啦！”阿南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是吗？”不过，他又想，一切都已定局，便阴沉地补充说：“但是，一切都已决定了。”

阿南回到陆军省，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密谋者们正在加紧串连，准备闹事。有关美国舰队开到东京湾的谣言已传遍整个陆军省：“敌军正准备登陆；伞兵即将空降各主要机场。”惊恐的军官们把保密文件拖到院子里放火焚烧。有个从冲绳回来的大佐，挥刀冲进英语广播和报刊翻译室。他指责翻译人员散布投降主义。他一边挥刀朝他们乱砍，一边喊：“你们哄骗我们，死有余辜！”但眼泪使他的心软下来，他猝然转身，摔门而去。

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长森猛赳中将，把一肚子挫折感发泄在情报首脑身上。他闯进有未精三中将办公室，大声高喊：“自杀吧！我看你死了我再剖腹！”有未提醒他说，他的职责是保卫天皇。“这是我的事。我会保卫天皇陛下，然后就宰了你！”有未大惊，连忙走到作战部长官崎周一中将的办公室。森也曾威胁过宫崎。“他疯了！”有未说。

各级军人的纪律开始大乱。派去驻守大楼的宪兵士官们开了小差，把衣服和食品也拿走了；下级军官辱骂上级军官；有些高级军官关起门来大喝威士忌酒和日本米酒。混乱现象倒使陆军领导人团结起来。阿南、梅津和杉山都在一个几乎等于信条的简短宣言上盖了章：“皇军将把圣断贯彻到底。”各部门负责人都被命令到第一会议室报到，听陆柏阿南训话。

下午 3 时半，阿南登上一个小讲台。“天皇业已决定结束战争，”他对直立不动的军官们说，“所以，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天皇的旨意。”稍停片刻，他便咽着说：“困难摆在我们大家面前，你们身为军官，要面对现实，一死不能百了。你们得活下去，就是吃草、睡在岩石荆棘上也要活下去！”

阿南的训话把高级军官参与政变的可能性毁灭了。只有不可动摇的畑中少佐和几个死硬派依然决心行动，他们准备占领皇宫，并截获天皇关于投降诏书的讲话录音带。为此，他们加紧活动，整个下午，畑中骑着自行车，在酷热中转遍东京的大街小巷，企图给密谋者输血打气。畑中找到近卫师团第二联队（团）长芳贺丰次郎大佐。畑中指天发誓说，阿南、梅津，田中和森各位将军均已参加密谋；芳贺勉强答应支持。之后，畑中又骑自行车回市谷对他们的同伙吹嘘说：“近卫师团所有联队长都答应支持我们，要说服的只有师团长一人了。”

随后，迫不及待的畑中就来到森猛赳中将的办公室，要他支持政变行动。森虽然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同情，但对亲身参加这一政变却表示犹豫。他说：

“让我到明治神宫去洗一洗不纯的脑子，然后再正式作出决定。”

“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畑中怒气冲冲地喊道，随即开枪把森猛赶枪杀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利用师团长的名义给各联队发布命令。实际上森的印章是由佃中盖的，命令却是东条的女婿古贺少佐写的。它指示部队占领皇宫，“保护”天皇和国体；派一个中队占领日本广播协会大楼，控制广播。包围皇宫的部队总数达1000多人。如同“二二六”叛乱时那样，大部分官兵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反叛。从外表看，它不过是紧急增强常备警卫力量。不到几分钟皇宫所有的大门都被关闭，使天皇与外界隔绝。

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没有佃中的命令不得离开皇宫。在宫内省，天皇的诏书已经录音完毕，下村总裁和日本广播协会工作人员乘车离去，汽车开到不足100码外的板下门时，上了刺刀的士兵把他们拦住。有个士兵竟向车内探头探脑，他奉命要搜寻情报局总裁。下村总裁的秘书承认自己的身分，所有人被带到一个警卫小木屋里受盘问。内中有人泄露说，录音带已交给一个侍从保管。于是，一个搜索队便被派出搜查宫内省。

木户睡在宫内省四楼。侍从户田向他报告说，叛军已进入大楼正在搜寻木户本人和天皇的录音带，御文库已被包围。“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类事，”他说，“陆军是该死的笨蛋！”由于皇宫外很少有人认识木户，户田建议他到宫内省侍医的夜间值班室去，在那里他可以冒充医生。木户刚在医生的床上躺下，他就想到，如果像47浪人中的吉良那样，在躲藏时被人杀掉，这多丢脸！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匆忙收集起绝密文件，撕得粉碎，扔在马桶里用水冲下去。然后，侍从才请他躲到地下的仓库里去。

畑中少佐虽然成功地孤立了天皇，但却无法找到天皇的讲话录音。另外，被他派去执行任务的井田中佐带回来的消息又是令人沮丧的，他们得不到外界的援助。“东部军管区不愿介入。”他说。事实上，井田本人也认为政变再也搞不下去了。“近卫师团官兵一旦发现师团长被杀，就会拒绝继续干下去。假如硬着头皮蛮干下去，那就会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没有什么别的法子，只好在拂晓前撤出所有部队。”畑中试图插嘴，井田把手一挥，继续说：“要面对现实，政变已经失败了；但是，如果你迅速将部队撤走，国民永远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这件事就会像仲夏夜之梦那样过去。”

畑中的脸色阴沉下去。“我明白。”他说。

“我去向陆相汇报情况，赶快把部队撤走吧！”井田继续说。

畑中点点头。然而，井田一走，畑中的叛变精神仍跟先前一样炽热。他回到叛乱指挥中心近卫师团兵营。第二联队长芳贺大佐正在那里越想越觉得可疑，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有见森将军。对芳贺的问题，畑中竭力回避，但古贺少佐不愿再保持沉默，他向他的上级坦白说森已经死了，并敦促芳贺指挥近卫师团。

“森将军是怎样死的？”芳贺大佐问。畑中和古贺都声称不知道。芳贺颇为不安。恰好，这时东部军管区司令部打来电话，查寻情况。打电话来的是畑中的参谋长高岛少将，他要了解皇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芳贺无法具体回答，便把听筒递给畑中。

“参谋长阁下，我是畑中少佐，”他用发抖的声音说，“请理解我们的热忱。”

高岛对他没有命令和训斥，而是好言相劝，表现理解反对派的心情，他说：“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了，不要动用军队了，这只能造成更多的无谓牺

牲；在日本，服从天皇大命，既是实际的，也是最高的道德。”

参谋长停了停又问：“你听见了没有？”

“我非常了解，阁下。让我再想想。我还有个请求。在广播天皇陛下下的诏书前，给我10分钟广播时间行吗？”他想向国民讲清楚少壮军官为什么要造反。

高岛说，这是“不坚决”的表现，应该尽量拯救生灵。“我们已经到了无从改变结局的地步。烟中，你懂得我的意思吗？”烟中没有回答，啜泣着放下了电话。

就在叛军包围皇宫的时候，阿南在自己的寓所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这之前，他同法西斯头目东条英机进行了串连，统一了口径，坚持认为他们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解放战争”。后来见到大势已去，政变也即将失败，今后留待他的只能是以战犯的罪名受审和上绞刑架。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结束残生，于是他决心切腹自杀。当竹下中佐在宿舍找到他时，阿南正在起居室内书写遗嘱。旁边铺好了一床席子，挂着蚊帐。竹下可以看出，姐夫在准备自杀，再谈叛乱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他们俩对饮了一杯酒，阿南即行“剑道五段”。他谨慎地把匕首深深插入腹部，然后左一刀，右一刀，鲜血像水柱似的喷射出来。猛然间，他又将匕首猛插进喉部。奇怪的是，伤口几乎没出血。竹下说：“要我帮忙吧？”

“没有必要，”阿南哼着说，“走吧！”

竹下退出，陆相的呻吟却使他又转身回去。“很痛吗？”他问。阿南已失去知觉。竹下拿起匕首，朝阿南的颈背一刀戳下去，把佩满勋章的外衣披在即将死亡的将军身上。阿南的一生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命的一生，谁能算清他的屠刀杀害过多少无辜的生命啊！

到15日清晨7时21分，反对投降的有组织的叛乱行动总算结束。但是，还有为数众多的顽固分子和团体仍准备以生命阻止投降。

烟中与东部军区通话的结果是派来了宪兵。宪兵一到，广播协会大楼内的叛军就全部无声无息地撤走了。烟中没有回陆军省。他的一个想法是要表明自己的“真诚”并恰当地结束暴力行动。他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同伴椎崎二郎中佐一起，信步来到皇宫前的广场上。在这里，他们作了最后的徒劳无益的表示，散发传单，号召国民起来阻止投降。11时20分，佃中抽出曾经射杀森猛越中将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开了一枪。椎崎往自己腹部戳了一刀，然后举起手枪，对准脑袋，扣动扳机。

政变流产了，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照常进行。尽管裕仁没有亲临，“诏书”的广播还是很隆重的。在播音室内，日本最有名的广播员和田信贤紧张地坐在麦克风前，两眼盯着时针与分针在12点时重叠。12时整，他说：“这次广播极其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天皇陛下现在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

在庄严地奏过国歌《君之代》后，稍停了一下，接着便是很少人听见过的声音：

《致忠良臣民书》“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帝国政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之各项条件。……”

“朕聊以自慰者，以尔臣民之赤诚使帝国国体得以保持，使朕与忠良臣民得以永世相处。尔等切勿悲伤冲动，勿使事态更形复杂；同胞切勿互相排

挤，致使混乱，误入迷途，丧失对世界之信心。世世代代举国一致，坚信我神州不灭。帝国任重而道远。尔臣民共竭尽全力，建设未来。广开公正之道路，培养高尚精神，努力奋斗，与世界并进，发扬帝国固有光荣。”

举国上下，全神聆听，一片寂静。站着或安静地跪着的听众，抽搐着脸，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千百万人恸哭，其人数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然而，在羞辱和悲痛之余，却也无可否认有某种得救之感。连年的战祸、死亡和破坏所造成的可怕的重担，终于要卸掉了。

在大本营的一个昏暗礼堂里，数百名军官，包括梅津在内，穿着整洁的军服，戴了自手套，佩带勋章、军刀，肃立恭听，泪流满面。但对某些军官来说，战争还未结束。在离东京不远的厚木基地，第三二海军航空司令小园大佐爬上跑道附近的一个土台，向飞行员发表讲话。他说，投降的命令意味着国体的结束，服从这个命令就无异于叛国。他喊道：“跟我来，消灭敌人！”他的话使数十人心中燃起烈火，高喊“万岁！”飞向蓝天，向美军阵地冲去。

在九州东北部的大分基地，海军“神风”部队的司令官宇垣将军，也以同样的决心战死。不久前，他在给渡边大佐的信中写道：“我必须为国家之危亡付出代价。”天皇的话增加了他的耻辱感。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义务步他派去送死的所有“特攻”队员之后尘。听完广播之后，他就协同11架轰炸机飞向冲绳，怀着日本帝国“必将永存”的武士道精神撞击美舰。临行前，他对部下告别说：“深信，我麾下官兵将能了解本职之动机，克服未来的艰难困苦，重建我伟大祖国，使之万世无穷！”

在东京的另一个区里，“神风”队创始人西多沈治郎海军中将，在家里自杀未遂，身受重伤。他派人去请他的“同志”兼朋友儿王誉士夫，因他昨晚借了儿玉的刀。儿玉进来后发现西多已把自己肚子切开，还在胸部、喉部戳了几刀，但神志仍很清醒。他握住儿玉的手说：“我们分别了，我要对你说的话都写在遗嘱上。”

失去理智的抵制投降的精神并没有随烟中和宇垣的死亡而死亡，公开的叛乱行动依然折磨着日本本土。厚木航空队的飞行员在东京地区上空散发了数以千计的传单，指责“重臣”和铃木政府把天皇引入歧途。他们的为首者小园大佐公开攻击说，天皇一定是疯了，才会投降；战争必须继续，但叛乱崩溃了。那天晚上，心神错乱的小园大骂天照大神，因而不得不把他管起来。给他注射了吗啡，穿上拘束衣，把他送到一所海军医院。

8月22日黄昏，10个自称“尊皇攘外义军”的青年，头上缠着白布条，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能看得见的爱宕山。当局派警察想把他们驱散，但他们却用手枪和手榴弹威胁包围他们的警察。在倾盆大雨中，他们手挽着手，高唱国歌，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之后，5颗手榴弹几乎同时爆炸，10人倒卧在地，全部被炸死。他们的为首者留下了一句绝命词：“山河失陷，蝉雨妄然。”几天后，3个业已身死的反叛者的妻子也登上爱宕山顶自杀。在自我毁灭的浪潮中，属于佛教某教派的11名运输将校在皇宫前自杀，14名青年学生在代代木练兵场切腹。

其他反叛者继续零星地袭击一些通讯中心。一名少佐和某通信学校的66名士兵短暂地占领了日本广播协会在川口的电台。约40个平民，包括10名妇女在内，夺取了松井广播站，然后袭击邮局、发电厂、当地报馆和县政府。

在广播天皇投降诏书的当天下午，铃木内阁举行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会上，铃木作为战时最后一任首相，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他对自己“两次麻烦天皇陛下圣断”感到羞愧。现在，有必要尽快组成新内阁。下午3时前，铃木向天皇提出内阁总辞职。应木户的建议，经天皇批准，以东久迩亲王为首的新内阁很快就诞生了，它将在盟军的指示下，办理投降的正式手续和结束战争的善后工作。

但是，正当中国人民欢庆胜利准备受降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怂恿之下，勾结日本大战犯冈村宁次，为独占胜利果实，又在策划新的阴谋了。正是：旧的灾难未过去，新的战端又燃起。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二章 鬼域伎俩

中国大地掀恶浪 妖魔鬼怪活动狂
抗战有功受打击 敌酋“无罪被释放”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举国欢腾，万民同庆，中国革命首府延安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还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经过 8 年艰苦抗战，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如今赢得了胜利，人民怎能不欢欣鼓舞呢！

但是，正当全国抗日军民欢欣鼓舞迎接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策划于密室，勾结美帝国主义和东条的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准备把中国人民推向更大的灾难的深渊。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正式传到重庆国民党总部后，人和卷宗川流不息地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秘书陈布雷忙不迭为“领袖”择要报告，空气紧张而低沉。蒋介石紧绷着脸，像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炸弹。

“报告委座，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全国各地在鸣放鞭炮，出号外，老百姓欢天喜地，高兴得无以形容，甚至放声痛哭。他们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过安定日子了。”

“嗯！”蒋介石竖着耳朵在注意听着。

“报告委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如遇拒绝投降者，应坚决消灭之！”

“什么！轮得他们？”蒋介石愤恨地起立踱步，风车似的团团打转。随即向陈布雷口述了如下 4 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自己的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并保证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要火速进军！

第二道给沦陷区的部队，通电所有日伪军将领，各守原有阵地，只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他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

第四，电请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要他在蒋介石的军队接收之前，当负责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

蒋介石在发布了这 4 道命令之后，紧接着就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对受降问题作了一番布置。到会的有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等人，会上蒋介石宣布了指定日军投降地区及受降长官，并根据何应钦等人的建议，正式委任投降将领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

为了夺取胜利果实，早在日本正式投降前，蒋介石就与美、日反动派暗中勾结。三方达成默契，决定利用日军、伪军打击抗战有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绝不让中共部队受降，而蒋介石的部队从遥远地区赶往受降时，运输问题由美方负责。赫尔利和魏德迈满口答应尽速将 100 万国民党军队运送到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蒋介石这一倒行逆施的决定，不仅引起了共产党的抗议、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在一些正直的国民党人士中也造成了不满。国民党老将

冯玉祥曾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偏偏不准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浴血抗战，抗击了64%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毙伤俘敌伪军136万，解放了广大的土地和上亿的人民。如今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几乎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之中；将近全部的伪军和绝大多数的日军，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纵队的包围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冯玉祥仗义执言，大发雷霆。

按理，只有包围敌伪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具备受降的资格！蒋介石的军队，80多万人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又有一大批装备整齐的军队留在后方，准备大打内战。因此，华北已经没有国民党的军队，山西阎锡山的部下已在8月2日率部投敌，华中蒋介石的军队距离日军所占的大城市很远很远，无法迅速受降！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毛泽东主席譬喻得好，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准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峨嵋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

至于蒋介石，8年来，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在抗日战争中间，在1940年、1941年和1943年，他发动过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如今胜利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自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斥和反对。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蒋介石的反动措施是心领神会的。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当听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惊恐不已。他知道大势已去，不过为了维护军心，还故作镇静。根据东条的“宁为玉碎”的精神，他向侵华日军发布了如下的“训示”：

“苏联终于向我侵犯。皇国如今面对美、英、苏等大敌，已进入关系国家兴亡之决战中。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全军将士且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大捕公‘臣一人在，圣运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和时宗公之壮烈斗志，克服万难，一心一意为击灭骄敌而奋斗。”

8月15日，当冈村宁次收到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后，随即率侵华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于正午时分，按平时遥拜队形，在广场东面集合，收听天皇投降诏书。午后并对全军将士下达了如下“训示”：

“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据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交待，这一天他彻夜不眠，感到无限忧烦。特别

当他听到 14 日夜陆相阿南剖腹自杀后，更使他惊魂不定，但在 16 日，当他收到蒋介石要他“忠于职守”的电报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从此，这个大战犯成了蒋介石的贵宾挚友，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优待。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效忠”和在反共方面亲密合作，冈村收到蒋氏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遵令执行”，对所谓“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冈村供称，停战后，“中国官民”对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蒋介石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分别派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接收。工作进行得非常“圆满”。其他地区也对日军表示了“亲善”。汉口的中国国民党军司令部在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时，特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此外，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广泛掀起了中日“亲善合作”的热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有关处理投降的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军队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为了加强同国民党的反共合作，冈村宁次还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一共列了 11 条，其中谈到：“在整个停战及撤兵期间，皇军及侨民应坚持不屈气魄及斗志，同时要从大局着眼，衷心协助中国繁荣，实践对中国的道义，贯彻帝国真意，以奠定日、中结合及东亚复兴的巩固基础。”

在停战及撤兵期间，要“确保治安”，“不得已需以武力自卫时，应不失时机地采取断然态度，发挥皇军的威力”。而且还狂妄他说：“中共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

纲要还指出：“有关加强对华支援，应以真正掌握中国民心为主。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在华一切军用及国有各种设施、器材等严禁破坏损毁，如数向中央政府方面移交，以利其复兴。”

9 月 9 日，国民党陆军司令何应钦，率参谋部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之流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所谓“中日合作”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战犯勾结在一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屠杀中国人民。战犯冈村宁次对此感激涕零，他说：“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何等彻底。”

10 月 21 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谈完“公事”后，何应钦拿出甜酒予以款待，这次密谈达两个多小时。

席间，何应钦秉承“蒋委员长”的指示，“高唱中日合作”，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对冈村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一再表示感谢。

这位亲日将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进行顺利。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

卖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同苏联恶化关系，并接受广田三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被我言中。”讲到这里，何应钦举起酒杯，为“捐弃前嫌，中日密切合作”而干杯。

就在这前后，蒋介石的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新编第一军的将校军官们，也与战犯冈村宁次及其司令部的军官们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蒋军将校军官对与日军作战深表遗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当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店时，这一情景使麇集在门外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

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宁沪司令汤恩伯等高级将领，经常同冈村“会见、宴请、联欢”，这还嫌不够味儿。

12月23日上午，蒋介石又亲自出马，予以慰问。蒋介石对战犯低三下四，躬身问安，并要冈村“切勿客气，如有问题可随时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冈村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咸敬佩”。

话说日寇投降，沦陷区的人民欢呼鼓舞，对新的日子寄予美好的幻想，眼巴巴地盼望中央官员来临，展开新政。到后来却大失所望。有一首民谣唱得好：“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民间遭殃之事多至无数。最显著的如伪市与法市的折算率便是其中一例。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决定“200对1”，就是说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是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报纸揭露，仅这一桩买卖，蒋某等人就赚到黄金百万两！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国最重要、最富庶的地方，为了捞取那里的油水，蒋介石决定派他的心腹汤恩伯去。他说：“汤恩伯的服从心强，不大有野心，这些都是好的，而且他也很懂得做生意，你们还记得中原会战，他转移阵地时，还叫士兵每人背着一箱前门牌香烟吗？日本人讥笑他，我们的人骂他，唯独我认为他做得好，试想兵荒马乱之中他还记得生意经，这个人可以重用啊！”

蒋介石决定汤恩伯接收上海，顾祝同大为失望，气得吹须瞪眼。同时也真有人对汤恩伯看不上眼，在蒋介石面前告了御状。说他在上海受降时，在华愁公寓接见日本登陆部队司令闹了个大笑话。事情是这样的：当日本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到华懋公寓时，汤恩伯开口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到这里来谈谈。”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一听之后，立刻警告他说：“汤将军，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这样，汤恩伯才重新用命令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同松井单独会见的时候，居然抱歉似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还有，日本一投降，上海市马上重行宵禁，晚上10时以后就禁止行人和车马通行。谁要走路，必须向伪保安司令领取通行证。因此连重庆派过去的、地下钻出来的中央人员，都去拿了伪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证，这和投降以后的日本军队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日本军队虽然名义上投降了，但他们依然在上海街头昂首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汉奸们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汉奸周佛海做了上海别动队司令，罗君强和熊剑东担任了总指挥，程克祥当了指挥部的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就这样，南京伪政府的部长、伪上海市的局长们，麇集在总指挥部之下，成了秘书长办公厅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的不下几百名。难怪群众说，昔日的汉奸卖国贼，今日成了国民党的达官贵人。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变为“劫收”大员，成了当时争相抢购的“肥缺”。沦陷区的人们送给这些国民党的大人先生们三句话：

第一句是“五子登科”，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所以叫做“五子登科”。

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说不管你是汉奸、日本人、混帐工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那无论有多大罪孽，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宁沪等地公然为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 30 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弹性很大。上海流行着一句话，叫做：不怕犯天大的罪恶，只要有等身的黄金。

第三句话叫做“无法无天”。接收大员到后，什么都要钱，任何事情都难不住法币，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没有金条，那就无法无天，没法活了。

过去是日寇、汉奸欺压人民，如今是国民党，汉奸、日寇勾结在一起鱼肉人民。只是番号不同罢了，过去是“皇军”，而今叫做“中央军”！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侵华日军总司令、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其罪恶目的在于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为此，他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结，搜罗一切牛鬼蛇神来壮大他的反革命队伍。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就把冈村宁次聘为高级秘密军事顾问，为国民党屠杀人民积极出谋划策。真是上行下放，蒋介石启用大战犯后，山西上皇帝阎锡山也将山西侵华日军万余人组成反共别动队。这支反动武装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屠杀了大量的中国人民。

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介石原以为凭着国民党雄厚的军事实力和美帝的帮助，又有大战犯冈村宁次作高参，可以在 3 个月至 6 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于是，以 1946 年 6 月 26 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 7 月起到 9 月止，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大举进攻。

10 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在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 193 个旅（师），约 160 万人，占其总兵力的 80%。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为 120 万人，较之敌人的兵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人民解放军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作战方针，不断地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有力的打击。经过约 8 个月的时间，在消灭了敌人正规军 66 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 71 万多人以后，便制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接着，人民解放军即逐步展开了战略性的反攻。

面对着连吃败仗的局面，蒋介石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恐不安。特别是华东战场，节节失利，更使他急不可待。在十分焦虑的情势之下，蒋介石又想起动用日本大战犯冈村宁次来。他同左右商量道：“如今之计，我看只有请冈村宁次前往徐州，替我指挥山东战场，才可以挽回局势，你们以为如何？”

张群考虑了一会：“这倒是个办法。冈村将军可谓侵华急先锋，在中国积恶甚多，这次委座对他宽大，他一定会听命前去，问题是……如果传了出去，会不会引起议论？”

其他人也认为起用冈村宁次，他一定愿意效劳，而且也一定比其他将领高明，因为冈村是日本一等军事人材，战争结束之前又是现役大将之一，特别是对中国战局甚有经验。他同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曾任“台湾总督”与“香港总督”）、板垣征四郎3人并称“中国通之四杰”。但都担心，若一走漏了风声，就会引出麻烦。

“我同你们商量就是为了这一点。”蒋介石说，“最近我同冈村见过好几次面，他对我非常感激，便使我想用他来指挥山东战场。他人才难得，长期担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对北方情况非常熟悉。”

“他在华北专门找共产党打，”何应钦笑笑说，“他对付共产党算老行家了。”

蒋介石起立道：“那我就请他来谈谈。”说罢众人皆散。

隔了片刻，侍卫官传报：“冈村宁次大将已到”。蒋介石像注射了吗啡一样，顿时兴奋起来，急忙握住冈村双手，表示热烈欢迎，客人刚刚坐定，蒋介石就迫不及待他说：“中国的局势已经摆得清清楚楚。你替我到山东走一趟，局势挽回，军心、民心也就安定了。”

冈村谦逊几句后，高兴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遵命前往山东战场，不过以一个日本人出任斯职，在舆论上多少不便，这一点请委座考虑考虑，别让事情还没做好，反而增加委座不便。”

蒋介石笑道：“这个你放心。前方将领大都留日，汤恩伯同你交情又很不错，内部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外面，那管制舆论、封锁消息、审查报纸，我们甚有经验，在这方面请你放心好了。”说罢下令摆酒，为冈村饯行。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语投契不嫌多。”三杯下肚，借着酒兴，冈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外面有些人在问：‘冈村哪里去了？’这些人以为我这个一等战犯，早就应该受到公审，判处极刑，至少也应该关到巢鸭监狱，了此余生。他们哪会想到：今日的冈村是蒋委员长席上的座上客，而且就飞往山东，又像当年一样，指挥千军万马，同中国共产党直接作战了！”说着他举起酒杯说：“来，诸位，为了我们共同的反共大业干杯！”

谈到蒋介石对日本战犯的恩情厚意，冈村十分感慨他说：“我们的友谊是建筑在共同的反共基础上的，我们的友谊将像富士山一样，永垂不朽！”讲到这里，他又为蒋介石的“健康”痛饮了一杯。

“过去的就不提了。”冈村擦了擦嘴角上的白沫，又说：“战争结束以后，兄弟在中国已做了两年的座上之客，虽多参与战事的议论，但并非亲临战场，心里甚为惭愧……”说到这里，他瞅了瞅笑咪咪的蒋介石又说：“所以对今天委座的命令，真是十分的高兴，兄弟明天就要起程了。至于我留在华北的旧部9000多人，一部分正在阎锡山那里剿共，还有一部分在河北和山东中央军里协同作战，对于这些任务，兄弟感到荣幸之至！”

“不过兄弟感到遗憾的是，”冈村沉思了一回儿又说，“有些人对中日共同防共，共存共荣的精神不理解，他们也跟着共产党说长道短，不了解委员长的苦心，兄弟感到非常痛心！最让人讨厌的是，不仅中国记者起哄，外国记者有时也跟着凑热闹。”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董显光说：“有一次一些外国新闻记者问新闻局董局

长，说冈村宁次哪儿去了？董局长答得好，说我担任联络班班长，协助遣俘去了，但任务未了，所以大家见不到他。”冈村大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明天要飞往山东那还得了？”于是众人皆笑。蒋介石见冈村已有几分醉意，于是宣布散席。

其实，蒋介石动用冈村宁次并不是没有顾虑的。当客人散走。他对心腹陈布雷等人叫苦说：“难啊！动用冈村又怕招风险，不用又没有办法。你们替我看看，如今在国民党内，有哪个对付得了共产党？冈村在华北对付共产党的那一套，我们之间恐怕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于是他坚持前议，决心不变。

却说冈村去后不久，山东战场的败讯就传来了。蒋介石正为胡宗南在西北战场的失利伤脑筋，没料到张灵甫已死在孟良崮，他那王牌军几万人全部被华东解放军报销了，不是战死，就是投降。既损兵。又折将，蒋介石抱头哇哇直叫：“真是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啊！”

尽管有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充当顾问，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甚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尽管有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尽管有现代化装备的几百万大军，但是蒋介石仍是节节失利，不能扭转败局。1948年9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战役，继之又发动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共进行了4个月零19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在此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敌8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不是平均每月8个旅，而是38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蒋家小朝廷面对着摇摇欲坠的窘迫局面，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质问之下，终于在1949年1月26日演出了对冈村宁次所谓公审的丑剧。国民党法庭对侵华主要战犯冈村宁次宣布“无罪释放”。冈村竟也大言不惭他说，日本“解放”大东亚的目标，是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出发的，因而是“光明正大”的。而他本人，一贯致力于“中日友好”和“共存共荣”。他经常教育部队“戒烧、戒淫、戒杀”。因此，他是“问心无愧的”。

好一派胡言乱语！完全是强盗逻辑，到中国进行侵略、烧杀、奸淫、掳掠，屠杀了2000多万中国人民，是为了“中日友好”和“共存共荣”？

我们且看这位侵华战犯的履历吧：

1915年2月，日德战争爆发，侵占我青岛要塞；

1917年2月，奉命出差中国，辅佐青木顾问为侵华搜集情报；

1923年，任驻上海武官，继续为武装侵华做准备；

1925年12月，任军阀孙传芳顾问，参与中国内战，妄图阻止中国的革命运动；

1927年7月，侵占中国山东青岛；

1928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曾参加日军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

1932年，任上海日本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指挥侵占上海的战争；

1932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

1933年2月，参加热河作战后，曾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

1938年6月，任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攻占武汉作战；

1941年7月，任日本派遣华北方面军司令，对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大力推行东条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

1944年8月，任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攻占广西桂林、柳州作战；

1944年11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指挥统帅整个侵华日军的军事行动。

从以上列举的简历中可以看出，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仅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他秉承东条英机的旨意，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许多“无人区”和举世震惊的大惨案。闻名中外的1942年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就是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进行的。扫荡前夕，他专程从北平赶到石家庄进行部署，在战役进行中还多次亲临前线，甚至乘飞机进行视察。在这次扫荡中，日寇屠杀冀中人民数以10万计，烧毁房屋10万余间，并掳走5万多青壮年充当炮灰或做苦役。此外，冈村还在长城沿线疯狂烧杀抢掠，并甲并村，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无家可归。这就是战犯冈村宁次所说的“日中亲善”和“共存共荣”！

1943年秋，冈村率领日本侵略军4万多人，对冀西阜平县的平阳村一带进行残酷大扫荡。侵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给当地农民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灾难。

据当时的《晋察冀日报》报道：

64岁的杨楨及其老伴、儿媳和外孙女被冈村的军队抓住了，鬼子兵硬逼着杨楨老汉用石头砸死他的亲人。老人不忍下手，日寇使用刺刀将他刺死，用石头将他老伴砸死，并把他的外孙女从山顶上扔下来摔死。孟连书的老母，被日军一刀刀地碎割，还问她痛不痛。当她奄奄一息时，鬼子又把她扔到火里烧成焦炭。日本法西斯匪徒还当着父母的面，一刀砍下一个16岁女孩的头，先是放在桌子上，继而掷到她母亲的怀里。女孩的残废父母也被鬼子杀死了。

有一次冈村宁次的军队把一个孕妇按在一口棺材里，又强迫20多个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围在棺材周围，看着他们把孕妇开膛破肚，挖出心脏，挑出刚成形的胎儿。当八路军把日寇赶出平阳村的前夜，丧心病狂的敌人一天就杀了140多人，又把表示愿回家的60多个妇女剥光衣服，砍了头。

冈村宁次在平阳村一带扫荡了87天，屠杀了大量的村民，烧毁了无数的房屋。在平阳村的每口井里都填满了死尸，院子里汇聚着一寸厚的殷红血泊，令人惨不忍睹！

日寇在平阳村一带的暴行，仅是冈村宁次之流作恶多端的一个典型。据晋冀鲁豫边区极不完整的统计，抗日战争8年中，直接被日军屠杀的就有73.2万人，其中仅太行山区就达17万人，平均每31人中就有一人被杀害。日寇还惨无人道地奸淫妇女和向边区施放毒气和细菌。8年中因日军散布毒气和细菌而患病的人数，约达1200万。被日寇践踏和肆行奸污的妇女就有36.3万多人。这就是战犯冈村宁次所说的戒烧、戒淫、戒杀的“三戒”！

冈村宁次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是写不完、说不完的。就是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战犯，竟被蒋介石宣布“无罪释放”了。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哪能不谴责，孰能不反对！

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就此严正声明，勒令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立

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声明号召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

但是，一意孤行的南京反动政府，不顾中共的严重警告和中国人民的反对，竟于 1949 年 1 月 29 日清晨，偷偷地让冈村宁次及其他 259 名战犯乘美轮“约翰·W·维克斯”号逃之夭夭了。实力可恶至极！正是：冈村宁次被释放，众怒声讨“委员长”。欲知东条英机和其他战犯的结局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三章 战犯末日

东条英机大战犯 屠杀生灵千千万
国际法庭处绞刑 人民拍手齐称快

虽说冈村宁次受到了蒋介石的保护，逃脱了人民的法网，但他的名字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发臭发霉，实际上已沦为行尸走肉。然而，冈村的上司大战犯东条英机和他的大小兄弟们，却受到历史的惩罚，他们以及他们所推行的反动事业，都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话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局势更加混乱。面对着东条等人所造成的这个烂摊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非常时期承担组织新政府的责任。东久迩亲王出任首相也是经过好多周折的。东久一开始就给这个提议浇了一盆凉水。他说，政治曾使他父亲倾家荡产。此外，他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他在陆军大学当少尉学生时，曾拒绝明治天皇邀他出席晚宴的邀请；他曾与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吵过嘴；他还是靠了一位陆军元帅的劝解才保留皇族地位的。几年后，他娶了明治天皇的女儿聪子公主；但是，他依然想当一名自由自在的老百姓。

然而，天皇今天却批准木户物色的这位人选——作为皇族的一员，他叔父是“超政治”的，可以免受非难攻击。

东久迩知道自己被天皇“亲自挑选”出来当首相以后，几乎无法拒绝。“在这种严重局势下我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8月16日上午他坚定地对本木户说，“如果我对国家有用，我将欣然接受这个职务。”然而，在打定主意之前，他先得了解一下时局。

木户告诉他，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日本政府迅速派出一名联络官前往马尼拉。“所以，有必要尽早成立内阁。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同美国人打交道，任何耽搁都会引起盟国的怀疑，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昨晚的未遂政变使得有必要挑选一位受陆军尊敬的人。“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职务，你就会给天皇造成极大的焦虑。”木户进一步强调说。

东久迩暗自思量，领导一个战败国的担子将是繁重的，不过，他知道他能够通过陆军内的同僚（他本人有大将军衔）控制住陆军内反对派的叛乱行动。一旦日本前途定下来，他就可以辞职。“我谨领组阁大命。”

中午前，华盛顿接受日本投降的照会到达，大本营遂下令海陆两军停止敌对行动。另外，天皇还命令3位皇族到海外各地司令部进行解说，要军队放心，投降的决定系出自他本人的自由意志。陆军中佐田宫恒德王，将给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部队做工作；陆军中佐朝香宫鸠彦王，负责中国派遣军和中国方面舰队；前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的儿子闲院宫春仁王，负责上海、广州、南京、西贡、新加坡和印度支那。3人在羽田机场同乘一架白色双引擎三菱制五七式陆军运输机出发。

东久迩由于承担了本来不想承担的责任的压力，那天晚上辗转不眠。他想起一个早已忘却的偶然事件。这事发生在25年前他还在法国的时候。他对一个算命的老太太说，他是一个画家。她看了看他的手，抬头说：“这是撒谎。你将来会当日本的首相。他噗哧一笑，承认自己是个亲王，也是个军官。“在日本，皇族和陆军将校照例是不能当政治家的。我怎么会当首相？”

今天，这个倒霉的差使果然戏剧性地落在他的身上了。他想，今后必须谨慎从事，若走错一步就会给日本带来新的不幸或灾难，当前就面临着许多

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次日上午 11 时，即 8 月 17 日，他向天皇呈交拟议中的内阁名单。只有米内保持原职。东乡拒绝出任外相，由他的前任重光葵接任，近卫公爵出任无任所相。其他人选天皇都同意。

新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派一个代表团前往马尼拉，与麦克阿瑟将军一起安排各战场日军投降的事宜。由于害怕叛乱的飞行员截击代表团座机，采取了一些挖空心思的预防措施。8 月 16 日，天亮不久，河边将军率领 16 名代表团成员来到羽田机场。他们分乘几架小飞机，在东京湾上空转了几分钟后，便在木更津机场着陆。这里有两架身经百战、弹痕累累、样子像雪茄的三菱轰炸机在等待着他们。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飞机已涂上白颜色，并画上绿色大十字。

代表们登机后，飞行员才打开密封的命令：目的地是伊江岛。飞临九州上空时，代表们看见一队飞机正朝他们飞来，非常焦虑。但仔细一瞧，发现机上有美军标志，这才放心。于是，两架轰炸机有十几架战斗机在他们周围保护。日机发出暗号：“巴丹。”对方发出令人放心的回答：“我们是巴丹的守卫。跟我们来。”这群极不调和的飞机在南海上空飞行了一个半小时，伊江岛才出现在眼前。他们在那里换乘一架四引擎 C—54 型美国飞机，继续飞行。天快黑时，C-54 飞抵尼科尔斯机场。河边将军的代表团由美军翻译科长西德尼·马希比尔上校陪同，在马尼拉饭店会见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

萨瑟兰向日本代表团宣读了第一号总命令：指定在中国大陆、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的日军，向蒋介石投降；在中国满洲、萨哈林南部和北朝鲜的日军向苏联投降；其余日军则向英国或美国投降。正式投降仪式将于 9 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上举行。日本代表被命令开列所有部队和舰只部署地点、机场、潜艇基地、弹药库和地雷区的位置等。次日上午继续举行会议，就投降的具体事宜和美国占领军开赴日本的时间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8 月 28 日天亮不久，45 架 C—47 飞机飞临富士山，载来美国先遣部队，由麦克阿瑟的参谋查尔斯·坦奇上校指挥。领头的一架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停稳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征服者就是坦奇上校。在停机坪一端，一群日本人呐喊着朝他涌来。他当时想，这群疯子就要把他砍死了。这原来是一群接待人员。一个身材矮小的军官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有末精三中将。坦奇和有末向接待区的一个帐篷走去时，日本摄影人员和美国通信兵的摄影师不断拍照，几乎把每一步都记录下来。

厚木机场不到 48 小时就被美国第十一空降师占领，该师的四引擎运输机一连几小时每两分钟就降落一架。机场刚被占领，远处天际又出现一架 C—45 飞机。它是“巴丹”号，载运的是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架大型运输机于下午 2 时 19 分降落，麦克阿瑟叼着大烟斗走下飞机。“这就是结局，”他对前来迎接的美军先遣人员说，“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好像是到了终点。”

一排破烂不堪的汽车等待在机场上，准备把麦克阿瑟一行送到横滨临时司令部去。开道车是一辆红色消防车，行驶时发出惊人的爆裂声，车队跟着消防车，铿锵铿锵地徐徐开上前往横滨的 15 英里旅程。沿途站岗的日军几乎有 3 万人，全都背朝麦克阿瑟。

占领军司令部在新大光明旅馆安顿下来，这是一家豪华的饭店，1923 年关东大地震后建造的。晚饭后麦克阿瑟对聚集在他房间里的军官们说：“弟

兄们，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冒险。我们现在坐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军队，要看看管住 19 个全副武装的师，还有 7000 万疯子。只要走错一步，就会带来无穷的灾难！”

麦克阿瑟决定，日本的投降仪式于 9 月 2 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杜鲁门对这个选择特别高兴，因为世界上 4 艘最大的战列舰之一“密苏里”号是以他的故乡密苏里州命名的。

9 月 1 日，在“密苏里”号炮长霍勒斯·伯德中校指挥下，在该舰的甲板上进行了预演。次日清晨，天色迷濛，凉气袭人，约 7 时 30 分，一艘驱逐舰开到“密苏里”号旁边，盟国的海陆军将须和美、英、中、苏等国的代表先后走下驱逐舰转上“密苏里”号。这时舰上立时寂静下来，连波浪拍打军舰吃水线的声音都可听到。

此时，为纪念飞艇“希南多”号的艇长而命名的“兰斯多恩”号驱逐舰，载着 11 名日本代表驶来。日本人关于应由谁当首席代表的问题，曾经发生过争论。如果让皇族、新首相东久迩去受这种耻辱，他们认为那是不堪设想的；而战争后期曾为结束战争作过一些努力的近卫公爵，也不愿使自己在这一时刻蒙受羞耻。这个繁重的责任于是就落到新任外相重光葵的身上。重光觉得这是个“痛苦”但对他是有利的任务，对天皇委任他作为首席代表感到荣幸。陆军参谋总长梅津被迫参加，那是天皇亲自敦请的。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令他的作战部长富冈海军少将代理出席。“仗是你打输的，”他说，“所以该由你去。”富冈默默地服从，但已经打定主意在投降仪式后切腹。

8 时 50 分，一名美国军官领着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系宽领带的日本文官登上“密苏里”号。这位文官上扶梯极为艰难，每走一步都得呻吟一声。他就是外相重光葵。他的左腿多年前在上海被暗杀者的炸弹炸断。他的假腿使他步履艰难，十分痛苦。站在上面的美国军官，原以为戴高礼帽后面那个面容沉郁的将军会搀扶他一把。那个将军是梅津，他把重光看成是“巴多格利奥”，不理睬他的苦楚，故意让他出丑。后来，还是一个美国人拉了他一把。

从后甲板到举行仪式的前甲板的扶梯这一段痛苦的路程，使重光成了所有人瞩目的中心。有个美国记者注意到，观看的人都以“一种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重光葵痛苦地、狼狈地爬上扶梯，掩饰着他那悲惨的、难堪的表情。

日本代表团站好位置后，全体立正倾听舰上牧师的祈祷。麦克阿瑟来到一张桌子旁边，桌上铺满文件。美国人主动提供了一张在日德英战役中使用过的桌子，但是因为太小，舰长又换了一张破烂的饭桌，上面铺了一块还有咖啡斑点的绿绒布，咖啡斑点则用文件盖住。温赖特将军走到麦克阿瑟旁边，在桌子后面站着。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麦克阿瑟说，“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正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在这里即将取得的谅解，忠实地执行这种谅解。”

“我本人的真诚希望，”麦克阿瑟继续说，“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麦克阿瑟的活，可谓冠冕堂皇，引人动听。他讲完之后，朝日外相指了桌子另一边的一张椅子。重光一拐一拐地走上前去，坐了下来。他不知所措地摸摸帽子、弄弄手套和手杖，给人以拖延时间的印象。哈尔西将军真想给他一记耳光，并说：“快签！他妈的！快签！”然而麦克阿瑟却看出重光是弄糊涂了，便转身对他的参谋长严肃他说：“萨瑟兰，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重光签了字，接着梅津代表日本大本营僵直地走上去，连坐也不坐，在投降书上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麦克阿瑟用另外的笔以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的身分签了字。然后，盟国代表分别代表各国签字：尼米兹将军代表美国，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布鲁斯·弗雷泽将军代表联合王国，杰列维扬科将军代表苏联，托马斯·布莱梅将军代表澳大利亚，穆尔—戈斯洛罗夫上校代表加拿大，雅加·勒克莱尔将军代表法国，赫尔弗里希将军代表荷兰，艾西特将军代表新西兰。签字完毕后，麦克阿瑟再次发表简短讲话。“让我们祈祷，”他说，“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在“密苏里”号举行投降仪式后6天，麦克阿瑟来到东京。在各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0名战犯。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第一名。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头子，早就料到自己可悲的结局。不过，他还存有侥幸心理，3周前，日本内阁讨论投降时，他就多方进行阻挠，并于8月12日偷偷与阿南和畑俊六两名战犯进行串连，并要他们作证，他所打的是一场“自卫战争”。

9月12日，这个头号战犯还故作镇静。当一群新闻记者来到他在世田谷的寓所时，东条正大模大样地坐在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布置依然如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故意摆出一幅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样子。

听说要逮捕东条，外边的人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们竟涌进花园。到下午3点前后，人声鼎沸，几乎水泄不通。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侍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愿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一遍，鞠了一躬。他只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东条夫人带着侍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自己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这幢房子地势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美国军人、宪兵已把她家包围。有个美国军官在喊：“告诉这个狗杂种，我们等的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的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时是下午4时17分。

保罗·克劳斯少校和执行逮捕的人，以及跟在后面的记者们冲进东条的办公室。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了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0.32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克劳斯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己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4时29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本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但人们看着他毫不同情。“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稍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

曾几何时，这个嗜血成性的法西斯头子，不仅妄图征服全中国，而且妄图征服整个东南亚，以至大洋洲，乃至整个东方世界。正是在这种野心的支配下，就是他，这个东条英机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开初，战事发展对日本有利，东条和他的同伙欣喜若狂。但从1942年夏天开始，整个亚洲和欧洲战争的发展，都对日本不利。1943年2月，30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歼，欧洲战事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希特勒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因盟军在1943年9月于西西里岛登陆而摇摇欲坠，最后被推翻，成立了巴多格利奥新政权，9月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人民枪决。自此，日本失去了一个战争伙伴。

日本自身在太平洋的战事，同样是每况愈下。1942年6月，日本联合舰队在中途岛遭到惨败，从此盟国开始掌握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

1944年7月，塞班岛被占，美国以该岛为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东京东城区变成一片废墟，其他城市也遭到轰炸。硫磺、冲绳失陷之后，形势更加不妙。在这之前，1945年5月，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包围，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的轴心国反动同盟，彻底垮了台。

在中国战场上，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人民游击队，像汪洋大海一样，紧紧包围着日军盘踞的孤立据点。抗日的烈火愈烧愈旺，人民的力量愈战愈强，仅1944年一年，它们就同敌伪作战2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2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攻克日伪军据点5000多处，解放区人口扩大到1亿左右，这就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有力基础。

由于战争节节失利，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好战的东条内阁被迫在1944年7月22日下台，换上了小矶内阁。但是，东条仍在幕后施加影响，小矶内阁继续执行着东条的战争路线。甚至在盟军攻陷冲绳之后，东条和其他法西斯军事头目仍狂妄鼓吹“决战到底”，并提出“一亿玉碎”等冒险性的自杀口号。直到《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内阁在讨论无条件投降时，东条还在阴暗的角落里直接或间接地煽动宫廷叛乱。

反动派不打不倒，东条是不甘心死亡的。直到最后自杀时还在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诡称他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是“解放大东亚的战争”。多么卑鄙无耻而不自量啊！东条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当医务人员把他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他小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然而，东条当时并没有死去，他侥幸地活下来了，作为头号战犯受到人民的严正审判。

在东条被捕的第二天清晨，另一名战犯——杉山陆军元帅也开枪自杀了。他的夫人听到大夫身亡的消息后，也效法乃木希典将军夫人，在自己房中的佛像前跪下来，喝了少许氰化物，伏倒在短剑上。

时间隔了不久，近卫公爵在入狱的前一天晚上也服毒自杀了。对于这些日本战犯来说，由胜利者操纵审判是不能容忍的。对近卫这样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贵族来说，更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不少人采取了像德国纳粹头目们在受审前开枪自杀和服毒自杀的方法。仅陆、海军将领就有 34 人。其中罪名昭著者，除了阿南、杉山外，还有田中静壹、柴五郎、本庄繁、吉木贞一等 4 名陆军大将。

常言说，杀人者必须偿命，欠帐者必须还钱。东条英机虽然诡计多端，但终于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为了惩办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 11 个国家，于 1946 年 5 月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 23 名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这 28 人对于日本的侵略国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推行都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 28 名被告，除了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外，其余的 27 人是：

平沼骐一郎，1939 年任总理大臣，1941 年任无任所大臣，1945 年任枢密院议长，是日本法西斯进行侵略战争的头目之一。在过去，他是最隐蔽的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领导人，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

广田弘毅，1936 年至 1937 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至 1945 年为止任内阁参议，对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

小矶国昭，1939 年至 1940 年任拓务大臣，1942 年任朝鲜总督，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4 月任总理大臣，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最积极的推行者之一。

荒木贞夫，1931 年至 1934 年任陆军大臣，1938 年至 1939 年任文部大臣，1940 年至 1945 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集团公认的“思想家”和反苏战争的煽动者和组织者。

土肥原贤二，日本法西斯间谍头子，沈阳警务司令官，是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1931 年至 1940 年任高级指挥官，1941 年任航空总监，1940 年至 1943 年任军事参议官，1944 年任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的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官。1945 年任军事训练总监。此人臭名昭著，罪行累累，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坂垣征四郎，1934 年至 1936 年，先后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8 年至 1939 年任陆军大臣，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 年至 1945 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主要干将，日本法西斯“少壮派”的著名领袖梅津美治郎，1936 年至 1938 年任陆军次官，1939 年至 1944 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45 年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

畑俊六，1939 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 年至 1940 年任陆军大臣，1940 年至 1944 年任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积极推行者。

木村兵太郎，1940 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 年至 1944 年任陆军省次官，1943 年起任军事参议官，1945 年任侵略缅甸日军司令官，是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干将。

松井石根，1931年至1932年任参谋本部谍报处处长，1933年起任军事参议官，1937年至1938年任日军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1938年至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4年起任“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大政翼赞会”顾问，积极参与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活动。

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1年起任军事参议官。1933年至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36年至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年至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最老牌的首领之一。在任陆军大臣和关东军司令官时，曾积极参加了侵略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罪恶活动。

武藤章，1939年至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的高级指挥官，是东条侵略计划的积极推行者。

佐藤贤了，1942年至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是东条英机的高级军事顾问。

永野修身，1930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至1937年任海军大臣，1937年起任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年至1944年任海军参谋总长，1944年起任御前海军事务参议官，积极参与了对华和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活动。

冈敬纯，1940年至1943年历任海军省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次官，1944年起任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是太平洋战争计划的积极执行者。

岛田繁太郎，1935年至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年至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起任军事参议官和海军参谋长。是海军将领中积极参与和推行侵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松冈洋右，1935年至1939年任南满铁道会社总裁，1940年起任内阁参议官，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任外务大臣，是日本侵略扩张外交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是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主要组织者。

大岛浩，1936年至1938年任驻柏林武官，1939年至1945年任驻柏林大使，是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积极执行者。

白鸟敏夫，1936年至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年至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积极执行者。

重光葵，1931年任驻中国公使，1933年至1936年任外务省次官，1936年至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38年至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年至1943年任驻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大使，1943年至1945年任外务大臣，并兼任“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41年至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4月起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贺屋兴宣，1937年至1938年以及1941年至1944年任大藏大臣，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铃木贞一，1938年至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年至1943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大臣，1943年至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大

政翼赞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外侵略扩张活动。

星野直树，1934年至1936年任伪满洲国财政部实际领导，1937年至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局长，伪满洲国实际上的总理，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企划院总裁，1941年至1944年任日本副总理大臣，1944年12月起任日本大藏省顾问，是统治、奴役中国东北四省的主要罪魁之一。

桥本欣五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大政翼赞会”组织人之一，法西斯青年机关报《太阳大日本》杂志的发行人兼主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家”，青年法西斯运动的组织者。

大川周明，1926年起任南满铁道会社的“东亚研究所”所长，积极鼓吹侵华，是日本种族主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

木户幸一，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后任内大臣兼日皇枢密顾问，对起用东条任首相扩大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1月宣判止，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裁判。法庭接受了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犯有策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罪行的各种证据。

在法庭的判决书里，确认了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以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为目的，以达到用武力统治世界。法庭还判定，从1931年开始以来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判决书还确认，日军的暴行是有组织的，而且是按上级的命令执行的。

在审判进行期间，被告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中止审理他们的案件。被告大川周明患渐进性麻痹病而宣告为“无责任能力”，因而关于他的案件审理也停止进行。

1948年11月4日，是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祸的人民特别注目的日子。这一天，国际法庭对以东条为首的25名甲级战犯开始宣判。当东条英机等人被押上审判台时，旁听席的观众都投以愤怒的目光。过去，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把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亚洲人民、大洋洲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犯下了滔天罪行。如今，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个个耷拉着脑袋，心神不宁地站在被告席上，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神气了。似乎很难想象就是这群法西斯匪帮，曾经掌握过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践踏了一个个伟大的民族和众多的国家。

国际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贺屋兴宣、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畑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宣判之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48年12月22日深夜，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处绞刑的战犯，在东京鸭巢监狱内，一个个相继走上绞刑架，从而结束了他们的罪恶一生。

战犯东条英机是至死不悔的。他不仅仅在法庭上公然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而且就是把他判处死刑后，他还在最后遗言中呼吁美国人，不要使日本人的思想感情异化，不要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并说：“日本曾是亚洲唯一的反共堡垒，现在满洲已成为使亚洲共产化的基地。美国人还使朝鲜一分

为二。”他说：“这样将来必定产生大乱子。”东条至死不忘反共，可谓花岗石脑袋死顽固也！

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会按着东条之流的愿望发展的，过去他们曾经企图毁灭中国和整个东南亚，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又想毁灭日本，他们竭力鼓吹“焦土抗战”和“一亿玉碎”的自杀政策。然而，与东条之流的愿望相反，日本人民并没有被毁灭，只有战争贩子们才变成了历史的陈迹。

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希特勒没有逃出这一逻辑，墨索里尼没有逃出这一逻辑，他们的难兄难弟东条英机也没有逃出这一逻辑！

东条英机年表

1884年12月30日 东条英机诞生在日本一个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由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中将的大军阀，被称为陆军内部屈指可数的战术家。晚年著有《战术麓之尘》，被誉为日本“陆军之宝典”。

1889年9月1日 在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入学（第三期生）。

1902年9月1日 在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入学。

1904年5月 同校毕业。

1904年6月 在陆军士官学校入学（第十七期生）。

1905年3月 同校毕业。

1905年4月21日 授陆军步兵少尉衔，后参加日俄战争。

1907年12月21日 授陆军步兵中尉衔。

1909年 和胜子夫人结婚。

1911—1915年 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第二十七届毕业生）。

1915年6月8日 授陆军步兵大尉衔，任命为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中队长。

1916年8月18日 任职于陆军兵工总厂兼任陆军省副官。

1918年6月1日 专任陆军省副官。

1919年7月25日 任职于步兵第四十八联队。

1920年8月10日 授陆军步兵少佐衔，任命为力驻德国大使馆武官。

1922年11月28日 任命为陆军大学军事学教官。

1923年10月5日 兼任参谋本部部员。

1923年12月23日 兼任陆军步兵学校研究部部员。

1924年8月20日 授陆军步兵中佐衔。

1926年3月23日 任职于陆军技术本部兼任陆军部军务局课员。

1928年3月8日 任命为陆军部整备局动员课长。

1928年6月3日 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

1928年8月10日 授陆军步兵大佐衔。

1929年8月1日 任命为步兵第一联队长。

1931年8月1日 任命为参谋本部课长。

1931年9月18日 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借口进攻沈阳北大营，制造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条坚决支持这一侵略行径。

1931年9月25日 兼任陆军通讯学校研究部部员、陆军汽车学校研究部部员。

1933年3月18日 授陆军少将衔，特命任职于参谋本部。

1933年8月1日 任职于陆军兵工总厂。

1933年11月22日 被任命为军事调查部长。

1934年3月5日 任命为陆军士官学校干事。

1934年8月1日 任命为步兵第二十四旅团长。

1935年7月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鼓吹扩大和加强对内蒙的工作，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1935年8月1日 特命任职于第十二师团司令部。

1935年9月21日 特任关东宪兵司令，并兼任关东军警务部长。

1936年1月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和宪兵司令部，派大批特务以顾问名义前往中国原绥远省百灵庙活动，激起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敌热情。1月26日，内蒙德王守备队2000余官兵，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936年3月 在东条等帝国主义分子的导演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组织了以李守信，王英为首的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至此，德王集团便公开投敌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

1936年3月30日 东条领导的关东宪兵队，在柳河县大荒沟一带抓100余人，全部砍杀，制造了大荒沟惨案。

1936年8月 日本帝国主义指示伪蒙军进攻绥远。由于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敌人的进攻威胁着绥远地方统治势力的生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爆发了绥远的局部抗战。

1936年10月23日 日伪宪兵队破坏中共柳河县委，逮捕160余人，集体屠杀60余人。

1936年11月25日 德、日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定。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形成。

1936年12月1日 东条被授予陆军中将衔。

1937年2月7日 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昭和12年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

1937年3月1日 特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

1937年6月9日 作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上奏日本大本营，鼓吹大举武装侵华。奏折说：“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此上奏不久，就爆发了芦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1937年7月30日 日军攻占北平、天津。

1937年7月31日 东条率一支“精锐”兵团开始向我察绥和晋北地区进攻。连占张家口。大同等地。其“闪电”进攻，受到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嘉奖。

1937年8月11日 东条等策划的进攻张鼓峰一役，遭到失败，被迫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

1938年3月15日 东条指示日伪军警逮捕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林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人员300余人，其中近百人被判各种徒刑。

1938年5月20日 东条宪兵队破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所属下江特委，到7月8日止，逮捕16人，并处死刑及各种徒刑。

1938年5月30日 任命为陆军次官，负责陆军省常务工作。

1938年6月18日 任命为陆军航空部部长。

1938年10月21日 日军占领广州。

1938年10月27日 日军占领武汉。

1938年12月10日 任命为陆军航空总监，兼任陆军航空部长。

1939年5月11日 诺门坎事件爆发，日、苏交战。

1939年9月3日 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39年9月15日 诺门坎事件以日本失败告终，第六军团被歼，被迫与苏签订停战协定。

1939年11月初侵华日军纠集2万余人，在阿部中将指挥下，对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冬季“扫荡”。在黄土岭战斗中，敌酋阿部中将及其部下500人全被八路军歼灭。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在战场上击毙日军中将。

1940年2月21日 任命为临时军事参议官。

1940年3月30日 汪精卫的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1940年7月22日 任命为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

1940年7月29日 日本与印度支那当局正式签订了《日法共同防卫印度支那协定》。同一天，2.5万名日军即根据东条等人的命令，侵入印度支那南部。

1940年8月1日 日本近卫内阁提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 八路军以115个团近40万人的兵力，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持续战斗达3个半月之久，共毙伤俘日伪军4.6万多人（其中日军2.1万多人），攻克日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公里，缴获大量轻武器。这次“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东条等人的侵略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迫使日军撤换了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1940年9月27日 日本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德意对欧洲的统治权；德意承认日本对亚洲的统治权；三国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悍然进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

1941年7月2日 日本陆军省下达命令，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

1941年10月18日 东条被任命为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授陆军大将衔。

1941年11月5日 以东条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在御前会议上通过对美、英和荷兰开战的决定。

1941年11月16日 东条在临时议会发表战争演说。他强烈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他号召国民精诚团结，节衣缩食，为“一亿国民齐上阵”大事狂吠。会议并根据东条的要求，通过了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追加预算案。

1941年12月7日（华盛顿时间）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本侵略军根据东条的命令，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以及香港等地发动了进攻。

1941年12月8日 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同日，英国政府也对日宣战。

1941年12月11日 德、意、日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具体规定了瓜分世界的范围，要把反对美、英的战争进行到底，并不得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后，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的精神，在建立“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合作。

1942年1月2日 日军进入马尼拉。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英军向日本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将军投降。

1942年3月8日 日军占领仰光，缅甸南部战事告一段落。

1942年3月15日 日军占领整个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

1942年5月1日 日本侵略军5万多人，在冈村宁次率领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大扫荡。

1942年5月5日 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

1942年5月7日 美驻菲律宾远东军总司令温赖特将军向日本投降。至此，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东条的侵略军就侵占了泰国、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共侵占领土38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5亿。东条对此欣喜若狂。

1942年6月5日 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重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损失3500人。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日本侵略者就不敢随心所欲地进攻了。东条开始承认：“太平洋的主动权转入敌人之手”。

1943年1月4日 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和第八方面军下达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的命令。在瓜岛战役中，日军被击毙1.5万人，病死9000人，另有1000人被俘。

1943年3月8日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从腊包尔飞往布因途中，被美空军击毙。

1943年4月25日 古贺峰一海军大将继任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

1943年9月8日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1944年2月 在所罗门群岛一带和新几内亚的战斗中，日本海军动用了大部分军舰、6000多架飞机和10万部队。陆军在这里作战的约有27万人、2000架飞机。然而，尽管作出这样的努力，西南太平洋的战事还是以日本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到1944年2月以前，日军计损失13万人、70艘军舰（总计21万吨）、115艘运输舰只（总计38万吨）和大约8000架飞机，陆海军投入的战斗飞机几乎丧失殆尽。

1944年3月4日 日本大本营成立了中太平洋舰队，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任司令。

1944年3月31日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在从帛琉群岛飞往棉兰老岛途中，因天气恶劣，机毁人亡。

1944年4月中旬 为了加强中国大陆与南洋日军的联系，东条命令在华日军执行“一号作战”手令，尽速打通横贯中国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历时8个月，日军打通了3条铁路干线，击溃了50多万国民党军队，占据了140多座城市。这是东条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次强大的攻势。

1944年5月2日 根据天皇指示，丰田副武海军大将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

1944年6月15日 美军开始在塞班岛登陆，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命令决战，叫嚷“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1944年6月20日 马里亚纳海战，日本舰队遭到惨败。陆基飞机丧失殆尽。参战的9艘航空母舰被击沉3艘，另4艘受重伤，只有2艘小型母舰仍在战斗行列中。特别严重的是舰基飞机的损失，参战的360架飞机，只剩下25架。日本舰队的惨败，为美军占领马里亚纳主要岛屿大开了方便之门。

1944年7月6日 日本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和第四十三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因塞班岛失败自尽身亡。

1944年7月7日 美军宣布占领塞班岛。

1944年7月18日 由于战争连遭失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身任首相、陆相并兼参谋总长的东条从此退出军政舞台,但仍作为“重臣”参加重要国事的讨论。

1944年7月21日 日本大本营作出决定,加强菲律宾、台湾、琉球群岛、日本本土、千岛这一水域的第一道防线。

1944年7月22日 朝鲜总督,“高丽之虎”、露骨的扩张主义分子小矶国昭内阁正式就职。在皇宫举行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小矶发表声明:“决心团结大和民族,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继续奉行东条的战争路线。

1945年1月1日 美军占领日本控制的莱特岛。在莱特战役中,日军地面部队伤亡7万人。

1945年1月20日 日本大本营决定“本土作战计划”。

1945年3月26日 美军宣布占领硫磺岛。

1945年4月5日 日本小矶国昭内阁辞职,由铃木贯太郎组阁。

1945年4月7日 新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国会上说:“必须以任何手段打赢战争。”第二天,日本大本营批准了本土防御的补充计划,扬言“决战到底”。

1945年5月8日 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1945年6月8日 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企图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准备本土决战。

1945年6月9日 日本国会紧急会议通过了《战时非常措施法》和《国民自愿服役法》。按照这两项法案,日本政府有权不经国会批准,采取任何手段和措施继续进行战争。

1945年6月21日 美军宣布占领冲绳岛,日本守军司令牛岛满中将及其参谋长剖腹自杀。日本守军10万人中除1.1万人被俘外,全部被歼。岛上非战斗人员的死亡达15万人以上。

1945年7月26日 波茨坦会议发表宣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当天死伤约13万人。

1945年8月8日 苏联政府宣布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第二天,8月9日零时一过,苏联红军百万雄师分4路突入在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

1945年8月9日 美国向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日死伤约6万多人。

1945年8月9日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第二天,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的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并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如遇反抗,即坚决歼灭之。

1945年8月9日 日本军政要员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问题。军方强烈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反对投降。

1945年8月14日 日本军政要员举行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并照会盟国。

1945年8月14日 日本陆军发生宫廷叛乱。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7日 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

1945年8月19日 日本代表到马尼拉,听取了有关签署投降书的必要指示,并收到了同盟国拟定的日本投降书的全文。

1945年8月26日 麦克阿瑟将军通知日本帝国大本营,美国舰队已开始向东京湾进发。这支舰队拥有383艘军舰、1300架舰基飞机。

28日,美军先头部队在东京附近的机场降落;

30日,大批美军开始在东京附近和其他地区登陆,实现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同日,麦克阿瑟抵达东京,控制了东京的广播电台,建立了自己的新闻局。

1945年9月2日 盟国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1945年9月12日 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自杀未亡,随即被逮捕入狱。其他一些重要战犯也归案法办。

1948年11月12日 东条英机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12月22日被执行绞刑。

